

第8典 艺  
文

第9典 宗  
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  
外文化  
交流

第2典 地  
域文化

第3典 民  
族文化

第4典 制  
度文化

第5典 教  
化与礼  
仪

第6典 学  
术

第7典 科  
学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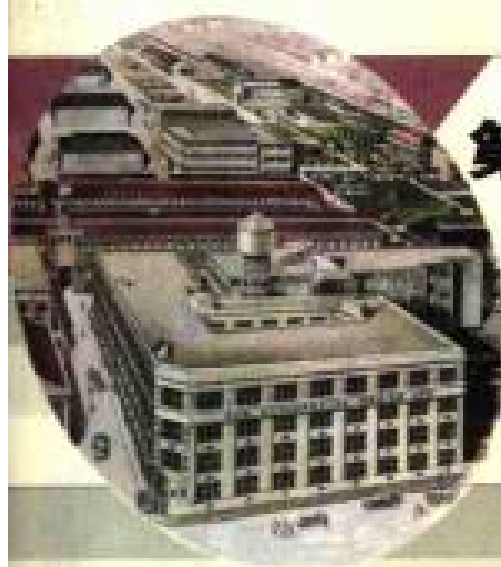
中华文  
化  
通志

第 1 典

【历代文化沿革】

# 现代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杜文君  
胡维革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历代文化沿革】

现代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 (1—010)

李学勤 主 编

---

现代文化志

杜文君 胡维革 撰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 数 377,000

印 张 15.375

插 页 1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8-02263-1/K·482

---

#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紘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玟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玟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校对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 现代文化志

### 作者简介

杜文君,1937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思想宝库》等。发表论文40余篇。

胡维革,1956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学术著作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深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现代(1912—1949年)文化的源流、发展、特点和成就,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展示了现代文化的全貌。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8年间,是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的年代。与该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化着、发展着。全书共分九章,既对现代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基本线索、文化主张和文化论争作了阐述,也对民俗、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史学、军事学、考古学等)、艺术、科技、新闻出版等分别作了介绍。其意图在于记述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势以及部门文化的发展历程。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言</b> .....	1
<b>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b> .....	1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	1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4
三、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7
<b>第二节 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b> .....	14
<b>第三节 文化主张与文化论争</b> .....	20
一、东西文化论战 .....	20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34
三、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论争 .....	45
四、现代新儒家 .....	54
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65
<b>第二章 民俗文化</b> .....	69
<b>第一节 民俗学研究概况</b> .....	69
<b>第二节 民俗改革</b> .....	77
一、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 .....	77
二、“五四”时期的社会礼俗变革 .....	87



三、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农村风俗的变革 .....	98
<b>第三章 教育</b> .....	110
第一节 概述 .....	110
第二节 教育思想、学说 .....	115
一、主要教育思潮 .....	115
二、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	121
三、蔡元培对现代教育学说的贡献 .....	123
四、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	127
五、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	129
六、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	132
七、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	135
第三节 教育的分化:不同的教育方针、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	138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 .....	138
二、国民政府统治区教育 .....	146
三、日伪统治区奴化教育 .....	153
第四节 教育改革、教育运动 .....	156
一、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	156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	160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166
四、乡村教育运动 .....	171
五、收回教育权运动 .....	175
<b>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上)</b> .....	179
第一节 哲学 .....	179
一、概述 .....	179
二、主要哲学思潮 .....	182

第二节 语言学	197
一、概述	197
二、语文改革运动	207
第三节 社会学	219
一、概述	219
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223
三、研究机构、团体与刊物	232
第四节 文学	236
一、概述	236
二、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246
<b>第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下)</b>	<b>260</b>
第一节 政治学	260
一、概述	260
二、政治学说、思想	267
第二节 经济学	286
一、概述	286
二、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288
三、主要经济学说、理论	296
第三节 法学	302
第四节 史学	308
一、概述	308
二、史观、史论、史派	315
第五节 军事学	336
<b>第六章 考古 博物馆 图书馆</b>	<b>343</b>
第一节 考古	343

一、概述	343
二、考古工作的主要成就	346
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主要业绩	349
<b>第二节 博物馆</b>	<b>351</b>
一、概述	351
二、主要博物馆	356
三、中国博物馆协会	358
<b>第三节 图书馆</b>	<b>359</b>
一、概述	359
二、主要图书馆	366
三、图书馆协会组织	369
<b>第七章 美术 音乐 戏剧 舞蹈 电影</b>	<b>372</b>
<b>第一节 美术</b>	<b>372</b>
一、概述	372
二、中国现代美术团体	375
三、中国现代美术报刊	379
<b>第二节 音乐</b>	<b>382</b>
一、早期新音乐运动	382
二、工农革命歌曲	383
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385
四、左翼音乐运动	387
五、新音乐运动	388
六、主要音乐团体	390
<b>第三节 戏剧</b>	<b>393</b>
一、概述	393
二、京剧	396

三、话剧	397
四、评剧	399
五、秦腔	400
六、越剧	401
<b>第四节 舞蹈</b>	403
一、概述	403
二、主要舞蹈团体	406
<b>第五节 电影</b>	409
一、概述	409
二、主要影片公司及其成就	410
<b>第八章 科学技术</b>	419
<b>第一节 概述</b>	419
<b>第二节 主要科研机构 and 学术团体</b>	422
一、中央研究院	422
二、中国科学社	422
三、中国天文学会	423
四、中国化学会	423
五、中国物理学会	424
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425
<b>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b>	425
一、数学	425
二、物理	426
三、化学	427
四、生物	430
五、地质	433
六、机械工程	435

<b>第九章 新闻 出版</b> .....	439
<b>第一节 新闻</b> .....	439
一、概述.....	439
二、主要新闻团体.....	443
三、主要通讯社.....	445
四、主要电台.....	446
五、主要报刊.....	447
<b>第二节 出版</b> .....	453
一、概述.....	453
二、主要出版机构.....	456
三、出版书目举要.....	464
<b>参考文献</b> .....	474

# 第一章 导 言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从此,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成了近代中国民族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爆发了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等。但这些斗争都是自发性的,因此都以失败告终。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因遭到慈禧太后一伙顽固派的镇压而告失败。但一批知识分子接受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各地出现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出版了一批革命的宣传品,其中著名的有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创办《民报》,宣传反清革命,并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攫取。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利用中华民国的招牌,反对革命。1913年3月,他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又镇压了孙中山、黄兴等发动的“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演出了一场短命的复辟帝制丑剧。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掌握北京的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曹錕、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为后台,统治直隶、江苏、江西和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奉系的张作霖,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逐渐把势力扩展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如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晋系阎锡山、川系熊克武、黔系刘显世、新疆的杨增

新等。这些大小军阀都把军队当作私产,凭借武力实行军事专政。为了割据称雄、扩大地盘和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他们彼此间进行着频繁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加剧了人民沉重的负担。全国陆军 1914 年为 45.7 万人,1919 年增至 138 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 70%<sup>①</sup>。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洋军阀不仅保留了清政府的全部捐税,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税。各种附加税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几乎无物不课,无处不征,甚至实行田赋预征。北洋军阀在大借外债的同时,还滥发公债、铜币、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据统计,1912 年到 1926 年,北洋政府共发行 27 种内债,实发额为 6.12 亿多元,为清政府三次发行公债实额的 10 倍以上。军阀政府的横征暴敛闹得民不聊生,加上军阀混战的烧杀破坏,兵匪的抢劫掳掠,给广大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军阀的统治,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奋起反抗,继续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 1913 年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1915 年 12 月 25 日,蔡锷在云南首义,发动了护国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响应,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7 年 7 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时,孙中山又发起护法运动。由于他没有提出发动民众的切实方案,手中无军队,只能依靠西南军阀,结果不到一年便被排挤而辞职,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力量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

<sup>①</sup>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4-165 页。



##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是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胚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基础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初步发展起来。

最早出现的中国人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如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看到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认为要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于是开始了以所谓“求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建立起新式军队并创办起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立制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同年他又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船政局;1867年,崇厚、李鸿章又设天津机器局。以后,在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汉阳等地陆续设立十几个中小局厂,制造枪炮军械。这些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的官办工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洋务派官员又开始了以“求富”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这类企业共约20个,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和纺织业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台湾基隆煤矿、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汉阳铁厂、湖北纺织官局、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

等。这些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

与此同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一共创办了约一百多个。但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到甲午战争时,大约只有七八十家<sup>①</sup>,包括缫丝、棉纺、轧花、面粉、火柴、造纸、印刷、制茶、制糖、制药,以及轮船修理和采矿等业。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从轻工业开始创办的,而且一直以轻工业为主。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继之,缫丝业在广州、上海等地有所发展。棉纺织业中近代工业出现的时间,比缫丝业晚几年。九十年代有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被火焚毁后改立华盛纺织总厂)、华新纺织新局(后改名恒丰纱厂)等。此后,有些官僚资本纺织企业,如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武昌四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等,逐渐转化为商办企业。棉纺织业中,最初真正商办的企业为朱鸿度于1894年在上海所办的裕源纱厂和严信厚在宁波所办的通久源纱厂(1896年正式开车)。在轧花业方面,1886年宁波出现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接着在上海也开设了几家机器轧花厂。在面粉业方面,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后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都有机器面粉公司出现。火柴业方面,从八十年代起,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都办起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是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和重庆的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造纸业方面,1882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机器造纸厂,1891年李鸿章又在上海集股开办了伦章纸厂。在印刷业方面,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此外,在制茶、制糖、制冰、制药等方面也都有近代工厂设立。

<sup>①</sup>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还经营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在采矿业方面还建立了一些使用机器的小矿。采煤业开办较早,在1880年前后创办了徐州煤矿、贵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枣庄煤矿、广西富川及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金属采矿业开办较晚,八十年代以后,约有十个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广东富商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有了发展。据统计,1872—1894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企业,全国共有72家,资本总额2097.7万元,其中完全商办的53家,资本总额460.4万余元。而1895—1913年间,新开设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企业已有549家,资本总额12029.7万余元,其中完全商办的463家,资本总额9082.1万余元<sup>①</sup>。无论是企业的数量,还是资本总额都比过去增加了许多。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总的发展趋势是:1895—1898年是设厂运动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创设新式企业有利可图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某些工业(如面粉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特别是抵制美货和收回路权、矿权斗争的推动,在1904—1908年间,又出现一个创办企业的高潮。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中国从西方各国的商品输入锐减,而由于战争的需要,出口却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

<sup>①</sup>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机。1914—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比此前的19年间超过1倍<sup>①</sup>。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1914—1922年,新建棉纺织厂54家,纱锭150余万枚,超过1912年的两倍以上<sup>②</sup>。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面粉工业发展也很快。大战前,中国只有面粉厂57家,1921年达到137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sup>③</sup>。其他如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中国民族工业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在竞争中被外国资本挤垮,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充分发展。当然,由于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

### 三、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它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魏晋时吸收老、庄而形成玄学;宋明时又吸收佛学而形成理学,等等,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的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其基本精神、格局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转折,也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6、188页。

③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38页。

的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有的封建经济逐步遭到破坏,政治制度面临解体,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壤之上的传统文化,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革新。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要求创造和发展为他们服务的新文化,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得不向近代转型;另一方面,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现出种种弱点和弊端,于是先进的国人不断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历程,是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密切联系的,它大体上经历了“物器”层面的文化变革、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三个阶段。<sup>①</sup>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中经 1861 年起始的洋务运动,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扬,从物器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舍己从人时期。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主持编译了《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此后,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民用科学的具体建议。此外,姚莹写成《康輶纪行》,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等。这些著作表现了近代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六十年代以后,“采西学”和“制洋器”成为更多人的议论话题。洋务派是这

---

<sup>①</sup> 1916 年 2 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便将中国近代文化史明确划分为三个前进的阶段。此后,梁启超在 1922 年 4 月《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又明确提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三时期说。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看法亦趋一致。当然,这种阶段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非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层面文化的变革,完全没有其他层面文化的变革,而是说在某个阶段中某种层面文化的变革居于主要地位。

些主张的实践者,他们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掀起了旨在学习西方以富强国家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而最早对此作比较系统说明的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冯于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论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中西文化关系发表意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意见是洋务运动的纲领,它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之前,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吸取其物器技艺,成为学习西方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变革的主要方面。洋务派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向海外派出了留学生,还办了一些学堂。这些学堂大体分外语、军事技术和工艺三类。与此同时,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译介西学的高潮。据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统计,到1895年,中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不包括宗教类),其中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书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类书籍。所翻译的自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医学等门类;技术书籍则包括兵工、造船、铁路、化工、矿山、冶金、纺织、印刷等门类。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冲击和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某些领域,促使其发生变化。然而,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之前却没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一时期支配文化各个领域的思想还是传统的儒学,是纲常伦理;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主要还是“中道西器”、“中源西流”和“中体西用”等主张,即认为西方文化不过强在技艺和物器方面,这只是“末用”,且是从中国古代流传过去的,中国文化重在道,这才是真正的根本,所以中国文化本比西方高明、优越,只需学其器技就够了。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是怀疑传统成法旧制,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转折点。日本因学习西方有道，竟能打败中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担任启蒙运动的主角，由此才真正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要求变法自强，并以此为主题推进文化运动。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科举八股、纲常伦理。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sup>①</sup>，响应变法。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以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为起点，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达到高峰。在“百日维新”中，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内容包括发展农工商业，提倡私人设厂办矿，奖励发明创造，改革军事和财政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遂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肤浅的、短命的政治变革，但却是一次深刻的、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手是康有为。他早年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后来又大攻西学。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自然科学和中国儒家今文经学，是康有为思想的两大支柱。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建议。此后他潜心研究变法理论，并在广州创设万木草堂，收徒授学，培养变法人材。九十年代，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先后刊行。这些著作冲击了封建传统，打击了“恪守祖训”的

---

<sup>①</sup>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33个、学堂17所、报馆9家、书局2家，共计51个（所）；至1898年增至300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页。

顽固势力,希图以“托古改制”的办法来变革现实。这一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从融合中西文化的愿望出发,致力于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他们用西学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使“儒家经义”成为一种体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儒学”,即“儒表西里”的“新学”。这种“新学”是戊戌时期新文化的主流。

严复是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曾经留学英国,具有深厚的西学修养。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强》,他在此文中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理论。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文本出版,此后进化论在中国广泛流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逐渐取代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主流。此后,中国出现了大量译介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的热潮,表明在制度层面文化变革的发展。据《译书经眼录》载,在二十世纪初年翻译的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164部,占总数的19.6%;社会科学类327部,占总数的60.9%。这一时期有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如卢梭的《路索民论》(即《民约论》),《培根文集》,孟德斯鸠的《法意》(即《法的精神》),穆勒的《自由原理》、《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译名为《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论》以及《美国独立檄文》(即《美国独立宣言》)等。

这一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方面积极策划、发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战线大造革命舆论。他们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并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其政治内涵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统一,即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一起来;其文化内涵是进行“国魂”的陶铸,即强调对传统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改造。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受到改良派的反对,双方利用各自所办的报纸展开了尖锐的思想论战。如在1905年以前,在檀香山有《檀香新报》与《新中国报》的论战,在香港



有《中国报》与《商报》的论战,在旧金山有《大同报》与《文兴报》的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亲拟《发刊词》,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旗帜,随即受到梁启超主笔的改良派《新民丛报》的集中攻击。1906年4月,《民报》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双方在12个问题上的分歧,主题是中国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使思想论战进入高潮。论战在三个方面展开:(1)革命还是保皇,其实质是要不要推翻已经堕落为“洋人朝廷”的清朝政权;(2)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质是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3)土地国有还是地主私人占有,其实质是要不要改变传统的土地所有制。这场论战以改良派的败退而告结束。通过论战,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从而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深入较量,文化变革的时期。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这段时期,思想界泛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人们的怀疑增长了,发展了,于是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成了当时变革社会的先声。“五四”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变革的表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

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sup>①</sup> 只有进行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才能造就新国民,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文学革命。《新青年》从创刊起,就以青年为主要对象,向他们痛切陈述当时中国社会黑暗腐败状况和封建专制的罪恶,号召青年“破除迷信”,“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新青年》的思想家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指出“提倡孔教必掣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将民主称作“人权”,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同欧洲一样全面完成“解放历史”。他们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指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要求以科学和理性来判断一切。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道德,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他们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文学革命。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这场运动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新青年》的领袖们虽然声明不谈政治,但他们的基本活动都是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的。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的牢笼,目的是要“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提倡“平等人权”等新思想,目的都在于“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是非常激进的,他们重视思想革命的作用,甚至不承认任何传统的权威和因袭的教条,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

---

<sup>①</sup>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神。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表现是全盘否定中国,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这表明他们还缺乏科学的分析批判能力。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并为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了近10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500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sup>①</sup>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二十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民族“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彻底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其基本态势是: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具体说来,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民国初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法令的公布，一时间民主共和思想张扬，西学大量传入，新式学堂成倍增加，各种报刊达500多种，政党、社团亦猛增至300多个。由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祭出尊孔复古旗帜，康有为等人成立孔教会，“请定孔教为国教”，

扬言“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带动封建旧文化猖狂反扑。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新青年》），树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同年，任鸿隽等创办《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和地质调查所也次第成立，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此同时，东西文化论战全面展开，并首先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的优劣方面。该时期的特点是：与政治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相呼应，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更加激烈；人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观念层面文化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发动了旨在思想革新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把文化革命推向高潮，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出现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西方各种思潮、学说纷至沓来，并迅速向各学科领域扩展；教育改革、文学革命、社会礼俗变革等深入发展。在此期间，东西文化论战、新旧思潮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持续不断。中国文化界出现了“百家并起，异说争鸣”的局面。该时期的特点是：“五四”运动激发了全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广泛传播；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新文化先锋已经举起“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文化主张竞相提出；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受到沉重打击。

1924年以后，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使政治思想问题显得突出。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当时，新三民主

义是国共两党和各界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刊为阵地，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想，共同反对封建教育、封建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同时，与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等反动思想进行斗争。该时期的特点是：三民主义走向新生，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共同高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国共两党严重对立，各种社会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使社会政治思想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蒋介石集团推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宋庆龄等革命民主派坚持新三民主义，邓演达等第三党提出了“平民革命”论，此外还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胡适等人的“人权派”政治主张和梁漱溟的“乡建理论”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并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了左翼文化团体（如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的斗争。鲁迅正是在这一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实质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争论。此后又发生“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争，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出路问题。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此激发起全民族抗日救亡思想大发展，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国难中的新觉醒。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抗日救亡”成了全民族关注的中心课题，以抗战为中心的文化运动空前高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光大。这一时期，一切具有爱国民主意识的文化界人士，关

注国家命运,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标志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将抗日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此后,一大批优秀的抗战文化作品相继问世。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反共的逆流,对抗日文化运动予以种种限制和迫害。对此,爱国的文化工作者进行了坚决斗争,使抗战文化运动得以继续下去。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农村、部队,创作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四十年代以后,中国各政党、团体围绕中国前途和命运展开论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蒋介石集团把新专制主义理论系统化;一些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许多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该时期文化的特点是:抗日救亡成为历史的主题,抗日、民主、团结是各抗日团体和人士的共同呼声,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流;国共两党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中各自将自己的理论系统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人民在抗日救亡中有了新的觉醒,又一代新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家、作家和文化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文化事业刚刚复元,国民党政府即发动全面内战,并对国统区文化界实行高压政策,残害进步文化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破坏文教事业。这一时期,解放区的文教事业有了全面发展。1948年中共中央新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一批地方报纸创刊。在教育领域,除原有的十余所高等学校外,又创办了一批新的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及村学、冬学均有较大发展。文艺界又创作了一批工农兵题材的优秀作品。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决战形势相适



应,政治思想战线也呈现“决战”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伟大胜利,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在中国破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专制主义最后失败,以美国“白皮书”为代表的侵华理论受到彻底批判。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直至解放大陆,人民政府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文化事业,将其改造成为人民的文化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sup>①</sup>

---

### 第三节 文化主张与文化论争

---

#### 一、东西文化论战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论战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和深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一直持续着,并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再引发各种形式的论战。从洋务运动时的体用之辩,到维新变法时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德、赛两先生与“孔家店”的对抗,科学与玄学之争,几十年间,从未中断。此中又以持续十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的领域最广泛。围绕着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如何认识自身文化,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评价传统文化及资产阶级文化,如何认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问题,文人学者见仁见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智,各抒己见,发表专著、文章近千种。他们提出的种种观点、主张、设想、方案,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党派或群体对于中华文化命运的关注,表明国人对文化的反省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这场论战依中心论题的变化和时间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论争的主要内容

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论争的第一阶段。论争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异同。当时争论主要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伧父)任主编的《东方杂志》间展开,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论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历数当时中国社会黑暗,并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①</sup> 他还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推崇法兰西革命对近世文明的贡献,并将“近世文明”特征概括为“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认为:“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sup>②</sup> 此后,陈独秀又著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78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sup>①</sup> 1919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对西学东渐中民族文化自觉过程作了回顾与前瞻。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sup>②</sup>

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受到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康有为、辜鸿铭等发表言论，提倡尊孔复古，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当时与《新青年》正面交锋的是杜亚泉及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从1916年开始，杜亚泉以佺父为笔名，先后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他认为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sup>③</sup>。他列举两种文明的差异是：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生活是向外的，中国人生活是向内的；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崇拜竞争之胜利，中国崇尚与世无争；西洋以战争为常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7—100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佺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10日。

态,和平为变态,中国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sup>①</sup>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文明之定义,本为生活之总称,即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今日东西洋文明,皆现一种病的状态”<sup>②</sup>。“就经济状态而言,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也。”“就道德的状态而言,在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他强调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sup>③</sup>。他认定:以儒家为主体的固有文化,是中国的“国是”,是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破坏了这种统一的标准,于是造成“迷乱之现代人心”、“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因此,“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当今“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国固有之文明”。<sup>④</sup>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虽然采纳杜亚泉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但却肯定西洋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应该“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sup>⑤</sup>。此后,陈独秀先后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文,批判杜亚泉及

①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10日。

②③ 伦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15日。

④ 伦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⑤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东方杂志》维护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阐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根本区别与优劣。杜亚泉又作文《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答辩。

1919年2月至3月,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攻击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攻击新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对此,李大钊等立即予以反击。李大钊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指出:“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sup>①</sup>

同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信中称:“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北京大学是“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sup>②</sup>该报刊载林纾公开信的同时,还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评论,为林纾助阵,指名攻击北京大学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绝对的非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新派主张“怪诞不经”,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sup>③</sup>。蔡元培看到林纾的信后,当天便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要求《公言报》全文照载,以明辨是非。蔡元培说,北京大学并无“覆孔孟,

<sup>①</sup>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6页。

<sup>②</sup>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491、49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494、495页。

铲伦常”的过分言论,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并且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sup>①</sup>他重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sup>②</sup>

## (二) 第二阶段论争的主要内容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0年为论争的第二阶段。论战由比较东西文化差异转而讨论东西文化的相互关系,即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如何调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章士钊、陈嘉异、张东荪、蒋梦麟、常乃惠等。

章士钊是东西文化调和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1919年9月,他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演说:“自古朝代变换,每有一定时日可指,……至言时代之精神,则决无如此显明之界线可分。”这是因为“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所谓“移行的”,是说世间万物,不论进化到何种阶段,“仍是新旧杂糅也。此之谓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故今日之为青年者,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具体到文化问题,他说:“一面开新,必当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此其所当知者。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sup>③</sup>

章士钊此说一出,立即在思想界引起不同反响。陈嘉异、杜亚泉

<sup>①②</sup>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8、271页。

<sup>③</sup> 章行严:《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等著文,表示赞成“调和”说。陈嘉异说:“其实若综合哲理与历史而观,乃至推论至自然界一切现象,仍不得不以章先生之说为适当。此固进化之原理与其过程所以昭示吾人者如此,初非可以笔舌争,亦非可以意气争者也。”<sup>①</sup>杜亚泉则接过章士钊的“移行”、“调和”论,解释说:“盖旧习惯之破坏,乃新思想成立后自然之结果。新屋既筑,旧屋自废;新衣既制,旧衣自弃。今不务筑新屋,制新衣,而惟卷人之茅茨而焚之,剥人之蓝缕而裂之,……故以非新非思想而揭集为新思想者,实际上乃阻遏新思想之最有力者也。”<sup>②</sup>

张东荪最先著文反驳章士钊的“调和”说。他认为:“只有突变与潜变,而没有移行。譬如我们鼓吹新思想便是创造潜变(即下变的种子),决不能与旧的调和,一调和了,便产生不出变化,……所以潜变是不能调和的,调和潜变便是消灭潜变。”但突变以后可以调和,“我的调和说与章君不同,我以为调和不是甲乙的混和,乃是另外一个东西(如丙)”,不是正负的混和,必定是正负以外的东西。<sup>③</sup>

蒋梦麟提出:“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新文化的创造“打破了旧的安乐窝,若要免去争端非新的停止活动不可,要新的停止活动,就是要中国停止进化”。他指出:“‘新’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目的。‘旧’是对于这新态度的反动。”新旧不是两个学派,“两个学派之中能容调和派,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sup>④</sup>

常乃惠亦反对东西文明调和说。他认为“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不过西洋文明已从古代超入现代,而东洋文明还正在迟迟不进的时候”。他援引孔

① 陈嘉异:《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② 伦父:《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③ 张东荪:《突变与潜变》,《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日。

④ 蒋梦麟:《新旧与调和》,《晨报》1919年10月13、14日。

德关于社会进化必经神权、玄想、科学三个时代的说法,认为西洋文明是科学的第三期文明,东洋文明是第二期文明。文明进化的趋势只有由第二期向第三期前进,而不能从第三期退到第二期。<sup>①</sup>

陈独秀说: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但“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他以货物买卖为喻,说明“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他还批评“调和论”主张的“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决计不可能改造私有制度下的旧道德。<sup>②</sup>

李大钊批判东西文化调和论,在分析“物质开新,道德复旧”观点时指出:“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复旧的道德,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sup>③</sup>李大钊还从经济上分析中国近代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

① 常乃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国民》2卷3号,1920年10月1日。

②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③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封闭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形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sup>①</sup>

在这一阶段论战中,章士钊等以“进化”、“调和”观点否定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而新文化营垒亦存在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近代文化一概肯定的倾向,因此也未能科学揭示东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

### (三) 第三阶段论争的主要内容

从1921年到1927年为论争的第三阶段。虽然从表面上看争论重点是东西文化优劣比较问题,但实际上主要辩论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新文化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张东荪、胡适、瞿秋白、杨明斋、郭沫若、孤桐等人。

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后归国。3月,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欧游心影录》,表明他最终完成由崇拜西方文化到反对西方文化的转变过程。梁启超在文中总结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陆的观感,向国人介绍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凄惨衰败景象。他认为科学刺激的物质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将人类抛入战乱频仍、弱肉强食、道德沦丧的深渊。他称这“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梁启超要青年先“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

---

<sup>①</sup>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诚意”，再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它，“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并“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sup>①</sup>

1922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sup>②</sup>。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第三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第四章，西洋、印度、中国三方哲学之比较观；第五章，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梁漱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样法有三种，或曰三个不同的路向，即（1）向前面要求；（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3）转身向后去要求。从人类历史上三大文化体系看，西方文化是第一路向，即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第二路向，即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第三路向，即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基本精神。梁漱溟提出以上三种文化的运思方式特征：（1）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2）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3）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这三种思维特征分别适用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他指出西洋文明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路，这一路已经走到头，必须转入用直觉研究人对人的问题这文化发展的第二路。至于人类文化走向印度文化的运用现量的路，那还是遥远的将来事。据此，他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化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化复兴”<sup>③</sup>。后来，梁漱溟自认“这书的思想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3月3日至3月25日。

② 据梁漱溟回忆：“至1920年秋，我才开始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授内容发表于《少年中国》杂志。1921年暑假，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我在济南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四十天，由罗常培记录全文，在山东首次铅印成书。不久由北京重印，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共再版十多次。”——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199、200页。

差不多是归宗儒家”，其任务就是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导向“孔子路上来”。<sup>①</sup>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的第一年中就印刷五次之多，可见其影响之大。围绕该书提出的观点在思想界展开的激烈争论，成为“五四”后期东西文化论争的一个新的热点。

陈嘉异发表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宣布自己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反对东西文化融合之论。他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备的优点，即：（1）它是独立的、创造的。（2）它具有调和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优越性，而且能够用精神生活统御物质生活，并把两者融为一体。（3）它有调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越性。（4）它具有由国家主义到达世界主义的优越性，而尤以世界主义为其归宿，故东方文化可为将来之世界文化。“故余以为东方文化实非仅东方国家之文化，乃一未来之世界文化也。”<sup>②</sup> 柳诒徵发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认为中国文化是“极中和之道德，极高尚之文学”，“今虽礼教凌迟，然而流风未沫，……此正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也”。<sup>③</sup>

对梁漱溟文化理论提出批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胡适、张东荪等人坚持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之路，而瞿秋白等则提出应该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以取代封建宗法文明和开始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文明。

张东荪强调民族间的文化可以相互吸取，可以发生变化，不赞成把世界文化分作三种路向的说法。他认为“奋进以征服自然而扩张生活本是生命固有的倾向”，这是西洋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我们要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乃是吸收人类公同的东西”。<sup>④</sup>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8版《自序》。

②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年1月。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学衡》第27期，1924年3月。

④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9日。

李石岑认为,中国、印度、西方都在向前走,不同之处在于走的方式和速度,而不是三种不同的路向。他批评梁漱溟排斥印度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态度,认为我们重视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看重“赛因斯”和“德谟克拉西”精神,而这决非三纲五常之类呆板教条所能改造得了。梁君推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走孔子的路,“不免有变更事实迁就学理的毛病”。<sup>①</sup>

胡适批评梁漱溟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观点是“闭眼瞎说”。“梁先生太热心寻求简单公式了,所以把这种历史上程度的差异,认作民族生活根本不同方向的特征,这已是大错了。”胡适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现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sup>②</sup>胡适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洋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分析西洋近代文明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1)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2)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3)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这样的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而且它“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sup>③</sup>

①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②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

③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在这一阶段论战中,瞿秋白先后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论战的看法。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它包括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系统四个方面——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所当有的。若研究文化,也自然应依此程序。他指出:“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瞿秋白论证了东西文化的历史兴衰转变,揭示了两种旧文化代表落后于时代的共同本质:“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sup>①</sup>他把现代文明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指出现代文明问题“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这个伟大的运动将“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sup>②</sup>

1924年6月,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出版。全书共分四

①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

②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

部分：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评章士钊的《农国辨》；总解释。这是一部从广阔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分析、批判的著作。作者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分别对文化定义、文化成分、文化起源、文化变动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凡是在或种天然地理及经济条件之下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愈久，愈不易变动。久处这种文化的民族其抵抗归化外来的文化之力也愈大。假使他所处的天然地理或经济的条件变动，则其文化随之也变动。所谓变动者即旧文化不适用，新文化产生或新旧并行皆是。其变动之时机如水旱天灾气候转移，人口增加，政治之战争，民族之互相迁合及其战争与侵略。但是文化虽变动而其民族习惯——性——常常的经过许久时期还存在其中。”<sup>①</sup>“中国自秦以后采用了儒家的文化，便是偏于讲人情及自修的文化；在经济方面停止了进化，在政治方面永不会产出伟大的法律；同时也不发达杀人的战具。”<sup>②</sup>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根由：“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sup>③</sup>指出：“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sup>④</sup>杨明斋在书中通俗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探讨了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并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以及国民的社会生活等作出新的解释。

1926年7月，《政治生活》发表署名希祖的文章，点名批判胡适没有介绍西洋近代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而只是“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又作了一次将死的最后的呻吟”。作者表示既反对胡适等赞美的西方

①②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书局1924年版，第231—232页。

③ 同上书，第309页。

④ 同上书，第308页。

资产阶级文明,又反对东方封建文化,而欢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和解剖的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以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与他们的团结和争斗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策略和其对于未来的共产社会的组织的意见等等。总之我们所欢迎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sup>①</sup>

##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这场论战历时六七年之久,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领域。它不仅是学术论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

### (一) 历史背景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逐渐控制全国政权。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一次把“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解答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就需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党派的代表人物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积极参与了这场论争,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观点。

怎样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看法。

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

---

<sup>①</sup> 希祖:《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政治生活》第79期,1926年7月。

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sup>①</sup>。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把中国“列入半殖民地”国家。<sup>②</sup>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当时的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sup>③</sup>。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受帝国主义操纵和支配的,“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sup>④</sup>。为此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2年10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主张中国人根本“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sup>⑤</sup>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sup>⑥</sup>。同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认为:“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sup>⑦</sup>。“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

② 同上书,第80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⑤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115页。

⑦ 同上书,第202页。



还要厉害。”<sup>①</sup>

1926年3月,毛泽东根据“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sup>②</sup> 社会的情况,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指出“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sup>③</sup>。同年5月,托洛茨基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针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批驳。这样,中国问题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成了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sup>④</sup>，“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sup>⑤</sup>,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⑥</sup>。大会批判了认为中国革命当时已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错误论断,指出把现时中国革命说成“不断革命”是不对的。中共“六大”决议遭到了敌对阶级或其他一些党派的攻击,也得到了进步的革命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拥护和捍卫。这场论战实质上是围绕着中共“六大”决议而展开的。

## (二) 论战的过程和内容

首先挑起这场论争的是托陈取消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少数人拥护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撰写反对中共“六大”的文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页。

④⑤⑥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1、3页。

章。1929年8月到10月,陈独秀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中共“六大”决议相对立的主张。这些主张后来在陈独秀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观点是:(1)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结局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sup>①</sup>。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sup>②</sup>。(2)中国封建制度之崩溃,“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sup>③</sup>。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深入农村,“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中国农村经济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地主已资本家化”<sup>④</sup>,因此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了。(3)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1930年中国托派把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编译成《中国革命问题》(第1、2集),由上海书局出版,在更大范围宣传托派的观点。

另外,还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1928年戴季陶、周佛海等在上海出版《新生命》月刊。陶希圣从1928—1930年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等文章,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向来发达,“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sup>⑤</sup>。1929年新生命书局出版了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

①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③④ 同上书,第90页。

⑤ 同上书,第115页。

中国革命》等著作。由于陶希圣的观点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并使用一种“如果这样,就是那样;如果那么说,就是这样”的叙述方法,结果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无法确定其性质的社会。当时有人戏称陶希圣笔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X 社会”。

1929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其中涉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年12月李立三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sup>①</sup>,系统地批驳了托陈取消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还组织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投入这场论战。1929年11月,王学文等在上海出版《新思潮》杂志。1930年4月该刊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分别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状况,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中国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同年6月,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成立,明确提出自己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9月他们创办《社会科学战线》,投入论战。1931年1月“社联”又出版《书报评论》,由柯柏年主编,发表反驳托派和“新生命”派观点的文章。

---

<sup>①</sup> 此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2、3合期(1930年3月15日),4、5合期(1930年5月15日)。

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中国托派,是“新思潮”派的主要对立面。

严灵峰在1930年7月参加创办《动力》杂志,先后在该刊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两篇文章,并以这两篇为主又加了《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编成《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于1931年6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1932年他还写了《追击与反攻》一书。任曙也有《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出版(1931年1月)。他们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位托派分子刘镜园也先后发表《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sup>①</sup>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sup>②</sup>,认为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

此外,还有一些人标榜自己对“新思潮”派和托派观点都不同意,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种种说法。

如孙倬章在《中国经济的分析》中提出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的地位”<sup>③</sup>;胡秋原在《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sup>④</sup>;金如海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略评》中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落后资本主义社会”<sup>⑤</sup>;罗敦伟在《中国统制经济先决问题》中说中国社会是“变质的封建社会”<sup>⑥</sup>;方亦如在《中国经济问题》中说中国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sup>⑦</sup>,等等。

《读书杂志》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

①③ 《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

②④ 同上书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

⑤ 《综合》创刊号,1934年5月1日出版。

⑥ 《中国经济》第1卷第7期,1933年10月25日。

⑦ 《研究》第1期,1932年4月1日。

主要阵地。该刊由神州国光社王礼锡主编。1931年8月该刊第1卷第4、5期作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出版。王礼锡作序说明论战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性,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sup>①</sup>。邀请各派人士参加讨论。此后该杂志继续刊登有关论战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2、3、4辑。在该刊发表文章、参加论战的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等,托派的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胡秋原,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有《新思潮》的成员,还有张闻天、熊得山等。此外,也有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论战各派之间,尤以“新思潮”派与托派的争论最为激烈。

论战以当时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诸种势力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托派认为,帝国主义的侵入“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sup>②</sup>。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没有本质区别,两者携手“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sup>③</sup>,因而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指出,帝国主义的商品——资本输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

①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

②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1卷第3期,1930年9月30日。

③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9页。

且加紧了这种剥削”<sup>①</sup>，因此，“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sup>②</sup>。“新思潮”派还指出，帝国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区别，托派鼓吹对两者“一视同仁”的观点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实际是在宣传“殖民地化”。<sup>③</sup>

第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托派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sup>④</sup>。“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并且“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有蒸蒸日上之势”<sup>⑤</sup>。“新思潮”派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各帝国主义的附庸”<sup>⑥</sup>。中国民族资本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大战结束，面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之势，“不得不处于困难之境，或相继地倒闭或缩小其生产规模”<sup>⑦</sup>。“新思潮”派还揭露托派乱用统计数字，混淆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

第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势力在农村的地位已被资本主义所排挤，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已转变为资本主义。他们说：“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

---

① 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

② 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

③ 伯虎：《中国经济的性质》，《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1931年5月。

④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455页。

⑤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动力》第1卷第1期，1930年7月15日。

⑥ 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1日。

⑦ 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

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sup>①</sup>现在封建地主已不复存在,土地集中在资产阶级化的“新式地主”<sup>②</sup>手中。“新思潮”派批驳托派的上述观点,指出帝国主义总是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以实现其殖民统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是地主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本家的地主化。“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致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sup>③</sup>“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土地问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一日没有希望。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sup>④</sup>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大体从1929年持续到1934年,出版有关著作30余种,论文150余篇,发表论战文章的期刊近60种。此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逐渐走过了高潮期。1933年神州国光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读书杂志》被迫停刊,论战告一段落。这场论战的结果是“新思潮”派的观点被普遍接受。正如当年有人所记述的那样:“那次论战以后,这样的结论事实上都已在思想界中无形地揭晓了。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底性质如何,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经济。”<sup>⑤</sup>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历史方面的深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是论战从现实问题到历史问题的继续和深化,但它们的酝酿

①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1页。

②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1卷第3期,1930年9月30日。

③④ 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

⑤ 沈志远:《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1935年7月10日。

和发展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

1928年2月郭沫若流亡日本后,开始进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1930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印行。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追论及补遗。<sup>①</sup>郭沫若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sup>②</sup>该书提出中国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的观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学说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者吕振羽等赞同郭沫若的方向,指出其研究的功绩,不在于其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而在于其首先运用唯物史观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而“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托派文人杜畏之、李季,还有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等人,则群起而攻之。1931—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成为文化战线的—个热点。《读书杂志》仍是争论的主要阵地。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二:

第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焦点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郭沫若认为“亚细亚”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在中国大体是在西周以前。后来他又进一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李季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和奴隶制并行而先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杜畏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同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几种并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这种生

① 其中,《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曾发表于《思想》1928年第4期。关于《诗》《书》《易》的研究文章,曾化名杜衡,在1928年9、10月间《东方杂志》上连载。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



产方式。胡秋原和王宜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农奴制,是“先资本制”时期。应该看到,作为郭沫若的论争对手,李季、杜畏之、胡秋原等尽管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不一,但却共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学说,认为这一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

第二,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郭沫若认为西周属于奴隶社会,肯定中国历史经历了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吕振羽、翦伯赞、邓云特等虽然在具体断代时限上与郭沫若有分歧,但他们也都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反对“空白奴隶制”说。陶希圣、李季、杜畏之、胡秋原等人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但他们共同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经过争论,赞成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社会的人越来越多。

第三,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键问题,是关于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联系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托派文人和陶希圣等为了证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前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李季认为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历时2086年,中国处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陶希圣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即已崩溃,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共同鼓吹“商业资本主义”理论,称它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胡秋原和王礼锡则提出一种“专制主义社会”说,认为中国自秦至清末,就在这一阶段。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秦统一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是一直存在的。吕振羽对封建社会的上限与郭沫若观点不同,但他也肯定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封建制社会。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商业资本主义”说,指出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资本是不同的。商业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任何独特的生产方式,亦不能成

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段。

中国社会史论战,其政治意义明显地高于学术意义。这场论战也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仅从学术上看,许多问题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直到今天,学术界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 三、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论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它是二十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论战的两极是“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对立。由于陈序经公开打出“全盘西化”的旗号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使这一时期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事实上进行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一是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

#### (一)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

1934年4月16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演讲。他说:“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sup>①</sup>由此,他提出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同年10月10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陈立夫任理事长,提出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统一精神”、“创造精神”为该会主旨。同时创办《文化建设》月刊。该刊发刊词宣称:“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夫然后才有中国的民族复兴。”<sup>②</sup>陈立夫在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文化建设论》,认为:“我们要建

<sup>①</sup> 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

<sup>②</sup> 《文化建设》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

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再尽利用科学的发展,以创造人民所需关于衣食住行之资料,则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sup>①</sup>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sup>②</sup>联名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称“一十宣言”或“十教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是经过几个月酝酿写成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没有了中国”——提出为什么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2)“一个总清算”——检讨过去。“宣言”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由于受外国的侵略和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失去了本位的特征。近代的几次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解决中国文化上存在的问题,反而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落。因此,如何建设中国文化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主张复古,有人以为应模仿英美,有人主张模仿苏俄,有人主张模仿意德,但这都是错误的,不可行的。(3)“我们怎么办”。“宣言”称:“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为此,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1)中国是中国,有它自己的特征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2)徒然赞美或诅咒古代中国的制度思想,都是

① 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

② 十教授为王新命、何炳松、武培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儒、樊仲云、萨孟武。

无用的。“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sup>(3)</sup>“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吸收的标准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sup>(4)</sup>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领域，并且对于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sup>(5)</sup>“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总之，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该“宣言”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相继转载，成为全国文化界关注的事件，在中国文化论坛上引发了一场大争辩、大风波。在这场讨论中，一些论者对“宣言”提出的“不守旧”、“不盲从”、“择善而从”的观点在原则上表示赞同，但又认为，“宣言”过于“笼统”、“空泛”，只提出空洞的原则，而无具体实施方案。何谓“中国本位”？如何建设中国文化？是讨论的主要问题。胡适认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sup>①</sup>陈石泉说：“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无非以现在的中华民族为单位，且依其需要而为民族文化的出发点。”<sup>②</sup>张熙若说：“中国本位”四字究竟作何解？“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具体主张到底是什么？我们局外人还如堕在五里雾中<sup>③</sup>。一篇署名鲁人的文章指出，要提高中国的文化，应该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首先必须反帝反封建。<sup>④</sup>

面对各方文化人士的批评，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5月10

---

①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1935年3月31日。

② 陈石泉：《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天津《大公报》1935年3月13—21日。

③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④ 鲁人：《论中国本位文化》，上海《大美晚报》1935年2月18日。

日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认为“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我们所揭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地的环境，热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sup>①</sup>同日，陈立夫发表《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认为“三民主义者，即以中国为本位之文化建设纲领也，故以如此之信仰建设国家，则国家得以生存，贡献世界，则世界得其进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真义，其在斯乎”。<sup>②</sup>

此后，“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又呈现新的热潮，各种评述议论纷纭，赞成者、反对者、修正者、怀疑者各种观点皆有。如严既澄认为，应把“中国本位”四字取消，把讨论集中到“今日的中国究竟应否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这个题目上。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其办法就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主，而吸收西洋文化之所长以补助之<sup>③</sup>。卢于道说：“提倡文化建设，不若曰提倡科学建设之更为直截了当。夫如是，方言之有物，行之有方，结果效验可期。而中国文化可得而建设也。”<sup>④</sup>梁实秋称建设“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这实在是一种夸大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在此时此地发生，我以为是最不合于‘此时此地的需要’。”<sup>⑤</sup>刘絮敖说：“所谓‘中国本位文化’，也就是‘在我国的利益前提下，以从事于文化活动’的意义。”“我认为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在原则上似应为无人可以反对的。不过在未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我认为还须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以为前提，若是不

① 王新命等：《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

② 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文化与社会》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

③ 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22—23日。

④ 卢于道：《科学的文化建设》，《科学》第19卷第15期，1935年5月。

⑤ 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

然,则我们一切的努力,是要归于白费的!”<sup>①</sup>王西征说:“‘三民主义’是中国现在一切设施的依据。”但十教授讲本位文化的基础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这样“在三项‘此时此地的需要’中,没有‘民权主义’”,三民主义成了“二民主义”<sup>②</sup>。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的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sup>③</sup>

总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讨论没有达到“十教授宣言”的预期目的。这场讨论发起者的本意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以强化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因此它不可能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 (二) 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

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正面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全盘西化”一词是胡适首先使用的。1929年他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文中使用了两个词来表达其文化观点,一个词是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个词是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此后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篇书评,指出胡适文中用的两个词意义不一样,前一个词可译作“全盘西化”,后一个词可译作“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他还表示,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赞成“全盘西化”。从此“全盘西化”一词才流传开来。

1934年1月,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提出了“全盘西化”论的主张。该书是作者在二十年代末三十

① 刘絮教,《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

② 马芸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经籍书店1936年版,第236页。

③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8页。

年代初写成的,书中的观点于1933年底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过<sup>①</sup>。作者在该书《代序》中指出,作这个大题目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的,表明要继续上次论战的态度。当时的报刊也发表过一些讨论文章,但影响不大,及至“十教授宣言”的讨论展开,陈序经的观点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视。在讨论中,陈序经先后发表《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再谈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辩护》等文章,反复阐述其“全盘西化”论观点。

陈序经说:“关于中国文化底主张,大约可分作下列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其理由是:“(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sup>②</sup>。他认为“复古派”和“折衷派”都有缺点,都不能行得通,“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sup>③</sup>，“我们应该全盘西化。”<sup>④</sup>

胡适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前后表述不一。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开展后,陈序经在论争文章中把胡适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为此胡适在《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套“文化惰性”理论,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

①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②③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371页。

④ 同上书,第467页。

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sup>①</sup> 1935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承认“全盘西化”这个名词有“语病”,自己用字“疏忽”,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sup>②</sup>。但是,胡适此举又遭到陈序经的反驳。他的题为《全盘西化的辩护》与胡适的《答陈序经先生》一起登在《独立评论》第160号上。这时胡适不再讲“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而只讲两人“似乎意见不很相远”了。

在这场讨论中,完全支持陈序经的观点的人非常少见,多数论者从不同角度对“全盘西化”观点提出批评。穆超说:“我们反对‘全盘西化’的理论要点是:(一)‘全盘西化’蔑视中国的国情决无好结果。(二)一国文化乃是数千年继续的创造品,‘全盘西化’突然把旧的文化基础打倒,而新的文化基础又决非一时所能创立,所以免不了思想的陷于失去中心和酿成社会的混乱。(三)适于国情且合于需要的文化,在乎互相调和,但是,‘全盘西化’收不到调和的益处。(四)中国今日民族的出路,根本在乎民族性的改良,中国民族性的弱点若不改进,虽然实行‘全盘西化’也不能把西洋文化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sup>③</sup> 吴景超批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理论”,即“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观点,认为“文化的各部分,有的分不开,有的分得开”。“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sup>④</sup>。张佛泉认为,“以全盘西化为理想是不能完全

①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②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③ 穆超:《再论“全盘西化”》,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7月10日。

④ 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第139号。



达到的”，同时表示“我深信从根上西化才是我民族的出路”<sup>①</sup>。王新命认为陈序经的西化论和胡适的西化论“有点不同”，“前者是从西化到西化，后者是从全盘西化到半盘西化，前者是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后者是以折衷为目的的全盘西化。”他说，全盘西化论的“最大的错误”，“是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四万万民众也是文化的产物”；“是忘记了全盘西化的结果会把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来替代中国人饭碗中的白米饭”；“是忘记了聪明相等的民族纵有其不相如的地方，而在文化的创造上，决不会甲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天堂的材料，乙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地狱的材料”<sup>②</sup>。叶青称“全盘西化论是思想界投降帝国主义论，是文化的殖民地化论”。<sup>③</sup>

此外，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原则，即“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根本精神；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枝叶装饰；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优美之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sup>④</sup>

上述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和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是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同一大题目下进行的，其实质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因此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所涉及问题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之。这次大辩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留下大约 150 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知名人士，后来马芸若、樊仲云分别将论战有关文字汇成专辑出版。<sup>⑤</sup>

在这场讨论中，观点各异，论争由始至终，但这场争论仍反映了

①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天津《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2 期。

②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1、446 页。

③ 叶青：《全盘西化？殖民地化？》，上海《申报》1935 年 6 月 22 日。

④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32 页。

⑤ 参见马芸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中、下编），经籍书店 1936 年版；樊仲云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 1936 年版。

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般动向。其一,在讨论中,“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两极对立的观点有互相吸收的趋向。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文化”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解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有的文章写道:第一,我国既是世界大环中之一环,要与其他各环竞存,应“迎头赶上去”,以使我国科学化或近代化;第二,我国民族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国的文化,应不求全与欧美的文化认同;第三,“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明了第一点,就应急速地将近代文明国家的要素即科学与技术,尽量从欧美移植过来,以改造我国的产业组织;明了第二点,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我们不可忘却了自己还有独立自主的特质;明了第三点,吾人在吸收欧美的科学与技术时,不可把跳舞、面包都吸收过来<sup>①</sup>。其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在讨论中逐步产生一种共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取代“西化”、“本位文化”等概念。有人对现代化的含义作了说明: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若是有人愿意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sup>②</sup>其三,在讨论中,辩论双方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所改进。例如对如何认识中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逐渐占上风,不论对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在分析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等。同时也对

①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4—535页。

② 同上书,第458页。

中西文化不同之由来作了历史分析,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文明与现代工业社会文明之不同,这样,讨论中较多的人把中西文化的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 四、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现代中国主要文化思潮代表之一。它是以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为己任,以融会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的内圣之学为主导开出“新外王”,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而言的。一般认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最早阶段,称为原始儒学。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阶段,被称为新儒学。“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欲以儒家思想为主来融会西学,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时代潮流,这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即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一种文化思潮、哲学思潮和学术思潮,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关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是现代新儒学的发端与奠基时期,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等。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五四”时期。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现代新儒学的产生起了助缘作用。梁启超在文中介绍了大战

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衰败景象,认为科学刺激的物质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是灾难。“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他呼唤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sup>①</sup>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不仅扩大了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声势,也促使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有部分内容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在山东铅印成书,到1922年底该书已再版四次。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端之作。梁漱溟说:“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这是因为:“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一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还是东方人,“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sup>②</sup>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3月3日至3月25日。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2—4页。

如前所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作,书中提出了“意欲”决定文化的文化观、尊孔主义和人类文化三大“路向”的理论。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自有其明显的思想特征。其一,他一再申明弘扬光大儒学,并不是出于守旧的心态或对过去的依恋,而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态度是最平正实在的”,这种态度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同时,他对传统儒学也并不只是一味肯定,而是崇尚阳明后学,对于宋学则多有批评,认为他们并未得孔学之真传。其二,他说:“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sup>①</sup>他认为西方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具有普遍的价值,西方社会“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中国社会则个性束缚,社会性不发达。据此,他主张“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sup>②</sup>。其三,他注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中,他不满足当时流行的浅层的现象形态的比较,要求找出东西文化不同的根由,并开始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他运用柏格森哲学的生机主义和直觉主义来诠释儒家哲学,表现出一种试图把儒家哲学现代化的努力;他在文化比较中突出民族性原则,并试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说明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学的人生态度和道德理想)的普遍性意义;对于未来文化,他在比较中认定儒家文化不会消亡,相反较之西方文化更富有现代价值,更合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都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取向,使梁漱溟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人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行之后不到一年,已经得了近百篇的论文,十几册的小册子,和他大打其笔墨官司。这样一闹,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的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sup>③</sup>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21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206页。

③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

张君勱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中另一位代表人物。1923年2月14日,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并整理成文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他认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sup>①</sup>。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向张君勱发难,于是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见“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国内许多著名学者都置身其中,张君勱又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之评价》等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论战中,张君勱自觉地以梁启超、梁漱溟所着力阐发的一个观念作为自己立论的前提,这个观念即是:人类文化正处于转变时期,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从西方走向东方,从物质走向心灵,从向外追求走向反求内省。张君勱说:“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sup>②</sup>他认为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并在论战中反复阐述有关科学的局限性问题,说明他批判“科学的人生观”是旨在为中国文化谋求出路。他说:“夫科学之有益于实用,孰得而否定之!然其流弊所届,亦不可不研究。”<sup>③</sup>此二三十年之欧洲思潮已经发生转变,其特征之一即“新玄学时代”,而此“新玄学时代”的基本精神“与我先圣尽性以赞化育之义相吻合”,“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sup>④</sup>

张君勱三十年代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著作。四十年代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以张载所言“为

① 张君勱:《人生观》、《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版。

②③④ 张君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版。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宗旨。1957年3月他的《新儒家思想史》(上册)英文版在纽约出版。该书下册于1963年2月出版。这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1958年元旦，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此后他曾在欧美及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讲学，其主旨均在于促进现代新儒家运动的发展。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他曾自述其思想历程：早年曾“趋向佛法一路，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未几舍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乃返求诸己，忽悟于《大易》”<sup>①</sup>。1920年熊十力投师欧阳竟无，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并研究佛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讲授唯识论。经过10年潜心研究，于1932年出版了文言文的《新唯识论》。该书的出版引起佛学界的激烈批评，刘蕻如发表《破新唯识论》，于是熊十力又作《破〈破新唯识论〉》一书，193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此后他又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1940—1944年全书完稿出齐)、《十力语要》(1947年)和《十力语要初续》(1949年)等。这样，他扬弃佛学，参证西方哲学，归宗儒家，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哲学的理论体系。晚年，他更重儒学，有《原儒》(上、下卷，1956年)、《体用论》(1958年)、《明心论》(1959年)、《乾坤衍》(1961年)等著作出版，认为唯有孔子“集古圣之大成，开万世之学统”，将自己的许多观点托之于孔子。

熊十力称哲学是“关于本体的学问”，提出“心性本体”说，即把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最后都归结于心性论。他在《新唯识论》第一章“明宗”中指出：“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的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

<sup>①</sup> 熊十力：《体用论》“赘语”，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应故。”<sup>①</sup>他以“体用不二立宗”，统领其《新唯识论》全篇，强调“体用不二”是儒家哲学的特征，也是儒家哲学的优点和长处所在。他一再讲，新唯识论的“根本思想”、“纲要”、“旨趣”，就是“体用不二”，反对将体用分裂为二。他认为实体即功能，提出“翕辟成变”说，提出：“《新论》主张即用显体，即变易即不易，即流行即主宰，即用即体，而其立论，系统谨严，实以翕辟概念为之枢纽，若于翕辟义一有误会，即全书便不可通，直可谓毫无价值之书。”他依据“体用不二”原则，引出“内圣外王”的人生论。他认为本体是具有道德属性的，“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他还说：“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总之，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实质，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重建儒家的心性本体，并通过“体用不二”的环节，引申、发挥儒学的价值系统，实现对儒学传统的再造。

第二阶段：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其代表人物是冯友兰、贺麟、钱穆。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新理学的创建者。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融会中国传统哲学与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之见解，提出“中道”的人生观。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册，被当时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版《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1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等六部著作，合称“贞元六书”，把程朱理学与西方新实在论相结合，构成富于思辨性的哲学体系。由于这一体系“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讲

<sup>①</sup>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页。



的,故称之为“新理学”。冯友兰的新儒家思想,体现在“贞元六书”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之中。他说:“新理学这个名字,在我用起来,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南岳、蒙自所写的,商务印书馆1939年所出的那部书。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sup>①</sup>

冯友兰认为:“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结,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sup>②</sup>“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底,逻辑底,而不是事实底,经验底。”<sup>③</sup>因此,哲学的对象是真际,不是实际。而不着实际的哲学才是“最哲学的哲学”,其新理学即是“最哲学的哲学”。他自诩新理学,“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sup>④</sup>。他说,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就人类精神生活所关涉的对象而言,“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社会,一部分是人生”,其中自然即传统哲学所说的“天”;社会和个人即传统哲学所说的“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传统哲学所说的“天人之际”。“人类的生活,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是和‘天人之际’有关系的,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天人之际’是哲学的主要对象”。<sup>⑤</sup>

《新理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总纲,其主要建树在于哲学形而上学方面。他说:“《新理学》讲到理、气,这是关于自然方面的;讲到历史、社会,这是关于社会方面的;讲到圣人,这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在以后的五部书中讲社会和个人方面的比较多,讲到自然方面的比较少”。<sup>⑥</sup>

《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主要是继承了程朱理学中有关理气关系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新实在论哲学有关共相和殊相关系的思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6页。

②③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511页。

⑤⑥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7页。

想,用新实在论哲学改造和说明程朱理学。在后五部著作中,作者把《新理学》中有关共相与殊相的理论作为方法,分析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问题,使其哲学的一般原则得以展开说明和具体化。《新事论》讲文化社会问题,所要说明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之为殊相与各种社会形态之为共相的关系。《新世训》讲生活方法,讲青年修养问题,主要讲一种“处世术”。《新原人》讲人生理想,讲立人之本即塑造一种理想人格,是依《新理学》所讲的宇宙之真为依据来讲道德之善。《新原道》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哲学史,用以表明新理学是继承中国哲学传统而创立的新统,以见其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新知言》是专门讲哲学方法的,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总之,“贞元六书”应视为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创立、发展和完善过程。

贺麟在四十年代先后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宋儒的新评价》、《文化的体与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宋儒的思想方法》等论文,并出版了《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文化与人生》(1947年)两部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一书,对十九世纪末期以来50年间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力图将中西哲学融合起来,构建起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贺麟鼓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造成了“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因此,“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sup>①</sup>。为此,他对新儒学思潮进行总结,并极力鼓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认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哲学有了很大进步,其中有四点值得“大书特书”：“(一)在这

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几十年中陆王之学得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了新的调解；(三)理学中程朱、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了新的调解；(四)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sup>①</sup>他把陆王心学的复兴和发扬看作此间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认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的哲学思想，正是体现了这条主线的延续和发展。他断言中国哲学的未来只能是儒家哲学的复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sup>②</sup>

贺麟明确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sup>③</sup>。“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sup>④</sup>。他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sup>⑤</sup>“第一，必须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他强调：“应以西洋之正宗哲学发挥中国之正宗哲学。盖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之哲学，与中国孔孟、程朱、陆王之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之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机，即是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须之途径。”<sup>⑥</sup>

贺麟提出了“新儒家哲学”的概念，并把建立和发展新儒家哲学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在贺麟的哲学思想中最根本的是陆王心学。他认为：“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8页。

②③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④⑤⑥ 同上书，第3、4、5页。

理,所谓‘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sup>①</sup>他用体用关系说明心物关系,认为:“心物永远平行而为实体之两面,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sup>②</sup>理是什么?他说:“理是一个很概括的名词,包含有共相、原则、法则、范型、标准、尺度以及其他许多意义。”<sup>③</sup>“心即是理,理既是在内,而非在外,则无论认识物理也好,性理也好,天理也好,皆须从认识本心之理着手。”<sup>④</sup>由此,他提出“合心而言实在,合理而言实在,有意义的价值而言实在”的唯心观点,并进而复活陆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形成所谓的“知行合一观”;又依据“知主行从”原则,提出道德决定经济、对理念尽忠、假人欲以行天理等观点,建立了以“理欲调和”为特征的伦理学说。

钱穆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国史大纲》(1940年)等著作,从史学方面张扬了新儒家的思想。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应当是“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sup>⑤</sup>。这是要继承古代儒学经史不分,通经致用、通史致用的传统。他把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区分为三派,即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和革新宣传派,其各自特点是:“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行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须。……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彼时时注意于

①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同上书,第22页。

④ 同上书,第28页。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sup>①</sup>他认为,理想的史学研究应该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命派之目的”<sup>②</sup>,非此不足以担负历史研究的特殊使命。这特殊使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sup>③</sup>

钱穆认为,必须把考据和义理结合起来。他提出了清代汉学源于宋学,“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的观点。他批评当时的学术风气说:“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sup>④</sup>他指出,近代新派史学虽然注重历史研究与现实变革的关系,但却往往依据现实的需要取舍历史,“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于历史研究和现实变革都是有害无益的。他说:“凡对以往的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sup>⑤</sup>中国历史并非如某些新派史学所说的一团漆黑。“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sup>⑥</sup>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在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

①②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7页。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⑥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页。

在”<sup>①</sup>，这也即是要“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仍将于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识者即谓此。”<sup>②</sup> 体现民族之精神的民族之文化，乃是我们民族的慧命所在，也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所在。钱穆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处于病态之中，而急于效法他人则使病态日重。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基于“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sup>③</sup>。钱穆的史学研究和对史学方法的探讨，反映了一名新儒家学者的立场和思想，是现代新儒学在史学层面的展开。

五十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重心转移到港台一带，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他们发表宣言、著书立说、兴办学校、出国讲学，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不仅在港台造成一定的声势，而且在海外产生了影响。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的新一代传人杜维明、刘述先等，更是成了国际学术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

## 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文化的主张。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载于同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此文及以后论著中对近百年来的文化论争作了总结，并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或中华民族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26页。

的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sup>①</sup> 因此，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根据。“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sup>②</sup>

毛泽东指出：在当时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sup>③</sup>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sup>④</sup>。毛泽东指明了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即“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sup>⑤</sup>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② 同上书，第665页。

③ 同上书，第694—695页。

④ 同上书，第695页。

⑤ 同上书，第698页。

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sup>①</sup>

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sup>②</sup>但是,这种吸收必须经过科学地分析、批判、选择和改造,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能搞“全盘西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将其与中华民族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sup>③</sup>

第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它能够和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进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既不能全盘否定,又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②③ 同上书,第706—707页。



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sup>①</sup>

第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sup>②</sup>在进行文化教育时,要把普及和提高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要有自己的文化军队,即人民大众,因此,革命的文化人要接近民众,否则就成了“无兵司令”。为了文化普及,为了和民众相结合,语言必须接近群众,文字必须进行改革。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③</sup>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③ 同上书,第708—709页。

## 第二章 民俗文化

---

### 第一节 民俗学研究概况

---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从先秦时起,历代学者积累了大量民俗资料,提出了许多见解,反映了中国民俗学史的悠久传统。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它是在继承传统、引进西方新学、探寻新学科建设中逐步发展的。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末,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8年至1926年,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时期。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在“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浪潮影响下,把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从歌谣学着手开始了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其研究范围涉及风俗、语言、历史和教育等方面。稍后开展的风俗调查会活动,大大扩展了民俗学研究的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董作宾的《看见她》的比较研究和《歌谣周刊》“孟姜女专号”。

1918年2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日刊》发表《征集全国近世歌

谣启事》，并刊出《北大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说明此次征集的目的、办法、入选资格等，由沈尹默、刘复、钱玄同、沈兼士四人负责编辑、审定事宜。从5月20日起在北大日刊上开辟“歌谣选”栏，每天刊登一则，由刘复编选并作考订说明，共出148则。

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继续征集近世歌谣。1922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1922年12月17日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先后由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等负责编辑。该刊发刊词明确提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研究，它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项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材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之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文艺的目的在于促进新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研究歌谣为民俗学立一基础，把歌谣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结合起来，是当时众多学人的共识。这种观点在《歌谣周刊》得到反复宣传和认真贯彻。因此，当时歌谣学运动的兴起，便是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发端。

1923年1月30日歌谣研究会决定扩大收集范围，除歌谣外，还要收集、研究神话、传说、童话故事、风俗、方言等资料。1923年5月24日成立了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张竞生任主任。该会决定其主要工作是：(1)收集关于风俗之载籍；(2)开展实地调查；(3)征集风俗博物馆陈列资料。他们制订“风俗调查表”，把民俗现象归纳为环境、思想、习惯三个大的方面，内容包括地名、人口、生活情度、民族、格言和俗语、宗教信仰、衣、食、住、婚姻、丧礼、祭礼、家礼、客礼等54项，并组织发动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会员进行了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和财神殿的民俗调查。

《歌谣周刊》从创刊到1925年6月并入《国学门周刊》，共出版97期及增刊1期，发表歌谣2226首，文章、通讯、讨论、译著等共111篇，成为当时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中心。该刊曾先后发表了许多

有关民俗研究的文章,如常惠《歌谣中的家庭问题》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温寿铤《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和《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郑宾于《歌谣中的婚姻观》、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顾颉刚《两个出殡的导子账》和《东岳庙游记》、董作宾《民俗文学中的鸦片烟》、郑孝观《江南风俗一零》、庄尚严《由坤宁宫得到的几种满人旧风俗》、王文彬《关于完婚的几首歌谣》等。《歌谣周刊》还开辟了具有民俗研究意义的专号,如婚姻专号中的文章,重点研究了旧式婚姻的礼仪民俗;《看见她》歌谣专号,不仅开了歌谣比较研究的先例,而且从歌谣研究中展示了各地在婚姻、方言、服饰、饮食、待客等风俗方面的差异,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一条蹊径;“腊八粥”专号是岁时节令方面一种习俗的研讨,表现了“五四”以后民俗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孟姜女专号体现了历史与民俗研究的结合。

歌谣研究会还出版了“歌谣丛书”八种,其中有顾颉刚的《吴歌甲集》;“歌谣小丛书”一种:董作宾《看见她》;“故事丛书”一种: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风俗调查会编辑的有三种:《妙峰山》、《东岳庙》和《北京市招》,其中《妙峰山》是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等对北京妙峰山的专项调查研究,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到1926年8月共出24期。该刊在风俗调查研究方面计有沈作乾的《括苍畚民调查记》、钟敬文的《汕尾新港疍民调查》、刘松青的《福州蛮户调查记》等,说明专题调查研究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从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时期。此间,先是以中山大学为基础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响颇大。三十年代初,以杭州为中心南方各地开展民俗研究活动,出版各种丛刊丛书,推进民俗理论研究,扩大

了民俗学研究的队伍。30年代中期北方风谣学会成立,歌谣研究会恢复活动,又使北方民俗研究活动继续开展。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1926到1927年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员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到中山大学任教。当时该校设有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南北人才合流。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全称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确定其工作有四个方面:即收集整理有关风俗信仰和民间文艺的各种资料,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开办民俗学传习班。1928年3月,民俗学会始办《民俗》周刊<sup>①</sup>,基本宗旨在于发扬民众文化,其发刊词称:“我们要站在民众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讨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该周刊先后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任编辑。至1933年6月停刊,共发行123期,共发表有关民间文学的文章100多篇,传说故事300多个,歌谣、谚语、谜语200余组;有关风俗信仰的资料和文章共300多篇。涉及面较广,知识较为丰富。对于有些问题还比较集中地进行了资料的征集和探讨。《民俗》周刊1936年复刊后,改为《民俗》季刊。直到1943年,陆续出版了2卷8期。先后由杨成志、钟敬文编辑。季刊更加侧重民俗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方面的研究。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发展了中国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事业。他们在挖掘整理资料、理论建设、培养人才、开展民族民俗和地区民俗调查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学会所

---

<sup>①</sup> 《民俗》周刊前身是《民间文艺》周刊,1927年创刊,至1928年1月,共出12期,由董作宾、钟敬文编辑。

发行的期刊、丛书、作品、资料及研究文章等,多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些是带有开拓性的著述。如这一时期的优秀著作有江绍原的《发须爪》和《血与天癸》、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钟敬文的《〈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郑振铎的《汤祷篇》、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钱南扬的《谜史》、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等。在民俗理论方面,研究者开始接受东西方民俗学的成果,特别是分类及对民俗学理论概述上,有何思敬的《民俗学的问题》、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姜子匡的《民俗学的分类》等。在民族研究方面,周刊不仅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瑶山调查专号、蛋户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专号等,而且有罗香林的《广东民族概论》、杨成志的《云南伊伊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著作。在地区民俗研究中如苏粤婚丧、昆明民俗、海南岳民俗等研究皆有成果,并出版了关于神、槟榔、蚕民、清明、旧年、中秋等特集号。

此外,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曾与意、美、德、英等国学者有学术来往。在学会活动期间,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在它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民俗学会分会,如鄞县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厦门的民俗学社、揭阳的民间文艺会等。

1930年夏秋,由江绍原、钟敬文、姜子匡、钱南扬等在杭州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学会除杭州总会外,在浙江绍兴、宁波、吴兴、永嘉等县,及广东、福建、安徽、四川等地先后建立了分会。该学会以搜集、研究各地、各民族风俗、习惯、信仰、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为宗旨,先后出版了《民俗周刊》(100多期)、《民间月刊》(12期)等,参加撰稿的有顾颉刚、钟敬文、周作人、赵景深、钱南扬、叶德钧、杨堃、容肇祖、王鞠侯等。这些刊物主要发表关于各地风俗、信仰、民间娱乐活动等资料和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还出版了“月光光歌谣专辑”、“老虎外婆故事专辑”(《民间月刊》)、“歌谣专号”、“巧女故事专号”、“女俗专辑”、“紫姑神专辑”(《民俗周刊》)以及《新年风俗志》、《巧女呆娘的

故事》、《李调元故事》、《民俗旧闻集》、《中国民谭型式表》等书。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理论丛刊《民俗学集鏤》，共2辑。第1辑由钟敬文编辑，是作为《开展》月刊第10、11期合刊的“民俗学专号”，1931年出版。所收文章分四类：论考、记述、随笔、附录。论考类文章占全书的一半。重要的文章有据英国班尼的《民俗学》“绪论”翻译的《民俗学是什么？》、钟敬文的《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汪馥泉的《民俗学的对象任务及方法》、黄石的《苗人的跳月》、《迎紫姑之史的考察》和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谈》的译文等。《集鏤》第2辑由钟敬文、娄子匡编辑，1932年出版。该辑大部分是关于民俗学的论文，重要的研究有黄石的《满洲的跳神》、英国班尼的《民俗的搜集与记录》译文、娄子匡的《占雨的谣俗》、森鹿三的《中国古代山岳信仰》、顾颉刚的《周汉民俗和传说琐拾》、钟敬文的《蛇郎故事试探》、赵景深的《英国童话略谭》（杨晋豪选译《英国童话集》序文）等。其中一些文章曾经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

在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带动下，各地分会也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民俗》周刊（浙大）、《民俗旬刊》（宁波、福州）、《民俗周鏤》（湖州）、《民俗半月旬》（湖州）、《民俗周刊》（绍兴、潮州、厦门、徽州、重庆）、《民俗》（漳州）。在总会和各地分会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的人员，有江绍原、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朱自清、赵景深、叶德钧、叶镜铭、曹松叶、翁国梁、孙佳讯、钱小柏、钱巽龢、林培庐、谢云声、张长弓、清水、袁洪铭、樊缜等。

此外，在《民众教育季刊》（浙江省立实验民众教育学校出刊）上刊过《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文化》、《民间艺术》专号，登载许多重要论文。该刊还编印《浙江民间文化小丛书》，计有《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浙江民间固有组织调查》、《浙江旧历新年风俗》、《浙江各地岁时记》、《蚕的民间文化》，以及浙江地方故事集、歌谣集、传说集、谚语

集、民间戏剧等多种。南京《中央日报》的《民风周刊》由顾颉刚、方纪生主持,从1936年8月办到1937年7月,共出42期,所载民俗资料和研究文字颇多,其中亦有一些有价值的论著。该刊从20期以后,每每缀有“编者的话”,对所刊文章作出民俗学上有见地的评价,大多为方纪生所写。他还于1934年出版了《民俗学概论》,是我国关于民俗学的较早的系统论著。

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胡适、魏建功、顾颉刚等人为歌谣研究会委员。《歌谣周刊》从1936年4月复刊,到1937年6月共出53期,发表各种研究论著113篇和一些译述文章,比较侧重歌谣的文艺学研究,其中亦有关于民俗方面的文字,许多论著至今在学术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与此相关,1935年5月,风谣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参加组建的人员有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罗常培、魏建功、常惠、徐芳、沈从文、方纪生等,推顾颉刚为会长。它是继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在北方的一个较有影响的民俗学研究团体。

第三阶段:从1937年至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使民俗学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区内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调查和研究;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指引下,开展了民间文艺和民俗的调查与改革工作。此外,还有少数外国人(日、法等)对中国民俗进行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学者积极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和语言等。这个时期没有民俗学的专门刊物和团体,有关著作多是登载在中央研究院一些研究所刊行的集刊上,也有个别学者的著作。如中山文化教育馆编《民族学研究集刊》,从1936年5月出版第1集,到1948年8月共出6期,每期约30万字,内容除民族学、人类学之外,有关民俗的重要文章计



有：刘咸的《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何联奎的《畚民的图腾崇拜》、马长寿的《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苗瑶之起源神话》和《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欧阳翥的《我国婚姻与优生制度之商榷》、卫惠林的《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闻宥的《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胡鉴民的《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郭豫才的《壮侗仲为西南民兵名称说》、马松龄的《凉山罗夷的族谱》、吴文晖的《原始的地产制度》、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师的种类》、芮逸夫的《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等。黄石、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程憬、陈志良、常任侠、马学良等，都对神话、传说等作过有益的研究或调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后来还有东北及其他解放区，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因而形成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其中很多同志作了民间文学的记录，后来出版了民歌、故事的集子（如李季、康濯、李束为、董均伦等）。延安鲁迅艺术研究院收集了许多民歌，后来由何其芳、张松如选编成《陕北民歌选》出版。东北合江鲁艺文工团也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一书。这个时期很多作家在深入生活、学习民间文艺方面作出成绩，把创作新的文艺作品与推进社会变革、移风易俗结合起来，著名歌剧《白毛女》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突出的成果。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还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对西北民歌进行搜集和研究。这一时期还选编出版了《民间艺术和艺人》、《民间音乐论文集》以及《秧歌论文选集》等书。这些，都给“五四”以来的民俗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这一时期少数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绩，如永尾龟造的三卷本的《中国民俗志》、欧文的《民俗学研究》等。

---

## 第二节 民俗改革

---

### 一、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文化、风俗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潮流。孙中山等人早在1906年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就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把扫除“政治之害”和“风俗之害”作为未来实行军法之治的两项主要内容。军法之治时期是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要扫除的风俗之害包括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等等,在禁止恶风陋习的同时,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sup>①</sup>。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尽管内政外交百端待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仍然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文告、法令,充分表明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革除陋俗、“以培国本”的决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的社会改革文告、法令计有:《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1912年1月2日)、《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1月)、《严禁鸦片通令》(3月2日)、《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3月2日)、《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3月2日)、《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飭所属禁止刑讯文》(3月2日)、《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3月5日)、《令内务部通飭禁烟文》(3月6日)、《令内务部掩埋城垣内外各处暴露尸棺文》(3月7日)、《令

---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内务部司法部通飭所属禁止体罚令》(3月11日)、《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文》(3月13日)、《令内务部通令聋户惰民等一律享有公权私权文》(3月17日)、《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3月19日)、《令广东都督严禁贩卖“猪仔”文》(3月19日)。<sup>①</sup>此外,南京临时政府有关各部也发布过一些类似的文告,如:《陆军部通飭各军队严禁军人冶游聚赌文》(2月9日)、《内务部报告禁赌呈》(3月5日)、《内务部请大总统查禁赌博陋习及禁售各种赌具呈》(3月7日)、《内务部令南京巡警总监取消批准私立花柳检查医院以及私人假用公产文》(3月9日)、《内务部咨各省都督及卫戍总督禁止鸦片文》(3月14日)等。

上述文告、法令所涉社会改革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禁卖人口、禁止体罚、解放“贱民”、保护民权、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管制娼妓、改革历法、改变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礼仪、树立新风等各个方面,是孙中山及革命政府切实督率国民扫除社会旧污的重要举措,推动了民国初年移风易俗的发展。

### (一) 剪辫易服

1. 剪辫。中国古代男子与女子全部蓄发不剪,举行成年礼时,束发于顶,加上冠、笄。周边少数民族有的髻首,有的剃发,有的剃一部分,留一部分,并不划一。清军入关后,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于顺治二年(1645年)6月15日颁布剃发令,称“今者天下一家,君犹父也,父子一体,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后,亦限旬日,尽令薙发”。此令下达后,遭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强烈反对,“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斗争席卷全国。但所有抗争都遭到失败,除了和尚和道士之外,全国男人都照满洲习俗剃发蓄辫。此后200年来渐

<sup>①</sup> 以上令文均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成习惯。至清末反清革命兴起,辫子作为汉族屈从满族、臣民奴于君上的标志,而剪辫则是对清朝统治和封建传统的一种否定。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军政府成立次日发布的宣布清政府罪状檄文中,便把发辫列为清王朝罪状之一,并立即发布禁止蓄辫文。此后,人们在革命浪潮影响下纷纷剪掉辫子。剪辫几乎成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的标志:“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sup>①</sup> 广东省宣布独立时,“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罔不争先恐后,纷将天然锁链剪去。……统计是日剪辫者,尽有20余万人。”<sup>②</sup>

当然,剪辫既是向旧传统的一种挑战,必然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碍。反对剪辫的人,有清廷遗老遗少,他们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廷的怀念与忠诚,甚至梦想清朝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及其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群众不愿剪辫,其中有的是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有的怕毁了发肤,对父母不孝;有的怕清廷复辟,会杀无辫之人。因而在这场剪辫与反剪辫斗争中,时常发生强行剪辫的事。甚至内务部长朱启铃也内定一例,“凡以事捉将官里去者,无论是非曲直,先将其辫子绞去。”<sup>③</sup>

剪去发辫之后,新出现的是短发的普及:年长者的头发前半部仍剃光,后半部留至耳门;青壮年则多剃平头。后来随着西洋发式兴起,许多人每逢立夏,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依例留分头。

2. 易服。中国传统服饰习俗源远流长,从东周的曲裾袍服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总的特点是褒衣缚带,宽大松缓;等级森严,十分繁琐。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清廷下令强迫穿着满服,规定民人不遵行和官员执行不力者均要治罪。但被迫仿效,并不如式,到顺治

① 忍庵:《辛亥革命在贵阳》,《越风》第1卷第20期,1936年10月。

② 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

③ 黄远庸:《谈屑》,《远生遗著》卷四,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59页。

十年(1653年)二月再度重申改易满装。此后抵制易衣冠的斗争也被镇压下去,着式满服渐成习俗。

民国初年的服饰习俗改革是与男子剪辮、女子放足并行的,其首要方面就是对满式服饰的否定。独立各省对此都有明文规定,禁穿清代官服。一时间出现了服饰改革热潮,经营满式服饰的帽店、靴店、衣庄等没有了生意。

如何改革服饰是当时讨论的一个话题。在讨论中人们指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弊端:一是褒衣缚带,长裙雅步,与近代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不相协调。二是服饰上的森严等级区分,既违反平等、自由观念,又繁琐得令人难以适从。但人们对应该改穿什么衣服看法不一。有人主张恢复古装,要国人穿古式武侠装束。这种看法有违时代潮流,响应者甚少。另一些人主张改穿西服。认为有西服的形式,讲求西装之精神,取法西人之政学、法律、工艺、商农之美法。衣着与外人相同,可使酬酢交往相融洽,有利于来往考察,向外国学习,而无猜忌凌辱之患。这种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由于其顺应向西方学习、改传统服装由宽大松缓向简短灵活转化的时代潮流,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一阵“洋服热”。

1912年10月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服制》,共3章12条,附图若干。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两种,昼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擎式,晚用大礼服似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常礼服两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均黑色,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上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下用裙,周身得加绣饰。这种礼服在民国初年政府官员中曾较为流行。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创制中山装。它不是东方的传统服式,而是对西式服装的改造。这种服装是单立领,前身门襟9颗扣子,上下左右4个明袋,袋褶外露,后身有背带缝,中腰处有腰带。这是最早的中山装。孙中山带头穿着后,很快便在男学生中时兴起来,并逐步得到推

广。在推广过程中又不断有所改进,后背去掉腰带,领子改为立翻领,前身门襟的扣子改为5颗,4个明袋改为吊贴口袋。以后小袋又改成平贴袋,袋盖上面都有明扣袋,成为今天中山装的式样。这种服装朴实、庄重、大方,颇具中国气派,迅速流行起来,并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男礼服的代表式样。

民国初年的服装改革,带动了服饰习俗的演变。此中有过渡时代难免的混乱现象,即当时出现的“亦古亦今,又中又西”,平民模仿官僚,官僚穿起民装等现象。经过对中西服装的比较、改良和选择之后,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以及在满装基础上改造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虽然西装外套当时没有得到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却渐渐得到推广。

## (二) 改历改元

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改历改元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sup>①</sup>

1. 改历。中国传统历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成就。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经过观测、计算和多次改革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系统的阴阳历,曾给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很多便利。它的缺点是,由于平年每年平均比回归年约少10天21小时,需要每3年置1闰,5年2闰,19年7闰,闰年13个月,比平年多29或30天。年与年之间日数相差太大,给人们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因而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全国改用阳历,既克服了旧历的缺陷,又与国际上通行的历法相一致,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但改历命令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完成,究其原因,除思想保守者反对外,中国传统习俗也起着重大作用。在当时日常生活中(尤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其是农村),尽管“正朔已更,旧历宜废”,但民间于岁时伏腊,仍只知有中历不知有西历。在中国旧历书中,有不合理的成分,如天时迷信与禁忌等,应予摒弃;也有合理成分,如二十四节序与农时等,是多年农作经验的积累,应予保存。

1912年1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民国改历的精神和国民的风俗习惯,议决编历办法四条:(1)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2)新旧两历并存。(3)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4)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sup>①</sup>此后,中历西历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从民国以至今日,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改元。中国古代用“干支”纪年,即用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相配合,组成60个干支,用以纪年。60年一轮回,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但很容易混淆,于是又配以帝王号或帝王的年号一并使用。从西周开始用帝王号纪年,至汉武帝起,历朝皇帝都设立年号纪元。这种纪年方法不但频换年号,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太平天国在创制的《天历》中首先提出以国号纪元,否定了帝王年号。此后,康有为等提出以保教为宗旨的孔子纪年。1903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一文,反对使用君主年号,亦不同意孔子纪年,主张以保种为宗旨,用中华民族之始祖黄帝降生为纪年。文章认为用黄帝纪年有三善:“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善一”,“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其善三”。文章并以当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sup>②</sup>。因黄帝为传说中人物,古籍记载生卒年代各有不同,故有歧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页。

②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72页。

义。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元年癸亥纪元,并推定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且署于日记中。《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多采宋说。武昌起义时即用此纪年发布文告和印行《中华民国公报》。后来在讨论新国家纪年法时,人们对黄帝纪年提出异议,认为黄帝年远代湮,无确定生年,用作纪年,无可征信。这种看法为当时一般党人的共识,所以便有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的改元通电。采用国号纪元,结束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帝王为转移的纪年方式,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精神。

3. 新旧节日。中国传统节日,都是按旧历年月日固定时间进行的。改历改元以后,新历旧历并存,民间节日基本照旧。有些节日,如旧历新年还比新历新年繁盛得多。随着社会政治变革、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人们的节日习俗也发生许多变异,如在节日中的衣着、饮食、娱乐、交往方式上多了一些西化现象;迷信色彩逐渐淡化,有些迷信的节日走向衰微,最终被遗忘。对于节日中的一些弊端,人们也进行了批评和改革。

与此同时,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有民国成立日(1月1日)、国庆(10月10日)、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和国耻纪念日(5月9日)等。稍后又有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国际妇女节、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植树节(清明日)等等。

### (三) 改革礼仪

1. 用鞠躬代替跪拜。跪拜礼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普遍的一种礼节。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被长期保存下来并愈演愈烈。这种礼节十分烦琐,对维护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跪拜礼主要是对尊长,有些场合要施磕头礼,平辈之间用作揖、打拱。随着近代民主思潮勃兴,先进的国人看到跪



拜礼与西方鞠躬礼的本质不同,指出跪拜含有臣服、屈从的意思。梁启超首先提出易拜跪为鞠躬,但未能实现。

二十世纪初,随着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发展,反对跪拜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废除跪拜礼就是对君权、族权和神权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正式规定用鞠躬代替跪拜。接着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礼。后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由袁世凯于1912年8月17日公布了民国《礼制》,共二章七条,具体内容为:第一章男子礼。第一条: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第二条:庆典、祀典、婚礼、丧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礼。第三条: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第四条:寻常相见,用脱帽礼。第五条: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第二章女子礼。第六条:女子适用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但不脱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礼。第七条: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sup>①</sup>。此制公布后,社会上有时竞相效法。当然,废除跪拜礼、实行鞠躬礼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袁世凯、清廷遗老遗少等为复辟帝制而行跪拜礼外,在民间亦有鞠躬礼和跪拜礼同时采用的现象。鞠躬礼作为一种体现民主、平等精神的礼节,必然在城乡逐步推广,并成为中国人民的通常“文明礼仪”。与此同时,握手、鼓掌、举手等礼节也逐渐在中国普及。

2. “大人”、“老爷”改称“先生”、“君”。与废除跪拜礼节相关的是革除“大人”、“老爷”等称呼。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公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渐,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

<sup>①</sup> 《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sup>①</sup>

“大人”、“老爷”的称呼，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是一种不成文的旧礼仪。清时官厅视官等高下，皆称大人、老爷。随着清朝吏治日渐腐败，加之人们媚上心理作怪，这类称呼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普遍。孙中山认为官员是人民公仆，不必取非份的名称，要求官厅人员俱以官职相称，民间则通称先生或君，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民主平等的意向。这种称呼上的改革，推进了社会习俗的发展。

3. 婚丧礼仪改革。婚礼。民国初年的婚制，是在沿用清代一夫一妻及妾制基础上作了一些限制，如取消指腹为婚与割襟为亲等风俗，继续维持妻妾制度。但婚礼的形式却有很大的改变。新式婚礼大致分三节进行：第一节行结婚礼，第二节行见亲礼，第三节行受贺礼。其具体仪式为：男女宾起立，向新郎新娘行鞠躬礼。男女宾代表各以花佩新郎、新娘襟上，复位，行鞠躬礼。奏乐，新郎、新娘致谢，行鞠躬礼。男、女宾演说。新郎、新娘退。奏乐，女宾退，男宾退，司仪员退，礼毕。当时社会上，结婚有用新式婚礼者，有用旧式婚礼者，而更多的婚礼是新旧参用，于新式婚礼中杂有祀祖之类的旧俗。

丧礼。丧礼是人死后由亲朋、邻里等处理死者殓殡祭奠的礼节。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历来十分繁缛，其间包含不少陋俗。在民国初年的民俗改革中，人们提出要摒弃丧葬习俗中那些封建迷信的部分，简化丧葬礼仪，提倡新式丧礼。规定吊唁者应按《民国服制》要求，男子左臂佩黑纱，女子胸际缀黑纱结。灵堂设置为堂前供亡人影像，陈列亲友所赠之挽联、挽幛、香花等。花圈为安葬时用之，安置于墓上。丧仪程序为：奏乐、唱歌、上花、献花、读祭文、向灵前行三鞠躬礼。来宾致祭，一鞠躬。演说亡人事实。举哀、奏乐、唱歌，谢来宾，一鞠躬。

民国初年的丧礼是新旧参用的，体现了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5页。

特征。

#### (四) 解放疍户、惰民、丐户等

1912年3月17日在《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上发表了《大总统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文中指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于是人民之阶级以生。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疍户，浙江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sup>①</sup>

上述疍户、惰民、丐户等是旧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所谓“贱民”。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公权和私权，是数千年专制秕政的产物。其中疍户指舟居水宿的遗民，主要居处于福建、广东、广西一带；丐户俗名“大贫”、“堕贫”，讹为“惰民”，主要聚居于浙江绍兴、宁波两府和江苏常熟、昭文两县，浙江山阴县也有很多；令文中提到“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是指经过各种途径沦为奴婢者的后裔；“优倡”主要指兼事卖淫和卖唱业的“乐户”；“隶卒”则指政府雇用的一些差役，如看门的门子、门斗（兼管仓库），管牢房的禁卒，验尸的仵作，捕盗的捕快等等，他们是衙门和官员的奴仆，其法律身份却属贱民。据查，清雍正年间也曾下诏豁除以上各种人的“贱籍”，但当时的解放，即使在文件上也极不彻底，无论公权、私权均无明文规定。因此一部分贱民虽脱籍为良，但仍受社会歧视；而另一部分贱民的身份依然如故。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4页。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重视保护人权、保护华侨问题,先后下令禁止买卖人口<sup>①</sup>和严禁贩卖“猪仔”。<sup>②</sup>

在上述令文中,孙中山高扬西方“天赋人权”旗帜,批判封建社会制造贱民、蹂躏人权、陵轹百姓的种种罪恶,指责清廷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陷人涂炭的历史境况,痛斥奸徒拐贩诱卖人口、“猪仔”,宣布民国既成,尊重人权,保全国体,解放贱民,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以自由博爱平等之义,推进社会改革。尽管上述人权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逐步解决,但孙中山当时发布的一系列令文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 二、“五四”时期的社会礼俗变革

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注重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去探究革命失败的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德和礼俗进行深入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并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崛起。它以《新青年》为阵地,揭橥拥护民主和科学,“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sup>③</sup>,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进一步变革。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51—252页。

<sup>③</sup>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 （一）批判封建礼教

反对封建礼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陈独秀曾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sup>①</sup>在这里,陈独秀精辟地阐明了新国体与旧伦理不能调和的道理。基于这种认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提倡祭天祀孔时,《新青年》便著文反对儒家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sup>②</sup> 忠、孝、节的封建秩序和天赋人权所提倡的人格自主是根本对立的。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学说、封建礼教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1916年,当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请列入宪法时,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鲁迅、吴虞等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儒学、批判纲常礼教。他们表示:“提倡孔教必悖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并全面阐明:(1)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能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2)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原则;(3)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易

<sup>①</sup>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

<sup>②</sup>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白沙著《孔子平议》，指名道姓向孔子开战。文章称孔子学说“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只是因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才使得“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于孔子之自身”。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sup>①</sup>。陈独秀以进化论观点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sup>②</sup>鲁迅借“狂人”之口，痛斥封建礼教为“吃人”！吴虞说：“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sup>③</sup>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革。

## （二）提倡社会新风尚，推进妇女解放

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为建立一种新道德、新风尚而努力实践。他们组织社团，针对当时社会的恶风陋习和青年中存在的个人享乐主义的腐败生活风气，订

①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孔子平议》（下），《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②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③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立各种社规、戒约,并把遵守这些社规、戒约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宗旨结合起来。1917年10月,恽代英等在武昌发起组织互助社,提出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其戒约是: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sup>①</sup>。社员们都热心救国并很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称为修养的小团体,按照互相督促砥砺的条文和戒约,每天在日会上进行检查。在互助社的帮助和影响下,武昌地区又先后成立了许多同类性质的小团体,如健学会、日新社和诚社等。“五四”运动中,这些社团的成员们在武汉三镇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爱国活动的开展。1918年4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其会章规定了严格的人会手续,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该会的规律(即规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一个革命团体。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不能只立一个空泛的目标,应当切实地研究中国的情况;也不能一个人脱离实际地冥想和各自为战,应当集合起来,讨论出一个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然后进行共同的实践、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因此,有志革命的青年必须组织一个高尚、纯洁、勇猛精进的团体,组织“联军”,共同作战。同时革命组织还必须有一个共同信守的革命的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民学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1919年7月1日,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提出“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大信条,并在规约第14条中

<sup>①</sup>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8—119页。

规定对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之行为者提出警告书,劝其从速悔改。上述各社团还用出版刊物,创办书社和学校,开展读书和演讲活动等方式,向民众宣传改造社会的道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旧文化、旧道德、旧礼俗有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进一步的觉悟,思想较前更为解放,许多青年成为旧礼教的叛逆者,破旧俗、立新风的激进派,并通过他们影响到家庭和社会。此中,有些女性青年学生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在实践中站在反对旧礼教斗争的前列。她们的诸多感人事例得到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热情关注,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如男女平等、男女社交公开、女子教育和经济独立、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这对社会风俗的深层变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一,大学开放“女禁”。民国初年,只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不准男女同校。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天津发表《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演说,主张仿效西方,尊重妇女的人格和权利,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平等互助,以改变我国男女间的不平等现象。同年5月19日,甘肃的小学教师邓春兰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允许北京大学接收女子进补习班,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同时她还写信给北京各报,要求舆论给予主持。同年12月9日,一个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又写信给蔡元培,声称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大开放女禁。12月13日,蔡元培复信表示完全赞同男女同校的主张。随后他又在报上公开称:“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sup>①</sup> 1920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女生王兰请求入北大

<sup>①</sup> 《蔡子民先生外交教育之谈话》,《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



旁听获准,接着邓春兰等8人也援例入北大旁听。同年暑假,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开创了先例。此后,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也先后招收女生。与此同时,各省一些中学也仿效实行。从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男女同校日益增多,从而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

其二,男女社交公开。民国以后,女子走出家庭进厂做工、求学、参加社会活动的日渐增多,女子所受束缚有些许松动。但传统的男女礼教大防仍严重存在,“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仍在社会上被一些人视为准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堤防,许多进步青年一面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传统,宣传男女社交公开的重要意义;一面在社会活动中以实际行动实现男女社交公开。一些女学生同男学生一起参加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女学生团体与男学生团体的联合。天津的男女学生联合走在全国的前面。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各10名骨干男女青年联合举行会议,“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成立“觉悟社”,规定男女生在社内权利平等,建立严密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新社员要遵循男女对等的原则。社员之间和对外,均以抽签方式所定的号码为代号称呼,以此消除男女有别的痕迹。如周恩来的别名“伍豪”,是因他抽到5号而得名,而邓颖超则取名“逸豪”(1号)。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其成员男女同学相处极其自然坦白,工作上互相尊重,责任平等承担,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天津妇女界也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许多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如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许广平等。在湖南,周南女校学生周敦祥、魏璧、劳君展以及其老师陶斯咏首先加入新民学会,后来向警予等人也参加。她们愿意加入以男子为基本队伍的新民学会,充分表现了她们求解放、求改造的勇气。此后,男女青年的交往增多,一些勇敢的女青年甚至公开与男青

年通信交友,有些团体也实行男女合室办公、一起共事,这些都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

其三,批判封建家庭制度。1917年2月吴虞发表《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关系》,指出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是以家族制度为根据的,“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sup>①</sup>。这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五四”时期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常常是与妇女解放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19年10月,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因反抗封建家庭压迫,备受家中经济上迫害和精神上的折磨,在贫病悲愤中死去。这一事件暴露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弊端,引发了一场批判封建家庭制度的运动。胡适研究了李超的一生,撰写《李超传》,启发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中“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有女不为有后”等问题。他指出:“《李超传》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sup>②</sup>这是对中国家庭制度中只有“男子传后”的传统习俗的质疑和抨击。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出席了李超的追悼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并在李超遗像的横幅上题了“不可夺志”四个大字,以表彰她的反封建精神。陈独秀指出:“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sup>③</sup>李大钊认为:中国今日“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问题、婚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

① 吴虞:《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关系》,《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② 胡适:《李超传》,《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③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sup>①</sup>

上述问题的讨论,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扩大了清末以来“家庭革命”口号的影响,为后来中国家庭制度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这种影响在当时发动的第二次女子参政运动中有所反映。如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宣言称:打破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打破专制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妇女觉醒,妇女问题受到重视,妇女地位提高,有关妇女习尚发生了变化,这一切也带动了其他社会旧俗的改革。

### (三) 提倡科学,反对鬼神迷信

新文化运动高张科学大旗引起的反响之一,是旧势力掀起的一股宣传鬼神迷信的逆流。当时在统治者和一部分知识阶层中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迷信活动,还出版宣传这种迷信的杂志,宣称“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甚至还用“科学方法”证明鬼神的存在,一时间“神道设教”等迷信活动泛滥成灾。因此,从1918年上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新旧势力开展了一场关于鬼神迷信问题的辩论。以《灵学丛志》为代表,大肆宣传“人鬼之理,仙佛之道”,设坛扶乩,大量发表各种宣扬鬼神迷信的文章和乩辞。《新青年》等则发表批驳鬼神论的论文、通信等予以还击,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场思想斗争。

扶乩是中国传统的迷信活动。坛主和乩手们扬言他们可以召至

---

<sup>①</sup>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历代亡灵和神仙指点迷津,宣示过去、未来。1917年10月,灵学会在上海成立,并设盛德坛,由俞复任会长兼坛长,杨濬任坛正,陆费逵任坛督。同年11月25日开坛之日,他们扶乩,称有180位“圣贤仙佛同莅本坛”,推定亚圣(孟子)主坛,庄子为仙道代表,墨子为佛耶代表,设四乘十六司,分任编纂各种学术,研究精深学理<sup>①</sup>。从1918年1月起编印《灵学丛志》,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20年9月停刊,前后共出2卷18期。在当时的中国,乩坛所在多有,但唯有盛德坛和灵学会影响较大,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灵学会的会员和会友前后约200多人,其中有些是有影响的人物,如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曾为《灵学丛志》题辞:“暗室灵灯”,以示支持;还得到严复、丁福保、杨廷栋等学界著名人物的赞助。此外,这种迷信活动除了有北洋军阀政府许多文武官员的积极参与外,著名的《东方杂志》也陆续发表文章如《命运说》、《新相术》、《观掌术》、《挽近之神秘主义》、《梦中心灵之交通》等,宣扬神秘的命运和各种西洋迷信,实际上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以《灵学丛志》为代表的宣扬鬼神迷信思潮,其基本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但也掇引了西方的各种迷信,因而是古今中外各种鬼神迷信的杂烩。这股思潮所宣扬的主要内容:一是灵魂不灭或有鬼论。他们认为:“人死之后,视其业力之高下大小,为圣神,为仙佛,为善鬼,为恶鬼。人以灵魂为本体,躯壳不过灵魂之凭藉耳。”<sup>②</sup>他们企图把鬼神的存在同科学联系起来,而所谓证据却是扶乩。尽管他们煞费苦心登出两张所谓“灵魂照相”的照片,但却无法证明灵魂不灭。二是鼓吹人鬼如何沟通。对此,他们提供了多种答案,其中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如认为人生时不能见鬼,而有些有“灵力”或“灵魂力”的人是可以见鬼的;或认为鬼有形有质,非人所能见,而禽兽则能见;人在梦

① 杨光熙:《盛德坛缘起》,《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1月。

② 陆费逵:《灵魂与教育》,《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1月。

中亦可与鬼谈话等。由此,他们对“心灵感通”、“传心术”、“降神术”和扶乩等无不予以肯定。三是宣扬鬼界幸福。丁福保在《我理想中之鬼说》中描绘了一幅鬼世天堂图,几乎满足了各类人物的不同需要,是受尽人间折磨的人们的理想境界。

灵学会掀起的宣传鬼神迷信的热潮,是对抗社会进步的思想逆流。它的反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企图对抗民主和科学的潮流,阻挡历史前进。对此,《新青年》从1918年5月开始反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科学旗帜,坚持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抨击有神论和有鬼论。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等文中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谓鬼神、灵魂、鬼摄影、扶乩等都是万不可信的。王星拱指出:“高等动物能思索,能记忆,等等,是谓心理作用。究之,心理作用,即生理作用中之最精巧的一部分耳。如思索记忆等等,皆为能力发见之现象;能力以物质变换而发见,故亦即为物质变换之现象。”<sup>①</sup>因此,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不灭”、“鬼神世界”是不可能的。

《新青年》派强调要有确实的根据,揭露《灵学丛志》“几无一页无一行不露作伪之破绽。”<sup>②</sup>陈大齐指出:“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耳。”“盖扶乩等现象,假使果非有意作伪,在现今心理学视之,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精神病者优为之,固不待‘圣贤仙佛’之降临也。”<sup>③</sup>他抓住扶乩者作伪露出的马脚,如“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李登讲音韵,能知世界语之发音”等来攻其荒谬,揭露其作伪。陈独秀称阴阳家“最为害于中国者”,“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

① 王星拱:《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② 半农:《随感录》(九),《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③ 陈大齐:《辟“灵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兴,民智日僇,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sup>①</sup>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还主张破除偶像崇拜。认为:“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sup>②</sup>他们将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一切宗教家所崇拜的神佛仙鬼,以及君主帝王、节孝牌坊和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的不合理的信仰等等,都列入偶像之列,号召人们破坏它,而建立真实合理的新信仰。

《新青年》派看清了鬼神迷信逆流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他们指出,提倡有鬼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sup>③</sup>。对于这股鬼神迷信思潮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八表同昏,天地既闭,国人对现世界绝望灰心,乃相率而逃于鬼”<sup>④</sup>。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正为鬼神迷信的流行准备了基础。二是灵学会的现实表演是中国传统迷信活动的继续,尤其是与儒、道两家有关。三是那些搞鬼神迷信活动的人,其目的在于牟利。《新青年》派继承中国古代无神论传统,在一些文章中援引中国古代反对鬼神迷信的无神论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sup>⑤</sup>

《新青年》与《灵学丛志》之间关于鬼神迷信的辩论,实质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与迷信的斗争。由于产生鬼神迷信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上的根源继续存在,这些鬼神迷信活动不可能经过一场辩论而消灭。《灵学丛志》虽在不久停刊,但同类性质的组织“悟善社”、“同善社”等又泛滥起来,此外还有《灵学要志》杂志出版。尽管如此,经过这场辩论,此类组织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已是声名狼籍。这场论战张扬了

① 陈独秀,《阴阳家》,《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②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③④ 刘叔雅,《周易乙亥君》,《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⑤ 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科学旗帜,推进了社会风俗的变革。

### 三、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农村风俗的变革

现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推动社会风俗变革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工人运动,到1924年前后,各地工人纷纷成立工会,创办夜校和俱乐部,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清除宗法观念和旧式行帮的影响;迅速脱离自在阶级的状态,以自觉的姿态站到改造社会的最前列。在农村,随着1926—1927年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普遍组织起来,社会风俗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27年3月,全国农会会员达500万人。广大农民在乡间推翻地主政权,解除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封建势力;打破族权、神权、夫权,猛烈冲击各种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农民还把他们深受其害的恶风陋俗加以禁止和限制,有些地方已基本做到“弊绝风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法令形式改革社会弊端,开展民主运动、教育运动和妇女运动,推进社会风俗的变革,因此,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都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

#### (一) 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对封建习俗的冲击

现代中国农民运动于二十年代初首先在广东兴起。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农民运动在华南各省迅猛发展,1927年则扩展到北方。“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sup>①</sup>农民运动在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同时,在改造社会习俗方面亦多有建树。

1. 广东海陆丰。海丰和陆丰是广东东部两个相邻的县。1922年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6月,彭湃深入海丰农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同年10月成立“赤山约农会”。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随后,又相继领导成立了陆丰总农会、惠州农会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使农民运动迅速向全省扩展。关于农会的纲领、组织、会务等情况,彭湃于1923年9月写给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中作了如下介绍:“其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其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sup>①</sup>。其会务包括防止田主吊田,以免农民生活不安;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会员如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极力和解,以免讼累;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办理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教育事项;办理农业改良事项;办理水利发展事项;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办理农团以除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等。

当时,上述纲领、组织和会务中的大部均已实行,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农村社会风气的变革,其中尤以海丰和陆丰两县最为明显。海丰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那里有许多新型的社会文明,如出现不要钱的医院、学校;教育农民破除迷信,宗教开始衰微,教会中学有百多名学生退学后转入新式学校读书;鸦片烟和赌博都被禁止;组织妇女解放协会,把反对虐待奴婢、反对守节和争取婚姻自由与土地斗争结合起来,使妇女地位迅速提高。

2. 湖南。1926—1927年间,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根据毛泽东的分类总计,湖南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共做了14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

<sup>①</sup>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页。



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其中有些直接就是破坏旧习俗、树立新风尚的社会改革，有些则是为这种改革创造了环境或提供了条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是湖南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在1926年一年间，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农会是农民社团的最高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农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农民结社完成了由旧式会党向现代社团的转变。农会作为农民的平等联合组织，削弱了从前等级制的宗法结构，必然引起农村民情风俗的一系列变化。

其一，推翻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农民运动推翻了地主政权，使族权、神权、夫权也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的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昔日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被废除。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与此同时，神权也发生动摇。农会占领神庙作会所，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作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禁迷信、打菩萨之风在一些农村盛行，家神老爷（傩神）游香被禁止。丧葬中敬神、做道场、送大灯的减少。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壮年农民都不再信神。夫权在农民运动中也被削弱，许多地方的妇女组织起乡村女界联合会，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女界联合天足会，发动妇女放足和剪发。

其二，严禁牌、赌、鸦片。农会在乡下树立了权威，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其中禁得最严的便是牌、赌、鸦片三者：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的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sup>①</sup>

此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如花鼓戏可能因其宣传封建迷信和色情而被禁演。农民痛恨坐轿子的老爷,先是打轿子,后来大涨轿工价。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或被禁止,或自然消灭。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等等。

其三,开展文化运动。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兴起。农民不欢迎脱离农村实际的洋学堂,大办农民夜校,平均每乡一所,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

有的地方农民还组织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进行经济上的互助。修道路、修塘坝一类公益活动也由农会管起来。

3. 湖北。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于1926年底北迁武汉,使南国新风猛烈地冲击了湖北社会的传统习俗。特别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为湖北的农民运动和社会风俗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军进驻武汉,许多知识青年脱下长衫投入革命洪流,从外表到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女青年更是“摆脱封建枷锁,做了家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庭叛逆，鄙弃小姐式的生活，脱下时装艳服，穿上了朴素的灰布军装，走向艰苦火热的生活中去，向传统的旧道德、礼教及一切不平等制度宣战”<sup>①</sup>。她们不顾社会的歧视和家人的反对，剪短发，穿草鞋，荷枪实弹，进行操练、野营；有的则成为群众宣传队员和文艺舞台上的演员，传播新思想和新风尚。她们在革命队伍中自由恋爱，与志同道合的男青年结成革命伴侣。武汉社会受着大革命的洗礼，传统习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辛亥革命后复起的缠足之风被禁息，女子剪发成为时尚，牌赌几乎禁绝，鸦片烟鬼被迫藏匿，迷信活动顿时敛迹。

湖北农村的社会风俗也出现了大变动。如浠水县原来旧俗很重，妇女缠足，梳纠巴头，穿耳环，着大袖衣服，终年围绕锅台转，不让读书，不许社交，不许高声说笑，不许反抗，要遵守“三从四德”、“对男子绝对贞节”的旧道德。在大革命中，该县农会在破除旧俗，解放妇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放足、剪发、改服装运动。女学生开风气之先，带头不缠足、剪发、穿短装，宣传婚姻自由、童养媳自由、奴婢自由、寡妇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掠夺婚姻，反对重男轻女，要求男女教育平等。1927年上半年，浠水全县要求婚姻自由、包括寡妇再嫁的案件，共达260多起，都得到处理<sup>②</sup>。通山县过去在春节期间，不是拜年请春酒，就是搞封建迷信的迎神赛会。另外便是沿街摆设几十张台子，公开赌博。1927年农民组织起来，以玩龙灯、耍狮子、踩莲船、踩高跷等代替旧习恶俗，还把过去唱的旧调填上新词，宣传革命道理。汉剧也改演革命人物故事，人们称作“文明戏”。禁烟委员会抓烟贩，缴烟枪。妇协沿街检查年轻妇女是否放足，剪去发髻。童子团还宣传破除迷信，不信鬼神，捣毁了城隍庙、多宝寺的菩萨<sup>③</sup>。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① 汤石僧：《烽火中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

② 邓谷：《大革命时期的浠水》，《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

③ 朱明：《忆通山县的大革命》，《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

4. 陕西。陕西的农民运动自 1926 年底进入高潮,至 1927 年 7 月陕西省农民协会被强行解散,历时约半年。此间,陕西许多县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破除旧俗,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其一,从教育入手促进社会风俗变革。在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中,关于教育的方针是:广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提高农民政治知识;设立农民俱乐部,组织农民宣传队及讲演团;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农民补习学校<sup>①</sup>。于是,各地农会普遍兴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读书识字,学习革命道理。与此同时,还举办农民俱乐部、剧团、儿童劳动会等。

其二,破除迷信。农民协会从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被霸占的祠堂、庙宇,变为农民协会、平民学校或农民夜校的场所。在农民协会强盛的地方,一些欺骗坑害人民的巫婆、神汉和卜卦相面者,不得不退避三舍或改务正业。<sup>②</sup>

其三,提倡男女平等。在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农村妇女决议案》中,要求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同时规定:婚姻须得女子同意,反对买卖制及聘金制;严禁虐待童养媳和媳妇,禁止给女孩缠足;须给再婚妇女在社会上一律平等待遇,不得歧视;妇女如愿再婚,其家人不得干涉;凡会员均不得虐待其妻女<sup>③</sup>。许多农民协会配置有“天足委员”,负责宣传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歧视妇女,倡导放足、剪发。

其四,禁烟禁赌。在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严禁烟赌决议案》,请政府严令禁止种鸦片烟及吸烟、赌钱,违者重惩。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③ 同上书,第 234 页。

要求各农协严拿吸烟、赌钱之徒，酌量处罚，因此各地兴起戒烟抓赌新风。上述决议和活动，对于破除乡村陋俗、提倡新风尚起了促进作用。

## （二）苏区的民俗革新

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政权采取苏维埃（即代表会议）形式，叫苏维埃政府，根据地简称苏区。当时各革命根据地都处在偏僻的山区或边界地区，经济文化均不发达，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围剿”，广大军民处于频繁作战的环境里，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和移风易俗活动的条件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仍把搞好文化教育工作、推进社会风俗变革，看作是争取革命胜利与苏区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将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一些新风尚以政策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对于封建陋习恶俗也有法规加以取缔、限制或改造，而且在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时，采取适合苏区实际的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大力推进社会风俗的改革。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sup>①</sup>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区根据这一方针，在彻底改革旧教育的

<sup>①</sup>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同时,切实施行普及教育,兴办农民学校,从而推进社会习俗的革新。

“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生活。”<sup>①</sup>不久又专门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共七章二十三条,对婚姻原则、结婚、离婚、离婚后的幼儿抚养、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1934年又对此条例作修订,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该法宣布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买卖婚姻制度,禁止一夫多妻,禁止童养媳,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同时确立了婚姻登记制度。它对改造中国旧婚俗,建立新的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关于婚姻的立法均以此为蓝本。

苏区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妇女地位,如严禁贩卖妇女,取消蓄婢制度,禁止娼妓活动,禁止翁姑虐待媳妇和丈夫打妻子等,并组织各种活动,破除迷信,宣传移风易俗,收到明显的效果。如在长冈乡,据毛泽东调查: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头发,除老太婆外,一律剪掉了,老太婆也有剪发的。去年以来,老太婆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sup>②</sup>。在赣西南地区,“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艺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天地君师亲位’,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所谓公产公妻的鬼话的现象。农民也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325页。

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用度。记得富田之彼下(乡苏)以前要卖出黄纸(敬神用的)两万余元,现在完全取消了,黄纸店也倒了”<sup>①</sup>。“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他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sup>②</sup>

苏区政府还规定了许多新的节日、纪念日,如1月1日新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日,2月7日“二七”罢工纪念日,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5月1日劳动节,5月30日“五卅”纪念日,11月7日十月革命节,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等,通过这些纪念日向民众进行革命宣传教育。

### (三) 延安新风尚

陕甘宁边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保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大块革命根据地。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实行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边区政府按照当时的可能条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在改造社会风俗方面,开启了一代新风尚。

其一,大力发展民众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继承和发展了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废除了国民党统治区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

<sup>①</sup> 张紫晨:《中国民俗的历史》、《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44页。

<sup>②</sup>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5页。

治报告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据此，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国防教育政策。它们不仅大办各种干部学校和中等学校，而且重视民众普及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中规定：“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成人教育主要是农民教育。群众根据当时农村分散的特点，结合当地斗争和生产的需要，照顾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切身利益，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如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冬学、个别教学、炕头教学、巡回教学等等，其中冬学是主要形式，它主要是在冬季农闲时开办，成效显著。教学内容也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教材可以根据群众需要自行编写。

儿童教育从贯彻“民办公助”政策后，民办小学迅速发展。在这些小学里，群众还创造了适合当时抗战形势和农村特点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克服了旧型正规化的毛病。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由群众自己来决定。它的形式很多，各有特色。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有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的村学；由群众中积极分子倡议，经政府积极支持和帮助而办起来的学校；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学校，新式的巡回学校等。其中有的是全村男女老幼分班学习的一揽子村庄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是教育儿童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村宣传、推动、组织文教运动的中心。在文化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经常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开展识字运动，出大众黑板报，成立读报组，教唱



革命歌曲等,既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风俗的变革。米脂高家沟的桑文义和延安杨家湾的陶端予,就是在这个文化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教师的代表。

其二,用法令形式推进社会风俗改革。1939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发给各县、区、乡训令,令飭严行放足运动,限6个月内完成全边区妇女放足任务,并随令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1942年1月,成立边区禁烟督察处,颁布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以中央苏区1934年的《婚姻法》为蓝本,而比其更加完备和详尽。条例规定男女婚姻以遵照本人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童养婚等陋习,还规定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为边区妇女解放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妇女协会,负责教育妇女从事生产劳动,参加社会活动,并保护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

其三,实行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民间文化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使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的时代主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sup>①</sup>接着,他又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倡导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生活,对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化,如年画、剪纸、民间故事、秧歌、社火、秦腔、陇东道情、陕北民歌等,进行挖掘、整理、改编和创造,出现了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秧歌剧《兄妹开荒》、平剧《三打祝家庄》和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突出的成果。当时的边区还注意吸纳新的文化形式,管弦乐队的成立,大合唱的创作和开展,木刻、绘画艺术的引进和推广,都丰富了革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命队伍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

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移风易俗运动,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第三章 教 育

---

## 第一节 概 述

---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相适应,逐步实现由传统的旧教育向现代新教育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教育制度、各类学校、学科内容和教育方法等都有了很大发展。其基本特点和趋向是:在中西文化、中西教育的碰撞与融合中,新旧教育制度嬗变,即由封建主义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

纵观该时期中国教育史,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文化教育战线继续清末以来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同封建阶级旧文化旧思想的斗争,表现在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的试验和封建复古教育逆流的回潮之间的斗争,如教育宗旨制定、学校制度变革、课程和教学方法更新等,都具有上述斗争的性质。“五四”运动以后,是现代教育全面展开和实施的时期。与近代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注重生活、实践及个性发展,认为教育应当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对此,社会

各阶级、各阶层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建立了本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它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具体说来,中国现代教育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教育也具有不同的状况和特点。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封建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发布了教育改革令,颁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制定了新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并对课程的设置、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封建旧教育的一个显著的胜利。但为时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北京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权。他们大搞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恢复尊孔读经,复活封建买办的教育宗旨,致使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教育改革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教育又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这股逆流很快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批判。

“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新篇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由旧民主主义阶段步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教育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局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封建复古教育受到猛烈批判,读经科目被逐出校门;学校的民主气氛高涨,学生自治团体大量涌现;女子教育受到重视,北京大学首开“女禁”,许多学校陆续招收女生;提倡白话文教学,采用语体文教科书。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也迅速发展:在普及教育方面,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是“五四”运动中“拥护民主”口号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实践。在职业教育方面,1916年江苏省教育会提出实施职业教育

方法案,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进行大学改革,取得显著成果,其他大学也基本上按北京大学办法改制。在上述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基础上,1922年北京政府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草案》(即“壬戌学制”),它是“五四”时期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不少早期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参与了 this 活动。与该时期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相呼应,各种教育思潮竞相出现,主要有平民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工学和工读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无产阶级新教育的产生,是这个时期划时代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以后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旗帜下共同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运动,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有了长足的进展。1924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sup>①</sup>。此间,国共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官学校等,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拟定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为日后发展教育事业做了一些政策性的准备。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到“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出现了收回外国人依据不平等条约创设各级各类学校权利的运动(简称“收回教育权运动”)。此外,针对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24页。

该时期出现的“国家主义教育”逆流，恽代英、萧楚女等进行了批判。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教育与政治局势的变化相一致，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与对峙。其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先是推行“党化教育”方针，后来又颁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并发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在教育制度上，则在沿袭1922年的“新学制”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教育规程、法令、标准和纲要，以强化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直接控制。1934年蒋介石亲自倡导“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是这场运动的准则，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全国纳入军事化的轨道。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苏区出现了相对统一、独立发展的人民教育体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注重普及教育，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依靠群众办学。其三，各派教育家进行了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黄炎培倡导的农村教育改进实验区、晏阳初主持的农村平民教育实验、陶行知领导的乡村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实验以及梁漱溟组织的乡农学校实验等。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大肆推行其殖民统治的奴化教育。对此，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开辟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华战争，中国教育事业也遭到了严重破坏<sup>①</sup>。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基本上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各自承办其管辖区内的教育事业。在国民党

<sup>①</sup> 顾毓秀：《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时事月报》第19卷第5期，1938年10月。

统治区,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了战时教育的总纲,还先后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确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施方案。此后,随着战争的失利,国民党政府还在教育上采取一些应变措施,如大批高校内迁、设置国立中学以安置沦陷区流亡的中学生、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贷金制等。在此期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教育事业较前有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存在种种弊端,尤其是不适应抗战的需要,因而在战争全面爆发时便发生了关于战时教育的辩论,教育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教育的封建性和买办性。1938年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成立,号召全国教育团体和教育工作者要一致合作,“努力于战时教育的研究、设计、宣传与推行”<sup>①</sup>。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的言论,基本观点是:实行“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最高准则;以“党员守则”作为教育的基本信条;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学校训育准则;教育要文武结合;等等。其目的在于控制教育,拒绝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实行抗战的教育方针,提倡国防教育,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和工农群众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发展和成熟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是先后创办了20多所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其中著名的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华北

<sup>①</sup> 《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成立宣言》,《新华日报》1938年2月16日。

联合大学等,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中等教育主要有师范学校、中学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地方干部和小学师资;小学教育承继了苏区小学教育经验,实行义务教育,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都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人教育主要是根据农村特点,开展农民教育,其形式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冬学、半日学校、民众教育馆等,以识字为主,并学习时事政治。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内继续推行奴化教育。194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所谓“东亚教育”会议,强化了日本占领区的奴化教育。对此,沦陷区人民进行了种种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教育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急骤变革也出现了大转变的局面: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疯狂镇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广大师生的民主教育运动,使国统区的教育丧失了民众,陷入全面危机,最终只能和其政权一样退出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教育,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教育权,新民主主义教育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

## 第二节 教育思想、学说

---

### 一、主要教育思潮

#### (一) 军国民教育思潮

清末民初兴起的一种较有影响的教育思潮。中国古代教育把学



军习武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重。但自汉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军事科目的学习便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中国教育长期重文轻武。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自动组织起来,武装反抗侵略。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加强军事教育的必要,主张“以民为兵”,提倡“尚武”精神。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于1906年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正式列入教育宗旨<sup>①</sup>。191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海开会,通过五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即“请定军国民教育案”。同年6月,清政府在京召开教育会议,通过17项议案。其中第一项为:“军国民教育咨议案”。第二项为:“提倡军国民教育案”。可见军国民教育在清末已成风气。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进一步阐明了军国民教育的主张。同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正式把军国民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之中。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又把“尚武”列入教育宗旨<sup>②</sup>。当时,代表教育界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力提倡军国民教育,并议决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对施行这项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细阐述。至此,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达到高峰。

“五四”以后,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涵义和内容也在变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通令各省市教育局:鉴于国运危急,在专门以上学校加课军事教育;同年“济南惨案”之后,军事委员会拟议凡高中以上学校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军国民主义教育的主张再次提出。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讲话时说,我们救

<sup>①</sup>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页。

<sup>②</sup>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

国的教育,亦就是“军国民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军国民主义教育一直为教育界人士所提倡。

总之,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既是受中国寓兵于农传统的启发,又是受西方国家推行义务兵役制的影响,加之教育界和政府当局大力提倡的结果。

## (二) 实利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思潮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是清末民初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是实利主义教育思潮的演变和发展。它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而产生和发展的。早在“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曾颁布创办实业学堂的法令。1903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实业学堂的宗旨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并将实业教育列为学制中一个独立的系统。此后,各级各类实业学堂有所发展。1912年初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根据清末实业教育发展状况,参考各国教育经验,提出实利主义教育,并把它列入教育方针中<sup>①</sup>。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指出发展实业教育已成为社会潮流。他说:“一般论者,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其道维何?曰多设实业学校也;曰于普通学校加设实业科也;曰提倡实业补习教育也。”<sup>②</sup>同年,庄俞发表《采用实用主义》文章,表示赞成黄炎培的观点;陆费逵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和国民教育并重》论文,提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的观点。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将“职业主义”列为新教育方针的内容<sup>③</sup>。这些文章扩大了实业教育的影响,并以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137页。

②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页。

的概念,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1916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常年大会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方法案,议决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同年12月,蔡元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题为《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的演说,强调必须发展职业教育,以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1917年5月6日,教育界、实业界人士40多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推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聘蒋梦麟为总书记。该社组织大纲写道:“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并规定该社任务是:“甲、推广职业教育。乙、改良职业教育。丙、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sup>①</sup>后来又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同年10月出版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并附设各种工厂、商店等。由于当时提倡职业教育者的努力,职业教育思想广为流传,在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中,职业教育占有了重要地位。此后,职业教育在全国逐渐发展起来。

### (三) 平民教育思潮

“五四”时期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思潮。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提出的办刊宗旨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后,中国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1915年,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必须同时在教育上实行“惟民主义”<sup>②</sup>。1916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颁布了《注意贫民教育案》,并通知各省区教育会贯彻。此后,平民教育运动逐渐兴起。参加的人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政治见解不同,

<sup>①</sup>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sup>②</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7页。

实施平民教育的目的各异,但却都是在“拥护民主”旗帜下,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开展争取人民教育权利的活动。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劳动与教育问题》,呼吁广泛设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也有均等机会去读书、看报、补习技能和修养精神。同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sup>①</sup>。他们通过“以学就人”的露天讲演和刊发出版物等形式,在城市、乡村和工厂开展平民教育活动。陈独秀多次著文,主张平民教育要使“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进学校读书,要求一切学校教育机关向全民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享用;认为要真正实现平民教育,就必须根本解决广大人民的生活问题,“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一般工人不能得着平等的教育<sup>②</sup>,他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事”。<sup>③</sup>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失学人民补习教育办法》的决议,通知各省区教育会开展失学人民的补习教育。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1919年10月和12月,分别发刊《平民教育》和《少年社会》,鼓吹平民教育。前者认为,“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后者主张通过教育使人人树立“德谟克拉西的人生观”,才好实现“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两者都宣传教育救国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同年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由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接着,各省也纷纷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了各省平民

①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167页。

教育的发展。从此全国 20 个省区多办起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还编印了《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学校读本。

二十年代中期,平民教育运动明显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教育家继续坚持“平民教育救国论”,从事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活动,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在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积极开展了工农教育运动。

#### (四)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民国初年开始传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大量传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思潮。

1919 年 5 月<sup>①</sup>,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他在中国居住了两年又两个月<sup>②</sup>,走遍了南北 14 个省市,讲演 200 多次,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系统讲授教育哲学。他的讲演除在多种报纸、《新教育》杂志等作系统介绍外,还编成《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教育哲学》、《杜威在华演讲录》、《平民主义与教育》等小册子出版发行。其中以《杜威五大讲演》流传最广,在他离开中国前,就再版 10 次之多。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儿童是中心”。他主张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内容纳入教学过程去,使儿童“从做中学”。他认为教育的自身没有什么目的。教育目的应该从属于教育过程,这过程就是它自身的目的,此外没有别的目的。由此他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的主张,认定教育目的只在于“养成适应现在环境的人才”,使他们“有应付环境的技能”。他主张初等教育“并不在使儿童读许多书,获得许多丰富的知识,而在于养成

<sup>①</sup> 关于杜威来华的日期有两说:一说是 1919 年 4 月 30 日,见“胡适给蔡元培的信”,《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 5 月 8 日;另说是 5 月 1 日,见《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 1920 年版,第 256 页。

<sup>②</sup> 杜威于 1921 年 7 月 11 日离北京回美国。

将来应用的能力、技能和习惯”；中等教育“求知识量较重”，要避免“太泛”和“太专门”的弊病，既要为进入高等学校作准备，又要为进入社会“谋生”作准备。他还提出教育三个要点，即儿童是教育的根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介乎两者之间的学校和教材是教育的工具。

杜威十分看重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许多旁的机关都不及它。例如警察、法律、政治，等等”。<sup>①</sup>

实用主义教育提倡民主主义，学校中人人一视同仁，不分等级贵贱，彼此和谐相处。以此移往社会，以求减少社会的纷争和矛盾。杜威还提倡平民主义教育，认为“须把教育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的各分子着想，使能成为便利平民的教育”。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需要，受到教育界许多人士的信服和推崇，使它广为流传，并成为现代教育史上一种有长久影响的教育思潮。

## 二、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又是力主改革封建主义教育、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倡导者。在其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教育著作有：《上李鸿章书》、《民国教育家之任务》、《女子教育之重要》、《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等。

孙中山重视教育的作用，力主革命教育。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是因为他们教育发达。中国应仿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养之道”，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对比

<sup>①</sup> 《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第160页。

西方,他抨击中国封建教育及用人制度的弊端。后来,孙中山从康梁改良主义道路的失败中,深切认识到革命的巨大意义,主张实施革命教育。他指出,教育必须服务于革命,要先革命后教育。“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sup>①</sup>,要通过教育宣传革命,“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培养革命人才,唤起民众,才能成功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要教育年轻一代继承革命未竟之功。

关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即认为“真知特识”是从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总结出来的,后于行而难于行,是为“知难”;“行”主要指“不知而行”,是人人都可做到的,所以“行易”。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先行后知”、“知以进行”等观点。孙中山认为,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人类“多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就拿习武、试验、探索、冒险四事来看,也说明“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他进而指出,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就能对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必然导致“知之更乐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因此,应该提倡“知以进行”,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并用之指导实践。

从中华民国成立一开始,孙中山就主张普及教育,关心贫穷儿童及劳苦大众的教育问题。1912年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而今中华民国建立,“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sup>②</sup>。这种普及教育的思想观点,在以后他所制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和多次演讲中,都一再得到重申。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颁布了不少改革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3页。

封建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法令。当时所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及其设置的课程,除注重发展普通教育外,还重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则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代替灌输“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课程;同时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的课时,加强了生产技能的教育。

为了普及教育,孙中山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他说:“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国。”<sup>①</sup>《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把“厉行教育普及”规定为一项重要的“对内政策”。

此外,孙中山对青少年的学习目的和方法也十分关注。他号召青少年要立大志,读书要“为平民谋幸福”、“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不要为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学习时不要“死读死记”,应从考察、研究事实入手,把读书和考察事实结合起来,在总结经验中上升为科学理论;要独立思考,课内学习与课外自修相结合,达到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注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及繁”地进行学习。要努力学好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帮助中国进步。

### 三、蔡元培对现代教育学说的贡献

蔡元培(1868—1940年)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他出身于普通商贾之家,少年时期就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变法维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8页。



新运动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年,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曾赴德法留学多年,为其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著名基地。1927年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40年病逝香港。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毛泽东曾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sup>①</sup>。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他在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教育方针“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sup>②</sup>。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

<sup>①</sup> 毛泽东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sup>②</sup>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4页。

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sup>①</sup>。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现象世界的教育目的,即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要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总之,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sup>②</sup>。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132页。

② 同上书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

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sup>①</sup>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主张。他认为新旧教育之不同,在于旧教育是以成人的意见强加于儿童,阻碍儿童个性自由发展;新教育则以儿童个性为出发点,使其自由发展。他反对“注入式”教法,重视学生自动、自学、自助,教师只居于引导与辅助的地位。他还提倡“即工即学”、“边工边学”,使学生从实际活动中获得知识。

蔡元培对于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也很重视。他认为劳动教育可使人民养成劳动习惯,解决劳心劳力的对立。平民教育可使全国平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达到人人平等、幸福。女子教育,可以造就完全人格,使男女平等,国家隆盛。因此,他支持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并在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大学生。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贯彻着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对于资产

<sup>①</sup>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

阶级各种教育学说和教育制度、方法,他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 四、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1895—1931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1917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员。1920年同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1921—1926年,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约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此间,经常发表有关青年和教育问题的论文、通讯。大革命期间,在沪杭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一度逃亡日本,并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1929年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文委的领导工作,后因积劳成疾,复至日本就医。1931年8月9日病逝。杨贤江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阐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家,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及300多篇关于青年和教育问题的论文等,后辑成《杨贤江教育文集》。

关于教育的本质,杨贤江认为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sup>①</sup>,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是依据经济基础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sup>②</sup>;教育不仅由经济所决定,也由政治所决定,“正犹教育与经济互有关系,教育与政治也是互相作用的”<sup>③</sup>;教育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合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页。

② 同上书,第534页。

③ 同上书,第542页。

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是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之一种手段”，这种教育是全社会的，是统一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了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其特征是：“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两重教育权的存在及对抗”、“男女教育的不平等”，所以这种教育显然是有阶级性的<sup>①</sup>。由此，他批判了“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等观点。

关于教育的效能，他认为教育既然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受社会经济和政治所制约的，它不可能超越这种制约而发挥其效能。他说：“就教育上的各种设施以及教学内容而言，都是和当时的经济及政治状态相适应的——不拘是反动的也好，是革命的也好。”“说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越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梦吃，也准是夸大狂”<sup>②</sup>。他批判了三种错误的教育效能观，即“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和“先教育后革命说”。指出要变革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进行革命。在革命中，教育应当作为革命武器之一；革命胜利之后，教育是保卫政权并促进政权的一种机能。

杨贤江对教育的进化作了历史考察，阐明了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教育的特征。关于资本主义教育，他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与封建社会教育不同，这是由两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而决定的。两者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教育要比封建社会教育进步。针对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颂扬的论调，即所谓“劳动化或生活化”、“科学化”、“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中立化或公平化”、“国际化和和平化”等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除了具有阶级社会变质教育的五个特征外，还要添上两个特征：独占化与商品化。同时，资本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合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1 页。

② 《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62 页。

主义社会教育还存在矛盾现象,如个性发展与强行限制、“启发”与蒙蔽、学术研究自由与思想专制等矛盾。这是“文明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有摧残文明、阻止进步的行为”<sup>①</sup>。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需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的教育,也是有阶级性的。所不同者,这时期的教育权和政权不在资本家手中,而在无产阶级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以养成无产阶级的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为目的”<sup>②</sup>。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杨贤江主张对青年进行“全人生的指导,而关键则在于使青年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 五、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攻政治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J. 杜威、P. 孟禄的学生。1917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并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来,他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并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面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极为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6年初,他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提倡国难教育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指导出版《战时教育》杂志等刊物,

① 《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6页。

② 同上书,第532页。

推进战时教育运动。1939年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并创办了社会大学。1946年7月病逝。陶行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中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逝世后,毛泽东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也赞颂他是“万世师表”。陶行知一生有很多教育著作,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幼稚教育论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普及教育》、《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及后来辑成的《陶行知文集》等。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在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办晓庄学校时提出的,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他陆续作了新的解释和发展。生活教育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其要义是强调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他对生活即教育的解释是:“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非康健的生活,就是非康健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非劳动的生活,就是非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非科学的生活,就是非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非艺术的生活,就是非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非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非改造社会的教育。”“有计划的生活便是有计划的教育;没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没有计划的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sup>①</sup>。他指出生活教育的特质是:“(一)生活的,(二)行动的,(三)大众的,(四)前进的,(五)世界的,(六)有

<sup>①</sup>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244页。

历史联系的”<sup>①</sup>。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拿抗战的生活来克服妥协的生活……教育只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sup>②</sup>。“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sup>③</sup>。后来，他为生活教育运动定了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

对于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是相联的。“我们主张‘社会即教育’，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sup>④</sup>。他认为，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sup>⑤</sup>

关于“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观点，陶行知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sup>⑥</sup>。“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sup>⑦</sup>他还说：“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sup>⑧</sup>教学做合一是大众的生活法。“行

①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8—530页。

② 同上书，第653—654页。

③ 同上书，第694页。

④ 同上书，第250页。

⑤ 同上书，第423页。

⑥ 同上书，第185页。

⑦ 同上书，第151页。

⑧ 同上书，第188页。



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sup>①</sup>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完整体系，既有教育目的、方针、原则，又有教育内容和方法。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包括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始终贯穿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观点。从“一二九”运动到他逝世的最后十年，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sup>②</sup>，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同时把生活教育运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并为之服务，从而不断发展了生活教育理论。

## 六、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黄炎培(1878—196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协助蔡元培制订民国教育政策法规多种，主持江苏省教育行政工作，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3年，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有力地推动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1914年以后，进行了广泛的国内外教育考察，坚定了改革旧教育、提倡职业教育的决心和信念。1917年他联合国内知名人士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此后，他坚持不懈地提倡、实验和推广职业教育，提出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并在职业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黄炎培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主要教育论著有《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与杨保恒合著)、《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南洋华侨

<sup>①</sup>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sup>②</sup>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教育商榷书》、《中国教育史要》、《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以及后来选辑的《黄炎培教育文选》、《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

民国初年，黄炎培首倡实用主义教育，这是针对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社会实际而提出的。他认为“欲求学校教育之见功，教育主义必注重实用而后可”<sup>①</sup>。实用主义的提出，是自然的趋势，其原因是：社会生计之恐慌；百业之不改良；学校毕业生失业之愈多。从而指出，“不实无用”，不得谓之教育。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可以“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sup>②</sup>。他建议以实用为目的，改革小学各科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还把实用主义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之背景，指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前，“教育界盛倡实用主义已有年。迨本社成立，大都以倾向实用主义者倾向职业教育。故实用主义者，不啻职业教育之背景也。”<sup>③</sup>

黄炎培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对职业教育的地位、目的、办学方针、教学原则和职业道德教育等作了系统地阐述。

黄炎培以改良教育为改良社会的手段，主张沟通教育与职业的联系。他认为职业就是“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就是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而职业教育就是依据人们的职业需要，“启发人的知和能”，使“人人广其知而大其爱”，“了解我与群的关系”，贡献其力量，从而获得生活需求，同时“对群服务”。他说：“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而

①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14 页。

③ 同上书，第 100 页。

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sup>①</sup>。他指出:“教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sup>②</sup>倘若能沟通教育与职业,十年之后中国可以赶上“欧美今日之盛”,“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羸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基础于以确立”<sup>③</sup>。为此,“主旨三端: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sup>④</sup>。

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sup>⑤</sup>。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sup>⑥</sup>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科学化,认为这是职业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所谓社会化,就是要一切“着重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这是“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后来,他把这种观点发展为“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社会是整个的”,要求“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sup>⑦</sup>。所谓科学化,是指“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并不会在科学以外,别有解决的新方法”<sup>⑧</sup>。因此,办理职业教育要力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重调查、注重试验,勤于总结、逐步推广,力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工作重效能”,用科学的态度来处理职业教育上的种种问题。

①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②④ 同上书,第54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⑤ 同上书,第68页。

⑥ 同上书,第321页。

⑦ 同上书,第155页。

⑧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主张职业教育者,同时必注重职业道德。职业教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两者缺一不可。若离开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真义。他标举“敬业乐群”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有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要“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根据这一基本规范,当时各类职业学校曾制定职业道德教育标准,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

黄炎培还认真总结清末以来开办实业学堂的经验教训,针对过去实业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等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 七、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陈鹤琴(1892—1982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家、儿童教育家。1914年清华大學毕业后留学美国。1917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务长。1920年开始进行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实验研究。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兼任园长。1925年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书。1927年任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第二院院长。此间他在幼儿教育实践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儿童发展特点的主张。1928年受大学院之聘,参加并负责全国幼稚园标准的拟订工作。1928—1939年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长。1934年赴欧洲英法等十多个国家考察教育。1940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学校,此后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他先后创立幼稚教育研究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幼稚教育社,主编了《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

《活教育》等刊物，还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及小学自然故事等丛书。他还热心从事普及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和文字改革工作。1949—1959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院长。1979年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他的主要教育著作汇集成《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卷。

陈鹤琴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说：“儿童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sup>①</sup>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幼稚时期是身体和智力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幼稚教育是儿童的基本教育，亦即人群的基本教育。儿童在这个时期，关于习惯、知识、言语、思想各个方面都打了很深的根基。倘说在这个时期根基稍一不稳，将来要想建造健全的人格，也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促进健全的社会，第一须注重幼稚时期的教育。”<sup>②</sup>为此，他号召教育工作者要十分重视和开展对幼教的科学实验，探出一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的客观规律，从而促进全民族的幼儿教育的发展。

陈鹤琴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儿童心理及其教育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样。儿童的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sup>③</sup>。什么是儿童期？他称儿童期就是可塑性的意思。它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儿童期是发展能力的时期；另一方面儿童期具有可以发展的性质，此即所谓可塑性，或谓可教性<sup>④</sup>。他认为儿童生来的天性是好动、爱模仿、好奇心强、爱游戏。好动说明“儿童还没养成自制力”，他的行为完全为冲动与感觉所支

① 《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② 同上书下卷，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③ 同上书上卷，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④ 同上书，第59页。

配。在教育上应给予充分机会,适当的刺激,使他们多与万物接触才好。模仿心、好奇心在教育上价值很大,教育者应当利用它们,给予模范的影响,引导他们至学问的境界。他说:“儿童好游戏乃是天然的。近世教育利用这种活泼的本能,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幼稚园教育,即根据游戏本能。即以中小学校而论亦以游戏为施教之良器。”<sup>①</sup>

陈鹤琴认为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幼稚园教育所不能代替的责任。他十分重视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在所著《家庭教育》一书中,总结出家庭教育原则 101 条,每条原则均以事实为据。比如,他提出父母教育孩子的原则和方法是:(1)用积极的暗示,不要用消极的命令;(2)用积极的鼓励,不要用消极的刺激;(3)要以身作则,并选择好环境以支配儿童的模仿;(4)不以命令式去指挥儿童;(5)不要多说“不!不!”事属可行,就叫他行;事不可行,禁止他行;(6)对别人做的好事或坏事,父母应以言辞赞许或批评;(7)根据儿童的年龄、知识引发其做事的动机;(8)既不姑息也不严厉;(9)不要骤然命令小孩子停止他的活动;(10)父亲应同儿童做伴侣;(11)多用游戏法施教。这些原则和方法中贯穿着一个主张,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应该一致,要刚柔共济,万不可宽严不一。他还认为家庭教育必须与幼稚园教育相配合才能做好幼稚教育工作。

“活教育”理论是陈鹤琴的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他认为中国传统旧教育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个“死”字,这种呆板的教育使儿童没有思想的机会,窒塞了儿童的思维,扼杀了儿童的个性。为此,他系统地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1)活教育的目的论。他说,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sup>②</sup>。受教育者

<sup>①</sup> 《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sup>②</sup> 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上海华华书店 1949 年版,第 45 页。

学做人的条件是：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能力，要有创造能力，要能够合作，要有服务精神。抗战胜利后，他把活教育的目的，由“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改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他说，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爱人类就是要爱劳苦大众的多数人，反对共同的敌人。（2）活教育的课程论。他提出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活教材”，让学生和真正的书——大自然大社会相接触，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学习。课程编制的原则：一是根据最近颁的新课程标准，二是根据当地儿童与环境实际需要情形。课程的内容应包括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3）活教育的方法论。基本原则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他说：“在学校里的一切活动，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做了就与事物发生直接的接触，就得着直接的经验，就知道做事的困难，就认识事物的性质。”<sup>①</sup>他把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和批评检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则起指导的作用。

---

### 第三节 教育的分化：不同的教育方针、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生、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时期（1919—1927年）

---

<sup>①</sup> 《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53页。

“五四”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从事教育活动。主要是开展工人教育运动,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中有很多人留法勤工俭学。同时,有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革命青年,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如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在安源等地创办工人学校。同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秋,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所封闭。同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办了湘江学校,毛泽东任校董,湖南自修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转入该校。1922年10月,党还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1926年,彭湃、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又在武昌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干部学校的发端。1924年,为了适应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孙中山举办了黄埔军官学校。

在这一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也起来办学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了这种情况:“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sup>①</sup>

## (二) 土地革命时期的教育(1927—1937年)

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形成时期。自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后,便在苏区开始兴办人民教育事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制订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政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应开始施行完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积极地引导青年劳动群众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sup>①</sup>。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军队教育和干部教育。这是苏区教育建设中最早着手进行的,军事学校最初多是随军性质的教导队或训练班,1931年以后建立起一些比较固定的学校,如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等。此外,苏区还举办了多种干部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师范学校等。并重视干部在职学习,如普遍开设训练班等。

广泛开展群众业余教育,扫除文盲,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和文化补习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统计,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只算江西、广东两省)32388组,组员155371人。特别是妇女的学习要求尤为迫切。

儿童教育。普遍兴办小学,使儿童受到教育。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要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修业年限5年。在小学教学中强调三项原则,必须与政治斗争联系,必须和生产劳动联系,必须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使学生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动的双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的意志。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

<sup>①</sup>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童多数进入了小学。

此外,苏区还举办各种类型师范学校,形成了较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

###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1937—1945年)

这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发展和成熟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制订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并在实施中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sup>②</sup>对于外国文化教育,它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全盘西化”,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中国教育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sup>③</sup>。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它既不否定一切,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剔除其封建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sup>③</sup>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革命性的精华,“古为今用”。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sup>①</sup>,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教育。它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这种革命教育,对于人民大众是有力的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新教育。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废除了国民党统治区奴化的、封建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

根据抗日救亡的需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实施这一政策,就是实行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和抗日干部。为此,各抗日根据地执行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并实行以民教民的新方法。同时还建立了文教统一战线,吸收一切赞成抗日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根据地的文教建设工作。

在干部教育方面,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高级干部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时事政治。文化水平低的干部,补习文化。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办各种干部学校,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以及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等等，培养、训练了大批革命干部。从1941年到1942年，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讲演文章，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干部教育改革逐渐成为群众运动，由此群众教育也开始进行全面改革。

中等教育主要是中学和师范。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地方干部和小学师资。1937年3月成立鲁迅师范学校，1938年又成立边区中学，至1939年两校合并改称陕甘宁边区第一师范学校。到1940年又在关中、三边两分区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成立陇东中学。中等教育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华中、山东等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一定数量中学；而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如陕甘宁边区，则中学缺少。为了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各地区中等教育常常兼办训练干部的短训班或干部科，其教学内容具有实际、精简、集中的特点。此外还开办了少数职业学校，如医药专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

关于小学教育。1938年3月公布《陕甘宁边区小学法》，1939年又公布《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边区小学应依照边区国防教育宗旨及实施原则，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的知识技能”；将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注重教学内容改革；对贫苦儿童与烈军属子弟给予入学困难补助。这一时期儿童教育自贯彻“民办公助”方针后，各根据地小学，尤其是民办小学有了迅速发展。

成人教育主要是农民教育。根据农村特点，结合当地斗争和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教学形式，如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冬学、民教馆等。学习内容以识字、时事政治、生产知识和军事知识为主。教材根

据群众需要自行编写。

#### （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育（1945—1949年）

这一时期解放区教育，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并根据这个时期革命的总任务和形势的变化，把教育为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服务，作为主要任务。当时各类学校都加强了支援战争、争取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也都根据战争的发展和需要，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各解放区教育积极为解放战争需要培养人才，输送干部。与土地改革紧密结合，使教育为土地改革服务。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教育陆续进行了整顿、改革和提高。各解放区先后召开了一些会议，如1946年苏皖边区和山东解放区、1948年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行署、华北及东北教育会议等，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向新型的正规化的教育方向发展的问題。各解放区还陆续制定了一些教育规程、教育方案和实施办法。

“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在这一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各解放区成立了一些新学校，如东北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辽南建国学院、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等。这些学校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后便输送到党政军及文教等部门工作。在这个时期，解放区还进一步发展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如东北地区有东北大学、东北行政学院、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农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沈阳工学院、沈阳农学院、沈阳医科大学、大连大学、延边大学等；华北区有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山东大学等；陕甘宁边区有延安大学；苏皖区有华中建设大学。这些院校一面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一面培养未来的新的专业人才。

同时，解放区还整顿、改革和提高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成人

教育和儿童教育。儿童教育有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成人教育设初级民校、高级民校。此外还有兼顾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双重任务的初级国民学校。各解放区为了提高初等教育质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加强师范教育，重视师资培训，改善教师待遇，积极提高教师素质。同时，加强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有的地方还建立中心小学，带动和辅导一般的初级小学，以提高教育质量。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解放区有大量学校需要接管。解放区各级政府在接受和改革中，采取了审慎的政策和措施：(1)采取保护政策，妥善接管。废除国民党政府旧的教育体制、训导制度，对课程进行调整和改革。(2)对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政策，提高他们的觉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由于政策正确和措施得力，新解放区各级学校的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很快走上正轨。

####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教育(1949—1952年)

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的时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据此，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中国“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

建国初期开展的教育工作，主要有：(1)收回教育主权。1950年12月，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2)妥善地接收了全国新解放区的旧有学校，并对这些学校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主要有：所有学校都向工农群众敞开；取消国民党政府在学校中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建立革命的学生组织；取消国民党政府在学校设立的公民、党义等课程，设立革命的政治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肃清奴化的、封建主

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3)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4)从1952年开始,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与此同时,在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工作,并在调整中将65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5)发展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1952年比1949年冬小学生增长101%,中等学校学生增加142.2%,高等学校学生增加69%。职工业余学校入学人数已达302万人,农民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2400余万人,冬学5000万人。少数民族教育也有发展,近8000名学生在民族学院学习。<sup>①</sup>

建国初期,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所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后来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打下了基础。

## 二、国民政府统治区教育

1927年9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订的教育方针及其实施状况如下。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力图通过教育贯彻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治国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提出根据三民主义而确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制定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是:“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sup>②</sup>会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sup>②</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0页。

议还规定实施教育宗旨的八条方针<sup>①</sup>，以期在各级学校及社会各类教育中推行三民主义教育。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又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在这个“原则”中规定：初等教育的目标，是“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之教育中”；中等教育则要“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并切实陶冶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高等教育要使“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此后，这个教育宗旨、方针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教育法令、颁布教育规程、指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但它是违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

## （二）教育行政制度与学校制度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任命蔡元培为院长，总理全院事务。又颁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设院长、副院长及大学委员会，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社会教育处、文化事业处和各种专门委员会，以及直属国立学术机关（国立大

<sup>①</sup> 即：（一）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生产劳动之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多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二）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三）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四）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五）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于可能范围内，使其独立设置，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六）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必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七）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八）农业推广，须由农业教育机关积极实施。



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博物院等)。各省则分若干大学区,每区以国立大学为教育机关,由大学校长综理区内教育行政及一切学术事宜。1928年10月废止大学院,成立教育部,教育部下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总务四司。1929年增设蒙藏教育司与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在地方上,省设教育厅,县设教育局。

在学制方面,基本上仍继续实行1922年公布之壬戌学制。1928年5月,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学制。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废除综合中学制度,分别设立中学、师范、职业三种学校。这是民国教育史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学制改革。

### (三) 各级各类教育的实施

关于国民义务教育,国民政府在1929年、1936年和1937年多次提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拟定扫盲计划,但均因“经费困难,未能实施”。1939年国民政府正式实施“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据此,教育部于1940年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要”,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即将小学和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具体办法为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分别由乡镇长和保长任校长。这是一种企图用基层政权直接控制教育,用教育来加强基层政权的措施。小学课程设置几经修订,至1942年教育部公布之标准规定为:团体训练(包括训育和卫生训练)、音乐、体育、国语、算术、常识(高小分为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图画、劳作。

中等教育方面,1932年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和《职业学校法》,确定三种学校分别设立。中学可为省立、市立、县立、联立和私立,其任务为:“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准备。”1940年规定普通中学课程,初中为:公民、体育、童子军、国文、算术、博物、生理及卫生、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选修。高中为:公民、体育、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国文、外国语、算学、生物、矿物、化学、

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1932年教育部规定了中学毕业生会考制度。职业学校分初高两级,以单科设立为原则,有特别情形者得设数科;其课程最初由各校自定,1934年6月教育部刊行《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各级师范学校均由政府办理,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课程有: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训(女生习军事看护)、劳作、美术、音乐、伦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及教法、小学行政、实习等。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同年8月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大学组织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院,3院以上合组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大学得设研究院。1931年通令大学采用学年学分制。1935年公布《学位授予法》,同时公布学位分级、考试细则,将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

#### **(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应变措施**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沪等大片国土沦陷,中国教育遭受了重大损失。据统计,战前有高等学校108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底被破坏91所,许多大学的图书、设备、仪器损失大半。40%以上的中学陷入沦陷区或战区。为了维持战时教育,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首先在1937年7月制定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布置战区学校内迁事宜。8月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部署维持战时教育的原则。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据此颁行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进一步阐明国民党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与此同时,将一些高校迁到内地。如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师一部迁陕西城固成立西北

联合大学；东北大学迁四川三台等，使师生不致流散，维持基本教学。1938年大学开始统一招生。1939年大学为扩大招生，设立先修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大学再次内迁，如上海交大、沪江大学迁往重庆，燕京大学迁到成都等。

从1937年起，国民政府为救济战区流亡中等学校师生，先后设立34所国立中学。此外，还办了国立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及14所国立师范学校。1938年2月公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以解决战区流亡学生的生活问题。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统治区教育有了一定发展。高等学校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了33所，师生数也有所增加，同时开办了一些新科系，配合战时需要进行科研和生产，许多师生参加后方铁路和公路建设，直接参军参战或投身抗日宣传。中等学校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5年9月20日至26日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决议案五类，即关于内迁教育机关之复员问题；关于收复区教育复员与整理问题；关于台湾区教育之整理问题；关于华侨教育之复员问题；关于其他教育之复员问题。据此，将国立专科以上内迁的学校大部分迁回原址，一部分留设原地，并恢复由于战事而停顿的学校。对日伪所设学校一律予以停闭或改组，在各收复区分设“临时大学补习班”，将日伪所办高等院校学生予以收容训练，并加甄审，合格者发给肄业证书。1945年12月教育部颁布《收复区各县市国民学校教员登记甄审训练办法》，对收复区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普遍进行登记、甄审与训练。

#### **(五)战后学生民主运动和国民党统治区教育的崩溃**

国民党政府为将教育纳入其一党专政的轨道，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人事、思想、教育与管理等实行严格控制。首先，在组织上用

高压手段控制教育行政机关和各公立学校的领导权,以贯彻其方针政策。其次,建立训育制度,厉行思想控制。在学校中开设公民和党义课,向学生灌输封建主义思想。规定每个学校都要将“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匾悬挂,“以资启迪”和“匡正人心”。1939年教育部颁布《训育纲要》规定,“修己”要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善群”要“亲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进行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再次,在初中、小学设童子军课,高中以上实行军训。蒋介石亲自担任童子军总会会长,戴季陶任副会长,各级国民党部为当地童子军之监督机关。

此外,1946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美国人或美国的公司等法人及团体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不受干涉”地从事所谓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之权利。1947年又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并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利用“美援”在华从事活动。

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是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及争取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25日昆明大中学生举办争民主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阻挠、破坏,并用机枪等武器进行威胁。昆明3万师生为了表示抗议,举行联合大罢课,国民党政府对此进行镇压,造成“一二一”血案。为此,全国学生罢课示威,声援抗议,揭开了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惨案。9月下旬,全国各地举行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年底爆发了以“沈崇事件”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1947年5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民主运动,于当月便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1948年又设“特种刑事法庭”迫害进步学生与民主人士。同年4月下旬,各地学生和教职员工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人民民主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镇压,造成“南京惨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在大陆上完全崩溃了。1949年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撤至台湾,结束了除台湾省以外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

总之,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事业是落后的,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5万人,1946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179.8万人,小学在校学生2285.8万人。按当时全国4.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全国80%以上的青壮年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在20%左右,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劳动人民子女极少。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更为落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中,封建的私塾占相当大的比重,城镇私立学校中有许多是接受外国津贴的,而且学校的分布也很不平衡。中等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县城以上的城镇,有的地区是县无中学,乡无小学。高等学校有41%是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六个城市,国立大学的40%、私立大学的46%是设在沿海地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1946年新疆只有一所100名学生的新疆学院和8所中学,宁夏只有5所中学,青海只有4所中学,西藏连一所中学、小学也没有。<sup>①</sup>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 三、日伪统治区奴化教育

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45年的“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施了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的殖民主义教育。东北沦陷区的教育，通称“伪满教育”，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教育，通称“汪伪教育”。

#### (一) 伪满殖民主义奴化教育

伪满教育的实施，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1937年)，主要是建立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便对各级学校，特别是大、中学校进行了疯狂破坏和血腥镇压，封闭了东北大学等许多学校，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抗日思想和中国历史等教科书，并逮捕和屠杀了大批爱国师生。1932年伪满政府按照所谓“王道立国”的精神，颁布教育方针：“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世界大同”。同时宣布各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凡有关党义教科书一律废止，并提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把伪满的“建国宣言”、“诏书”、“敕语”和“仁德天皇”、“靖国神社”等内容塞进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意识。此外，还制订《统制学生思想方案》，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课外活动进行严厉地管束与监督。

按照这个方针，伪满殖民主义学校体系逐步建立。1933年开始整顿初等教育，至同年年末，恢复了中小学900所。小学仍按四二制，中学则一律改为农、工、商、家政等科的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取代原来高等学校的是各种“养成所”、“训练所”，它们是培养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军政警宪的场所。1934年后，恢复和举办少

数高等学校，如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农业学校、日语专修学校以及建国大学等。这些学校旨在培养殖民地的统治者。其特点是日语化、职业化、“日满共学化”。1937年伪满公布《新学制》，标志奴化教育制度的确立。

第二阶段(1937—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伪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奴化教育的实施，强化教育为侵略战争政策服务。1937年5月2日，伪满公布《学制要纲》，明确规定了教育方针和学校体系。其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sup>①</sup>这个方针要求学生必须崇拜天皇和伪满皇帝，赞颂“日满亲善”、“万邦协和”，为“大东亚圣战”效劳。“要纲”规定学校体系为三段，全部学程13年，其中初等教育仍为四二制，但加添了1—3年的国民学舍和国民义塾。中等教育降为四年制，分设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前者分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后者分家事、裁缝等科。普通中学变为实业学校。高等教育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其程度仅相当于原中学水平。这个学制反映了殖民地学制短、程度低的特点。课程设置和内容也作了相应的变动。规定在小学设“国民科”，即把原来的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等课加以统合为一，变为主要宣传“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满洲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之盟邦等歪曲历史、抹煞民族意识的国民道德课。以日语讲授占总学时的一半。中学和大学亦设国民道德课，宣扬“日满不可分”的“皇道”，要青年立志做侵略者的“中坚国

<sup>①</sup> 《满洲教育》第3卷第6号，1937年6月。

民”，把日语定为“国语”，国语改为“满语”，日语讲授课时在各科中最多。实业课则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实际操作和训练，以培养普通技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教育亦实施所谓战时体制。首先设立“文教审议会”，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为会长，其任务是在战时条件下“刷新”文教的根本政策。其次是确立战时教育方针，其基本内容为：“建国精神”的彻底发扬；实务教育及勤劳训练的彻底实施；身体锻炼和国防训练的强化。据此，在大、中学校普遍实行“日满共学制”，各级学校减少授课日数，增设“终日实习”、“终日训练”、“勤劳奉仕”等课；将“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宣扬“唯神之道”、“八纮一字”，迫令学校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师生拥护“大东亚圣战”。1944年日伪对大学宣布“决战体制”，实行强化军事教育，宣布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制，缩短毕业年限。最后则强令教育界开展“捐纳兵器”等活动，把侵略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学校师生身上。

## （二）汪伪教育（1940—1945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将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广大地区。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面实施与伪满大致相同的奴化教育。首先，在学制上沿用原制，企图恢复学校网络，以建立伪教育体系。除拼凑一些大学外，尤其重视开办专门培养汉奸官吏的高等学校。其次，汪伪也用反动的“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日汪提携”、“反共救国”、“东亚联盟”等。汪伪曾盗用并歪曲孙中山的思想言论为其卖国理论作掩饰。日本侵略者更是肆意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为其所谓“新民族观”、“新国家观”作掩饰，要以“黄种人的共同意识”制造“超国家集团”，妄想瓦解、消灭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民族观念和祖国观念。再次，汪伪还在各地开办教师训练班、讲习所，企图通过对教职员的短期训练，造成一批实施



奴化教育的工具。

---

## 第四节 教育改革、教育运动

---

### 一、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立即着手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

#### (一) 发布教育改革令

在全面改革教育制度以前,教育部首先发布了几个重要的教育改革令,主要有1月19日发布的《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同日发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3月发布《民国教育部官职令》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是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改革教育的命令,共14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进步要求。如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起,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是一个从课程内容上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它具体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及师范学校的教学科目、各学年各科每周授课时数等。虽然以后上述各类学校的课程也有变化,但与此文件所定标准出入不大。《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规定教育部设普通、专门、实业、社会、礼教、蒙藏六个教育司。

#### (二) 颁布新的教育宗旨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sup>①</sup>,否定清王朝颁布的封建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两个核心条目,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提出中华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为教育方针<sup>②</sup>。同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召开了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改革措施,如教育宗旨、学校系统、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根据会议的讨论,特别是蔡元培对教育宗旨的意见,教育部于1912年9月2日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sup>③</sup> 蔡元培强调:“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sup>④</sup> 这个新教育宗旨的公布,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德、智、体、美“四育平均发展”的方针。

### (三) 制定学校系统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将整个教育期限定为17—18年,共分三段四级,小学一段二级,中学、大学各一段一级。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3年。中学4年,毕业后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3年或4年毕业,预科3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毕业,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3年毕业。专门学校本科3年或4年毕业,预科1年。这个学校系统称为“壬子学制”。

① 此文先后刊载于《民立报》1912年2月8、9、10日;《教育杂志》第3卷第11号,1912年2月10日;《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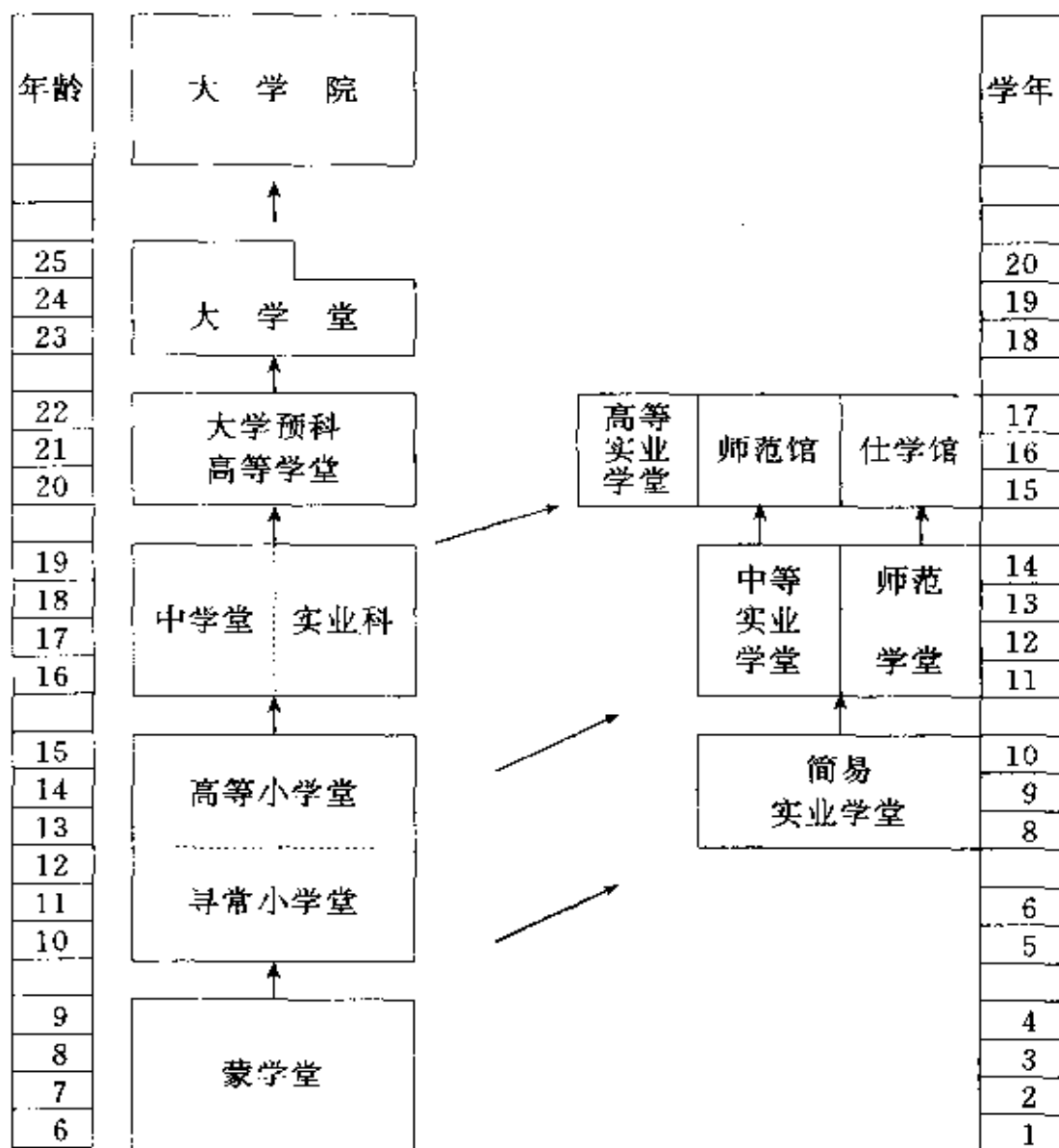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137页。

③ 《教育宗旨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1912年10月10日。

④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3页。

自该新学制公布至 1913 年 8 月,教育部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对这个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又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见壬子癸丑学制图)。①

壬子癸丑学制图



教育部于 1912 年 9 月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将师范学校分为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私立师范学校等。同年 10 月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2 页。

公布的《大学令》、《专门学校令》，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专门学校分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朝末年的“癸卯学制”相比较，有很大的改革：它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比清末学制缩短了3或4年；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鉴于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设大学预科；大学撤并经科入文科，取消经学的独尊地位……。这个学制在中国推行了10年，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才废止。

#### （四）改革课程

民国教育部成立后，首先规定废除清朝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要合乎共和国宗旨。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规定中、小、师范学校教科用的图书，可自行编辑，惟需经教育部审定；教科书须合于部定学科程度及教育宗旨。同年11月，教育部公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12月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3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按照这些文件，对学校课程进行了改革。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其课程，初等小学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课缝纫。高等小学教学科目有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课农业，女子加课缝纫。视地方情况，农业可以从缺，或改为商业，并可加英语或别种外语。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具体规定了各科各学年每周的授课时数及各科各学年教学要求。《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中学的教学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学、经济、图画、手

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校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但遇地方特别情形,得任择法、德、俄语一种。在《中学校课程标准》中,具体规定了各科各学年每周授课的时数和各科各学年教学内容。

在课程改革的同时,还注意了教学原则和方法的改革,对于小学还专门制定了“教则”。比较突出的有:(1)强调教学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要求凡所教授,必须适合儿童身心发达程度。在教学方法上改变过去只有课读与背读的状况,注意推广较先进的教学方法,认为教员在不得已时可以加做于儿童,但不得用体罚。(2)注意使教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以适应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要求所授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并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

### (一)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教育的冲击

民国初年,中国教育界曾一度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由于袁世凯很快窃取了政权,扼杀辛亥革命带来的各项民主改革成果,同时也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封建复古逆流。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坚持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盲从、独断和迷信。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推动教育界进一步进行了各项改革。

1. 恢复和发展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措施。袁世凯在复辟帝制活动中,公然取消民国元年制定的教育方针,并在其“宪法草案”中规

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责令学校祀孔读经。据不完全统计，在1915年，仅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读经教材等即达20种之多。这种倒行逆施，遭到新文化运动斗士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猛烈抨击。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教育界进步人士着手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7月，新教育部表示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发表的教育方针。9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撤销袁世凯政府颁行的《教育纲要》和《预备学校令》。10月教育部颁行了《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有关学校读经的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一批封建顽固派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重申国民信仰自由原则。这样，各级学校开始加强民主与科学教育，使教育在指导思想上有所进步。

2. 男女平等教育权在形式上的确立。女子教育在辛亥革命后，仍处于不平等地位。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男女教育不平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要求实现男女教育平等权。1917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扩大女子的教育权。在“五四”运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要求男女教育平等、“大学开女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招收9名女生，以后南京高等师范等校陆续招收女生。到1921年以后，全国各大学均招收女生，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可以男女同校，甚至同班。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正式取消了男女学校之间的差别。

3. 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在文学革命推动下，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三届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推行注音字母，以为将来小学国文改国语做准备。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与此同时，有一些学校率先编写使用新的国语教材。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小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并在同年又明令至1922年一律废止小学各年级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修身、唱歌等教科书。从此学校以国语为标准语音进行教学，中学教科

书及大学讲义也逐渐全部使用白话文。这是教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 （二）推进大学教育改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进行大学改制。首先,确定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把北京大学办成学术中心。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派别,以求学术的发展。其次,进行学制和体制的改革。他在北京大学实行文理两科并设,预科改属本科,调整专业,废学门制为学系制,废年级制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立由教授中选举产生的评议会为学校立法机构,选举产生各系主任,实行民主管理。再次,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蔡元培既反对学生有游荡的旧习,又反对死读书,认为研究学理要有活泼的精神。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了许多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如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进德会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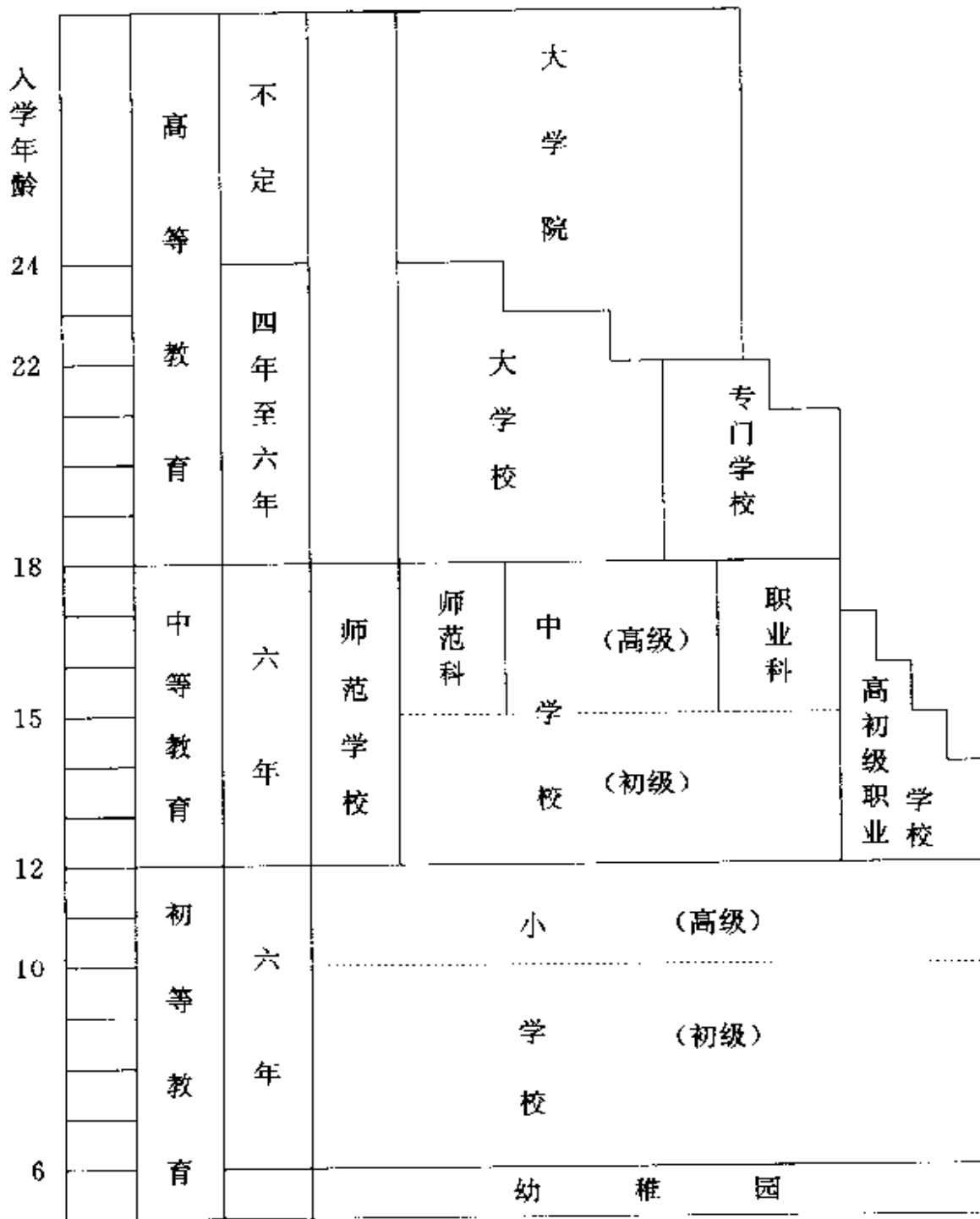
## （三）“壬戌学制”与普通教育的课程改革

“壬戌学制”也称新学制,它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后产生的。1920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苏州召开,会上提出了改革学制系统案。1921年联合会通过《学制系统草案》,并向各省区教育会和各高等教育机关征询意见。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作了修订,再交教育联合会代表大会讨论。最后,于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一般称这个学制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

“壬戌学制”列有七条标准:(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改革案》制定的“学制系统表”如下图:

壬戌学制系统图①



(本图左行之年龄表示各级学生入学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与成绩或其他关系分别定之)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5 页。



《改革案》对各级学校制度分别作了说明：(1)初等教育方面，主要规定小学年限为6年。分初高两级，前4年为初级。义务教育年限暂以4年为准。幼稚园接受6岁以下儿童入学。(2)中等教育方面，主要规定中学年限为6年，分初高两级，各为3年。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得单设。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况，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3)高等教育方面，主要规定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医科和法科至少5年；师范4年；大学为选科制。

《改革案》还订定了附则，强调注重天才教育，得变通年期及教程，使优异的智能得到充分发展；对于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的，则施以相当的特种教育。

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1922年10月，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定进行程序；12月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编订了中小学各科课程要旨，分请专家草拟各科课程纲要。1923年4月和6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四两次会议，复订了小学、初中各科纲要和高中课程总纲，刊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该纲要规定：(1)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初小阶段的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学科。(2)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科制。初中科目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语、算学、自然、图画、手工、音乐、生理卫生、体育。高中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分科第一组(文科)科目为：特设国文、心理学初步、伦理学初步、自然科学或数学一种、社会学之一种。第二组(理科)科目为：三角、高中几何、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大意以及物理、化学、生物选习两科，另设有选修课。(3)对师范教育除高级师范外的课程标准

也作了规定；对职业教育，因各地各业情况各异，未作统一规定。（4）对大学、专门学校的课程，并未提出具体方案，仍依 1912 年颁行的标准，参以各校意见，送教育部核定。

“壬戌学制”继承和发展了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成果，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改革的要求和经验，具有许多优点，如缩短了小学年限，延长了中学年限；若干措施注意根据地方实际需要，不作硬性规定；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等，因而基本上稳定了全国的教学秩序，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后除在学分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有所变动外，基本上一直沿用到 1949 年。

#### （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教育活动

在“五四”时期教育改革运动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教育问题。1920 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靠教育的方法改革社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们支持或参与具有进步性的教育改革活动，但只是作为民主改革的一部分，并不是以此作为全面改造社会的手段。

开展工农教育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为此，他们中有许多人自觉到工农群众中去，同时还创办工人补习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该校由邓中夏主持，教员有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1921 年 1 月开学。学校白天教工人的子弟，晚上教工人，课程有常识、国文、工厂和铁路知识、数学等。通过教学向工人讲解“劳工神圣”的道理，传播革命思想。同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补习学校中有些学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工人党员。此外，上海、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都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以后，粤汉铁路的徐家棚、安源路矿等地，又都陆续开办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同年9月还开办了补习学校,以满足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学习要求。由于湖南自修大学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于1923年11月被反动军阀赵恒惕强行关闭。随后,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易礼容、罗宗翰等又在长沙开办了湘江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转入了湘江学校。19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还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杨贤江、萧楚女、邓中夏等曾在这里任教。

###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 and 真理,纷纷赴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前已经历了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发展阶段;“五四”运动后则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赴法求学运动。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他们认为法国是“民智民气先进之国”,“欲养成新国民”,以留学法国最宜<sup>①</sup>。学会宗旨是“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极力赞助此事。同年4月,俭学会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在四川亦办预备学校)。该校实行男女同校,学费低廉,使较贫苦青年也可入学。至1913年先后组织两批共80多人赴法俭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李书华、李宗侗和郑毓秀等人。1913年秋,留法俭学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预备

<sup>①</sup> 张允候、殷叙彝、李峻晨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学校亦随之停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欧,其中约15万人在法国境内。如何对华工进行教育,引起中法人士的关注。1915年6月,李石曾协助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宗旨是提倡“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智识”。该会出版《勤工俭学传》,发行《华工杂志》,大力宣传“以工兼学”。1916年3月,勤工俭学会与华法教育会共同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蔡元培等人还亲自讲授课程。

在华工教育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中法有关人士为加强两国文化交流,推动勤工俭学的发展,经协商于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会议推举主要发起人欧乐、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汪精卫为副会长,裴纳、法露、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吴玉章为会计。就中国发起人来说,成立此会的目的是:(1)“扩张国民教育”;(2)“输入世界文明”;(3)“阐扬儒先哲理”;(4)“发达国民经济”<sup>①</sup>。同年6月22日,华法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确定该会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规定教育方面的六项工作:(1)联络中法学者诸团体;(2)创设学问机关于中国;(3)介绍多数中国留学生来法;(4)助法人游学于中国;(5)组织留法之工人教育;(6)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sup>②</sup>。华法教育会的成立是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事业的继续和扩大,并在实际上一度成为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

1917年北京华法教育会成立,成为华法教育会中国会所。与此同时,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重新建立,并在长辛店、河北蠡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四川成都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后来,华法

①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卷,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06页。

教育会又在上海、重庆、长沙、广州、济南、天津、武汉等地开办各种形式的预备学校或预备班,把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推向全国,为赴法求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形成了空前规模的高潮。当时,有大批青年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同时受到工读思想的影响而投身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据载:从1919年到1920年间,共有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河北(147人)为最多。基本上是16—30岁的青年学生,但也有年长者。他们当中著名的有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李愚如;湖南的蔡和森、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蔡畅、徐特立、张昆弟、罗学瓚、何长工、萧三;四川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傅钟、刘伯坚、孙炳文;贵州的王若飞、黄齐生;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李慰农;江西的熊雄;还有萧朴生、李卓然等人。

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一般先是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这些学生根据自己的经济、技能和身体情况,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学。据1920年8至9月份调查:当时有440人(加上以前的约600多人)进入70多家工厂勤工,还有的当散工、干杂活;约670多人(加上以前的达800多人)进入巴黎及各地30多所学校俭学,在校人数比较集中的有蒙达尼公学、枫登白露公学、木兰公学等校。留法勤工俭学生大多是经济贫困的有志青年。入厂勤工的学生,大部分干着劳动强度较大的杂工和普通工,许多人集中在钢铁、化学、造船、汽车、矿冶、兵工等重工业工厂从事重体力劳动,如铸工、翻砂工、搬运工、钳工、煤矿工等。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许多人住在简陋的木板工棚里,下班后要自己烧饭以维持生计。至于候工的勤工俭学生则只能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们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生

活的实际。有些青年则着重锻炼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例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就是这样。蔡和森于1920年6月撰写了《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sup>①</sup>一文。同年8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1922年3月,周恩来在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信中,谈到他留法勤工俭学一年来的思想变化:“我方到欧洲后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sup>③</sup>。可见,这些人从那时起就已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了。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经历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由于中法当局对一些勤工俭学生日益走向革命道路的强烈不满,使来法学生勤工俭学活动日趋困难,最后竟处于勤工无处、俭学无门的境地。当时入工厂者不到十分之四、五。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进行了三次重大斗争。

第一次是“二二八”运动。1921年初,许多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已非常困苦,有的无房可住,有的病倒,甚至无医而亡。面对这样严重困难,中国驻法使馆置之不理,而华法教育会竟在1月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大多数学生陷入绝境。2月27日,蔡和森、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目标,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2月2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率领聚集巴黎的400多名同学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相持大半天,公使陈策勾结法国军警将请愿群众

①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33—48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纪念周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强行驱散。当局的暴行引起旅法各界华侨的愤怒，国内各界也纷纷通电抗议。陈策迫于压力，不得不请法国当局释放被关押的学生，并将国内汇来的部分捐款发给贫困学生作维持费。法国当局也组织了“少年监护委员会”，负责联系安排学生的劳动和生活救济。

第二次是勤工俭学生联合旅法华人团体掀起的“拒款运动”。1921年6月初，北京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扩大内战，派专使朱启铃等到巴黎，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后增至5亿）法郎购买军火。消息传出，引起旅法华人的愤怒。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组织“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并于6月30日、8月13日召开了拒款大会，终于迫使北京政府秘密借款流产。这是以旅法勤工俭学生为主力联合旅法华人共同开展的爱国斗争。

第三次是勤工俭学生联合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拒款运动”后，中法反动当局寻机对勤工俭学生进行报复。先是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留学生的维持费，接着又传来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要从国内另招学生的消息，这便使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为争求学权利而斗争。9月17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发动“争回里大”的运动。9月21日，各地学生代表125人到达里昂占据中法大学，但却遭到中法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策串通法国政府，派警察把学生拘禁起来。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回国，强行押往马赛。14日，由马赛上船，遣送回国。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转入了低潮。

严酷的现实，促使一批留法青年先进分子觉醒，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成了他们的迫切愿望。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团组织性质）。同年秋冬之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从1923年开始，先后有赵世炎、

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高风、刘伯坚、李富春、聂荣臻、蔡畅、郭隆真、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百多人转往莫斯科学习。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到1925年,留法勤工俭学生除在外国定居者外,大部分相继回国。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历时数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初期的主要宗旨在“输入西方文明”,其内容是学习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仍是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教育救国运动。“五四”运动后,在各种新思想和工读思潮影响下,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工读主义思想一时影响很大,但想通过勤工俭学运动来改造社会是行不通的。随着大批勤工俭学生在斗争实践中的新觉醒,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勤工俭学运动的性质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爱国文化运动。

#### 四、乡村教育运动

乡村教育运动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一种教育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当时,中国一些社会组织、教育团体将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提倡“到乡村去”、“到民间去”、“复兴农村”、“建设农村”,致力于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改造。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从1925年至1935年各种乡村教育实验区已多达193处。它们的政治倾向各异,活动内容、方式和持续时间也不相同,所办的乡村事业也各有特点。主要派别有:



### （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试验活动

该会于1923年8月26日在北京成立,选举董事40人,执行董事9人。董事长朱其慧,书记陶行知,总干事晏阳初。初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主要在城市从事平民识字运动。1924年编辑出版《平民千字课》,被全国广泛采用。后来由分析文盲数量而注意农民,认为“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住在乡间;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也都是乡下人……因为中国农民缺乏教育,所以农业也有衰败的气象,而农民自身,更是穷苦不堪”<sup>①</sup>。于是将平教事业转向农村。1926年该会选河北省定县为华北试验区,特从翟城村入手,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社会调查等工作。1929年总会迁定县,集中全力在定县进行实验。晏阳初等认为,中国农村的主要病症是穷、愚、私、弱,为了救治农村的“四大病”,必须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来进行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四大教育”(四大教育的基础是文字教育,重心是公民教育),并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sup>②</sup>。按照这种教育思想,平教会从1930年到1937年在定县试验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调查定县历史及社会状况,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2册;举办各种类型的平民学校,编写千字课及各种教材;建立实验农场,成立合作社,指导农民生产;设立卫生院、保健所,建立医疗卫生宣传网。1932年以后还进行了县政建设实验。1935—1937年,晏阳初率主要成员到长沙、成都,指导湖南、四川、贵州建立实验县。

###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试验

1925年8月,黄炎培在山西应邀草拟“山西职业教育计划”时,就提出“划区创办乡村职业教育”的主张,指出开展这种教

<sup>①</sup>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印:《平民教育实施的试验》,1927年,第19页。

<sup>②</sup> 平教会秘书处编印:《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1931年,第1—5页。

育的意义在于：“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sup>①</sup> 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第一个农村改进区，推进农村改进事业。该社领导人江问渔指出：“农村改进原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它是适应着中国农村特殊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农村人民愚得太厉害，穷得太厉害，既愚且穷……穷则变，变则通，所以想出这一个特殊的农村改进方法来。”<sup>②</sup> 关于农村改进事业的内容和范围，“括其大要，实不外‘教’‘富’‘政’三端”，此三端“须连锁合一，同时并进，既不容有所偏重偏废，亦不容各自分立”<sup>③</sup>。最后，通过农村改进活动逐步实现农村自治。193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总结徐公桥改进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农村改进事业实施办法》，其内容有11条，细目50款，具体规范了农村改进事业的范围和标准。自1928年至1935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举办的农村改进试验区和各种改进机关达27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徐公桥农村改进区、黄墟农村改进区、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区、沪郊农村改进区以及全国农村改进机关联合会、乡村改进讲习所、徐公桥信用合作社等。其主要活动有：开办夜校、农民教育馆，改进小学教育；建立农艺试验场，推广科学技术；倡建公共医诊所，改进风俗习惯等。1934年6月，徐公桥试验区期满6年，同年7月1日举行交接典礼，完全移给地方自办。

### （三）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乡村教育活动

1926年，以陶行知任主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提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应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实行“教学做合一”的“活

<sup>①</sup> 《试验农村改进计划》，《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1926年11月。

<sup>②③</sup> 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4页。

教育”，“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sup>①</sup>。他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教育农民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据此，1927年2月在南京郊区农村开办晓庄中心小学，3月又办了晓庄师范，后合称晓庄学校，提出“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sup>②</sup>的口号，成为开展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该校于1930年4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2年，陶行知发表《古庙敲钟录》，提出建立工学团的教育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并于同年10月在上海筹办了“山海工学团”。该团在教学中采用“小先生制”，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海工学团停止活动。

#### （四）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活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sup>③</sup>。1928年，梁漱溟应李济深邀请，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听者千余人。自谓：“所谓‘乡治’，简言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设一个新的中国。”<sup>④</sup> 1929年秋，梁漱溟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并接编北京出版的《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先后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这种学校是把中国宋朝、清朝曾推行的“乡约”制度加以修改补充，以学校为外貌，由“乡村领袖”（地主绅士）、“学众”（农民）和“有志于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教员）组成。这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是政治、经济、教育、自卫的综合体。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县为实验区，直到抗日战争

①② 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9页。

④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爆发。此间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三千多人。<sup>①</sup>

### （五）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乡村实验活动

三十年代期间，无锡设立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实行改良蚕桑、养鱼植树开荒，增加农业生产等。

此外，还有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的乡村教育活动；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工学实验；浙江湘湖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农工试验班；大夏大学民众教育实验区金家巷农村念二社民生本位的教育实验；燕京大学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试验区以及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与“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合组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都曾进行过研究实验及训练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移至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四年级生和研究生；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在重庆附近的歇马场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为乡村建设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将乡村教育系改为乡村建设系，聘请来自定县、邹平、无锡等地教师任教。该系还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刊物及《乡农报》等。

## 五、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1927年，我国人民开展了收回外国人依据不平等条约创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在中国创设的各级各类学校，通称为教会学校。它作为外国对中

<sup>①</sup>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组成部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给各国教会在华传教办学以合法的权利。截至1926年,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达7382所,学生总数为214254人,其中普通中、小学为6890所、学生199694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各类学校有6255所,学生144344人。教会学校约占全国学校总数的7.65%,教会学校学生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14%。高等教育更为突出,1926年全国各教会大学的学生总数达8404人,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9.45%。教会学校不仅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体系,还自行建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拟订教育法规,管理和监督各校行政和教育设施。

这种文化侵略行径激起了教育界爱国人士和广大学生的强烈愤慨。1917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演讲,这是中国现代倡言非宗教教育的开端。1922年3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于中国召开第11次大会,由此激起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同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反动本质。接着,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领导下,北京、广州、湖南、湖北等地都建立了“非基督教同盟”组织,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汉民、吴虞等人都参加了同盟。非基督教运动开始时,较多侧重于教育与宗教脱离,随着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和运动的深入,势必触及教育主权问题。因此,收回教育权运动,实际上是“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与深入。

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会议通过了反对教会教育的纲领,规定“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sup>①</sup>。这里明确提出了反对教会教育,故被认为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始。这场运

<sup>①</sup> 《中国青年》第29期,1924年5月3日。

动的实际发端是广州基督教圣三一学校学生要求自治的斗争。1924年5月初,英国圣公会所办圣三一学校学生为实现自治而组织学生会,遭到英籍校长无理阻挠,学生以罢课相抗,并在宣言中历数教会学校危害,主张“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取教育权”。当校长开除罢课学生并污辱中国时,学生提出严正要求:“一、收回被开除同学。二、校长污辱中国,须向学生谢罪。三,不得干涉学生集会结社。”<sup>①</sup>继之,广州各教会学校的爱国师生以罢课、游行,甚至退学进行抗议。7月,广州学生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四项主张:(一)所有外人在华所办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核准;(二)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之支配及取缔;(三)凡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在课程上正式教授宗教,也不许强迫学生赴教堂祈祷读经;(四)不许压迫学生,不许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sup>②</sup>

广东教会学校风潮影响了全国,各地教会学校风潮接连发生。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通过了关于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请求政府制订实施条例。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开封举行第10届会议,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这些决议案的发表,使收回教育权逐步成为全国性的舆论。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各地运动在反帝风暴中日趋高涨,而以上海、广州、福建、武汉、长沙等地最为激烈。许多教会学校的师生出于爱国义愤,大批退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全体学生及中国籍教师,抗议外国校长侮辱中国国旗,愤然离校并另组光华大学;其他如长沙的雅礼大学、务本大学,福州的华英书院、协和学校、三一学校,广州的圣心学校、中法学校,河南开封的圣安得学校、济汴学校、华美女校,北京的笃志、慕贞学校等

① 《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1925年2月。

② 《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

等,广大爱国师生也都愤然退校。湖北省还组织“教会学校退学联合会”,以安排学生退学事宜。此后,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发展,收回教育权运动也由学校风潮发展成群众性的社会运动,这在全国性的“反基督教运动周”(1926年12月22日至28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群众运动推动下,北洋军阀政府于1925年12月公布《外人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大学院于1926年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规定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教学须按统一课程标准进行等。此后,外国教会也被迫作了一些让步,陆续申请办学立案手续。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实际效果尚属有限。但这场运动是一场捍卫民族权利的斗争,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否定了外国在华的教育特权,开创了收回教育权的先例,为中国政府对外国在华教会学校实行注册立案等限制政策,以至为日后彻底收回教育权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 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上)

---

## 第一节 哲 学

---

### 一、概 述

从 1912 年至 1949 年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发生发展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崭新阶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形态向近代哲学的新形态转化。十九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产生时起,便紧紧扣住“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主题。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西方进化论思想为理论武器,论证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他们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理论,批判封建传统哲学,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社会进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发生过重要的启蒙



作用。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进步的人们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发端。第一,新文化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而且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而彻底的思想革命。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现代的特征。第二,从十九世纪末起,西方哲学开始输入中国,但成为潮流,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开始的。中国现代诸多哲学思想思潮形成都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第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迅速广泛传播,并在和中国社会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革命。

自1912年民国建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可谓中国哲学百家争鸣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勃勃生机而传播于中国,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行于学界,中国传统哲学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扬。社会生活的空前震荡,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中西文化的相互撞击,新旧学术的砥砺契合,汇之于寻求改造中国、创造中国新哲学之路的焦点上,由此构成思路各异、学派纷呈、论战迭起的现代中国哲学。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大体可分五个小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动前。以孙中山、蔡元培、胡汉民、朱执信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竭力维护共和制度,在哲学上努力探索共和制的思想基础,开始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主张在共和制名义下实行“开明专制”,提倡传统道德和“调和”东西方哲学。康有为等人则否定共和制度,主张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一些人则选择了无政府主义。

第二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派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以进化论为武器向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发端时期。

第三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力宣传唯物史观,并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与此同时,实验主义、柏格森主义、新实在论、尼采哲学、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大规模地输入中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展开了论争,主要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和“社会主义”的论战。此外,还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这一时期,具有中国特点的哲学体系还未形成。

第四时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革命失败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唯物辩证法成了席卷全国思想界的主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三者融于一炉,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时期,熊十力创立了独特的新唯识论,冯友兰、金岳霖和贺麟等人的哲学思想也在形成之中。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官方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发生的哲学论战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唯物辩证法”的论战等。该时期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时期。

第五时期: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政治、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展开,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得到进一步阐发。冯友兰、金岳霖、贺

麟的哲学思想正式形成并得到展开。陈立夫的唯一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宣扬。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哲学展开与成熟时期。

## 二、主要哲学思潮

### (一) 孙中山哲学思想

1918—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完成了《建国方略》,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著作。这部著作连同孙中山后来的《军人精神教育》和《民权主义》等著作和讲演,集中反映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孙中山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为依据,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物质派生精神,行先知后,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石,科学进化论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他基本上坚持了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路线。然而,他的社会历史观,即民生史观,则是二元论和唯心主义的。

孙中山认为,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世界的进化发展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所谓“物质进化”时期,就是客观世界由物质性的“以太”(后来又说成是“星云”物质)经过不断的运动和变化发展成为地球及其所属的太阳系等各种天体。所谓“物种进化”时期,即生物进化阶段,是在地球产生后,无机物质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产生了有机物——“生元”(细胞),由“生元”演变并构成植物和动物,最后由猩猩演化成人。所谓“人类进化”时期,就是人类历史,

由洪荒时代经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民权时代。

知行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并进而广泛论述知行问题。他提倡“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认为“先有事实,后有言论”是宇宙间的道理。指出人的认识来源于“行”,人的知识是“事实”的反映。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孙中山把“行”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论证“行”是“人类之进化”的必要门径。他认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能实行便能知”,不去实行,就不会进步,就不会获得真知和新知。求知的途径“要靠实地去考察”。孙中山在强调以“知”促“行”的同时,还提出“实行”是试验学理“真”与“假”的证明。他指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宇宙事物的进化没有止境,因而人的知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

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是进化论的民生史观。它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合理的、进步的内容,但基本上是历史唯心主义,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民权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并由此论证人类必将发展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地上天堂。他提出时势造英雄,“万众心理”造时势的见解,这是对英雄史观的否定,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他没有认识到“万众心理”的客观动力。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提出群众生活及群众斗争问题,力图从民众经济生活寻找历史进化的动力,有积极意义。但他对“民生”的理解是抽象的,以致把动力归结到抽象的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抹煞了欲望背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与他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的,为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科学进化论贯穿在孙中山全部哲学之中,是他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孙中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

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关于孙中山哲学的性质,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是唯心论或二元论;有的则认为是唯物论。在唯物论的观点中,又有“唯物的进化论”和“进化的唯物论”两种评价。

##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展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据统计,从1918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各种刊物上登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文章有300余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译本和节译本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一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并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学习与宣传。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等院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独秀从1920年至1922年,先后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论述了唯物史观等问题。李达从十月革命以后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不仅从日文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并且写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现代社会学》等文章和专著,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发动和联合是决定

革命成败关键的观点。“五四”运动后,他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瞿秋白在1920年底到俄国考察,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便力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制定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政策。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的问题,指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这两篇政治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实际应用和具体阐发,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且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流,中国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传播,由以往主要介绍唯物史观转到着重宣传辩证唯物论,在全国开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宣传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经典著作大都有了中文全译本,外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被大量翻译介绍,这为中国人民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在三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翻译介绍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著述工作,开始全面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的发展。艾思奇于1934—1935年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具体的比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本书后来改名

为《大众哲学》出版,到1949年前再版了32次,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沈志远于1936年6月出版《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称哲学理论是“活的大众生活的精确真实的指导”。此书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同年7月再版,到1951年先后再版15次。1932—1937年间,李达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写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发表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系统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有广泛的影响。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提出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张如心、陈唯实、冯定等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十年代的传播,遭到了各种敌对思想的激烈反对。张东荪和叶青是攻击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角色,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有时甚至到了互相对骂的地步,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却是目标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派方面则以艾思奇、邓拓、沈志远等为代表进行反击。这样,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哲学论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从哲学高度对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概括,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著文《反对本本主义》,首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主张,批判了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1936年他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1937年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三者融为一体,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军事科学作出了独特贡献。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在1941—1943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思想作风,指出理论和实践的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一贯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和论述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此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研究和运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新的成就。如艾思奇和吴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观》、侯外庐和罗克汀的《新哲学教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林彬(本名赵纪彬)



的《中国哲学史纲要》、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终于成为中国哲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三）现代新儒家哲学

现代新儒学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走上理论系统化阶段，先后形成新孔学、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四种理论。

1.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主要源于中国儒家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唯识学，是三者的混合物。他的哲学是为其文化理论作论证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文化哲学的特点。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称“是评判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sup>①</sup>。其主要观点：一是意欲决定一切的宇宙观。认为“意欲”决定生活、决定宇宙，宇宙不过是“意欲”的产物或表现。二是唯识学的知识论。他说，一切知识皆成于“现量”、“比量”、“非量”此三种作用之上，“一切知识都是由这三种作用构成”。认为所谓“现量”就是感觉，“比量”就是所谓“理智”，感觉的内容是主观所造，概念有影无质，是“我心所自生私有的”。他还认为，知识单靠现量和比量是不成的，“故从现量的感觉到比量的抽象概念，中间还须有‘直觉’之一阶段”。直觉就是非量，它“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直觉一半出于客观，一半出于主观。梁漱溟受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认为感觉和理智不能认识宇宙流动的本体，只有生活的直觉才行。他认为人们认识世界有三个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

<sup>①</sup>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西洋及其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sup>①</sup> 据此他断言:“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方法。三是意欲决定的“三路向”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不同的文化是不同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是无尽的意欲,意欲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样法的不同。他将人类的意欲分为三种,从而形成三种生活样法,三种不同路向的文化,即西洋的、中国的和印度的。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家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就是复兴孔家文化。

2.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奠基者,他糅合儒佛,建立了新唯识论体系。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1932年)、《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十力语要》(1947年)等。其哲学思想是:一,提出“心性本体”说。认为一切物的本体非离心外在的实体,“境不离识”,“物不离心”。本体就在吾心中,人们只须反求诸己就可得本体。二,新唯识论的翕辟说。认为本体是能变的,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本体称为“恒转”。本体自身就具有翕和辟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一翕一辟、一辟一翕,才使得本体生生大化,显现为万殊。翕辟同是本体所具有的两种不同势用。“翕辟相反相成”,“是浑一而不可分的整体”,必有翕辟两方面才构成变化。在翕辟这一对矛盾中,辟起主导作用,主宰翕,运用翕。熊十力将辟名为心,翕名为物。这样,翕辟关系,也就成了心物关系。心物之间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的。三,以“体用不二立宗”,“即用显体”,反对将体用分裂为二。他说:“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本体与现象,此在《新论》即名之为体用。”<sup>②</sup> 决不可将体用析成二片,用是体之用,用即是体;体就是用的

<sup>①</sup>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本,第177页。

<sup>②</sup>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5页。

体,无体即无用。既“非有异体而独存之用”,又“非有异用独存之体”。体用是有差别的,体是绝对的,无形象的,用是万殊的,有形象的。但体用决不是二物。此外,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引申出“内圣外王”的人生论,认为“内圣”是道德价值的源头,“外王”则使价值源头得以贯彻。

3. 冯友兰的新理学。冯友兰于1932年发表《新对话》,初步提出自己的哲学基本观点。1939年出版了《新理学》,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新理学。以后陆续出版了《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著作,建立了新理学庞大的哲学体系。冯友兰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科学不同,科学以实际为对象,哲学则以真际为对象。不着实际的哲学才是“最哲学的哲学”。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四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这些概念是对真际的逻辑概念,是超时空的、永恒不变的。“理”是事物,所以为事物的依照,总所有的“理”就构成“理”世界,它在逻辑上先于实际世界。“气”是事物存在的依据,它不是物质性的,完全是逻辑观念。“道体”是理和气统一的“程序”,“大全”就是“一切底有的别名”,也就是宇宙,但不是物质性的宇宙,而是哲学上的“太一”。冯友兰就是这样建立起一个纯逻辑的哲学体系。他把形上学运用于社会,运用于人生,在形上学的基础上构筑起历史观和人生哲学,以明“内圣外王之道”,达济世安邦之目的。其中,“境界说”是新理学中有价值的思想之一。他认为“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sup>①</sup>。由此,他将人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总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把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自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逻辑论证上达到了较高水平。

4. 贺麟的新心学。贺麟在抗日战争前主要的成果是对黑格尔

<sup>①</sup>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

哲学的介绍。四十年代以后,他在鼓吹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同时,力图将黑格尔哲学及新黑格尔主义和宋明理学、心学糅合起来,建立了新心学哲学体系。在贺麟哲学中最根本的是陆王新学。他把理、心看成是宇宙的本质、主宰,把宇宙的一切看成是理的外化、显现。认为“合心而言实在,合理而言实在,合意义价值而言实在。换言之,唯心论者认为心外无物,理外无物,不合理性、不合理想、未经思考、未经观念化的无意义无价值之物,均非真实可靠之物或实在”<sup>①</sup>。在认识论上,他复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知主行从”原则,并把直觉与理性统一起来。贺麟很注重道德教育,但他对道德的看法完全是唯心的。他提出道德决定经济、对理念尽忠、假人欲以行天理等观点,建立了以“理欲调和”为特征的伦理学说。贺麟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完全是继承黑格尔的,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唯心论。

#### (四) 现代资产阶级实证哲学

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除了“新儒家”一派外,还有一派沿着实证哲学的方向发展。实证哲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实用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后实证哲学”三个发展阶段。

1. 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之于美国的杜威。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长文,根本否认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实在”,认为“实在”只是人的感觉、感觉及意象之间的关系,“旧有真理”等因素的复合,纯粹是主观的。胡适实用主义的核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胡适还鼓吹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的辩证法。他说,人类文明“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社会的“解放与改造”,“是一点一

<sup>①</sup>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9页。

滴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改造”，这才是“真实可靠的进化”。由此，他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只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胡适主张多元论的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社会历史现象当然有“经济的原因”，但我们必须“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重视方法论是胡适实验主义的一个特点，他的所谓“科学方法”，即“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历史的态度”。这种方法论影响了我国一批学者。胡适不仅宣传实用主义，而且用它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并具体运用到政治、历史、文学、教育等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有比较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两重性：在“五四”前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起着反动的作用。

2. 丁文江的哲学思想。在1923—1925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丁文江是“科学”派的代表，先后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勱的“人生观”》、《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勱》、《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等文章，反对张君勱等提出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观点，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是万能的，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社会，也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认为心理上的内容都是科学的材料，物质本来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认为人的认识就是认识这种“觉官感触”，在此之外有没有物质都“不可知”，都要“存疑”。他明确地宣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存疑的唯心论”，即他所讲的科学知识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丁文江有过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导其思想和行动的是“少数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

3. 张东荪的哲学思想。“五四”时期张东荪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社会主义论战”。此后，他着力介绍西方哲

学,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三十年代他与叶青挑起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攻击。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在哲学上自称是“存疑的唯心论”者。他提出了“架构宇宙观”,认为客观世界实际上只是些没有物质内容的架构。他说:“我们把物理而代替物,便亦正可把生理而代替‘生’,就是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这亦就是说一切都是架构,而无实质。而架构却不是能离开我们的认识”<sup>①</sup>。他把他的认识论叫作“多元认识论”,主张认识的基本因素分为五种,即感觉、条理、范畴、设准和概念。这种理论认为“外物”和“自我”都是“绝对不可知的”。张东荪的哲学是新康德主义的变种。

4. 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金岳霖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发表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撰写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该书完成于1948年,由于种种原因,至1984年才公开出版)三部专著,反映了他的逻辑思想和前期哲学思想。其一,“道、式、能”的本体论。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在关于道、式、能和可能的关系分析中,金岳霖强调的是逻辑世界的先验性,承认逻辑世界大于可以感知的具体世界。其二,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批判“唯主方式”,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

<sup>①</sup> 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131页。

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并依此指导其对本然世界的认识。他认为,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说,金岳霖的哲学认识论是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对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大思潮的一次综合。从中国近代哲学思潮的发展来看,金岳霖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的终结。

### (五) 国民党右派的哲学思潮

又称国民党官方哲学,其基本特征是借发挥孙中山哲学之名,行歪曲孙中山哲学之实。就其历史过程看,大致经历了戴季陶的“民生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三个阶段。

1.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他在6—7月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从右的方面改造孙中山学说,构造“民生哲学”等理论。他认为“仁爱”是社会进化和革命道德的“基础”,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他说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是继承了孔子的“民生哲学的理论”。他声称“仁爱是人类的生性”,是一切道德的根基,所以民生的基础是仁爱。由此,他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还说:“独占性是统一的基础,排他性是支配的基础。”鼓吹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为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中国共产党,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提供理论根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2. 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陈立夫先后发表《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书,对孙中山哲学进行歪曲,构筑

了他的唯生论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在《唯生论》导言中说:孙中山注重民生史观的说明,而对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宇宙观讲得太少,而一般人也只注意民生史观的研究,很少注意民生史观的宇宙观的研究。为此,他提出唯生论,以补充这种不足,为国民党提供形而上学的论证。陈立夫认为,宇宙的本体是原子,宇宙的一切万物都由原子构成。原子是不生不增不减不灭的。原子是有生命、常活动,且具有神妙的智慧与伟大的能力的东西。原子为宇宙间有生无息大智万能的主宰。陈立夫自称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并说原子包含有物质和精神两种特性。“宇宙之两部分——精神和物质,只是原子之一物。”他认为,原子含有精神与物质,因此由原子组成的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宇宙是生命之巨流。所以唯生论是“生的哲学”。陈立夫承认宇宙间一切都是变化的,认为生命的过程是生、长、衰、化四个阶段,或《大学》中所谓“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这七个阶段。他说:“宇宙间无论是事、物、人,一切的一切都受这七个字(即诚、形、著、明、动、变、化)的大道理支配,宇宙万物从此而成,人为诸物亦以此而成,天道人道固一贯也,所以说,‘诚者物之始终’”。陈立夫把诚看得比原子更根本,没有“诚”就没有原子,没有物。他把“诚”说成是“宇宙间一切精神的原动力”、“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原动力”。

在社会观方面,陈立夫认为,万物有生命,万物都求生,于是宇宙间充满着生存竞争、物物相残的惨状。但是,万物生存竞争的方式各不相同。物的求生只是猎取或掠夺,而人类的求生更能生产或创造。唯生论认定,“凡同类相残者是违反宇宙之生的本意(神意)而必趋灭亡,因主张全人类应当互助相爱,所以是‘爱的哲学’;认定发挥创造力是人类共生共存共进的大道,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统治宇宙的途径,所以是‘人的哲学’”。陈立夫的这些观点不过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一种折衷。唯生论社会观的要害是反对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立夫攻击唯物史观“以物质环境,来作解决人生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又说,人类历史是一部求生的历史,“生”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而“阶级斗争”是人类进化时发生的一种病态。“以病态为常态,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

3.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1932年,蒋介石发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革命哲学的重要》等讲演,提出了“力行哲学”。此后又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行的道理》、《中国之命运》等,进一步发挥力行哲学。这种“力行哲学”的总体思想渊源于《大学》、《中庸》的“笃行”和“力行近乎仁”的传统思想,而其直接来源则是陆王心学。蒋介石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所以我们的哲学,确认‘知难行易’为唯一的人生哲学,简言之,唯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所谓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说的‘实行良知’”。“在人类的全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长、发展以及某阶段与阶段间的衔接,后一段与前一段之间的准备与补充,无不是行。”“行的意义,是不分动静的;整个的行程中间,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养也是行”。又说:“古人说:‘性与生俱来’。我以为‘行’是性之表,所以,‘行’亦与生俱来。”蒋介石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解释为实行先天的良知,“致”就是“行”。

蒋介石极力利用孙中山知行分任和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的错误观点。他说:“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说要求学问的知识完全,就要用许多时间,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难,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人们,只是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因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蒋介石认为,“行的原动力是‘诚’”。“我们行事,只要至诚去力行,就必能笃行实行,唯有笃行实行,才算行。”他说:“我们行的目的是什么?这我可简单总括的答复一个‘仁’字,我

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

---

## 第二节 语言学

---

### 一、概述

从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创立和探索时期,亦即语言学的西学东渐时期。

中国诸民族语言源远流长,各具特色。汉语是这些语言的代表,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历代学者曾对汉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文字、声韵、训诂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只重于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和文献资料的考订,致使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因此,“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sup>①</sup>

民国以来,与西学东渐相适应,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上,又就学于西洋各国,努力“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sup>②</sup>。他们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武装自己,重新审视汉语和小学,进行大胆的研究和探索,拓展了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的学科,从而使汉语研究由传统的文字学跨入了语言学的新天地。“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现代语言学——这在它所包容的各门学科的历史发展中充分展现出来。

#### (一) 汉语文字学

---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73页。

文字学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 中国古人称之为“小学”(或称“小学”为字学)。东汉时期许慎创立《说文解字》的“六书说”, 支配了文字理论达一千八百多年。自 1899 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 开始改变这一现实, 古文字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印出《铁云藏龟》一书, 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 写出《契文举例》、《名原》, 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以后随着甲骨文出土数量的增多, 研究方法的改进, 古文字研究成果益丰。罗振玉先后编印了《殷虚书契前编》(1913 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 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 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 年)、《殷虚书契续编》(1933 年) 等书, 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 年)、《殷虚书契考释》(1915 年)。王国维作《戡寿堂殷虚文字考释》(1917 年), 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 成就颇多。在充分把握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 王国维对文字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权威的《说文》给予批判、订正。王国维和罗振玉一致认为, 《说文》一书比甲骨文晚得多, 可据之上推金、甲文, 但《说文》也有错误, 不能奉为圭臬。

此后, 中国出现一批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如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 容庚的《金文编》(1925 年), 孙海波的《甲骨文编》(1934 年), 都按《说文》部次编排, 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多次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 第一个发现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 并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 著有《殷历谱》(1945 年)。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1956 年) 一书, 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著有《甲骨文字研究》(1930 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 年)、《卜辞通纂》(1933 年)、《殷契粹编》(1937 年)、《金文丛考》(1932 年) 等书。他研究古文字以考证古史和古代社会文化, 由文字以证史, 由史以证文字, 所以发明甚多。唐兰著有《古文字学导论》(1935 年)、《殷虚文字

记》(1934年)、《天壤阁甲骨文存》(1939年)、《中国文字学》(1949年)等专著,尤其在文字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他提出“为文字学而研究古文字”,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和经验,总结出考释古文字的四种方法:对照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历史的考证。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源于八卦或结绳的传说是不可信的,最初的文字绝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千万人的创造。在汉字的构成问题上,他认为许慎“六书说”界说不明,难以为文字明确分类,从而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象声。他还介绍了汉字的源流和特点,提出创制新文字的设想。于省吾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上。他在四十年代自印了三本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即《双剑谿殷契骈枝》及其续编、三编。此后又在刊物上发表了不  
少考释甲骨文的文章。

## (二) 普通语言学

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2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国语而有学自此书始”。该书分十章,着重论述了国语的起源、国语的发展、国语成立的法则、国语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并讨论了“方言及方音”、“标准语及标准音”、“国语与国文”这三对关系。该书是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开创性著作,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因而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此后,普通语言学的普及工作逐渐展开,除了对国外各种语言学流派、著作进行译述外,也有少数根据国外某种理论框架自撰的,如乐嗣炳的《语言学大意》(1923年)、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1930年)、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年)、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年)和《语言学概论》(1934年)等。

在译述本中以高本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影响最大。该书最早于1926年由潘尊行用文言翻译出版,后又由贺昌群用白话译成于1933年出版。全书分七章,论述了中国语言学的性质、中国语音学的

路途与方法,以及语言学者困心衡虑的问题。高本汉认为,汉语是单音节的;汉字为表意文字;现代北京话是没有形态学立场的。这些观点对中国语言学界影响甚大。福尔的《语言学通论》(张世禄、蓝文海译,1937年出版),除介绍一般语言学理论外,着重反映了近代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在语言中的进步。三十年代有人开始把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但影响并不大。

此外,还有一些专事语言学普及的论文,如华超的《什么叫做言语学?》(《教育杂志》第13卷第6期,1921年)、张世禄的《言语学简述》(《新中华》第2卷第19期,1934年)、王力的《语言学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华北日报·国语周刊》新14期,1942年9月4日)、岑麒祥的《历史语言学中之分化作用与统一作用》(《中山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41年)、季羨林的《语言学与历史学》(《申报·文史》第1期,1947年12月6日)等。

### (三) 汉语语法研究

汉语语法是研究汉语结构规律的学科。它包括词、短句、句子的结构规律。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言语法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语法研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马氏以文言为语言材料,参考拉丁语法,首次建立了汉语语法体系,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马氏文通》给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在重视句法、划分词类着重意义标准和独列助词一类等几个方面。此后陆续有语法著作问世,大都是对《马氏文通》的模仿和修正。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年),注重字和词的区别,逐章讨论了词的分类,较为合理,具有“清浅宜人”的特点。杨树达写了《马氏文通刊误》(1931年),又因《马氏文通》是文言语法,对书中虚词再作专题研究,著成《词诠》(1928年),后来又在订补《马氏文通》的基础上,著成《高等国文法》(1930年)。

从“五四”时期开始,一些锐意革新的语法学家力图突破《马氏文

通》的框架,为建立新的语法体系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年)颇受英国语言学家 H. 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的影响,着重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注重从逻辑语义上给词按概念分类。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年)参照刘复的书而又有所变通,并针对《马氏文通》的缺点提出新设想:一是在词品分配上,“以论理学做个基础,下一个根本的研究,去整理我国文字的习惯法”。二是“本书的说明,专注我国文字的历史和习惯”,而不是专注记述的说明。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年)是一部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上有创见的著作,其主要贡献:一是提出研究语法的三项原则,即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二是对古汉语语法作出若干新解,尤其在词类区分上分别本用、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这在辨识词性方面有所改进。

随着白话文被广泛应用,中小学也把“国文”课相继改为“国语”课,一批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书问世。胡适的《国语文法概论》(1921年)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国语文法的重要性,并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在当时有一定影响。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最为著名。该书首创“句本位”汉语语法体系,在词类划分上主张“从句法的成分上辨别它的用法来”,即“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在句子分析方面,采用以主语和述语为中心的分析法,以 J. C. 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1910年)作参考来确定句子成分。同时还采用 A. 里德等人的图解法来表示句子分析的结果。这本书多次重印,对语法学界,特别是在大中学校的语法教学上,影响很大。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年),是一部贯通性的语法历史的研究著作。何容在 1937 年写成《中国文法论》(1942 年出版),对从《马氏文通》以来至三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作了小结,是一部语法学史专著,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时,对如何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研究汉语语法,以建立起完

整的语法体系,是许多学者都在探讨的课题。刘复、陈承泽等人曾对此发表过原则性的意见。到三十年代中期,要求中国文法革新的呼声日趋高涨。1936年1月,王力首先发表《中国语法学初探》,提出文法革新问题,试图探讨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方向和方法。一年后又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从1938年到1943年开展的文法革新问题讨论,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反对《马氏文通》以来一些语法著作在不同程度上机械模仿外国的倾向。这场讨论以上海《语文周刊》为主要阵地,陈望道、方光焘、傅东华、金兆梓、张世禄等人发表了许多研究论著,后来汇集成《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sup>①</sup>、《中国文法革新论丛》<sup>②</sup>。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1)怎样建立中国文法新体系;(2)怎样探索中国文法研究的新方法;(3)文言和白话文法要不要分开研究;(4)语法学和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的关系;(5)对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评论。关于词类问题,陈望道提出“功能说”,主张依据词在组织中活动的的能力来划分词类;方光焘提出“广义形态说”,认为应从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上来划分词类。他们都反对传统语法单凭意义划分词类的观点。在体制上否定了分部依附于析句、析句依附于分部的“一线制”,肯定了以析句合其纵、以分部连其横的“双轴制”。这次讨论,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机械模仿、为革新汉语语法研究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四十年代初,一些语言学者既借鉴外国语言学理论,又重视汉语实际,撰写了一批新著。吕叔湘的《中国语法要略》(三卷,1942—1944年),从汉语的基本品格和汉语的实际应用出发,拿文言和白话对照,着重语法现象的描写。上卷“词句论”,探讨了句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

① 汪馥泉编,1940年由上海学术社出版。

② 陈望道编,1943年重庆文萃出版社出版。

系,细致深入。下卷“表达论”以语义为纲描写汉语句法,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该书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他十分重视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在句法的描写方面,对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有重大影响。高明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年)偏重于理论的说明,全书除绪论外分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三编(修订本增加一编构词论),对汉语的特性、词序和虚词的重要性、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都曾提出一些见解。在四十年代,学者们开始重视近代汉语的研究,但大都偏重词汇方面,在语法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吕叔湘所作的一些专题研究,其成果后来收集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中。

#### (四) 汉语语音研究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应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一些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了较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

“五四”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语音,而对中国语音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音值作出构拟,“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从而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年),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音韵研究十分活跃,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赵元任写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1934年)一文,是音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方桂发表《切韵a的来源》(1931年)等三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



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年)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还有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年)和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年)等书出版,对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还有一批语音学专著问世。如张世禄的《语音学纲要》(1934年)和《中国音韵学史》(1938年),王力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1939年),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1949年)等。

中国第一个搞实验语音学的人是刘复。二十年代刘复在法国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汉语语音,其《四声实验录》(1924年)讲了实验声调的方法和与声调有关的乐理,记录了汉语12种方言的声调。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1931年)对广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辅音和声调进行了实验。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设计发明了声调推断尺,积极提倡实验语音学。赵元任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汉语的声调提供了工具,并于1934年在南京历史语言所建立了实验语音室。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抗日战争开始、缺乏仪器设备而中断达20余年。

### (五) 描写语言学

由于受复古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历来不重视描写语言学。“五四”以后,描写语言学进入了发展时期,其主要表现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兴起。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并发表了宣言书,规定了调查会的任务,制订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记录方言的字母,并且标注了14种方音作为实例。此前,曾开展过关于现代方言研究的讨论。沈兼士指出,今后的方言研究不同于旧日,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应用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应注重利用与之有关系的其他学科来研究方言。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对吴语的调查。随后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倡导和组织下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调查,取得了空前丰富的方言材料。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影响很大。由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编著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是当时出版的篇幅最大、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该书内容丰富、编排合理,对方言调查研究和撰写调查报告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此间,还有不少专门研究某一地点方言的著作,如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年)和《中山方言》(1948年)、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年)和《临川音系》(1941年)、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0年)、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注音》(1956年)、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年)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于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汉语方言的论文那就更多了。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较注重语音的细致描写和分析,兼顾古今音韵的对比,审音比较严格,考证古音也下过很深的功夫。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涉及全国汉语方言的县、市近200个,约占全国2000多个汉语方言调查点的1/10左右,其所取得的成果使汉语方言学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从过去作为语文学的附庸发展成为现代语言学领域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现代语言工作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赵元任的《广西瑶歌注音》和李方桂的《广西凌云瑶语》于1930年发表。此后,李方桂调查了壮侗语族的多种语言并且出版了《龙州土族》(1940年)、《莫话记略》(1943年)等著作。他在1936—1937年英文中国年鉴里写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奠定了基础。四十年代罗常培调查过独龙、景颇、白、傣等族的语言,并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1942年)和三篇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的论文(1944年)。闻宥调查了羌、彝等语言,发表了《汶川瓦寺祖羌语音系》(1943年)、《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与傅懋勳合作,

1943年)、《理番后二枯羌音系》(1945年)等论文。马学良调查过苗语、彝语,发表了《湘黔夷语掇拾》(1938年)、《傛文祭经的种类达要》(1947年)、《傛文作斋经译注》(1949年)。傅懋勳调查过彝、纳西、白、羌等语,出版了《维西么些语研究》(1940年、1941年、1943年)、《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年)等著作。

### (六) 汉语修辞学

中国历来有重视修辞的传统,在历代的各种论著中也有不少关于修辞的论述,但修辞学的专著却极少。真正把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还是“五四”运动以后。“五四”时期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在一些高等学校开设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以现代白话文为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陆续出版了一批修辞学专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要继承古代修辞研究的传统撰写的,如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1923年)、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1920年)、金兆梓的《实用国文修辞学》(1932年)、赵景深的《修辞讲话》(1934年)、宋文翰的《国语文修辞法》(1935年)等。二是在引进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撰写的著作,举以下3种为代表:

唐钺的《修辞格》(1923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修辞格的著作。作者主要参考了欧洲传统修辞学,参阅英国学者J. C. 纳斯菲尔德所著《高中英语作文》(1910年),提出汉语修辞格共分五大类27格。第一类:产生于比较的修辞格,包括显比、隐比、寓言、相形、反言、阶升、趋下6格。第二类:产生于联想的修辞格,包括伴名、类名、迁德3格。第三类:产生于想象的修辞格,包括拟人、呼告、想见、扬厉4格。第四类:产生婉曲的修辞格,包括微辞、舛辞、冷语、负辞、诘问、感叹、同辞、婉辞、纤辞9格。第五类:产生于有意重复的修辞格,包括反复、俚辞、排句、复字4格。《修辞格》的用例,均取自古代诗

词文赋,是一部文言修辞格。该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影响深远。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作者参考日本的修辞学,但自己多有创见。全书共分十二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特色是引例丰富,归纳系统,阐释详明。它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该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对此后的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汪震的《国语修辞学》(1935年)。该书全讲白话文,与当时的国语运动的历史形势是合拍的。

此外,还有张弓的《中国修辞学》(1926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1年)、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1933年)等,亦较有影响。

## 二、语文改革运动

### (一) 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前后由新文化阵营发动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有明确的语文改革目标:提倡白话文,废置文言文。这场运动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即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文化知识界的进步势力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复古派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西汉时统治者独尊儒术,记载儒家经典的文言文也成了不可更改的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也越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

展。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起,但直至清末仍局限于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替代文言文而成为通用的书面语。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书面语同口语应相一致,如洪仁玕、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王照、梁启超等都曾提出改革文体、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可是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没有人自觉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影响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袁世凯称帝失败(1916年);四是《新青年》创刊,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文体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民主主义潮流。这些都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肯定,并发表《文学革命论》,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和“八家文派”之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槐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也提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并第一个考虑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同期发表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第一次对“桐城派”古文给以较系统的批评。5月,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领域首先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sup>①</sup>,这就是说,白话是指现代中国人的口语。

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如林纾先后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荆生》、

<sup>①</sup> 鲁迅:《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致蔡鹤卿书》等,攻击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愤愤于白话文运动“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陈拾遗等攻击白话文运动“吸欧糟而饮美粕,与国粹为大敌”;刘师培等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由此酿成了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蔡元培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纾的留声机》;鲁迅发表了《〈孔乙己〉篇末附记》等,对复古派的言论进行了彻底的批驳。这场“文言白话之争”与白话文运动相始终,并促进了白话文的发展。据估计,在1919年内,白话文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

1921年以后,胡适转而“整理国故”。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这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文化上则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章,提倡白话文,并无情地嘲弄那些鼓吹文言的国粹派。此间,一些语言学者如白涤洲、唐钺等也著文反驳文言维护者。至二十年代中期,这场“文言白话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这场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宗的地位。它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白话文理论建设上,即建立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框架,提出了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而且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以成功的写作实践证明白话文能够代替文言文。“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新文化运动勇士们的诸多论文,虽然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在文学上,白话文体的散文、小说、诗歌等,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

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跃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学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

## （二）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是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加接近大众口语的文体改革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正宗”地位，但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之外的文化领域，如政府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社论，学校的国文、作文，中上层社会交往的信札、应酬文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时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或是滥用欧化句法和日语句法的洋腔。这种状况严重违背现代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有必要对这种文言化或者欧化的白话文作进一步的改革。

引发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上接连发表主张废弃白话、复活文言，甚至提倡小学读经等文章，其代表人物是汪懋祖。与此相反，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陈望道、陈子展、胡愈之、叶圣陶、黎烈文等发起，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开展了“大众语”的讨论，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这场讨论延续近半年，发表了两三百篇文章。讨论中批判文言文，也批判了“五四”以来半文半白的白话文，要求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且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并提出了文字拼音化。

“大众语”讨论提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尚未触及的问题，如怎样防止白话文欧化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大众语”讨论的重视，有些进步学者发表了许多建设大众语的富有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尤以陈望道和鲁迅贡献最大。陈望道和鲁迅在论战中发表了多篇论著，对大众语运动作出

了重要理论建树,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在讨论中,大家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去看待文体改革的问题。归纳起来,其要点如下:(1)关于大众语的特点。从语言形式上看,“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sup>①</sup>。从表达的内容看,应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2)关于建设大众语的前提。主要应弄清大众语与大众生活的关系。陈望道提出,建设大众语,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学语言。“用大众语写文字的态度必自认是大众的一员,不在大众之上,也不在大众之下”<sup>②</sup>。(3)关于建设大众语的途径。陈望道提出“三路并进”建立普遍的大众语的路线:方言土语“从下送上”,即从语言流入文字;文学科学用语“从上迎下”,即从文字流入语言;中间由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编定通用的语汇、语法“从横通过”。<sup>③</sup>

此外,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语文改革的新课题:(1)关于大众语与现代口语的关系。多数人认为,大众语应该就是现代中国普通话。鲁迅说:“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sup>④</sup> 这种看法是极有见地的。(2)关于大众语与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关系。许多人认为用拉丁化新文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新文字是大众语最理想的书写工具。

大众语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彻底击退复兴文言、废止白话的逆流,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推行。

### (三) 国语运动

① 《陈望道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③ 同上书,第101—102页。

④ 鲁迅:《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指从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文言一致”和“国语统一”是这场运动的两大口号。前者是指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后者是指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场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二十世纪初,国人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国语”这个名称是当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最早提到的。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时,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启发,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2月《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并从1918年起全部改用白话文。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4月北洋政府成立推行“国语”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

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五四”以后,与白话文运动发展相一致,国语运动进入了推行期。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及其附设的推行“国语”的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协同有关方面先后做了以下的工作:(1)修订注音字母方案。(2)修改国音标准。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了“国音”标准,1919年出版《国音字典》。这种标准音习惯上称之为“老国音”。各界对此议论颇多,主张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发布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3)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此项是由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发起制订的。该方案于1926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1928年由国民政府大学院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予以公布。(4)推进学校的国语教育。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院校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提案函请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函覆同意。同年实行学制改革,规定全国中、小学的语文科一律定名为“国语”科。(5)培训国语师资。1920—1923年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培训各省区学员四五百人。1921年中华书局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商务印书馆创办“国语讲习所”,三四年间为南方各省及南洋各地培训了二三千名国语教员。1928—1934年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直辖的“国音字母讲习所”办了8期,毕业学员170多人。此外还协助各地举办国语讲习班。(6)出版书刊。出版了《国语月刊》、《国语周刊》、《国语旬刊》等宣传研究国语的刊物。1920—1922年间,《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教育杂志》、《星期评论》、《上海青年》等报刊,不断发表宣传国语的文章。编辑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新

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教育国语课本》(中华书局)等各种课本。此外国音的字汇、字典、国语辞典、语音教材、语法、会话读本、留声片等也陆续出版。后来还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进行大规模的辞典编辑工作。(7)成立“国语文献馆”,对国语史料进行调查、征集、整理、陈列统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语的推行陷于停滞。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继续出版注音书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与国语略有不同,但运动的性质相同,它是国语运动的继续。另外在光复后的台湾省,用了大约10年时间就在全省同胞中普及了国语。

#### (四)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运动。

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文字拉丁化运动。二十年代,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主要参加者有当时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1929年2月,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10月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4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汉学家尤果夫和瞿秋白、郭质生三人组成小组负责修订此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等移居海参崴,该工作由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了中国过去的几种方案,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拟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该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于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包括原则和方案两个方面的内容。原则共

13条,主要有:“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应该采用拉丁字母”;“这种拼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必须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清除偏僻的土语,有机地输入国际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技术的词汇”;“反对认为中国文字拉丁化是不可能的消极观点,也反对把汉字立即废除的‘左’的观点”;“研究中国方言的工作极端重要,必须大大开展这个工作”。这些原则归纳起来说,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必须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方言化。

该方案的内容分为4个部分:

第一,字母表和声母韵母表。字母表共有28个字母,其中5个用双字母表示(表1)。

表1 字母表<sup>①</sup>

字母		读音		字母		读音	
大写	小写	注音符号	汉字	大写	小写	注音符号	汉字
A	a	ㄚ	啊	Ng	ng	ㄣ	
B	b	ㄅ	伯	O	o	ㄛ	哦
C	c	ㄘ	雌	P	p	ㄜ	泼
Ch	ch	ㄘㄞ	痴	R	r	ㄝ	儿
D	d	ㄉ	得	Rh	rh	ㄝ	日
E	e	ㄜ	呃	S	s	ㄝ	思
F	f	ㄈ	佛	Sh	sh	ㄝ	诗
G	g	ㄍ	革	T	t	ㄝ	特
I	i	ㄝ	衣	U	u	ㄝ	乌
J	j	ㄝ	衣	W	w	ㄝ	乌
K	k	ㄎ	克	X	x	ㄝ	赫
L	l	ㄌ	勒	Y	y	ㄝ	迂
M	m	ㄇ	墨	Z	z	ㄝ	姿
N	n	ㄋ	纳	Zh	zh	ㄝ	知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声母有 22 个。不列声母几(ㄐ)、欺(ㄑ)、希(ㄒ),改用 g(ㄍ)、K(ㄎ)、X(ㄒ)变读表示,即在 i(ㄐ)、Y(ㄑ)前面 g(ㄍ)、K(ㄎ)、X(ㄒ)变读软音几、欺、希。韵母有 35 个,其中单韵母 6 个,复韵母 14 个,带声韵母(即鼻韵母)15 个(表 2)。

表 2 声韵母表①

声 母 (22)	b	ㄅ(伯)	p	ㄆ(泼)	m	ㄇ(墨)	f	ㄈ(佛)
	d	ㄉ(得)	t	ㄊ(特)	n	ㄋ(纳)	l	ㄌ(勒)
	g	ㄍ(革)	k	ㄎ(克)	(ng)	ㄋ	x	ㄒ(赫)
	zh	ㄓ(知)	ch	ㄔ(痴)	sh	ㄕ(诗)	rh	ㄖ(日)
	z	ㄗ(姿)	c	ㄘ(雌)	s	ㄙ(思)	r	ㄖ(儿)
		j	ㄐ(衣)	w	ㄨ(乌)			
单 韵 母 (6)			i	ㄐ(衣)	u	ㄨ(乌)	y	ㄩ(迂)
	a	ㄚ(啊)	ia	ㄐㄚ(鸦)	ua	ㄨㄚ(挖)		
	e	ㄜ(呢)						
	o	ㄛ(哦)			uo	ㄨㄛ(我)	yo	ㄩㄛ(药)
复 韵 母 (14)	ai	ㄞ(爱)			uai	ㄨㄞ(歪)		
	ao	ㄞ(奥)	iao	ㄐㄞ(要)			ye	ㄩㄝ(月)
	ei	ㄟ(欸)	ie	ㄐㄟ(耶)	ui	ㄨㄟ(威)		
	ou	ㄛ(欧)	iu	ㄐㄨ(又)				
带 声 韵 母 (15)	an	ㄢ(安)	ian	ㄐㄢ(烟)	uan	ㄨㄢ(弯)	yan	ㄩㄢ(渊)
	ang	ㄤ(盎)	iang	ㄐㄤ(央)	uang	ㄨㄤ(汪)		
	en	ㄣ(恩)	in	ㄐㄣ(因)	un	ㄨㄣ(温)	yn	ㄩㄣ(胤)
	eng	ㄥ(鞞)	ing	ㄐㄥ(英)	ung	ㄨㄥ(翁)	yng	ㄩㄥ(雍)
变 音	g、k、x 一列声母 在 i、y 两行韵 母前面变读		gi	ㄐㄐ(几)			gy	ㄐㄩ(居)
			ki	ㄐㄐ(欺)			ky	ㄐㄩ(区)
			xi	ㄐㄐ(希)			xy	ㄐㄩ(虚)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6 页。

第二,音节的构成。分三种形式:(1)声母跟韵母相拼;(2)声母单独成为音节,有zh、ch、sh、rh、z、c、s、r 8个;(3)韵母单独成为音节。

第三,词儿的写法。共9条,包括(1)词儿连写;(2)词尾跟词儿连写;(3)界音法(即隔音法);(4)数字的写法;(5)拟声词的写法;(6)助词的写法;(7)成语的写法;(8)略语和缩写;(9)特别写法(区分常见的少数同音词)。

第四,话的写法。主要规定大小写、标点符号用法、移行法和分节法。

三十年代初,拉丁化新文字首先在苏联远东地区推行。1931年9月26日在“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负责推行工作。此后,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就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中传习,后来又在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中传习。该委员会举办了许多新文字学习班、补习班,到1933年共出版课本、读物和工具书10万多册。1932年10月26日,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和出版问题,并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方案和写法进行若干修正。

在国内,1932年有人开始介绍苏联推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消息。1933年焦风(方善境)翻译介绍了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上海世界语者也陆续介绍苏联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资料。1934年,叶籁士等在“大众语”讨论中介绍拉丁化新文字,认为这是书写大众语、普及群众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工具。这个意见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此后,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国推行开来,其发展历程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8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夜。以上海、北平、广州、闽南等地为中心。高潮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前后。第二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延安等地

为中心。高潮是 1938 年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实验和 1940—1942 年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第三阶段是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高潮是 1947 年民主运动前后。第四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以上海、广州、武汉、旅大等地为中心。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是在群众运动中推行的,其主要方式和成就是:

1. 名人倡导,团体促进。瞿秋白是拉丁化新文字的最早开拓者。鲁迅曾接连著文大力支持这个运动。1935 年 12 月陶行知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北平,抗战前一些教授如王力等也赞助这个运动。抗战初期陈鹤琴和陈望道组织领导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在香港,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有张一麀、冯裕芳、许地山、马鉴、陈君葆等。在延安,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都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倡导者。在知名人士倡导下,成立了很多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据统计,在运动初期,全国成立的团体有 80 多个,最早的是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4 年 8 月)。成立团体最多的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的北平。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团体约 40—50 个,虽多数难以开展工作,但陕甘宁边区的团体却很活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有 20 多个市县成立了团体。这些团体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起了重要作用。

2. 制订多种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从 1936 年开始,各地制订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有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 13 种。

3. 开办学习班。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学习班约有 1000 多个,参加学习的有 10 多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举办了很多难民新文字班,陕甘宁边区举办了很多冬学新文字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东北各铁

路局为了使用新文字铁路电报而举办了很多报务员新文字班。

4. 出版书刊。抗战前全国出版的图书包括概论书、课本、工具书等共 61 种,报刊 36 种。抗战初期上海出版的图书有 54 种,报刊 23 种;陕甘宁边区出版的图书有 16 种,报纸 1 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是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的《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刊物是上海出版的 *Sin Wenz* (新文字) 月刊、*Zhungguo Yjan* (中国语言) 半月刊和《语文》月刊,北平出版的 *Beiping Sin Wen'z* (北平新文字) 半月刊、*Dazhung Bao* (大众报) 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新文字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文字书刊的销售量达 130 多万册。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编的《语文知识》月刊每期发行 15 万册。

---

## 第三节 社会学

---

### 一、概述

社会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十九世纪末从国外逐步引入中国。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形成与发展。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将国外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为创立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看法。我们认为,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十九世纪末至 1927 年);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时期(1927—1937 年);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1937—1949 年)。



中国维新派是传入社会学的先驱。康有为在其著作(如1884年始编的《人类公理》,后改名《大同书》)中,融合了中西社会学说,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梁启超继承和发挥了康有为的观点,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指出“群学”(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学问。谭嗣同在《仁学》(1896年成书,1899年始刊于《清议报》)一书中,最先明确采用“社会学”一词。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于1898年首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接着还翻译了大量社会学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年)。通常人们把这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通过外派留学生、译介日本和英美著作、外国学者来华讲学等途径实现的。清末中国留学生主要被派往日本和欧美,他们当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社会学界的先导。如中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康心孚就是留日学生;朱友渔于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早期社会学著作多译自日文,如章太炎译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1902年)、吴建常译市川源三易名的《社会学提纲》(1903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1911年)等。最先在中国实施社会学教育的是美国在华办的一些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采用白芝霍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为教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学者葛学博创立,并邀美国学者来华任教。清华学堂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狄特莫任教。早期的社会研究多是由教会学校开展的小型调查,其中1918—1919年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与美籍传教士甘博曾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调查,成果用《北京——一种社会调查》(英文,1921年)发表。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国内许多大学成立

社会学系,增设社会学课程,培养社会学人才。据许仕廉 1927 年调查,当时国内 60 所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 308 种,其中社会理论、社会问题课最为普遍。各大学中,开设社会学课程较多的有燕京、复旦、沪江、政治、华西、光华、文化等大学。1922 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1923 年瞿秋白任系主任。该校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1922 年余天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团体。1928 年孙本文等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出版《社会学刊》。这一时期,社会学者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和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清华学校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对生活费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步入学科基本建设和系统研究阶段,是社会学显著发展的时期。1930 年,中国社会学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全面进入成长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纷呈,普通社会学研究主要是综合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并逐渐形成两个传统,即西方社会学传统与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前者代表人物有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等,其代表作有朱亦松的《社会学原理》、黄文山的《社会进化》(1930 年)、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1935 年)等;后者代表人物有瞿秋白、李达、陈翰笙、许德珩等,其代表作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 年)和《社会学大纲》(1937 年)、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 年)等。在应用社会学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农村、城市、人口、劳工等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在社会调查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李景汉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梁漱溟对山东邹平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社会学界一些人还以独特的方式研究了中国的向何处去的问题,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改良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实验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学界的许多教学和科研机构向西南迁移,云南、贵州、四川逐渐成为社会学重要的教学和研究基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社会学界开展了社会工作的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行政与社会服务方面人才。这一时期,社会学中国化与社区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吴文藻、孙本文、陈达、吴景超、李安宅、杨堃、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等为此作出了贡献。其中吴文藻等倡导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认为这种做法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陈达等注重国情普查,对中国的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费孝通对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为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现实依据。

从十九世纪末到1949年,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主要表现为:  
(1)培养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人才。自1906年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设社会学科目始,到四十年代,社会学教学从选修到设系,培养专业毕业生逾千人,教师逾百人,形成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的队伍。  
(2)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学组织。从1922年建立中国社会学会,到1928年建立东南社会学会,直至1930年扩展到组织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反映了社会学队伍的发展,并有组织地开展了研究。  
(3)出版了社会学译、著达千种。开始社会学著作多译自日本和欧美,后来则以中国学者著作为多,而且涉及理论社会学、分支社会学各个领域。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研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  
(4)注重中国社会问题和社区的调查研究。从二十年代起就对中国劳动群众的生计进行调查研究,三十年代以后更广泛开展对中国社会问题——农村问题、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劳资问题等研究,至四十年代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其中有些调查研究质量较好、影响较大。  
(5)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都注重社会学的中国化。以吴文藻、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为

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们还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倡导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 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 (一) 理论社会学研究

1. 西方社会学传统。自社会学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派一直影响很大。二十年代以后,普通社会学除译自外国著作外,国内学者著作亦日渐增多,其内容多是依循、阐述外国各家学说,并有综合研究趋势,但自成体系者甚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本文、杨堃、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等。

1920年出版的覃寿公译的远藤隆吉著《近世社会》,是在此之前译著中篇幅最长的一部。1923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德普、延年编译海逸史和爱尔伍德著的“社会学入门”。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常乃惠著的《社会学要旨》,该书作为青年丛书之一,是参考英、日多种书籍写成的。同年曹聚仁编著的《社会学大纲》由民智书局出版,此书大体上采自海逸史的社会学研究绪论。1925年瞿世英译鲍格度斯的《社会学概论》,为商务印书馆高级中学教科书,是当时国内流行的书籍。

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亦松的《社会学原理》,该书取材于海逸史、恺勒、劳史等人著作,参考多种著作,经作者融会贯通而成。书中特别重视功能的观点、“群”的观点和“群的势力”,作者自称全书“自首至末,完全从功能上着眼”。他还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和活动都是受因果律的支配。

1929—1930年世界书局陆续出版由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该书由各方面卓有研究的专家撰稿,内容包括了普通社会学各方面,共有15种:《社会学的领域》(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孙本文)、《社会的心理基础》(潘菽)、《社会的经济基础》(寿勉成)、《社

会的生物基础》(吴景超)、《社会的地理基础》(黄国璋)、《社会组织》(吴景超)、《社会变迁》(孙本文)、《社会进化》(黄凌霜)、《社会约制》(吴泽霖)、《农村社会学》(杨开道)、《都市社会学》(吴景超)、《社会学史纲》(李剑华)、《社会研究法》(杨开道)、《人类起源》(游嘉德),该丛书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说明我国出现了专门社会学专家,并有联合研究的趋势。后来为供大学讲授之用,由孙本文合编成《社会学大纲》,1931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1933年民智书局出版了应成一的《社会学原理》。该书认为,社会意识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关键。全书说理明彻,文字优美,是自著中较有影响的著述。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影响较大,受到学界重视。该书由作者在其1928年出版的《社会学ABC》一书基础上,吸收欧美社会学各家学说编写而成。全书分5编26章,1940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作者曾加以修订、增删。该书注重文化与态度的探讨,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文化社会学的观点之上。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类的文化,而文化具体体现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据此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并探讨了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如社会行为的过程问题,社会组织问题等。这部著作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四十年代,孙本文有以下重要著作出版:一是《社会心理学》(上下册),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六编,共30章。第一编探讨社会心理学的目的、对象、范围、问题以及源流派别。第二编综述人类行为的基础与形式。第三、四编讨论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和社会制约个人行为的法则。第五编讨论个人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和个人对社会环境调适的法则。第六编专论社会心理学的应用。该书将社会心理学的各种流派和学说融为一体,并广泛取材于中国和

西方的有关资料,在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二是《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年由胜利公司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共22章。上编叙述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下编论述中国社会学的流派与特点,书末综述中国社会学的过去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研究方面,中国学者除翻译外国著作外,自著亦有6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本文的《社会进化》、《社会变迁》,黄凌霜的《社会进化》及李树青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等。李树青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作者的论文汇集,副题为“制度社会学论丛”,由潘光旦作序。全书分6个部分,依次为社会学与社会方法、社会思想及理论、中国社会的分析、文明与文化、社会移动及社会变迁、战时社会问题。作者从环境、民族与制度的相互关系的变动中历史地剖析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变迁的根源,并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家族制度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

2. 唯物史观社会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学者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陈翰笙、许德珩、李剑华、李平心、冯和法等人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社会学。李大钊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和《史学要论》(1924年)等论著,阐明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一些名家的观点进行评析,并对中外的婚姻、家庭、人口、劳工、农民、自杀、风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他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sup>①</sup>。“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

<sup>①</sup>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sup>①</sup>。1924年瞿秋白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讲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他对社会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指明了社会学的独立性、综合性与实用性。

坚持以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学的代表作还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年)等。他们提出了社会结构三层次论,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变动决定于社会内部的客观条件,强调社会进化中的社会革命论。其中,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年由现代丛书社出版,1929年上海昆仑书店再版发行。该书叙述了社会学的产生及其流派,阐明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指出社会学的使命和社会运动的方向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是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学的专著,1936年11月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作者原计划分上下两卷出版,后仅出版上卷。上卷属绪论性质,共计5编。书中阐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社会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社会发展的历史及派别,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等问题。

## (二) 分支社会学研究

1. 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后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著作有顾复的《农村社会学》(1924年)、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年)和《农村生活丛书》(1934年)、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年)和《农村社会学导言》(1937年)、乔启明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1945年)等。这些研

<sup>①</sup>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究农村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应当改进,这就必须了解农村生活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达到改进农村生活的目的,而研究农村社会学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步骤。通过研究,农村社会学家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大都是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提出的部分修正,即所谓土地改良,尚未涉及到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土地革命问题。

以陈翰笙、冯和法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们从生产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政治诸关系,指出土地私有制是农民受剥削及产生一般农村病态的主要原因,并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以解决土地为中心的革命。这一研究的代表作有陈翰笙的《亩的差异》(1929年)、《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29年)、《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英文版,1939年)等。1929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到1934年共出4版。第4版时作者作了较大修改。全书15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一般农村社会学及农村社会性质、概况;第二部分解剖了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农村的剥削关系、农业破产现象、土地政策、教育与农村改进,并略述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书中通过大量事实论证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者认为,研究农村社会不仅在于理论探讨,还在于提出实行的方案。该书在当时被十几所农学院列为大学教科书,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2. 都市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才起步。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这是该领域最早的专著。该书阐明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提出要把都市及其附庸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注重研究方法,把地图记载与发展史调查作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作者在书中论述了都市



的经济、都市的人口、都市的区域和都市的控制等问题。1934年有志书屋出版了邱致中编辑的“都市社会学丛书”，共8册，其中《都市社会学原理》为该丛书的代表作。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研究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问题、政策以及未来预想的科学。

3.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二十年代，并且与社会调查同步展开。起初的研究偏重于家庭、婚姻、人口、劳工问题，至三十年代以后，涉及领域渐广，而对人口、农村、劳工、犯罪等问题的研究较多。

关于普通社会问题研究：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孙本文的《社会问题》。此后孙本文经多年积累写成《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1942—1946年先后由重庆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和再版。全书共4册，分为五编，论述了社会问题的性质、范围、研究趋向，专门讨论了家族、人口、农村、劳资等问题，并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和途径。

关于人口问题。中国学者重视人口问题，试图从人口问题入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孙本文的《人口论ABC》，该书就人口、土地、粮食三项状况加以分析，提出以调剂人口和发展粮食生产来解决人口问题。1929年上海三民书店出版文公直的《中国人口问题》。作者指出，中国的贫困不是由于人口增加、富源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对富源没有科学的开发，国内受封建势力摧残，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剥削而造成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作者指出要探讨中国的一切问题，必须从人口问题入手，并特别强调在弱肉强食的时代，种族品质对于社会有重大关系。1931年中国社会学社年会讨论了人口问题，并由孙本文主编成《中国人口问题》论文集出版（1932年）。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达所著《人口问题》，书中明显地贯穿着生存竞争的理论。作者指出，为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要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质量。1934

年正中书局出版柯象峰的《现代人口问题》，作者认为，人口问题的重心在文化而不在人口与食料，应当改进文化环境，发展科学、改良农业，而不在表面的人口数量的增减，等等。

关于劳工问题研究。劳工问题是当时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1929年）、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年）、何德明的《中国劳动问题》（1937年）等。陈达认为，中国工界有两个最重要问题，即劳工阶级的生存竞争与劳工阶级的成绩竞争，前者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后者属于社会性质的问题。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几种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骆传华提出，对劳工问题的解决，必须作历史的探讨与现状的观察，然后从民族意识中去寻求解决的途径。

其他社会问题研究，有严景耀用唯物史观分析犯罪问题的代表作《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年）；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1935年）；还有潘光旦以优生学为重点研究家庭问题的代表作《中国之家庭问题》（1928年）等。

### （三）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且多是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此后，随着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形成和全国性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二十年代中后期，由陶孟和任所长的社会调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注重调查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和人口问题，出版了许多论著，其中篇幅最大、材料较丰富的是《中国劳动年鉴》；研究方法上贡献较大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与此同时，由陈翰笙、王昌际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也对农村和都市工厂进行调查。陈翰笙对东北农村调查后，出版

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难民的东北流亡》等著作,并于1929—1934年对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调查。

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在北方有李景汉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梁漱溟对山东邹平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在南方较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有: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刘保衡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广州岭南社会研究所的《沙南蛋民调查报告》、朱汉章的《泗阳县社会调查》、岭南大学伍锐麟的《旧凤凰村社会调查报告》、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的《南宁社会概况》等。在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上,进行了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代表作有黄桔桐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张锡昌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了32天考察,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他在江西宁冈、永新两县调查,1933年发表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41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延安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和跋中精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和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在绥德、米脂的调查,并分别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重版)、《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2年在延安出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重印本)报告。

#### (四) 社区研究

1937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第六届年会,主题为“中国社会

学之建设”。会上赵承信宣读了《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一文,建议将社区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途径。会议一致通过陈达提出的“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提案。此后,中国社会学界形成了社区研究的风气,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建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李安宅、杨堃、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等。

吴文藻积极倡导社区研究。他认为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sup>①</sup>在社区研究中,他选择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他认为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实际工作。为此,他注重人才培养,还主编了《社会学丛刊》,分甲乙两集共10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费孝通在社区研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江村经济》一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详尽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易等活动,阐明了“江村”经济与周围地理环境的联系及其与这个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等。此后,他相继写出《绿村农田》(1943年)、《生育制度》(1947年)、《乡土中国》(1948年)、《乡土重建》(1948年)等著作。其中,《乡土中国》一书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态。

社区研究机构在抗战时期主要有三个:一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

<sup>①</sup>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研究所,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该所就中国的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普查,先后写出《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云南呈贡昆阳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年)。在此基础上,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1946年)一书,分析了人口的各种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介绍抗战后云南几个地方从事现代普查实验及人事登记的方法。这些调查为以后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取得了经验。二是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主要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绿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年),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年),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1942年)、《芒市边民的摆》(1946年),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论著。三是李安宅主持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他们在一定的小区里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观察,以非汉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侧重对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进行研究,用当地的事实来检验人类学原有的各种理论,并加以新的引申或修正。

此外,在北平有1939年由杨堃、黄迪、赵承信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的农村实验室,对村民生活进行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林耀华指导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研究川康诸土著部族的生活,1947年著《凉山夷家》一书,影响很大。

### 三、研究机构、团体与刊物

#### (一) 北京社会实进会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社会团体,从事社会学传播活动。成立于1913年11月,由参加青年会活动的大、中学生发起组成,最初有会员200多人,后陆续增加。该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作风”为宗旨。1915年该会内设学务、演说、游艺、调查、交际五个部,先后举办了夜校、演说会、游戏场和贫民生活状况、人力车

夫调查等活动。1918年该会增设编辑部,先后约请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菊农、许地山为编委。1919年11月1日创办《新社会》旬刊,<sup>①</sup>强调以民主改造旧社会、创建新社会为宗旨,主张“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sup>②</sup>。同年成立董事会,聘请13名有学识和经验、热心社会服务者担任董事。董事会负责全会财产、经济及人事任免。该会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社会改造,并在活动中传播了社会学。作为该会骨干的瞿秋白、陶孟和、陈长蘅等,后来都成为社会学界的风云人物。

## (二) 社会调查所

前身是1926年由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属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7月1日更名为社会调查所。该所是专门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机构(所址先后在北平南长街东河沿6号,北平文津街3号),其任务是邀请专攻社会经济学的人士,用科学方法搜集社会事实加以研讨,尤其注意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所长陶孟和(1892—1960年)。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协助所长主持所务。下设研究室由陶孟和自兼主任。1930年起招收研究生。该所研究科目有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人口、统计等。主要调研项目有:(1)搜集整理、系统研究近20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包括清代经济档案、海关税收及分配、厘金、盐税以及财政等),编纂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2)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及工人生计,以求察知中国重要工业历史与现状。(3)进行了大量农村调查,如调查河北、山东棉花的生产贩运,北平近郊乡村家庭;举办冀、鲁、豫、晋、秦、陇、热、察、绥等省粮食调查,分析河北农村信用合作放款等。(4)研究劳动问题,尤其注意生活费用和工资

<sup>①</sup> 该刊至1920年5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19期。

<sup>②</sup> 《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两项,编辑《中国劳动年鉴》。(5)开展中国人口估计研究。(6)研究外贸及税收。(7)在统计方面,编印了《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中国统计年鉴》等。这些著作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 (三) 中国社会学社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其前身是“东南社会学会”。1929年底,由孙本文、许仕廉、陶孟和、陈达等联合发起,商定以原东南社会学会为基础,扩大范围,组织全国性社会学组织。1930年2月8日,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到会作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讲。第一届理事会9人,孙本文任正理事,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吴泽霖任会计。学社以联络全国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及社会行政为宗旨,把探讨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举行实地调查和编纂社会学书籍等作为主要任务。社章规定每年开年会一次。从1930年到1947年学社共举行过八届年会,分别以人口问题、家庭社会学、社会规划、战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等作为专题。学社除编辑《社会学刊》外,还与社会部合作发行《社会建设》月刊。中国社会学社在协调全国社会学界的教学与科研活动,诸如交流学术成果、培养人才、开展社会调查、译介国外社会学著作、匡订社会学术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四) 中国社会学会<sup>①</sup>

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22年,余天休博士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参加者甚少。这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的学术团体。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社会学杂志》双月刊,余天休自任

<sup>①</sup>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先后于1922年和1979年成立两个中国社会学会,这里仅对前者予以介绍。

总编辑。社会学者许仕廉、朱友渔、黄文山、胡鉴民、李剑华、陈达及美国社会学者步济时等 20 余人曾先后担任该刊编辑。自 1922 年 3 月至 1925 年 8 月共出 2 卷计 8 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 年 1 月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第 3 卷第 1 至 3 期,以后则由山东齐鲁大学出版。1933 年 3 月出版第 5 卷第 7 期后停刊。共载文 160 余篇。内容包括社会思想、社会学的分支及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等。至此,该学会与刊物自行消亡。

#### (五) 《社会学界》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的社会学年刊。由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任主编。1927 年 6 月创刊,1938 年 6 月停刊,共出 10 卷(其间 1935 年、1937 年因战争未出)。该刊宗旨:一是继续负起已停刊的《社会学杂志》的使命;二是为了中国的社会学者整理中国社会学的材料,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耘。该刊共载文 137 篇,其中大部是当时社会学界学有专长的专家撰写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按内容分类:社会学理论方面有梁启超的《社会学在中国方面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冯友兰的《中国之社会伦理》、孙本文的《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等;社会调查方面有李景汉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许仕廉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等;社会问题研究有许地山的《现行婚制之错误及男女关系之将来》、费孝通的《亲近婚俗之研究》、严景耀的《中国监狱问题》、赵承信的《人口年龄性别分配之分析》等;劳工问题有陈达的《国内重要工会的概况》等;介绍国外社会学主要有吴文藻、李有义、潘光旦、李景汉、林耀华、杨开道、赵承信等人的专论文章,其中尤以介绍英国功能学派的《特辑》影响较大。该刊还以大量篇幅发表社会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和社会学教学探讨文章、学术动态等。该刊在中国社会学建设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六) 《社会学刊》

原系“东南社会学学会”于 1929 年 7 月创办的学术季刊。孙本文任



主编,吴景超任编辑。第1卷1至4期由东南社会学会编辑,从第2卷第1期起改由中国社会学社编辑,成为全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刊物,仍由孙本文任主编。该刊以研究社会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为宗旨。当学刊出至第5卷第3期时,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1948年1月复刊后仅出了全年合刊的第6卷,此后未再刊行。该刊前后共出版6卷20期,载文300余篇,约185万多字。其中有各类论文115篇,国外社会学说介绍15篇,书评115篇,社会调查4篇,其他方面的文章50余篇。国内许多社会学专家都曾在该刊发表著述,它的出版发行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 第四节 文 学

---

### 一、概 述

中国现代文学,指自“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这里的“现代”,最主要的是指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但以此前的近代文学为先导。从十九世纪末至民国初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并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一方面是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

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同时还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一方面产生了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为代表的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产生了一批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的作品。这些都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思想与文学上的准备。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 第一个阶段(1917—1927年)

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发难的文学革命为开端。这场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9月《新青年》(第1卷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该刊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集中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和旧道德,猛烈批判儒家学说。1917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首先倡导文学革命。胡适认为文学应随时代变迁,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陈独秀还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可谓文学革命的宣战书: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表示,愿同国内外文学界豪杰之士一起,“不顾迂儒之毁誉”,而明目张胆地与“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由此,文学革命开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钱玄同和刘半农最先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专事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们巧妙配合的“王敬轩双簧信”,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

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参加了编辑工作,由此形成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学统一战线,共同向封建旧文学战斗。接着,陈独秀又办了《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也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使文学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抨击旧文学,从其陈腐的封建内容与僵死的文言形式两方面着眼;提倡新文学,也强调内容与文体、语言形式两方面的变革。但在文学革命之初,首先引起守旧派激烈反对的是实行白话的问题,并由此引发“文言白话”之争。与此同时,新文学阵营积极开展了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此后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将现代意义的“人”的价值标准引进文学领域。他在另一篇文章《平民的文学》中,进一步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口号。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不仅批判了封建旧文学的“旧毒”,也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学的“新毒”,深刻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

“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进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此后白话文渐次推广,到1920年已在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北洋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学校采用。这标示着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当然,文学革命的实绩主要在创作方面,1918年5月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稍后,郭沫若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这些作品的成功,表明文学革命已经突破初期理论探讨的范畴,真正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

1921年以后,文学革命由倡导期进入发展期。从1921年年初起,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开始大量涌现,新文学从新文化运动中析离

出来自成劲旅;创作队伍日益壮大,作品质量愈来愈高;在大量引进外国文艺思潮和多向探索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不同文学流派。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全国成立的大小文学社团有100多个,出版文学刊物300种以上。它们虽然思想倾向不同,规模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但均主张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是与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革命的先行者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刘半农、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田汉等人积极地译介外国文学。继《新青年》在1918年出刊《易卜生专号》之后,几乎所有比较进步的报刊都发表翻译作品,报道外国文艺思潮。在“五四”后的几年内,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进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有人介绍和试验。当然,并非所有外来思潮都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新文学先驱者中大多数人都力求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出发,去检验和选择外来的东西。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一批文学界的先觉者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视。正是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促进了新文学社团的蜂起;而文学社团蜂起,又进一步促进了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在这一时期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前者是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影响下形成的,后者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影响下聚集起来的。两者的文学主张虽有差别甚至对立,但又不无相通之处,共同为新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现代文学不同流派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的《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而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则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先河。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和发展初期经过了艰难的战斗历程。从1919年到1925年曾粉碎过封建复古派的三次反攻:1919年初对以林纾为代表的老牌守旧分子的斗争,1922年击退了《学衡》派的反扑,1925年开展的反对《甲寅》派的斗争。经过多次较量,复古派遭到惨败,新文学获得胜利,此后虽然也有某些复古的沉渣泛起,但终究难成气候。与此同时,新文学阵线还集中相当力量批判了“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和旧戏曲。

## (二) 第二个阶段(1928—1937年6月)

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崛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第二个十年里,虽然国民党政权为加强思想统治曾作过种种努力,建立党治文化与党治文学,宣称“建立三民主义的新文学”,但却始终形不成中心的理论,创作更从未出世。因此,这一时期决定文学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又称左翼文学运动,以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为中心,以左联成立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和左联成立以后的《拓荒者》(蒋光慈主编),《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主编),《十字街头》(鲁迅主编),《北斗》(丁玲主编),《文学月报》(姚蓬子、周起应主编),《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编辑)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等为基本阵地。后者以左联外的作家为中心,他们在政治上与艺术上具有不同倾向,其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的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与左翼文学运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这

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文学运动,一些文学见解相近者自发地在一起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共同进行活动。其中著名的刊物有《文学》(傅东华、王统照等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季月刊》(巴金、章靳以主编),《文丛月刊》(章靳以主编),《骆驼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编辑),《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萧乾主编),《水星》(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现代》(施蛰存等主编),《新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罗隆基等编辑)。此外,开明书店(叶圣陶、夏丏尊等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巴金等主持),生活书店(邹韬奋等主持)等也是活动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他们之间有关文艺思想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相互竞争,推动着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左翼文学运动迅速发展。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作家首先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并曾引发一场论争。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左联成立第一个课题是传播、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艺运动、文艺创作实践相结合。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胡风、钱杏邨等一批文艺理论家,在革命文艺理论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十年代,进步文艺界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确认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这次讨论涉及了文学语言通俗化、旧形式的利用等问题。鲁迅所提出的必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以促进现代文学自身创造与发展的主张,即是这次讨论的理论成果。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鲁迅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杂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艾育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等优秀作品,标志着现代文学艺术上的日趋成熟。此外,还出现了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劫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着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

这一时期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活动也十分活跃。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和梁宗岱等,都是当时知名的批评家。他们表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印象的批评”与“宽容”的态度,大体上能够概括他们在这—时期文艺批评的基本特点。他们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发展的。这一时期左翼文学除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外,还开展了与“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语派”的论争。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论争时有发生,并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除本时期“革命文学”论争外,在1935—1936年间,还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这场论争的实际结果,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巴金、谢冰心、周瘦鹃、林语堂等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新形势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下一阶段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 (三) 第三个阶段(1937年7月—1949年9月)

在这12年间,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现代文学也在民族解放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发展。由于这一时期全国划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个部分,文学运动呈现复杂的状况,但从整个新文学

运动发展的轨迹看,无论国统区、沦陷区的进步文学,还是解放区文学,都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使文艺思潮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文艺思想斗争此起彼伏,较大的论争有:抗战初期对“抗战无关论”的批判;1940年前后反对“战国策”派的斗争;1939—1941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和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判;1945年前后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剧本的讨论;1945—1949年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论的论争,以及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等等。而其中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有理论意义的一场讨论。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全面论述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问题的同时,多次谈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学的问题。有关的论断主要集中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前著系统地考察了“五四”以来包括新文学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指出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提出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原则等。《讲话》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总结了革命文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方针、政策,完整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讲话》直接指导、培育了解放区文艺,对国统区文艺乃至沦陷区的文艺运动,都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讲话》是最重要的文艺建设理论。四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多数都是围绕着学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组织下开展的。这些论争对当时乃至以后文艺创作与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是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抗战文学和



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前者是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全体进步作家以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创作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后者是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所从事的人民文艺作品的创作。这是现代新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抗战文学创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文艺“为祖国的抗战服务”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信念。接着,戏剧、电影、美术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先后成立。“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对于鼓励作家深入现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也都报告文学化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作家们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逆转,开始了历史的文学思索,对“民族命运”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观察,将爱国主义主题加以扩展和深入,力求使创作具有“史诗性”,产生了一批凝重、博大、具有历史沉重感的作品。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主题与题材大体上沿着前一阶段的开拓继续发展,更集中于两个领域:对现实黑暗王国的诅咒与否定,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在这里,文学用喜剧结束一个时代。总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促进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和时代更紧密的结合。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着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高峰。

同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

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新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这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与中国农民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对话”。正是在这个文学潮流中,涌现出了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季等一大批新型的人民艺术家,产生了小说中的《小二黑结婚》、《荷花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诗歌中的《王贵与李香香》,戏剧中的《白毛女》等新型作品,并创造了多种新的文学样式。所有这些努力与成就都显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向。

对现代文学作出真正系统的历史考察,开始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及其他理论著作,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及他为一些现代文学作品所写的序言及有关论述,茅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及一系列作家论,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及冯雪峰稍后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文学的最初尝试。在此以前发表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同时期出版的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著作,在学术界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四十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论述,更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最初的成果。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出现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普遍存在研究范围缩小,用政治结论代替历史评价与艺术分析的倾向。1978年以后出版的多种集体编著的现代文学史,分别由唐弢与严家炎、林志浩、田仲济与孙昌熙、孙中田等主编。此外还有钱理群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此同时,出现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发展历

史的专著。七十年代,台湾与香港曾先后出版了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

## 二、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 (一) 现代诗歌

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先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该刊于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此后又陆续刊出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新诗,其中标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作为倡导白话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俞平伯、康白清、朱自清、王统照、梁宗岱等纷纷发表新诗。文学研究会以郑振铎、周作人等人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作实力。朱自清的《毁灭》、《踪迹》等诗篇,表现了诗人正视现实的精神。王统照的《这时代》,传达了人间的苦味。冰心的《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表现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这些新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不同侧面传送出“五四”时期思想开放的自由气象。

二十年代,多种新诗流派逐渐形成。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该诗集辑入了诗人的57篇作品(包括序诗),其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灭中寻求新我的诞生,反映了中

华民族进入“现代”的青春热情与愿望。此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出版。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二十年代中期,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组成“新月派”,他们立志创造新诗格律体。闻一多著有《红烛》、《死水》,徐志摩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二十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入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面世。1932年《现代》杂志创刊,在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其实,现代诗派的作品多数借重于象征派,又带新月派的色彩。戴望舒是现代派最重要的诗人,有作品《我的记忆》、《望舒草》等。

三十年代,由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使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发扬。“左联”开展了新诗歌运动,《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发表了许多革命诗歌。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胡也频、洪灵菲、殷夫等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者的形象。殷夫是这一诗潮的第一个代表诗人,他的诗集《孩儿塔》被鲁迅誉为“属于别一世界”的诗。1932年中国诗歌会成立,它是由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四人发起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其刊物为《新诗歌》。它倡导诗的革命内容和大众化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蒲风,其主要作品有《茫茫夜》、《六月流火》。臧克家、艾青在三十年代的出现,是中国新诗成熟的重要体现。臧克家的《烙印》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出版,表明了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诗艺术发展的光辉实绩。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诗发展第二个高潮期。新诗以多样的形式为抗日斗争服务,街头诗、传单诗应运而生,诗歌成了民族解放的战鼓和号角。诗人们多以愤怒而乐观的调子歌赞这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争。田间的《给战斗者》、何其芳的《夜歌》、卞之琳的《慰劳信

集》、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和舒群的《在故乡》，堪称抗战诗歌的代表作。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开了用民歌创作叙事长诗的先河。高兰的《哭亡女苏菲》以个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忧患。抗战期间诗歌队伍有了很大发展，诗歌界积极推行朗诵诗运动。在国统区，有《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大量发表诗作的杂志，吕剑、徐迟、袁水拍、胡风等人创作相当活跃。高兰、冯至、任钧、蒲风等都积极参加了朗诵诗运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街头诗活动，柯仲平、林山、田间、邵子南、史轮等都创作了一些街头诗。此外，严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萧三等也都有丰硕的诗作。

四十年代，新诗继续发展。在解放区，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出现了创作长篇叙事诗高潮。代表作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阮章竞的《圈套》、张志民的《死不着》、李冰的《赵巧儿》等。王希坚、贺敬之、戈壁舟、严辰等也致力于通俗诗歌的写作。在国统区，诗歌的直接社会功能是对腐朽没落事物的揭露与抨击，其主要形式是民谣、小调，代表作有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当时还有“七月”与“九叶”两个诗人群，他们以自由体新诗为基本形式，分别有代表作《白色花》和《九叶集》。

## （二）现代散文

现代散文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它是在吸收外来思潮和接受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形式丰富多样，举凡杂感、短评、随笔、速写、游记、书信、日记、报告、特写等，都可归入它的范畴。现代散文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议论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

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17—1927年)里，首先是议论性散文大量出现并促成了散文文体的自觉发展，继之是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创作的成功，充分显示了新文学建设的实绩。这一方面表现在众多的作者和蔚为大观的作品创作上，另一方面则在于产生了像鲁

迅这样的散文巨匠以及周作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诸散文名家,他们各具风格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散文初创期的实力和不同流派作家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最早出现的现代散文是“五四”前《新青年》发表的议论性散文,如李大钊的《青春》和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等。1918年4月《新青年》增设“随感录”栏目,陆续发表了许多攻击封建痼疾和评论时弊的杂文。此后,《每周评论》、《新社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杂感”专栏,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杂文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青年》作家群,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以鲁迅为代表。

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奠基人。他的早期杂文后来收入《热风》和《坟》里。这些作品尖锐泼辣,带有广泛的社会批评的特点。它们所开创的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鲁迅的散文作品多集中创作发表于1924—1926年间,1927年集结出版有散文诗集《野草》和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

周作人也是《新青年》、《语丝》一派的主要作者。他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概念,提倡“艺术性”的抒情、叙事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他又形成一套散文理论,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二十年代在周作人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作家。

冰心的抒情散文创作开始于“五四”时期,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朱自清是擅写漂亮精致散文的大家,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背影》、《执政府大屠杀记》等具有多种文字风格,都是散文名篇。郁达夫是创造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并不多,但却以

真挚坦率的达情显怀、暴露赤裸的自剖和随情而文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有《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瞿秋白于1920年秋应聘赴俄考察,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问世。

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等较有影响的社团中,因而,除上述散文名家外,还有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郑振铎、俞平伯、庐隐、郭沫若、徐志摩、丰子恺、梁遇春等重要散文作家。

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28—1937年6月)里,散文创作继续发展。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作家坚持“五四”开创的现代散文发展方向,继承散文战斗性及其艺术风格多样化的传统,批评有违于新文学优秀传统的不良倾向,不断推动散文发展走向更加宽阔成熟的道路。这个时期创作实践的结果是:一方面,迅速地反映时代脉搏的杂文和报告文学获得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潮;另一方面,随着散文多种功能的强调,散文的体式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报告文学、传记等叙事性文体,日记体、游记体的散文,科学小品、历史小品等的倡导与试验,使这一时期散文样式日趋完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联”的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出现了杂文热潮。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有了很大发展,其思想、艺术特质都达到时代高峰,可以用“鲁迅风”加以概括。他先后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出版。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并对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这一时期也写了一些杂文,如《民族的灵魂》、《王道诗话》等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有一批青年作者写出了成功的作品,象唐弢的《推背集》和《海天集》、徐懋庸的《打杂集》等,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

添了光辉。

自然,杂文的健康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继之又出版《人世间》、《宇宙风》,提倡脱离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批评了这种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进步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体式多样的小品散文。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大都致力于散文的写作,并留下一些名著。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郁达夫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萧红的《商市街》、《桥》,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画廊集》,等等,都是各具风采的散文作品。

三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品颇为作家们所关注。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都是成功的作品。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其中以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尤为出色。

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37年7月—1949年9月)里,散文创作先后出现了两种体裁的繁荣:抗战初期开始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和后来一度高涨起来的杂文。鲁迅虽然已经逝世了,但他的影响日益扩大,不仅杂文在鲁迅旗帜下继续生长,整个散文领域与社会、人民结合得更加紧密,表现现实和民族心灵的大变动,不断发挥其战斗作用。这个时期有一批青年散文家出现,而几乎所有的文坛宿将都在挥笔撰写散文。

抗战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报告文学迅速发展,成为散文的主流。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如《文艺阵地》、《抗战文



艺》、《七月》、《文艺新潮》、《自由中国》、《文学月报》、《文艺战线》等，都以最大篇幅刊登报告文学。同时，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丛刊和专集。比较著名的丛刊有：以群编的《战斗生活丛刊》、《战斗的素描》，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报告丛刊》等。专集有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丘东平的《第七连》，曹白的《呼吸》等。在报告文学作家群的努力下，国统区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如丘东平除《第七连》外，还有《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萧乾的《刘粹刚之死》、《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乐》等。其他较好的作品也数量颇大。它们取材广泛，对抗战时期的敌我斗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作了及时、真实、生动的反映。

1941年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制造政治黑暗，国统区报告文学受到严重压制，而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则始终蓬勃发展。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周而复的《高原短曲》，陈荒煤的《童话》、《一个农民的道路》，丁玲的《陕北风光》，葛陵的《青菜及其他》，以群的《渡漳河》，何其芳的《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冀中边区编印的《冀中一日》，沙汀的《记贺龙》，杨朔的《毛泽东特写》，黄纲的《两个除夕》，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环东北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以周立波、周而复和沙汀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这个时期的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首先是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在号称“孤岛”的上海，以《鲁迅风》为阵地，用杂文同民族敌人战斗，并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在国统区的作者中，郭沫若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杂文作品。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和记叙散文数量较小,但也有一些佳作。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丰子恺的《辞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缪崇群的《废墟集》、《夏虫集》、《石屏随笔》、《眷眷草》,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

### (三)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一种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它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7—1927年)。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是鲁迅。他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这是现代小说的第一篇作品。此后,他在1918—1925年连续写了25篇小说,先后集结成《呐喊》和《彷徨》<sup>①</sup>。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之作,其中有《孔乙己》、《药》、《祝福》、《风波》、《伤逝》等名作,而《阿Q正传》则是代表时代艺术高峰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小说形式,它以密切关心现实人生问题为主要特征。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提出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这个重大问题。叶绍钧、汪敬熙、罗家伦、冰心、王统照等人的一些小说,都以反封建的态度,直面人生和社会的现实问题。二十年代,小说创作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及其他文学社团的涌现,为小说创作勃兴提供了基础。在普遍的全国性的文学活动中,一批优秀小说作品相继问世,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经常在上面发表小说作品的有鲁迅、冰心、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庐隐、王鲁彦、主任叔、孙良工等。他们遵循“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每写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流派。正是在鲁迅的带动下,1923

<sup>①</sup> 鲁迅在1918年至1922年连续创作15篇小说,于1923年8月编为小说集《呐喊》(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11篇,则收入1926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彷徨》。

年以后文坛出现了“乡土小说”的创作高潮,其中著名的作者有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其主要作者都集中于创造社,如郁达夫、郭沫若等。他们吸引了一些人,并逐渐形成一股创作“自叙传”抒情小说潮流。这股潮流极盛于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但延续较久,直至二十年代末。

第二个阶段(1928—1937年6月)。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在该时期,除鲁迅之外,茅盾、老舍、巴金等作家先后雄踞文坛,他们的代表作也相继问世。特别是以“左联”文学为核心的左翼小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流。“左联”以外的作家也在各派竞争中促使小说的繁荣。据统计,这一时期仅中长篇小说,就不下150部,短篇小说更是琳琅满目。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和讨论,一些作家(如蒋光慈、洪灵菲、柔石、胡也频等)开始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左联”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如丁玲的心理小说,张天翼、沙汀的暴露、讽刺小说,艾芜、萧红的抒情小说等,在当时受到社会的重视。茅盾的《子夜》出版,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鲁迅在《理水》、《非攻》等作品中,用新的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当时,“左联”青年作家群中还有蒋牧良、吴组缃、叶紫、萧军、舒群、端木蕻良、丘东平、周文、草明、欧阳山、荒煤、奚如等。

“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也因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在小说创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名著,它们与《子夜》等作品一起,将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出现了像叶绍钧的《倪焕之》,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王统照的《山雨》,鲁彦的《愤怒的乡村》以及罗叔的《生人妻》等一批重要作品。三十年代的“京派”小说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

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作品。在上海,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中心,聚集着杜衡、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一批作家,被称为上海滩上的中国现代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感觉派”小说。

第三个阶段(1937年7月—1949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首先是抗战小说的蜂起。当时由谊社主编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两个短篇集,以及沙汀、艾芜等集体撰写的《华北的烽火》和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集中反映了抗战初期小说创作的风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和红萝卜》、吴组缃的《山洪》(原名《鸭嘴涝》)、齐同的《新生代》等,是抗战小说中有成就的代表作。

张天翼和沙汀于1938年初,分别以《华威先生》和《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两篇小说,揭开了以暴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为内容的讽刺小说的序幕。此后,讽刺暴露性小说的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沙汀的《淘金记》等,便是此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钱钟书、师陀、萧红、张恨水、李劫人等,都以优秀的讽刺小说作品,汇入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潮。战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如钱钟书的《围城》,姚雪垠的《长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都以独特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短篇小说方面,沙汀、艾芜的一些作品,无论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小说作者,如骆宾基、于逢、王西彦、碧野、郁茹、张爱玲、汪曾祺等,他们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也曾引起艺术界的注意。

这一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小说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许多老作家如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且出现了康濯、马烽、西戎、马加、孔厥、柳青、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一批新作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代表一个时代高峰的赵树理、孙犁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出现了《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高干大》、《种谷记》等一批杰出的小说作品。特别是

在农村题材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解放区的小说对于“五四”以来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 (四) 现代戏剧文学

现代戏剧的主要剧种是话剧。它发源于欧洲,二十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辛亥革命后,欧阳予倩、侯镜若等在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大力开展新剧演出活动。从此,现代新剧逐渐流行。

话剧作为重要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1917年至1949年间,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始创阶段(1917—1927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新青年》在1917—1918年间曾开展“旧剧评议”,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对中国传统旧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传统旧戏所包含的封建性内容。钱玄同攻击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主张“全数扫除”,建立“西洋派的戏”。周作人、傅斯年也力主排斥旧戏。胡适更坚决赞成引进西方戏剧。于是,以《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为开端,迅速形成了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全国有20多种报刊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莎士比亚等世界名家的剧作。这些都对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21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各种戏剧团体、刊物,形成了多种戏剧流派的雏形。其中,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社提倡“社会写实剧”、“爱美剧”,而创造社、南国社的作家则偏于“主情”性,提倡浪漫主义戏剧,但他们的创作都同样表现出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

启蒙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色,都同样注重创作的时代性和社会意义,这构成了二十年代戏剧思想与创作的主流。

这个时期的剧作浸润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色。1919年3月胡适发表的《终身大事》,是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剧作。此后有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和《幽兰女士》、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汪仲贤的《好儿子》、洪深的《赵阎王》、郑伯奇的《抗争》等剧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剧作也在中国产生,如田汉的《咖啡店之夜》、《午饭之前》和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荃》等。

发展阶段(1927—1937年)。密切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在反动压迫日趋严酷的形势下,进步戏剧家们坚持了反帝反封建传统。1929年,在上海同时活跃着五大剧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应云卫领导的上海戏剧协社、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以及陈白尘领导的摩登剧社。同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艺术》和《沙仑》两种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要求剧家用戏剧艺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服务,促进了各剧团活动向进步方向发展。1930年,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以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将主要力量转向移动演剧,面向工、农、学,开展大众化剧运。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自动解散,不久,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与此同时,革命戏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有蓬勃的发展。

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不断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李健吾等。他们所著的一些优秀作品,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日臻成熟。其代表作有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夏衍的

《赛金花》、《自由魂》、《上海屋檐下》，田汉的《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欧阳予倩的《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同住的三家人》等。

成熟阶段（1937—1949年）。现代戏剧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空前的繁荣。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剧作者协会即集体创作了《保卫芦沟桥》，由此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的序幕。“八一三”上海战事紧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敌后，宣传动员民众，配合抗日斗争。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民族战场。1941—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喻今的历史剧高潮。1944年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这个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这一阶段出版的戏剧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剧作家们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下，形成了多种创作潮流，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如在抗战的第一年，便创作和演出了各种抗日剧作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陈鲤庭、崔嵬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此后，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有田汉的《秋声赋》、洪深的《包得行》、曹禺的《蜕变》、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宋之的的《雾重庆》、于伶的《夜上海》和《长夜行》等，都是激动人心的剧作。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剧作，首先当推曹禺的《北京人》，它是曹氏戏剧创作的又一高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话剧发展的民族化倾向。在历史剧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郭沫若，其主要作品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它们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桃花扇》，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一起，构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的高峰。在

讽刺喜剧创作上,代表作有陈白尘的《魔窟》、《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等。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较重要的剧作有田汉的《丽人行》、茅盾的《清明前后》、于伶等的《清流万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

这一阶段革命根据地的戏剧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 第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下)

---

## 第一节 政治学

---

### 一、概述

#### (一) 学科发展概况

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过程。最初是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点被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在中国形成并发展起来。

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发端于辛亥革命前后。此前,中国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其突出代表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移译名著和著书立说,介绍和倡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设计中国的资本主义蓝图,对封建政治学说产生了极大冲击。孙中山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制订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政治学说,成为设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论依据。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基本问题是要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君主政治改造为民主政治,建立以“主权属于全

体国民”思想为指导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是民权主义理论的实政化和制度化,是孙中山吸收西方权力分立学说和中国的科举及监察制度中的精髓而提出的。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依据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而制订的,它是中国现代政治学说与国家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将西方政治学说中国化的一次尝试。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年),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民国以后,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国内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讲授政治学课程。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颇有影响;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对中国政治制度论述甚详。此外,三十年代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政治学教材。学者们还对政治学进行了分科研究,涉及的领域有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中国宪政等方面。在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介绍方面,也有诸多成绩。其中有对名著的翻译,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民约论》、康德的《实用主义法学》等;也有对近代新思潮的介绍,如杜威的实用主义,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思想,罗素的政治学说等。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会员80余人。1935年6月,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中心议题有三个:外交策略、改进吏治、大学政治学课程的标准。1936年7月召开第二届年会,议题有四个:宪法草案、地方行政、外交策略、非常时期国民的政治教育。1942年11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三届年会,主要议题是: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问题、政治建设机构问题。至1949年,全国200所高校中,约有40所设有政治学系,基本上按西方模式教学,存在着偏重引进、介绍的特点。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大钊率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有些学者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此后,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分别在上海、广州等地主讲过政治学课程,其内容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邓初民在1929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1932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了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毛泽东的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解放区的传播更为迅速,《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成了“干部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活动的理论指南。

## （二）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多种政治思想并存和斗争的复杂局面。这是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激烈的民族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从阶级意义和社会影响来看,主要有四种政治思想,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三民主义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资产阶级及各种改

良主义主张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新专制主义思想。它们体现了现代“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选择、不同前途。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结局表明,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体,并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还出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其代表是在日本的刘师培,在法国的吴稚晖、李石曾,在国内的刘师复。他们宣传废除一切政府和国家,主张绝对自由,用暗杀和同盟罢工手段,建立无政府社会。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窃夺。袁世凯死后,政权又为北洋军阀所控制。他们继续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大搞尊孔读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人。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文学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李大钊最早提出学习俄国革命的主张。他在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带来了空前的思想解放,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西方各种思潮大量传入中国,鼓吹新思潮的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社会上兴起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人们纷纷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

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这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是进行三民主义宣传和绘制建设中国的蓝图。“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也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即与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些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主要是：（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24—1927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政治主张和戴季陶主义。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反对国共合作，攻击马克思主义，破坏革命。在统一战线外部，出现了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想，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此后，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陆续发表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文章。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政权。蒋介石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实际上却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髓。他反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宣扬封建伦理政治,推行“一党政治”,提倡“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他大搞反动立法,建立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思想界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些托派分子如严灵峰、任曙等和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抹煞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把中国社会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具体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始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与此同时,国民党发生分化,其中邓演达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提出“平民革命”和“建立平民政权”的主张。宋庆龄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1932年底,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杨铨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事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活动。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提出以乡村教育、改造、建设来解决中国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改良主义理论;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提出保障人权、实行法制、开放民主等改良主义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罪行辩护。中国出现了抗日和叛国投敌两种势力,展开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如何抗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蒋介石集团却奉行片面抗战、消极抗战路线；其他民主党派则提出抗日救亡、要求民主的主张，汪精卫叛国投敌，并炮制卖国主义理论。四十年代，中国各党派围绕中国前途和命运展开论战。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蒋介石在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攻击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有些人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此外，还有以林同济、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叶青的伪“三民主义”理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围绕中国应该“建什么国”的问题，全国各阶级、政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方针，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于1946年一手包办“制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妄图以根本法形式确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方针，并规定了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1949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主张实行中间路线，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蒋介石集团统治的结束，中间路线的破产。

## 二、政治学说、思想

### (一) 三民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由孙中山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制订,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主要部分。它经历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近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是独立和民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代表农民阶级,曾提出过朴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纲领。资产阶级维新派也尝试过变法的实践。他们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都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摒除了农民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皇权主义,突破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藩篱,认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制订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主张。1894年,孙中山创建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举起“振兴中华”的旗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sup>①</sup>的革命主张。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该会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政治纲领。<sup>②</sup>接着,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建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12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讲述了三民主义,同时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为核心的共和国方案。至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确立。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84页。



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就是民族主义,反满是他在当时倡导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振兴中华,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兴中会宣言指出,“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中国面临着“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厄运。“维持国体”则是奋斗的主旨。孙中山将“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的基本原因。如何实行民族主义?他认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救亡图存。孙中山还提出“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在三民主义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共和制度,是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孙中山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指出它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剥夺人民起码的权利,推行文化钳制政策。清朝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sup>①</sup>。他认为实现民权主义的主要途径是“国民革命”。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他为民国设计出一幅简图:“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sup>②</sup>他对政体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构思,主要内容为“革命程序论”、“政党和政党政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和“五权宪法论”。既阐述了民主建政的过程和原则,又规划了政府的结构。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其内容“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在土地问题上,他主张平均地权,土地国有。采取“核定天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7页。

下地价”、“照价收税”和“涨价归公”的措施,使由于社会进步而造成的土地增值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人民不必再纳赋税,地主不得“坐享其成”而致“垄断”。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吸取和借鉴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和英国思想家J.密尔的观点。关于资本问题,他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孙中山与时俱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sup>①</sup>，“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sup>②</sup>。在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肆虐,对西方所谓民权制度作了某些批判,认为必须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以防止欧美现行制度的流弊。在民生主义中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

<sup>①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

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创立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基本内容,一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二是以长期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和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点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三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确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sup>①</sup>。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即现时的民主革命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还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民主革命,应当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1925年1月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问题,但对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还缺乏正确的方针指导。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考察和分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应该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指明了方向,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接着,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1928年6—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1928年,毛泽东经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集中全党的智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总结创建根据地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发展成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条革命道路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党的工作应以农村为中心;二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革命战争。同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1964年重新发表

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初步论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年底,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和会议总结,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要求全党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反对投降主义;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要又联合又斗争,不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此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阐明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进一步论证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至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规定整风的主要任

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毛泽东的上述著作和党的其他整风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1945年4—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报告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sup>①</sup>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政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三) 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之一,形成于十七至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开始成为主要政治思潮。自由主义者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维护个性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权,国家应实行代议制民主,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国家为保护公民权应实行法治与分权。自由主义者期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主张改革、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激进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维新派严复、梁启超等人翻译和撰写了许多著作<sup>①</sup>,广泛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以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兴起于“五四”时期。它吸收了欧美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它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提倡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但反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反对以强力推翻旧政权,期望和平地取得民主和自由;主张国家独立,但不赞成

---

<sup>①</sup> 如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密尔的《群己权界论》,以及自己撰写的《政治讲义》;梁启超的《卢梭学案》、《斯宾诺莎学案》、《乐利主义泰斗边沁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学说》和《新民说》等文章。

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幻想通过发展经济、改良政治的办法，解除民族压迫；它虽然吸取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但主要不是继承十八世纪欧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接受了十九世纪以后西方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提倡改良主义；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为依据来观察中国社会，提出改造中国的主张，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民主性思想，带有民本主义色彩。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代表人物。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张东荪、胡适等人。1917年张东荪发表《贤人政治》一文，主张实行精英政治。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办法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张东荪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理论观点。他接连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等文章，系统阐述其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接着，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并发挥张东荪的观点。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缺乏真正之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劳动者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sup>①</sup>，实际上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胡适在1919年4月发表《实验主义》长文，构成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否认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主张社会的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

<sup>①</sup> 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基尔特是英文 Guild 的译音，意为行会。



义。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其“基本观念”是: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权力;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sup>①</sup>。他把“好政府”作为改革当时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认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对于现实政治问题,他主张南北议和,召集国会完成宪法,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减少议员,等等。事实证明,这种改良主义要求,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关注的焦点主要转向政治制度方面。潘大道、王世杰、高一涵、楼桐孙等人纷纷发表论著,探讨理想政治制度的形式,如代议制、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联邦制等。这种讨论是针对军阀专制提出的,仍未摆脱书斋式的研究,脱离实际政治斗争,远离人民大众,充分暴露了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保守性。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出现了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他们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公开向国民党提出保障人权、实行法治、开放民主政治的要求,并发起“人权运动”。人权派的出现是当时国内政治矛盾深化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者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矛盾的产物。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所谓《保障人权命令》。此前,国民党在3月开过“三中全会”,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法定”手续,通过了《“训政纲领”追认案》。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各项民主权利皆被剥夺,生命财产安全亦无保障,大批“政治犯”被捕入狱,国内政治陷入空前黑暗。但国民政府却还要标榜“保障人权”。对此,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揭露了国民党侵犯人权的真面目,同时发出“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以保障人权”的呼吁。此文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国内外报纸争

<sup>①</sup> 胡适:《好政府主义》,《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7日。

相转载。接着,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中国的共产》、《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后来,他们将有关文章辑成《人权论集》出版。他们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号召人们“努力起来争回人权”,指出“争人权的人先争法治,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sup>①</sup>。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权思想作了系统地阐述,宣扬“人权至上”,国家法律必须为保障人权服务;反对党治、人治、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场人权运动历时3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人权派表示在国事危亡的时候,对国民党政政府让步,不与当局为难。此间,他们还就“中国现状问题”、“怎样解决中国问题”展开了讨论。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提出中国要铲除和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根本的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sup>②</sup>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是爱国者,他们在民族主义旗帜下集合,在政治上合作,组织上集结,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这一时期,国统区于1939年和1944年先后有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其目标都是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并非都是自由主义者,但其目标却与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相一致,并有一批自由主义者在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自由主义者与其他“中间派”开始集结起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如1939年成立的统一同志会,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民主统一,

<sup>①</sup>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年7月10日。

<sup>②</sup>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2卷10号,1929年12月10日。

和平建国”的口号,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强调“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sup>①</sup>。为此,要实行议会制,“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司法绝对独立”;建立健全文官制度;“国家实行普选制度”;要主权在民,“国家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实行军队国家化,“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现役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等<sup>②</sup>。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表明自由主义思潮已经以政党政纲的形式出现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伯钧、罗隆基即提出组织第三大党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大党,其重要作用一是缓冲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防止内战;二是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中国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才有解决的途径。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中有些领袖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主张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主张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施复亮、张东荪等曾接连著文,倡导这一路线。“中间路线”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集成,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幻想,它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

#### (四) 蒋介石的政治思想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他是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后在奉化、宁波等地学习,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考入

<sup>①</sup>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sup>②</sup>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61—462页。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团长。1917年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的第二次护法运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登舰侍护,取得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赴俄考察。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这时,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仍表示拥护。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蒋介石率部两次东征和镇压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因战功卓著而获得声誉。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越来越暴露其反共面目。1926年3月20日,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表明其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打击、排斥共产党人,攫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他坚持要迁都南昌,冀图直接控制政权;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暴徒制造反共事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他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但由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立场,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持独裁、反共、内战方针。1948年任“总统”。1949年他所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被人民革命所推翻,率残部退逃台湾省。1975年在台北病故。

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国大陆达22年,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政治思

想也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蒋介石先后发表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1928年)、《为什么要有党》(1929年)、《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年)、《大学之道》(1934年)、《政治的道理》(1939年)、《行的道理》(1939年)、《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政程序》(1939年)、《中国之命运》(1943年)等一系列演说和著作,阐述了其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观点。

1. 反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三种政治理论,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sup>①</sup>。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国家及统治权系与阶级合为一体。以为昔日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此种主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sup>②</sup>。民主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它是英美等国的,不免“效能迟钝”,但“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就会产生“纷乱”<sup>③</sup>。他强调“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sup>④</sup>。正是在蒋介石的鼓动下,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狂潮。

2. 封建的伦理政治论。蒋介石把《大学》、《中庸》、《礼运》视为中国政治哲学之宝典,由此将政治的要旨归为:其一,“中国的政治哲

---

<sup>①②③④</sup> 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2—573页。

学,一切皆以人为本”<sup>①</sup>。他说:“大学之道所说的三纲:(一)明明德,(二)亲民,(三)止于至善,都离不开人。”<sup>②</sup>明德是存乎人的本性之中;亲民的对象是人;止于至善,即择善固执,也要由人从学、问、思、辨、行中去把握,止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也都是以人为本。《礼运》说“讲信修睦”,是说人对人应有的关系;“选贤与能”的贤能是人。《中庸》所说的“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都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sup>③</sup>。其二,政治以伦理为基础。他认为,“伦理就是人对人的正当态度,人类行为的当然法则”<sup>④</sup>。中国古代完美的政治哲学,大部分就是伦理哲学。他反对重法治轻伦理,认为伦理的价值高于法治。“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才是最完美的政治理想”<sup>⑤</sup>。其三,政治的目的在使人人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sup>⑥</sup>。他认为,政治原在满足人类之生活要求,所以政治之最终理想,即为民生。政治的内容总起来讲,不外“国计民生”。现代政治建设,必须以民生为首要。

3. 国家“有机体”论。蒋介石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它全部的机构,就是一个完整生命全体,每个国民就构成这个生命的一个细胞。他说,国家有人民、土地、主权三个躯体要素,此外还有国魂,即“全民族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以“有机体”国家论为据,强调“国家至上”,认为国家高于社会个人,领袖是国家意志的代表,要求国民全体之思想,绝对集中于“国家至上”旗帜下。在内外政策上,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和“军令、政令统一”,都是以“剿共”为前提的。

4. “一党政治”论。蒋介石说:“‘以党治国’,就是以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以三民主义治国”。“现在这时代,是一个党的时代,

①②③④⑤⑥ 《蒋介石文集》第1册,台湾印行,1963年,第110—117页。

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时代”<sup>①</sup>。“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够再许第二个党起来攻击国民党……我们只有承认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出来”，“来攻击革命的国民党”<sup>②</sup>。国民党是“团结同志，实行革命的总机关”，“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sup>③</sup>

为了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蒋介石在党政军系统建立各种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等，用恐怖手段残酷地镇压异己；同时又在全国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如进行“党化教育”、“军人精神教育”、“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等，提倡盲从和愚民哲学。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标榜“诚”，说“诚是革命的原动力”。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等同于静止的修养之道，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宣扬力行哲学，说：“本此一‘诚’，发为大‘智’，大‘仁’，大‘勇’，力行三民主义。”

#### （五）中国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欧洲。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中国留日、留法的部分学生所接受，并附会中国古代的“老庄”、“大同”、“均平”等思想，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 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2页。

② 同上书，第563页。

③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第一阶段(1901—1911年),是无政府主义在国外留学生中传播的阶段。1907年以前,马君武、马叙伦、张继、章太炎等把无政府主义作为反对清政府的一种手段加以宣传。1903年张继编译《无政府主义》一书出版。1905年在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用很多篇幅介绍无政府主义,提倡“破坏主义”,鼓吹个人冒险,用暗杀手段推翻政府。1907年6月,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刊行《天义报》(后改为《衡报》)<sup>①</sup>,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鼓吹“无政府革命”,废除政府,消灭国家,废兵废财;提倡“人类均力说”,“人人兼学众艺”,设“老幼栖息所”,实现“苦乐均平”;提出“运动农工为本位”的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倡“女界革命”。同年,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组织“新世纪社”,创办《新世纪》周刊<sup>②</sup>等,形成又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他们在介绍M. A. 巴枯宁、J. A. 克鲁泡特金、P. J. 蒲鲁东等人学说的同时,主要宣扬以下观点:“进化即革命”,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终极目标;要用各种手段革命,强调暗杀是“积极之行为”;反对婚姻、家庭,宣扬“三纲革命”;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这些派别对当时正在酝酿的反清革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其流传范围仍局限于国外的留学生中。

第二阶段(1912—1917年),是无政府主义在国内比较系统地进行理论传播阶段。1912年夏,刘师复在广州成立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接着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

<sup>①</sup> 《天义报》半月刊,1907年6月10日创刊。主持人为刘师培。共出19期,1908年3月停刊。《衡报》,旬刊,刘师培主编,1908年4月28日创刊,共出11期。

<sup>②</sup> 《新世纪》周刊,1907年6月22日在巴黎创刊,由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编辑。共出版121期,1910年5月21日停刊。此外,“新世纪”社还出版过《新世纪丛书》、《新世纪杂刊》等。



社”，发表宣言书，制定了行动纲领——《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并先后出版《晦鸣录》<sup>①</sup>、《民声》<sup>②</sup>、《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无政府浅说》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在刘师复的积极活动下，常熟、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范围扩散到一些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中，如广州的“理发工会”和“茶后工会”。刘师复等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形成其无政府主义学说。主要观点是：（1）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刘师复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sup>③</sup>。“‘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sup>④</sup>。“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sup>⑤</sup>。（2）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建立政党。刘师复在提倡暗杀的同时，也极力宣扬工团主义所主张的总同盟罢工，称它是社会革命的唯一“利器”。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绝对自由，反对管理，不应当像其他政党一样，由少数党魁组织机关，制定党纲，招人入党。（3）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刘师复散布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言论。他称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半面的社会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比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更为圆满的社会主义。他视马克思主义为仇敌，并将其与反动政府相提并论。

① 《晦鸣录》周刊，1913年8月创刊，由师复主编，广州晦鸣学舍刊行，只出2期。

② 《晦鸣录》、《民声》从第3期起改名《民声》，在澳门出版，从第5期起迁往上海出版。先后由师复、林君复、梁冰弦等人主持，1916年11月出至第29期停刊。1921年又在广州复刊，由梁冰弦、区声白主持，出至第34期，再次停刊。

③④⑤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第三阶段(1917—1923年),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及分化的阶段。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团体90多个,刊物70多种。根据各个团体及刊物的政治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实社”和“进化社”为代表社团,《进化》月刊为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派别。他们声称要继承师复之志,奉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为经典,宣布《进化》的任务是:“鼓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及联合主义,以倡导人群进化”<sup>①</sup>。强调他们的学说是“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二是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称“新虚无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以“奋斗社”为组织,出版《奋斗》旬刊。该派宣扬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史观,鼓吹“真正革命”、“宇宙革命”,“几时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的时候”,才算归宿<sup>②</sup>。三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郑佩刚、李卓等。该派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派互有交叉。主要插手工人运动,鼓吹工会高于一切、管理一切,反对政治斗争,主张“直接行动”,即“总同盟罢工”。

各派无政府主义者虽存在思想理论上的种种分歧,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却完全一致。无政府主义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思想障碍与组织障碍。因此,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先驱》、《少年》等刊物,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

① 黄凌霜,《师复主义》,《进化》第1卷第3号(《师复纪念号》),1919年3月。

②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8页。

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通过斗争，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混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化。

第四阶段(1924—1927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衰落的阶段。这一时期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团体都已分化瓦解，只有民锋社、民钟社、工余社和它们的刊物《民锋》、《民钟》、《工余》等仍然存在，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同盟还有一些活动。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因其反苏、反共和社会改良主义面目的彻底暴露而急剧下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思想派别，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彻底破产。此后，中国仍然有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刊物，但已属个别现象。

---

## 第二节 经济学

---

### 一、概述

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38年间，至少有2000多部经济学著作和100多种经济杂志刊行<sup>①</sup>，这个数字可以说明该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概况。现将已查出的1947部经济专著列表如下：

---

<sup>①</sup> 这些著作和杂志中的绝大多数是在“五四”以后出版的；其杂志数字不包括各高校校刊、各部门的官方刊物和一些综合性杂志。——参见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385页。

年 份	总数	自编	翻译	年 份	总数	自编	翻译
1912—1918	23	16	7	1935—1936	252	161	91
1919—1920	16	11	5	1937—1938	161	110	51
1921—1922	22	15	7	1939—1940	106	75	31
1923—1924	24	12	12	1941—1942	59	45	14
1925—1926	71	56	15	1943—1944	77	68	9
1927—1928	95	64	31	1945—1946	101	87	14
1929—1930	282	184	98	1947—1948	181	148	33
1931—1932	174	118	56	1949	56	29	27
1933—1934	247	179	68				
	954	655	299		993	723	270
				总计	1947	1378	569

注：此表所据资料出自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386页。

由上可见，其一，全部经济著作的数量，“五四”以后较“五四”以前有很大的增长，到三十年代前后达到最高峰，表明“五四”运动对经济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二，经济著作中的自撰部分与翻译部分相比，前者数量始终超过后者（有些时期甚至成倍或数倍超过后者），这种状况改变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著作以翻译为主的局面，表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步入新的时期。

在本时期出版的经济著作中，有社会主义经济著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著作）和资产阶级经济著作之区别，前者约220多部，后者有1700多部。现将这些著作按各学科刊行数量分列如下：

财政学	189(包括1901—1919年的14部)	工业经济	115
经济原理	188(包括1901—1919年的2部)	统计学	81

货币学	177(包括 1901—1919 年的 2 部)	经济史	81
会计学	159	银行学	58
农业经济	147	国内贸易	57
合作	119	国际贸易	49
外国学说史	49	经济地理	16
人口问题	24	经济政策	16
中国经济思想史	20	其他	147

注：此表所据资料出自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0—391 页。

这些各门学科著作的分类数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科学发展的一般状况。

此外，本时期经济杂志的出版也一直呈上升趋势。据查，从 1919 到 1949 年间，专门性经济杂志（除统计期刊外）约为 112 种，按其创刊年代分：二十年代有 10 种；三十年代有 48 种；四十年代有 53 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刊物有：上海“中国经济学社”<sup>①</sup> 于 1930 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重庆出版的《新经济》半月刊（1938—1945 年）、香港刊行的《财政评论》（1939—1948 年）、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主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季刊》（1932—1937 年）、陶希圣主持的《食货半月刊》（1934—1937 年）和中国合作学社主办的《合作月刊》（1929—1943 年）等。

## 二、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 （一）资产阶级基本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sup>①</sup> “中国经济学社”1932 年夏在上海成立，由刘大钧和马寅初发起和主持。是我国第一个经济学术团体。该社每年开年会一次，即出版《年刊》。1930 年改出《经济学季刊》，由李权时主编。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译述出版经济学理论的著作 20 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严复翻译的《原富》(1902 年上海南公学译书院出版),而国人自撰的经济学原理书籍则很少<sup>①</sup>,基本上是“译而不述”。

从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国人自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著作日渐增多。据统计,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这类书籍约有 30 本以上<sup>②</sup>。这类书籍从总体上来说,一般质量不高。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确有研究者是少数,能用以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更是极少数。在这类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或较为流行的主要有:刘秉麟所著的《经济学》,从 1925 年至四十年代初再版 10 余次;赵兰坪所著的《经济学》,从 1933—1947 年印行了 26 版;马寅初所著的《经济学概论》自 1943—1948 年也增订过 7 版;徐毓柝所著的《当代经济理论》(1948 年出版),对马歇尔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如凯恩斯、庇古、希克斯、张伯伦、罗宾逊等人的理论)作了系统和概括的介绍。

从 1929 年起,国内学者除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有较多著述外,

---

① 仅见李佐庭的《经济学》(1907 年)、熊元翰的《经济学》(1911 年)。又蔡承焕的《经济学概论》(1906 年),因未见原书,不知是否编译之作。

② 如:杨庆同、王海初:《经济学浅说》(1927 年);丁振一:《经济学概论》(1927 年);胡祖同:《经济提要》(1928 年);郭威信:《经济学概要》(1929 年);肖纯锦:《经济学》(1929 年);刘秉麟:《经济学》(1925 年);李权时:《经济学原理》(1930 年);杨明山:《新兴经济学》(1930 年);马哲民:《社会经济学概论》(1931 年);王建祖:《季德经济学》(1931 年);邹敬芳:《经济学概论》(1931 年)、《经济学原理》(1933 年);唐庆增:《经济学概论》(1933 年);黄曦峰:《经济学大纲》(1933 年);黄宪章:《经济学概论》(1934 年);朱九通:《经济概论》(1935 年);吴世瑞:《经济学原理》(1935 年);王达文:《经济学读本》(1940 年);周伯康:《经济学纲要》(1940 年);马寅初:《经济学概论》(1945 年);朱伯康:《经济学纲要》(1946 年);赵兰坪:《经济学》(1943—1947 年)、《经济学大纲》(1940—1941 年);黄兆栋:《经济学大纲》(1946 年);孙怀仁:《经济学概要》(1948 年);王沿津:《经济学原理》(1948 年);潘源来:《经济学原理》(1948 年)等。

对于若干重要的经济理论范畴也有许多专著和译著发表<sup>①</sup>,表明在引进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

三十年代还有四部经济学工具书出版,具体是:柯柏年主编的《经济学辞典》(1933年)、周宪文主编的《经济学辞典》(1937年)、黄清野主编的《实用经济辞典》(1937年)和何士芳编的《英汉经济辞典》(1934年)。

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经济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人的研究已突破“述而不作”的局限,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例如,赵迺抃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于1930年在纽约出版后,成为有价值的参考书;蒋硕杰的《在投资的宏观动态分析中恢复时间维度的运用》一文,曾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发表,此后他还多次在国外一些著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并为西方名经济学家所引征;张培刚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该校年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并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五十年代该书被美国和拉美一些大学列为教材。

## (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

---

<sup>①</sup> 如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有朱通九著:《经济学研究法》(1930年)、刘絮敖著:《经济学方法论》(1937年)、郑学稼译:《经济历史方法论》(1936年)、柯柏年译:《经济学方法论》(1940年);在价值论方面,有张素民著:《价值论》(1936年)、邹宗儒等译:《价值论概要》(1931年)、杨及玄译:《正统学派价值学说》(1934年);在生产论方面,有李权时著:《生产论》(1929年);在分配论方面,有殷受光著:《分配论 A、B、C》(1929年)、李权时著:《分配论》(1929年)、张素民等译:《分配论》(1933年);在交易与消费方面,有李权时著:《交易论》与《消费论》(1929年);在工资论方面,有朱通九著:《工资论》(1929年)、樊弘著:《工资理论之发展》(1929年);在地租论方面,有郑学稼著:《地租论》(1932年)、王亚南译:《地租思想史》(1931年);在资本与利息方面,有吴应图著:《资本问题》(1929年)和《利息问题》(1930年)、朱剑农著:《新资本原论》(1944年)、赵兰坪著:《资本节制论》(1947年)、曾豫生译:《资本的集中》(1934年);关于经济周期的有李权时著:《商业循环》(1929年)、谷春帆著:《世界经济衰沉之解剖》(1933年)、张梁任著:《景气学》(1934年);关于国民收入的有巫宝三著:《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等。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例如,1903年赵必振译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介绍了马克思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从1905年起,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陆续刊登一些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1912年上海《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译《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译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时期。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先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余工余值说),剖析了资本剥削的实质。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先后发表食力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渊泉(陈溥贤)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9月,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李汉俊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0月,北京《民国》杂志发表了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到日渐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译著,包括少数较重要的哲学译著在内,至少有222部,其中二十年代有48部,三十年代110部,四十年代64部。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本、经济学原理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译著等。

关于经典著作的译本,最突出的成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1930年陈启修翻译了该书第一卷第一分册,1932年潘冬舟译成第一卷第一、二分册。侯外庐从1927年起前后用十年时间译完第一卷和第二、第三卷的大部分,但仅有第一卷译本于1936年出版。吴半农和千家驹也于1934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册译本。1938年



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出版。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都译成中文出版<sup>①</sup>。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陈启修、沈志远、陈望道、王亚南、郭大力、李达、王思华、吴黎平、吴清友、张仲实等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审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中一半是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

- ① 这些著作译本列举如下:马克思:《哥达纲领批评》,熊得山译本,1922年;李春著译本,1925年。马克思:《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译本,1922年。马克思等:《马克思与列宁之农业政策》,刘书宝编译本,1928年。马克思:《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祺译本,1929年。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朱应祺、朱应会译本,1929年;沈志远译本,1948年。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译本,1929年;张申府译本,1932年;青骊译本,1932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刘曼译本,1930年;郭沫若译本,1932年。列宁:《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刘楚平译本,1929年。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之人种由来说》,陆一远译本,1928年。恩格斯:《农民问题》,陆一远译本,1928年。马克思:《哲学之贫困》,杜竹君译本,1929年;许德珩译本,1932年。《马克思论文选》,李一氓译本,1930年。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史纲》,黄思越译本,1929年。恩格斯:《社会进化原理》,刘寄阁译本,1930年。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末》,向省吾译本,1930年;张仲实译本,1949年。马克思:《自由贸易问题》,邹钟隐译,1930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本,1930年;钱铁如译本,1930年。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钱亦石译本,1932年;李一新译本,1932年。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译本,1932年。马克思:《犹太人问题》,郭和译本,1934年。《马、恩论中国》,方乃宜译本,1938年。恩格斯:《史的唯物论》,新汉译本,1938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艾思奇译本,1938年。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本,1938年。《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许涤新译,193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林、王石巍译,1939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郭大力译,1939年。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郭和译本,1939年;吴黎平、刘云台译本,1947年。《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1939年。恩格斯:《〈资本论〉提纲》,何锡麟译,1939年。马克思:《资本生产物的商品》,迪先译,1940年。恩格斯:《英国工人运动》,吴文焘译本,1940年。《〈资本论〉补遗勘误》,郭大力、彭迪先编译,1940年。列宁:《政治经济学教程》,高希圣译本,1946年。列宁:《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曹葆华译本,1948年;焦敏之译本,1949年。《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1949年。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何封等译,1949年。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林若译,1949年。

关于政治经济学译著,据查约有30部。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河上肇著)、《经济科学大纲》(波格达诺夫著)、《经济学入门》(米哈勒夫斯基著)、《政治经济学教程》(奥斯特洛维强诺夫著)、《政治经济教程》(里昂捷也夫著)等著作,它们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之传播,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外,还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加以运用和发展。这种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于他们逐步认识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揭露中国官僚资本的实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构筑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重要著作中。中国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具体分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取得了有意义的科学成果。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此书后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等。

### (三) 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成就

1. 财政学。1912—1949年出版的应用经济学书籍以财政类为最多。据统计,从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共出版了财政著作189部,其中在1919年以前出版的有14部,二十年代有42部,三十年代有86部,四十年代有47部;1935年以前以译本为多,以后则全为国内学者自撰。1924年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出版,流传较广。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本较为畅销的财政学著作,即李权时的《财政学

原理》，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和尹文敬的《财政学》。民国以来的财政史学著作约有 14 部，其中以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和刘不同的《中国财政史》为较佳。

## 2. 货币学和银行学。

货币学。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因此探讨货币问题的论著也就相对较多。据统计，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共出版有关货币学的著作约 175 部，其中以马寅初的《通货新论》、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赵兰坪的《货币学》、王传曾的《现代货币原理》、樊弘的《现代货币学》与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等影响较大。

银行学。民国以来有关银行问题的著述比较少。据统计，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共出版有关银行问题的著作 58 部。其中国内学者自撰的银行学原理约 14 部，<sup>①</sup> 其余是有关中国现实的银行问题的论著。如马寅初的《中华银行论》以及银行史的著作，全汉升著《中国银行制度史》等。

3. 国内国外贸易。民国以来关于国内贸易书籍共有 50 余本，其中国内学者撰写的商业学只有 5 种：周宪文的《商业概论》、侯厚培和侯厚吉的《商业通论》、罗宗善的《商业学》和《商业学大纲》、张英阁和陈文的《最新商业学》。此外，关于商业史的著作有郑行巽的《中国商业史》等。

1912—1949 年出版的有关国际贸易著作约 50 部，其中译作与自撰各占一半。自撰的国际贸易著作共 4 部，其中仅张毓珊的《国际贸易原理》较为充实。关于中国的国际贸易著作，以武埭干的《中国国

---

<sup>①</sup> 如卓定谋：《银行论》（1925 年）；郑行巽：《银行学概要》（1929 年）；陈其鹿：《银行学》（1933 年）；徐钧溪：《银行学概论》（1933 年）和《最新银行论》（1934 年）；蒯世勋：《银行学 ABC》（1934 年）；崔晓岭：《中国银行论》（1926 年）；朱彬元：《银行学》（1935 年）；朱斯煌：《银行经营论》（1939 年）；彭信威：《银行学》（1944 年）；侯厚培等：《银行学》（1946 年）；金天锡等：《银行学》（1948 年）；朱斯煌：《银行概论》（1948 年）；王传曾：《现代银行原理》（1947 年）。

际贸易概论》和何炳贤的《中国的国际贸易》等评价较好。

4. 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本时期有关工业方面的著作约 100 多部,其中工业经济学的专著只有 7 本<sup>①</sup>,较多的是关于工商管理、人事管理等著作。

有关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约有 147 部,其中不仅有农业经济学的著述,还有专门研究土地经济的<sup>②</sup>,而且绝大多数是国内学者自撰的。在当时的农业经济学家中以万国鼎和董时进较有声誉。

5. 人口学。1918 年陈长蘅的《中国人论》出版,这是国人论述现代人口问题的第一部著作。此后,出版了约 30 部这方面的著述,其中国人自撰的有关人口论原理的著作近 20 部<sup>③</sup>。三十年代以后陈达与许仕廉先后以人口学家闻名于世。陈达曾主编北京《晨报》的《人口副刊》,并于 1934 年出版《人口问题》一书。许仕廉的《人口论纲要》于 1944 年出版,亦为当时的人口论名著。

6. 中外经济学说史。本时期刊行的外国经济学说史约有 50 多部,其中大多是译本(以译自日本的为最多,其次是译自美、德、法等

① 译著有:潘念之译:《经营经济学》(1931 年);管怀琮译:《工业经济学概要》(1934 年);熊怀若译:《工业经济概论》(1937 年)。自撰的专著有:彭维基等著:《工业经济》(1930 年);黄开绳著:《工业分析》(1933 年);黄尹略等著:《工业经济》(1933 年);何孝怡著:《经营经济学概要》(1942 年)。

② 这一时期国人自撰的有:黄通著:《农业经济学》(1930 年);童玉民著:《农业经济学》(1935 年);董时进著:《农业经济学》(1933 年);黄绍绪著:《农业概论》(1931 年);吴文暉著:《农业经济论》(1947 年);胡求真著:《农业经济概论》(1941 年);林彦伦著:《农业经济学教程》(1949 年);章植著:《土地经济学》(1930 年);朱剑农著:《土地经济原理》(1947 年)等。

③ 国人自撰的人口论著作有:林毓著:《马尔萨斯人口论》(1926 年);乔启明著:《中国农村与人口问题研究》(1928 年);陈安仁著:《民族主义与人口问题》(1929 年);孙本文著:《人口论 ABC》(1929 年);陈长蘅著:《中国人口总数的新推测》(1929 年);陈天表著:《人口问题研究》(1930 年);许仕廉著:《中国人口问题》(1930 年);侯厚吉编:《世界人口状况》(1930 年);中国社会科学社的《中国人口问题》(1932 年);陶孟和著:《人口问题》(1933 年);陈达著:《人口问题》(1934 年)和《人口变迁的原素》(1934 年);柳象峰著:《现代人口问题》(1934 年);谢邦哲著:《人口问题》(1936 年);许仕廉著:《人口论纲要》(1944 年)等。

国),国人自撰的约有14部。<sup>①</sup>由于这些史著观点、体系差异很大,内容各有侧重,故在这一时期尚无一部学术界公认的名著。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起步较早,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开了运用近代经济学观点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先河。1912年陈焕章著《孔门理财学》,是专事研究某一学派的专著。而正式以经济思想史命名的专著最早为1926年刊行的甘乃光所著《先秦经济思想史》。从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这类专著出版约10多种。<sup>②</sup>

### 三、主要经济学说、理论

#### (一) 民生主义经济学说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为民生主义学说。它包括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制订的经济纲领和他对这些纲领所作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

① 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说史有:邝廖汉等著:《最新经济思潮史》(1922年);安绍芸著:《经济学说史纲要》(1929年);蔡庆宪著:《经济思想小史》(1929年);朱通九著:《近代经济思想史》(1932年);王亚南著:《经济学史》(1933年);沈志远著:《近代经济学说史》(1937年);张毓珊著:《经济思想史》(1937年);周宪文等著:《世界经济学说概要》(1939年);袁贤能著:《经济思想史导言》(1941年);沈志远著:《近代经济学说史纲》(1944年);金天锡著:《经济思想发展史》(1946年);赵迺传著:《欧美经济学史》(1948年);王亚南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949年);邹敬芳著:《西洋经济思想史》(1949年)等。

② 如:李权时著:《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8年);马君武著:《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29年);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1941年);熊梦著:《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唐庆增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1936年);王学文译(田崎仁义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36年);赵丰田著:《晚清五十年的经济思想史》(1939年);李权时著:《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41年);夏炎德著:《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1948年);张心澂著:《周礼财政制度》(年月不详);黄汉著:《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

群众的生命便是”<sup>①</sup>。“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sup>②</sup>。这两个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其实质是要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可是,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sup>③</sup>。这表明孙中山的这种理论是主观社会主义的理论。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渊源来自多方面,有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因素(如“厚民生”、“养民”、“教民”、重农、“贫富均等”等),更多的是吸取西方思想因素(如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化思想等)。他的民生主义是在1896年后流亡海外期间形成的。孙中山后来自述:在这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sup>④</sup>。当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当时还未得到系统阐发。1905年,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纲领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继《〈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一些著述,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分别作了阐述。并且,愈到后来,对民生主义阐释愈多。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孙中山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sup>⑤</sup>。他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论证了土地国有的合理性,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不是劳动产品,而地主占有土地,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霸占,是对社会所

①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② 同上书,第120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页。

有物的侵吞和盗窃。因此，土地不该归个人私有；其次，他认为地租和地价暴涨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地主之力”，地主获取地租及地价增长的利益，完全是“不劳而获”。不过，孙中山把地租、地价的生长看作是革命后才会出现的事情，故而用“平均地权”的办法，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对立；再次，他认为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由地主变来的，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可以“防止”大垄断资本的产生。

孙中山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他主张通过地租收归国有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化。其具体措施是：在革命胜利后，由地主向国家申报自己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价格，国家每年则按其申报价格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约1—2%）；申报后的地价增长部分全部收归国有，并且国家有权随时按申报价格收买其土地。这种平均地权的主张，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和关心，实质上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土地纲领，但它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被剥削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在平均地权中充实了“耕者有其田”的内容，正式宣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sup>①</sup>。这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

民生主义的另一项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早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孙中山就有了节制资本的思想。辛亥革命后他在演讲中经常提到节制资本的问题<sup>②</sup>。1919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原著中的民生主义部分增加了“节制资本”内容。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公开将“节制资本”列为政纲。节制资本的原则可概括为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sup>②</sup> 参见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1912年4月）、《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1912年9月）、《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1912年12月）等讲演。

两个方面,即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宣言”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sup>①</sup>。此后,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采用所得税制来限制私人资本的主张。此外,孙中山还指出“凡于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此即给予私人资本的活动和发展以种种便利条件。可见,节制资本是把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两者结合起来,其实质是借助国家力量,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方面研究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特点和阶级状况,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预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据此进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27年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农村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及土地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农民起来反对地主政权,以及要求土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乃是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斗争。1927年秋至1934年间,毛泽东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着重研究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联合政府》等著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作,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方面,是把操纵国民生计的外国资本和中国大资本收归国家所有,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保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各抗日根据地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6—1949年),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完整地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1.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与政治相一致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三项基本经济政策,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近代中国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支柱。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占有,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sup>①</sup>是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对于工商业,毛泽东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sup>①</sup>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sup>②</sup>

2.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毛泽东又作过一些新阐述。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全会的决议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并分别阐述了构成这一形态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经营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它代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巩固政权的主要物质基础。

合作社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包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78—679页。

括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合作社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部分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助手,是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小生产的主要途径。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这部分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但属现代性经济。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它们一直给以保护。

个体经济,包括个体农业经济、城乡手工业和小商业。个体经济一般利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经营方式分散落后,但人数众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家联合经营的工商企业,是国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要接受国家的管理和计划制约,同时国家又要使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时期各种经济成分都有所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前提。

---

### 第三节 法 学

---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法学与政治学的发展相一致,也是一个多元的发展时期。其中,主要有适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需要的官方法学,有资产阶级法学,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适应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需要,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同时也引进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鸦片战

争时期,以龚自珍、包世臣、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为了“救偏补弊”、“强国御侮”,主张“经世致用”,倡言“更法”,效法西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及男女平等民主思想。洪仁环还写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嗣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模仿英国和日本的体制,主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严复写了《原强》、《辟韩》等文,后来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等著名政治学、法学著作。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影响下,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治”和中国原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糅合起来,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内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法治”。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分化出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改革。清政府迫于人民革命运动,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不得不研究外国法律和修订本国法律。为此翻译外国法律,聘请外国法学家协助修订法律并讲学,派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法律。1906年第一次成立法律学堂,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二十世纪初,清廷下诏“变法”、“预备立宪”,并以“兼取中西”为方针着手修订法律。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任当时修订法律大臣,在传播西方法学思想和改革中国封建法律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他重视法学,推崇法治,认为“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关”;在其所著《沈寄簪先生遗书》及《秋谏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读律校刊记》等著作中,既论述中国古代法律,也介绍西方法律思想。他是“会通中外”,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出发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人。但即使持这种立场,也遭到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的反

对。当时围绕修订法律问题而掀起的“礼、法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封建旧律要不要资产阶级化的问题。沈家本主持修订的法律，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未及实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11日，他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宪法史上仅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文件。《临时约法》共7章56条，确认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对人民权利、义务和国家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限制即将掌权的袁世凯，该约法规定实行内阁制。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3个月，但却颁布了许多有关巩固民主共和制度、保障人权、保护华侨、发展资本主义、革除封建旧习和改革教育的法律、法令，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法律思想。伍廷芳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他通晓西方资产阶级法学，协助孙中山制订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律和法令，尔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著有《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等。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2年4月在北京建立了北洋政府，直至1928年6月才被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迫宣告结束。北洋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独裁政权。它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企图在宪政的伪装下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北洋政府既沿用清末未及颁行的法律，也制定了保护地主买办阶级利益和镇压革命运动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单行法规。以大总统命令发布的特别法，具有高于普通法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北洋政府的独裁性质。此外，经大理院批准适用的判例和解释例，也是北洋政府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1922

年,孙中山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先后发动两次护法战争,均告失败。“五四”运动时期,争取民主与变革法制是整个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号召“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人权治’”,“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封建军阀的法律乃是“维护特权阶级的法律”,进而提出要以革命手段实现法律变革。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李大钊、陈独秀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为地主买办阶级专政辩护的法律观点,剖析了反动法律制度的实质;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标榜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一切法律的观点,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法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为了反帝反军阀,巩固根据地,保护工农利益,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依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律、法令和条例,并对司法制度改革。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采取了西方某些法律形式,制订许多法律,同时强化司法机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由成文法和判例、解释例两部分组成。成文法中包括宪法、民法(包括商事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即所谓“六法”。六法和有关的单行法规汇编在一起,统称《六法全书》。至于判例、解释例,是在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解释例的基础上,作了大量补充而成。它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和成文法的补充。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法制与北洋政府的法制相比,增加了反共的法西斯单行法规、特种刑

事法庭和秘密审判制度。

在这个时期,不少学者对中外法学进行了研究,编译出版了世界各国的宪法、选举法和一些其他法规及法学著作,撰写并出版了一批法学著述,内容涉及各部门法学,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程树德的《九朝律考》和《中国法制史》、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白鹏飞的《行政法总论》以及江庸、王铁崖等关于领事裁判权、租借地问题的论著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法学面临着革旧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其中包含有丰富的人民民主法学思想。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政策》、《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法制。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思想。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为中心,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政治任务。虽然根据地是分散的,各根据地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是统一的,但立法的内容却具有因地制宜的相对独立性;又由于根据地开辟在农村,因此土地立法具有突出的地位。人民民主法制经历了由不成熟、不完善到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十几个革命根据地里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7

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此后又制定了政权组织法规、婚姻法、刑事法规、诉讼法规和法院组织法规等,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在敌后开辟的大小18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它们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本区情况,制定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和多种法规,并且建立了司法机关和诉讼制度。其中,陕甘宁边区是典型的代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边区政权立法的基础和活动准则。陕甘宁边区颁布的单行法规主要有:政权组织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劳动保护条例、婚姻条例、刑事条例、法院组织条例和诉讼条例等。抗日战争时期是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各解放区基本上沿用抗战时期的各种政策法规。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准备按此原则草拟宪法。为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0月颁行《中国土地法大纲》。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大行政区的出现,解放区制定了一批新的政策和法规,例如:大解放区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政权组织条例、土地改革法规、没收官僚资本法令、保护民族工商业法令、镇反政策和刑事法规、婚姻和民事法令等。各大区还先后建立和调整了司法审判制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创造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如法制建设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并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保障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保障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法基本原则;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依靠群众,就地审判,人民陪审和民主调解的审判制度等。这些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法制所继承与发扬。



这一时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和进步的法学家,也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批判中国古代封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法律思想,提出人民法制的观点。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法治,在法庭上多次为被捕的革命志士辩护,揭露国民党的非法的黑暗审判。1946年到1949年间,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撕毁各党派政治协商的协议,批判国民党一党制造的反动宪法,参加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斗争,为中国新法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少贡献。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国民党的全部法律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违反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必须全部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严肃批判了反映剥削阶级意识的旧法观点和旧法作风,提出了人民法制的原则和制度。以后,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

## 第四节 史 学

---

### 一、概 述

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9月,中国历史学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旧史学日趋衰落;资产阶级新史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和发展,代表着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

和趋势。纵观该时期的史学发展,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也可依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

这一时期虽然有封建史学的回潮,但决定史学基本面貌的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新史学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它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思想,批判封建历史观,批判“君史”,提倡“民史”,批判墨守古训、脱离实际的治学方法。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都曾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初步提出和论证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指出中国封建正史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君史”,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而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找出历史演变的规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梁启超的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创立的真正开端。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最先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接着,夏曾佑运用“新史学”理论,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sup>①</sup>,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学观点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稍后,王国维用实证论,即所谓“两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的大量古代史料与书面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相印证,在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开创了用甲骨文、金文解释中国古史的新途径。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

<sup>①</sup> 该书于1904年至1906年分三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它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印出版。

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理,并发表一些体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史著。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等人,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刘师培的史著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呼吁反对清朝贵族统治。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政治上大搞复辟帝制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思潮,给当时的史学以严重的影响,一度出现了封建旧史学的回潮。1914年袁世凯允准设立清史馆,聘众多清朝遗老和旧史家修纂《清史稿》<sup>①</sup>。该稿采用封建正统史观和“正史”体例来编撰,借以对抗资产阶级“新史学”。一些封建史家也与此相呼应,坚持用封建史观进行私家修史,或者刊印清季以来修成的史书。这时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政治上表现倒退,史学思想上也不如以前激进,表现了一定的软弱性。然而,历史的前进终究是不可逆转的。自1915年起,随着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对封建史学的再批判又展开了新的篇章。通过这场斗争,封建史学更趋没落,资产阶级史学中涌现出新的流派和新的发展局面,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 (二)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7年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并不断向前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传播。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历史科学的论文,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

<sup>①</sup> 该书于1927年写成初稿。赵尔巽主编。共五二九卷(原稿为五三九卷)。

“史学要论”等课程,出版了《史学要论》等著作。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介绍,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书稿,同时还写了许多有关中外历史的著述。此外,蔡和森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进化史》,瞿秋白发表了《社会科学概论》,系统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当时,为了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还开展了工农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并出版了刘少奇、朱少连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等著作。

在这一时期,一般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学者,继续抨击封建史学,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并在思想文化史研究和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如何炳松翻译和讲授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历史统计学》、《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涉及了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方面;胡适把实用主义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对以疑经、疑古思想开拓古史研究起了促进作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活动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新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进了中国古史的研究。当然,由于阶级的偏见,他们在史观和史论上,一方面展开对封建主义史观的批判,一方面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三) 第三阶段:1928年至1937年6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理论界和历史界为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为时达10年之久。论战的参加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有中国托派,有“新生命”派,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论

战,广泛宣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讨论了各种历史问题,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批驳了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和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错误观点,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步理出中国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脉络。在此期间,我国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进程的著作。此后,他又相继写出研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专著多种。吕振羽在1934—1937年,写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此外,在近代史和革命史方面,有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华岗的《大革命史》、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史》等著作问世。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裴文中、贾兰坡、李济、梁思永等对此多有贡献,使中国考古学体系初步形成。其次是对汉晋竹木简、敦煌宝藏、明清档案的整理,以及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多采的资料。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学者,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对推动历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扩大研究领域,在通史、断代史、专史和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作。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孟森的《明清史讲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都是影响较大的著作。

世界史的研究与翻译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开展。梁思成、向达等译的〔英〕H. G. Wells:《世界史纲》最有影响。另外还有谭建常译〔美〕Buell:《欧洲战后十年史》,姚莘农译〔美〕J. H. Hayes, P. T. Moon 合著的《近世世界史》,吴蠡甫、徐崇铎等译〔美〕Hayes、Moon 合著《中古世界史》等。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历史著作,有何炳松的《近世欧洲史》、张仲和的《西史纲要》、王纯一的《西洋史要》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而资产阶级史学队伍则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有的以研究历史为名,专事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有的鼓吹历史发展外力论,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辩护。大多数正直的史学家则继续在史料整理、史学著述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关头,坚持民族气节,发扬爱国传统,有的还逐渐接近或倾向唯物史观,成为民主战士。

#### (四) 第四阶段: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

这一时期中国史坛的主要状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迅速发展;史学界开展了以宣传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为主题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史观、买办史学、民生史观、“战国策”派和复古主义史学等进行了批判。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研究工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

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sup>①</sup>。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发、关于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重要问题的论述,对于指导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日益壮大,并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史学理论方面,相继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在社会史方面,有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郭沫若著有《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杜国庠著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在近现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稿》等。此外,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上也取得重要成就,出版了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原则。

这一时期,身居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一些学者也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虽然写史的观点与方法多有不同,但多数是以宣传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为宗旨的。在通史方面,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金毓黻的《中国史》、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在近代史方面,有陈安仁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李絜非的《中国近世史》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当时影响最大,书中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乎国家兴亡的观点。在断代史、专史、专题研究方面,有吕思勉的《先秦史》、《秦汉史》和《隋唐五代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等等,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世界史的研究与翻译也有较大发展。有刘启革译的〔美〕Hayes、Moon、Wayland 合著的《世界通史》、唐子长编《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王鹤仪的《二次大战简史》、程浩的《近世世界史简编》等。

在这一时期,剧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有着明显的反映。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形势需要,史学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与流派,即以秋泽修二为代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史论、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买办化史观,以及所谓民生史观、复古主义思潮和“战国策”派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和理论工作者开展了对这些反动思潮的批判,为团结抗战和民主建国扫清了障碍。

## 二、史观、史论、史派

### (一)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1873—1929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从“经世致用”的要求出发,提出编著新“国史”和“民史”,反对封建“君史”的主张。1901年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翌年又发表了《新史学》,提倡“史界革命”,初步论述了中国资产



阶级“新史学”理论。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史地研究的著述。二十年代他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历史统计学》(1922年)、《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逐步系统完善了他的史学理论体系。此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等论著中,也反映出他的史学观点。主要有:

一是倡言“史界革命”,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与改造。梁启超从充分肯定史学的政治作用出发,认为中国应来一次“史界革命”。他指出中国封建史学有四弊二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因为作史的目的只是为统治者“资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这完全是历代统治者、“霸者与霸者之奴隶”,为了保住一家的私利,“缘饰附会”,辗转伪造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二十四史的本纪列传,不过是无数“墓志铭”的合集,犹如“乱堆错落”的海岸之石一样,显不出群体进化的规律。“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中国封建正史,只是以往历史的刻板记录,其叙述和研究不能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根本不能“经世致用”。“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样的旧史根本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不仅不能“益民智”,反成为“耗民智”的工具。由以上“四弊”复产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sup>①</sup>。他指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认为这样的封建正史，中国人“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二是主张以进化论与因果律指导历史研究，认为研究历史在于求得进化之公理。梁启超说，新史学不仅要“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还必须“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

<sup>①</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282页。

进步”“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因此,新史学的任务,就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之源泉也。”这是中国学者运用社会进化论,对历史以及历史学的目的、任务、意义所作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

他指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人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但总的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愈变愈进步。据此,他认为,旧史学那种“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正是从历史的进化观点出发,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秦朝以前)、中世(秦汉至清乾隆)、近世(乾隆以后)三个历史阶段。又把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的发展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西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晚清)等七个时期。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梁启超并未将历史进化的观点贯彻到底,后来,他不仅对历史因果律产生怀疑,甚至倒退到历史循环论了。

三是宣扬英雄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梁启超历史观的核心是英雄史观。他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sup>①</sup>。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英雄

<sup>①</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sup>①</sup>他一方面强调古今中外的历史是少数伟人所创造,而且说,英雄伟人的“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另一方面又注意到“无名英雄”的历史作用,称“无名英雄,是造英雄之英雄”。并认为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这种带有折衷主义色彩的观点,虽然较之地主阶级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有着明显的进步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梁启超还把当时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搬到历史研究中来。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关系,“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因此,只有地理与人民相结合,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他把地理与历史的关系,比作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他正是据此来解释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中的许多现象,甚至把伟人的性行归诸于地理之影响。

四是在关于史学家的修养、史学方法论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梁启超认为一个史家应具备“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即要实事求是,绝对忠于历史的真相,力戒“夸大”、“附会”和“武断”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要博、约结合,专精和涉猎并进,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专深研究;要养成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学会由整体到局部、由个别到一般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方法;敢于怀疑,勇于创新,“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学会史学论著的写作方法,善于组织和驾驭材料,做到剪裁得体,详略恰当;要加强文采的修养,使文词“简洁”、“飞动”,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

<sup>①</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梁启超推崇“归纳研究法”，提倡“历史统计学”，同时还对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历史专题的选取与研究、各种专史的写作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可供后人借鉴的见解。

## (二) 王国维的治史理论和方法

王国维(1877—1927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他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治学东西文化，主要从事哲学、文学和教育的研究，并写了不少评介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著作；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罗的影响下，“尽弃前学”，转治经史之学。他治学严谨，规模宏伟，在古文字、古器物、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殷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等方面，均有深诣创获，取得了巨大成就。其著作有60余种<sup>①</sup>，大部分收入《观堂集林》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是和他的治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分不开的。他生长在中小商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里，自幼受父教，治举子业，治骈散文、古今体诗，刻苦努力。青年时代开始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向往维新，趋向“新学”。后来到上海《时务报》馆充校对，并入日本人执教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近代科学。嗣后在各地教书，主讲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同时研读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辛亥革命后，他在转治经史之学时，能博采中西治学之长，并且把近代西方的实证论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结合起来，作为其治学、考史、证史的主要立论依据。

王国维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只是在“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就是一切以“别真伪”为标准。因此，他提出研究历史“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

<sup>①</sup> 王国维的著述，据1927年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有62种。1928年罗振玉编成《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凡四集；1940年又由商务印书馆编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收43种，一〇四卷。

的主张,并把这一主张贯穿在自己全部学术研究活动之中。

王国维治经史之学,重心在治古史。他提出“古书不可泥”,反对墨守古说,但又不轻疑古,要求对古书资料进行独立思考,既不做排斥古籍的疑古派,也不做按主观要求篡改古籍的托古改制派。这里的关键是“得其真”、“得其实”。因而在方法上采取了以实证史,以史考实。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重视“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新发现的甲骨文字、殷周金文、汉晋简牍和六朝唐人所书卷轴等古代文物。他充分运用这些新出现的材料,把地下文献和古书互相印证,互相补充,既可以旧释新,又可以新释旧,扩大了古史的史料范围,为古史考证开拓了新的途径,开创了一个新方法,取得了古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个方法,王国维自称“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sup>①</sup>。又说:“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拙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sup>②</sup>。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论和中国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有机结合。它强调以充足的资料证明史事的真伪,去说明“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代表。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崭新的方法,在研读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

<sup>①</sup>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

<sup>②</sup> 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

史,以金文证周史,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写出了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文。他的治史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颇有影响。

### (三) 胡适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

胡适(1891—1962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他自幼受汉学传统熏陶。1904—1910年间在上海求学,受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崇信进化论。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撰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4月发表《实验主义》长文,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12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井田辨》(1920年)、《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1921年)、《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1926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1946年)等著述,反复阐述了他的历史观、治史观点和方法论。

胡适的历史观、治史观点和方法论,主要来源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吸取了赫胥黎的怀疑精神,还融入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鼓吹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他说“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成长的”<sup>①</sup>,人类社会“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社会的“解放与改造”,不是“笼统”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改造”,这才是“真进化”<sup>②</sup>。他认为,辩证法主张通过“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矛

<sup>①</sup> 《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44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35页。

盾对立斗争,使社会发生突变性的飞跃,是不可取的。因此,他主张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胡适还宣扬偶然论,认为社会事件都是纯粹偶然发生的,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说: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sup>①</sup>

胡适主张多元论的历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虽然承认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但却反对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他认为,“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社会历史现象当然有“经济的原因”,但是必须“承认思想知识等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自称其多元的历史观“就是秃头的历史观”。<sup>②</sup>

胡适特别注重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他称实用主义为实验主义,认为这“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sup>③</sup>。他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sup>④</sup>。这种方法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是科学试验的态度,二是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就是“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東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sup>⑤</sup>。所谓“试验的态度”或“实验的方法”,就是“(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sup>⑥</sup>。后来,他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

① 《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636页。

②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③ 《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第410页。

④ 同上书第2集第3卷,第99页。

⑤⑥ 同上书第1集第2卷,第535页。

小心的求证”。并说这是治学的方法。此中包括疑难、假设、求证三项内容，“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胡适十分赞赏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的名言，将其作为方法论加以提倡。

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他认为史学“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sup>①</sup>。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的。他提倡“整理国故”，说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在古史研究中，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并对考订史料和解释历史提出一整套方法程序。此外，胡适还对史学研究说过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例如他主张重视甲骨文、金文及古器物的研究；应当将社会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学，以便扩大材料的范围，等等。

胡适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方法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科学性。由于胡适重视方法论，并把它具体运用到政治、历史、文学、教育等各学术研究领域，因而在学术界有比较广泛的影响。运用这种方法，胡适在《红楼梦》、《西游记》等小说考证，禅宗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水经注》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些受胡适方法论影响的学者在史学研究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1919—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点是唯物史观。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学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开始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对建

<sup>①</sup>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页。



立历史科学理论体系作了尝试性的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李大钊(1889—1927年)是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1918年7月以后,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1919年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后,他写了许多史论文章,散见于《新青年》等杂志。同时,他还在大学里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他评述了自十六世纪以来鲍丹(法国)、鲁雷(法国)、韦柯(意大利)、孟德斯鸠(法国)、孔道西(法国)、圣西门(法国)等人的历史思想,阐明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的价值。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他多年史学研究的结晶。这是一部史学概论,全书共分六节:(1)什么是历史;(2)什么是历史学;(3)历史学的系统;(4)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5)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6)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sup>①</sup>。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书中指出,进步的史学研究者应在新史观指导下,把旧历史一一“重作”、“改作”。

在这一时期,结合历史研究注重宣传唯物史观的还有蔡和森、李达等人。蔡和森(1895—1931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就认真研读了法文本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1年回国后,任《向导》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他根据恩格斯原著的精神,参照世界历史资料,撰写了《社会进化史》,并于1924年由民智书局出版。全书分三篇,即“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3—765页。

进化”，外加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李达(1890—1966年)的《现代社会学》于1926年出版，他自己称此书是“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指出社会学者“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逆测将来”<sup>①</sup>。全书共18章，除具有概论性的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外，其他各章分别论述了“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问题。

第二阶段：从1927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为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进行系统的研究，撰写了一批开拓性的史学著作，探索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体系，其深刻意义是成功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适合中国国情。

郭沫若(1892—1978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1930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他公开申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sup>②</sup>。他通过对古代典籍文献、甲骨文、金文、地下文物等的考证、研究，确认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论述了中国古代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序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符合，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吕振羽(1900—1980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sup>②</sup>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于1934年出版。作者根据恩格斯、摩尔根所揭示的远古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大胆使用古文献中神话传说的记载,并印证所能见到的出土器物,把中国原始社会的各阶段及其内部结构,勾画出一个系统的轮廓。此项成果突破了胡适等人“东周以前无史”和神秘化了的三皇五帝的旧说,填补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1936年他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确认殷代是奴隶制社会,首创“西周封建说”。

李达在1929年连续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识》等专著出版。前著援引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对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著由“社会进化之原理”、“现代社会之解剖”、“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和“世界之将来”五篇组成。书中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民族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何干之在1936—1937年撰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专著,系统清理了论战中的各家各派观点,并作了评论,阐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在社会史论战中,翦伯赞(1898—1968年)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关于阶级社会构成之基本诸问题》、《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文。这些文章力图阐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探索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并批判了“封建主义破灭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等理论。吴泽写了《殷代经济研究》、《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中国先阶级社会的崩灭》等文,进一步阐述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论,批判了中国奴隶社会“空白”论。邓拓(1912—1966年)写了《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

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的问题》、《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文,认为中国社会经过奴隶制和封建制,不同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说法;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是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驳斥了中国近代为“资本主义社会”说和中国进化的“外烁论”等观点。

此外,在论战中,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王学文等,撰写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而其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则尤其突出。

首先,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建树,以及关于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概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号召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sup>①</sup>。他还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sup>②</sup> 这些分析讲清了历史科学的目的和意义。

毛泽东强调,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08页。

史。立场,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是一般的原理;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在研究问题时,要尽量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对材料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加以科学的分析与综合,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的结论。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很多精辟论述。为了克服机械唯物论,他注意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阐明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其中,关于“反作用”的提法,对于研究社会变动时期的历史尤为重要。在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他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界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阶级分析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要遇事先作一定的阶级估量,对各阶级的地位和态度进行分析。与此相关,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①</sup>

毛泽东对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也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中国经过了原始社会以后,也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则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这种起义和战争终归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在近代史方面,毛泽东着重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分析,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sup>①</sup>;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②</sup>;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其次,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

翦伯赞于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全书分列绪论、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问题等题目,结合中国史的研究,展开全面论述,即不仅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诸因素的相互关系,批判了神学、玄学、实用主义等“史的观念论”和机械唯物论,还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一般原理及其在各社会形态中的状况,总结了中国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哲学就是供研究作工具的方法论;历史学的任务是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范畴的产物;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它“不仅是胜利者的凯歌,而是胜利者的凯歌与失败者的悲号之交响”,也不在歌颂某一民族或阶级的胜利,而同时必须指出失败的民族或阶级之历史的遭遇,等等<sup>③</sup>。此外,翦伯赞还写了《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略论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② 同上书,第632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集史料的方法》、《略论中国史研究》等史学理论文章。

吕振羽于1942年出版了批判性的史论文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者依据唯物史观,对日本秋泽修二散布的军国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指出秋泽是“日本法西斯的宣传员”和“喇叭手”,其所著《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是“集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的错误的观点之大成的中国史论”<sup>①</sup>。秋泽宣扬的中国社会“停滞性”惟有通过外力才能打破的观点,是为日本侵略张目的。与此同时,作者对中国社会史诸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一一作了深入的探讨。

#### (五) “古史辨”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新史学阵营中出现的一个学派,因出版《古史辨》文集而得名,其代表人物是顾颉刚。该学派以疑古相崇尚,对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顾颉刚(1893—1980年)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做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身不辍,计约200册,400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20册。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1926年,顾颉刚把几年来讨论的文章和信函编辑成《古史辨》第1册,由北平朴社印行。正是在该书的

<sup>①</sup>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页。

推动下,史学界一些史家参与其间,出现了“古史辨”派。《古史辨》从1926年至1941年共出7册<sup>①</sup>。第1、2、3、5册为顾颉刚编辑,第4、6册为罗根泽编辑,第7册为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350篇,计325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该书体现了二十年代崛起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展示了该派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研究中做出的成绩。

顾颉刚认为,辩证古史的目的“一是推翻伪史,二是帮助明了真史”。在古史传说的辨伪方面,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要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一件史事“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sup>②</sup>。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sup>③</sup>。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古史辨”派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

<sup>①</sup>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书7册。

<sup>②</sup>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99—101页。



料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

### （六）“史科学派”

史科学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傅斯年，而其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该派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称“史科学派”。<sup>①</sup>

傅斯年(1896—1950年)于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影响颇广。1919年夏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并以此为中心,开展了史科学派的活动。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大致酝酿于1924—1926年留德期间,形成于1927年以后。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景仰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在当代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他如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对他也有影响。他在留学德国时期,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1795—1886年)和莫田森(1817—1903年)。因之,在学术上,他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

傅斯年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史学便是史科学”,“史学本是史科学”。“历史学不是著史”,而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

---

<sup>①</sup> 又:因该派主张“考史而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学派,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因其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实,故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等。

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sup>①</sup>。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sup>②</sup>他提出历史学研究的三个标准是:(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sup>③</sup>。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倡所谓“科学的比较手段”,具体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以对勘互证: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著录对外国的著录;近人的记述对远人的记述;不经意的遗留对经意的遗留;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对著文。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发现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的相互勘补”。

傅斯年的代表作主要有《考古学的新方法》、《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考》、《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贯彻“史料学派”的宗旨和原则,延揽人才,做出不少成绩。一是收购以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主体的文献史料,并做了分类和编写简目工作,推动了史料搜集活动;二是开展了大规模的殷墟考古发掘,为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特别是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日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三是广泛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如李济、陈寅恪、董作宾等,并以他们为核心,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四是组织出版了一批书刊,向学术界展示了本学派的风格和成果。据统计,从1928年至1950年,该所共印行专刊30种,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

①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

② 《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9月版,第276页。

丛书》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2卷。其中集刊最受学界重视,约有200篇历史类论文。还有若干成果,如董作宾的甲骨学、陈寅恪的隋唐史、劳榦的汉简研究、李济的考古报告等,更示人以典则。

### (七)“战国策”派

该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其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他们于1940年创办《战国策》杂志<sup>①</sup>,后又为重庆《大公报》编辑“战国”副刊<sup>②</sup>,因而被称为“战国策”派。

从1940年4月《战国策》创刊到1942年7月“战国”停刊,是“战国策”派主要活动时期。他们依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和斯本格勒的理论,大肆宣扬唯意志论和唯心史观。其主要思想和观点是:一是权力意志论。他们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混合起来,认为人类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世界统一于人的意志。“意志是宇宙人生的泉源,是推动一切的力量”。“人类意志”创造了人类全部历史,因此“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而“权力意志”就是人类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意志愈是伸张和充分发挥的时候,就是人类生活最精彩的时候<sup>③</sup>。不同的权力意志表现为不同的力,谁有力谁就代表正义,代表真理。“力是一切行动之原,无力便无创造”,“有力才配说理”<sup>④</sup>。在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团体和团体之间,永远需要力量。谁有力量,谁就胜利;谁没力量,谁就要灭亡<sup>⑤</sup>。战争是永远需要的。二是英雄史观。他们提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只有站在这一个立场,我们才能够彻底了解历

① 此刊于1940年4月1日创刊,1941年7月21日出最后一期,中间曾停刊,共出17期。

② 此刊于1941年12月3日创刊,1942年7月1日出最后一期,共出31期。

③⑤ 陈铨:《指环与正义》,重庆《大公报》副刊“战国”第3期,1941年12月17日。

④ 林同济:《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战国策》第17期,1941年7月20日。

史的现象”<sup>①</sup>。他们认为,少数英雄人物是民族的灵魂,是群众的救星。英雄人物“可以随时创造规律,规律绝对不能束缚他们”。“群众要没有英雄,就像一群绵羊,没有牧羊人”<sup>②</sup>。“天才是社会上的领袖,他推动一切,创造一切。然而天才的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力量。天才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力量的表现”<sup>③</sup>。他们主张人们应当像信仰宗教那样去崇拜英雄。认为“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sup>④</sup>。“历史演进最后的目的,就在产生天才,人类的目的,就是在产生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sup>⑤</sup>。在此基础上,“战国策”派还贩卖尼采的种族主义的优生学。他们把人类分成“力人”和“无力人”(或者称“超人”和“普通人”、“智者”和“愚者”、“强者”和“弱者”)。主张从遗传入手,多生殖“力人”,少生殖“无力人”。怎样对待现存的众多的“无力人”?他们提出:“屠杀是一个简单了当的解决办法”。他们甚至把中华民族看作是“奴隶民族”,相反,却把德、意、日法西斯说成是“优等民族”。三是历史重演说。“战国策”派采用德国斯本格勒的“历史形态学”观点,自称其历史观是“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各自成体系的文化均有三个阶段:(1)封建时代,(2)战国时代,(3)大一统帝国时代。目前的中国和世界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战国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趋向是“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演到最后的一阶段,两雄决斗,一死一生,而独霸独尊的‘世界大帝国’告成”<sup>⑥</sup>。“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着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遍布着惊人的可能。惟其无情,所以伟大。惟其伟大,所以无情。”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

①②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③ 陈铨:《狂飚时代的席勒》,《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2月1日。

④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重庆《大公报》副刊“战国”第21期,1942年4月21日。

⑤ 陈铨:《尼采的思想》,《战国策》第7期,1940年7月10日。

⑥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创刊号,1940年4月。

字：“战”。

“战国策”派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他们创办刊物期间。其著作主要是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所载的文章，此外还有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和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

“战国策”派袭取了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中消极的、反动的部分，鼓吹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宣扬形而上学的“历史重演说”，因此当时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的坚决批判。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派别也寿终正寝。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迹。

---

## 第五节 军事学

---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军事学急剧变革和多元发展的时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步加剧，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挑战，导致了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群臣百官纷纷条陈时务，主张仿用西法，创练新军。清政府也认识到“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从而开始全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清政府改革军制，普练新军。与此同时，还宣布废除武举制度，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军事教育系统，翻译出版西方和日本的军事学术著作，编写军事教材，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军事技术、军事制度以及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在这些书籍中，袁世凯等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徐建寅编写的《兵学新书》以及贺忠良编纂的《战法学教科书》，对传

播西方的军事思想,具有较大影响,并在促进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到在中国“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孙中山、黄兴等多次组织武装起义,最后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胜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他对军事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但是,孙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资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最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性,并找到了正确的建军道路,提出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并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军队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他所领导的革命政府曾组建了广东舰队和中山航空队,开办了广东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1924年又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方针,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培养了骨干人才。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学术,受到了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蔡锷、蒋百里等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例如,认为战争是“政略冲突之结果”;主张学习西方的义务兵役制,指出这是“既欲其精,又欲其多”的好制度;主张在军队编制方面应体现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等原则;在政治教育方面,提倡进行军国民教育。蔡锷辑成语录体兵书《曾胡治兵语录》<sup>①</sup>,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编者在每章后加评语,阐发军事思想。

<sup>①</sup> 《曾胡治兵语录》,蔡锷辑,共12章,14000余字。此书是摘取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而成。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这时期,北京政府扩建陆、海、空军,按西方操典进行训练,并以原来清王朝的军事学堂为基础,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保定军官学校。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该校不少毕业生后来也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工作,有些人成为领导和骨干,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时得到健康发展,其标志是提出了建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思想。此后,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逐步趋于反动。从1927年到1949年,除抗日战争时期外,蒋介石独裁政权始终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国民党政府先后组织翻译了日、德、意、英、美等国的许多军事著作,把外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治军作战思想掺杂混用。在军事教育方面,国民党政府将陆军军官教育分为养成和深造两级: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设立步、骑、炮、工等兵科学学校作为养成和深造之间的进修教育。海、空军分别设有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培养技术军官的军医、测量、军需、兵工等学校。抗日战争末期,成立国防研究院,以培养陆、海、空联合作战的高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中华民国时期各军校大多袭用日、德、美等国的军事教材,并聘用一些外籍人员充任教官。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爱国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介绍军事科学研究的成果,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如蒋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一书,着重阐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的思想,说明“战斗力与经济力是不可分的”,“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强兵必先理财”的道理,同时提出长期抗战的主张。杨杰在《国防新论》和《军事与国防》等书中,对当时的国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论述。

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近代以来

的军事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军事实践,无不带有这一社会性质的印记。消除这些印记,并创立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军事思想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必然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中国现代军事学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并且有选择地吸收中国历代的和外国的军事学术成果,通过集体奋斗和创造,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毛泽东等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通过长期战争实践,不仅探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方面的许多普遍性原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其基本内容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反映在各个时期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件、电报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关于战争观及方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



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sup>①</sup>。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的基本方法；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结合物；战争指导者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并善于运用辩证法进行作战指导，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二，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不能把武装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而应指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实践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其三，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建军理论和原则。主要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和根本属性;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主要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这支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推行进步的政治教育,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建立有领导的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自觉执行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其四,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人民战争。它以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游击队,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并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的非武装斗争配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整套以劣势装备的人民武装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核心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的内线持久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具体方针;并及时引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按照“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歼灭敌人,使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在战

略防御阶段,指导全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不断转化敌我力量对比,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战略进攻阶段,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并实施战略迂回包围,歼灭溃逃之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战略进攻阶段歼灭重兵集团的光辉范例。毛泽东还总结提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战争解决)、北平方式(和平改编)和绥远方式(留待以后改编),从而加快战争进程,迅速解放了全国大陆。毛泽东指出,这些战略战术都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只有革命军队才能够有效地运用它。

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人民军队要从低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解放战争时期,要求加强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建设和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运用。此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重视发展新式武器,不断用新的武器和新的技术装备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要努力提高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加强战备,增强作战能力,随时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指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教育训练军队的方法,一方面主要是让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方面通过教导队、学校来培养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在井冈山开办了第一个教导队,尔后相继建立了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和一些随营学校,为军队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教育训练有了发展,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并在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1所分校,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

# 第六章 考古 博物馆 图书馆

---

## 第一节 考 古

---

### 一、概 述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古代遗物和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为历代学者所瞩目。产生于北宋时期的金石之学,到清代已硕果累累,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1920年前后,北京政府聘请外国学者或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帷幕。

1918年,中国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商定,中瑞双方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由瑞典方面提供经费、派遣专家,采集到的标本送瑞典研究后,分存瑞典博物馆和中国地质调查所。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采掘脊椎动物化石时,发现龙骨山遗址,后在瑞典对所挖掘出的化石进行整理,发现一枚人科动物化石,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首次发掘,提出

“仰韶文化”的名称。不久，安特生又去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

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考古学研究机构，是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的考古学研究室。马衡被聘为室主任兼导师。在其主持下，考古学研究室于1923年察看了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和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开始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考古发掘的开始。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出面，邀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并于同一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但不久中国学者就陆续退出了这一活动。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成立。这是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考古团体。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被推举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这项考察活动一直持续到1933年，全部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支付。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1929年，李济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具有现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从1928年到1937年这10年间，中国的考古事业发展较快。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遗址发掘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翻开了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篇章。此期北平研究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等考古团体的广泛田野考

察,发掘出了大批古城遗迹、史前化石和珍贵文物,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考古事业。

从1937年到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学术机关纷纷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各学术团体仍密切配合进行田野考古,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出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出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夏鼐也在甘肃安定县阳洼湾发掘并证明了齐家文化的墓葬。

从1946年到1949年,由于中国战事频繁,田野考古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都进行了认真清理发掘,并对景县封氏墓群出土文物进行了收集。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裴文中于1947—1948年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进行了史前遗址的调查。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现代的考古事业摸索出了一套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出现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发行了自己的考古刊物。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初具规模。

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考古著作有: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年)、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梁思永等:《城子崖》(1934年)、施更昕:《良渚》(1938年)、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这些著作作为中国的考古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显示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尹达于1943年写成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使考古和史学紧密结合起来,收到很好效果。

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郭沫若等新一代学人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1939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年）一书，也是甲骨文研究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缓慢发展，聚集了一批人才，积累了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中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考古工作的主要成就

从1912年至1949年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考古工作以中外合作、团体联合等形式，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几项。

### （一）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早在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便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合作，由中国学者李捷和瑞典学者B. 步林负责，开始进行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即派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同年12月2日，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是世界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随后，裴文中又主持发掘周口店遗址的“鸽子堂”洞穴，首次发现大批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从而确认北京人文化遗存。1933年，裴文中和贾兰坡在发掘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时，发现了三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一部分躯干骨、少量石器和多量装饰品。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标本由

该院负责人保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标本下落不明。

## (二)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从1928年至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平方米。在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为及时发表殷墟发掘简报和研究成果,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了《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在国外深造的考古学专业人才梁思永学成归来,立即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参与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又加入由李济、董作宾分别主持的殷墟第四、五次发掘,发掘方法有较大改进,开始在小屯辨识夯土建筑基址。梁思永等人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他撰写的《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对此进行了论证,成为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1934年,在董作宾主持的殷墟第九次发掘中,发现了“大龟七版”。1934—1935年,梁思永主持了殷墟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主要发掘侯家庄西北冈的10座商代王陵及其附近的上千座“人牲”祭祀坑。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重大发掘。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村一带前后15次发掘中,共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与此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发掘了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 (三)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

1929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后,也积极开展田野考古工作。1930年,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合作,进行了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从1933年开始,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炳昶带领,前往陕西渭河



流域进行周秦遗址考察。1934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地区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和先周、西周及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不久又在西安唐中书省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大明宫、兴庆宫图残石。1935年,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此外,1936年西湖博物馆在杭州良渚镇附近发掘几处史前遗址,发现与龙山文化相似又有显著区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良渚文化”。

#### (四)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工作

从1928年到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其邻近地区进行了考古活动。中国学者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了高昌古城、雅尔湖古城及麹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了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迹,还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中国学者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查并实测了唐北庭都护府遗址。其中最大收获是1930—1931年瑞典学者F. 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汉代烽燧遗址,获简牍1万余支,后大都整理出版。F. 贝格曼后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除以上各团体的考古成就外,其他一些团体和个人也作出了许多贡献。1937年,梁思成等在山西五台县发现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佛光寺大殿。这是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1938年,冯汉骥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调查古代的石棺葬。1938—1939年,吴金鼎在云南大理附近,调查马龙、龙泉、下关、佛顶等史前遗址,以及南诏时期的五华楼、太和城等遗址。1939年,金毓黻等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内清理汉代画像石棺墓,并调查附近的崖墓和石阙。1942—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

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 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主要业绩

伴随着现代考古事业的诞生和发展,文物保护工作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12—1949年,主要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业绩如下。

#### (一)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时期设立的文物管理机构之一,成立于1928年,隶属于大学院。1929年3月,大学院制结束后,改隶教育部。首任主任委员为张继。会址设于上海。1928年设立北平分会、江苏分会和浙江分会等下属机构。1929年迁至北平团城。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1932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职权范围、工作内容、人员编制及所司职责,确认该会按照《古物保存法》行使古物保管职权。1935年11月9日,立法院修正《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其改属于内政部,规定由内政部常务次长任主席,另设常务委员4人,负责处理具体事务。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后,进行了大量有关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的调查,发表了多种具有价值的报告,并且办理了美国人安得思在蒙古私采古物案,奸商盗卖山西天龙山北齐石刻案,山西浑源出土大批古铜器案,私卖安徽寿县出土楚王鼎案,私卖甘肃定西出土莽权、莽衡案等案件。1935年5月,该会编辑出版《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一册。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停止工作。

#### (二) 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现代研究和保护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营造

社,创办于1929年,社长为朱启铃,社址设在北平中山公园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学社南迁,经长沙至昆明,1940年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北平。

学社下设法式和文献两组,法式组主任梁思成,文献组主任刘敦桢。两组分别进行古建筑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社对全国重点古建筑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并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20期及《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单士元著)、《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刘致平编著)、《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等书刊、图录。学社还为各省市重点古建筑的维修勘查提供咨询,进行设计,并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奠定了新中国古建筑学的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第一代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人才。

### (三)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是中国现代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与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其前身为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会址设于北平。该会下设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由工程技术人员及著名古建筑匠师等组成,负责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工程的设计施工事宜,并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两教授为技术顾问。

该委员会自1935—1937年秋共修缮重要古建筑20余处,其中有天坛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北京城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国子监、中南海紫光阁、五塔寺、玉泉山玉峰塔、香山碧云寺罗汉堂等重大保护工程。这些工程的修缮效率高,质量好,并通过修缮工作培养了一批古建筑技术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受时局影响,委员会仅完成了颐和园、北海、鼓楼、大钟寺等处的一般性维修工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立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下设文物整理工程处,承担

古建筑维修技术指导,到1949年完成了颐和园排云殿牌楼重建、北海万佛楼抢修、智化寺修缮等几项工程。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高教会接管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录用一批专业人员,继续从事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到1956年方告结束。

#### (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物保护工作

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下的各根据地和各地方政府,也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39年11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各分区行政专员和各村村长调查保护古物、文献及古迹。1942年,为保护山西赵城广胜寺收藏的金代大藏经免遭日本侵略军的掠夺,八路军战士献出了生命。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随后,相继成立了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南下进军之时,华北人民政府高教会及时印发《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要求部队引起注意,以免古建筑毁于战火。

---

## 第二节 博物馆

---

### 一、概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建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鲁迅亲自参与筹备,并将自己珍存的古物赠送该馆。这是中国现代建立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

1914年,内务部创办北平古物陈列所,主要接收奉天(今沈阳)、热河(今承德)两地的清廷行宫古玩,在北京故宫文华殿、武英殿展出,治格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1915年,江苏省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旧址成立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遗物。

1915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教育、科学博物馆数量迅速增长。继1913年交通大学成立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之后,北京卫生陈列所(191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陈列馆(1916年)、保定教育博物院(1916年)、江西省立教育博物馆(1918年)、天津博物院筹备处(1918年)、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1919年)、教育部教育博物馆(1920年)、岭南大学博物馆(1923年)、江西省立科学博物馆(1925年)、京兆通俗教育馆(1925年)、湖南地质矿产陈列馆(1927年)、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1927年)等相继成立或筹备。

1925年9月,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组成临时董事会,推选李煜瀛为理事长。同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这是一所以历史性建筑及清宫原有珍藏为中心的博物馆。

1927年9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博物馆也多由大学院领导。1928年6月,大学院拟定《施政大纲》,其中包括调查全国博物馆状况、整理现有博物馆、制订博物馆条例、筹设博物院以及培养需要人才等任务。同年冬,取消大学院改称教育部,博物馆仍属社会教育司管辖。

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如1914年内务部制订的《古物陈列章程》与《办事细则》,对博物馆的机构设置、人员分工、文物陈列等都有明确规定,使博物馆工作规范化。同时,博物馆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如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所制各种大小

涵洞模型,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章;国立历史博物馆获美国费城博览会大奖奖状。

1927—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各地陆续建立的博物馆主要有:1927年筹设的河南省博物馆(次年改为民族博物院),广泛收集有关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博物馆;1928年成立的兰州市立博物馆,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博物馆;1928年南京市历史博物馆成立,年末与体育场、图书馆合并为南京市立第一公园图书博物体育馆管理处;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馆成立,分古物、纪念、民俗、自然四部;1929年10月,四川北碚设立峡区博物馆;1929年11月,在杭州西湖博览会基础上筹设浙江西湖博物馆;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建成;1930年,天津美术馆和广西博物馆成立;1934年12月,市立上海博物馆奠基,1935年馆舍落成,1937年1月正式开放。

与此同时,各地还成立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如北平天然博物院(1929年)、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南海艺术陈列所(193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通俗博物馆(1931年)、青岛水族馆(1932年)以及北京国剧陈列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南京国民党史陈列馆等。此外,金宝善、董守义筹建的卫生体育博物馆和林惠祥筹建的厦门人类博物馆等,也在这一时期建成。

据统计,1936年中国博物馆总数达77所,是1928年的7倍多;1936年全国博物馆连同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古物保存所共231所,是1928年的13倍。

在各地各类博物馆纷纷建立的基础上,1933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傅斯年任主任,1936年成立理事会,蔡元培为会长,开始筹设大型的国家博物馆。

这一时期,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业务活动也日趋频繁起来。各地博物馆除举行一些规模不等的陈列展览、参加国际性展览

活动外,还对博物馆学展开了研究,一些关于博物馆学的著作开始问世。如《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及《中国图书馆一览》等书,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陈端志编著的《博物馆学通论》一书影响甚深,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博物馆工作的专著,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水平。为了便于各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一批专业性馆刊开始出现,如《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故宫周刊》(1929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1年)、《美术丛刊》(1931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河南省博物馆馆刊》(1936年)等。

1935年9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该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促进博物馆之间的互助为宗旨,并编印出版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1937—1949年,由于日本大举侵华和中国内战爆发,博物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博物馆损失惨重。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为保护文物,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将部分博物馆内迁。1933年1月,南京行政院密令北平文化学术机构所存文物妥为转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陈列馆等处文物精品分批南迁,不久又分三路西迁四川。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也迁至重庆北碚。但大部分博物馆因事起仓猝而陷入日伪政权之手。在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博物馆,一部分遭到破坏,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军事驻地,如天津广智馆进驻日本宪兵队,南通博物院变为日军的马厩;另一部分则由伪政权接管。在此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及伪“满洲国”,出于各自的需要,分别新建了一些博物馆,如国统区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1939年)、四川省博物馆(1941年)、四川地质调查所陈列馆(1942年)、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1943年);日本在青岛建立的山东产业馆(1938年)、在山西建立的太原博物馆、在武汉建立的“省立古物陈列所”;伪“满洲国”开办

的热河宝物馆(1935年,承德)、“国立博物馆”(1935年,沈阳)、“国立中央博物馆”(1939年,长春)、民俗博物馆(1940年,长春)、南岭动植物园(1940年,长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决定社会教育机构复员四原则,内迁的国立社教机构大部分迁回原址,具有地方性者留设原地。据此,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陆续恢复。同时,教育部和各地有关机关对日伪地区的博物馆进行接收,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博物馆,也得以收回。但不久内战爆发,社会经济文化陷入困境,博物馆事业受到严重影响。到1948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博物馆仅剩10余所。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将故宫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馆存留南京的文物精品,以及中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迁运台湾。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物、博物馆工作。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注意搜集、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倡议、举办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展览工作。

1933年1月,中共中央苏区开始筹建革命博物馆。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签发筹办革命博物馆的启事,向各级政府机关、党组织、部队和各群众团体征集革命文物。1934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成立。1940年7月,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在延安杨家湾落成开放。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在延安附近建立博物馆。8月,由延安地质学会筹建的边区地质陈列馆在文化沟建成,藏展边区的主要岩石矿物及其他标本。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筹设历史博物馆议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也设立了陈列馆或陈列室。1946年第三届参议会又提议建立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市筹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牺牲烈士纪念馆,后改为东北烈士纪念馆,1948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



## 二、主要博物馆

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发展较快。据统计,1936年全国共有博物馆77所,若将其他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和古物保存所等计算在内,总数达231所。这里仅将几所主要博物馆简介如下:

### (一) 南通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虽非建于现代,但在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中却占有重要地位。

南通博物苑于1905年1月14日,由清末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创建,馆址在江苏南通。

1905年1月,张謇迁移荒冢30余座,购地30余亩,动工兴建动植物园。1906年1月,他将兴建中的动植物园规划为博物苑,占地23300平方米,后扩大为71800平方米,后又建中馆、南馆、北楼、东楼四部分。苑内有4个陈列馆,陈列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方面文物与标本。中馆为三开间中式平房,上部加盖一间二层尖顶小楼。南馆平面凸字形,为一座西式二层楼房。北楼为五开间二层中式楼房。东楼为一座X开间中式楼房。苑内种植树木花草,饲养鸟兽,并有亭榭、假山、荷池等园林建筑。1912年改称南通博物苑。

苑内文物、标本来源于各地人士和寺院捐赠、售予。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共收录文物、标本2973号,1933年增至3605号,每号1件至数件不等。自然部分有动、植物活体、标本、化石及矿物。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苑藏文物、标本大部分遭劫掠、破坏和散失。1945年6月—1949年1月,在国民党统治下仍没有起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将其改名为南通博物院。

### (二)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建立,馆址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侧。

故宫为中国明、清两代(1368—1912年)皇宫,又称紫禁城。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逊帝溥仪及亲眷仍居后部“内廷”。1914年在前半部的“外朝”成立了古物陈列所,陈列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移来的文物。1924年冯玉祥逐溥仪出宫,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皇室公私财产。次年,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李煜瀛为会长,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1926—1928年在北洋政府控制下,故宫博物院危在旦夕。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10月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故宫博物院开始走向正规。1933年马衡接任院长。同年,为保护文物免于战祸,择其精要装箱南迁,并在南京建立库房,设立分院,后又避难四川。日伪占领期间,掠走文物达149件之多。1945年北平收复,马衡继任院长,南迁文物大部分运回。1947年9月,古物陈列所合并至故宫博物院。1949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接管。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故宫博物院占地723600平方米,古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1924年计有9.4万余编号117万余件文物,1949年清点有文物78万余件。藏有清代历史文物和奇珍异宝,以及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共分三大类:一类为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如前三殿、后三宫、西六宫、养心殿等多处;一类为历代艺术陈列,开辟有专馆长期或定期展出藏品;一类为与宫廷历史有关文物的专门陈列。故宫博物院出版定期刊物《故宫周刊》、《故宫旬刊》、《史料旬刊》等,还成立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在中国现代博物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东方文化

的宝库和东方文明的结晶。

### （三）北平历史博物馆

北平历史博物馆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开办的博物馆，1912年始建，馆址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

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建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器皿等文物为最初的馆藏。1926年10月，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1929年8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1933年4月，改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旧名。1949年10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8年建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是当时重要的文物收藏机构，收藏有全国各地发掘出的历代珍贵文物。

## 三、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现代博物馆界协会较少，而且大都规模小，人数少，经费紧张。中国博物馆协会是现代中国博物馆界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5年成立，会址设在北平陟山门街3号，原御史衙门内。

1934年，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傅斯年等联络博物馆界，倡议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经历一年多的筹备，1935年9月在北平景山绮望楼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确定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会议推举马衡为会长，袁同礼、翁文灏、朱启铃、叶恭绰、李济等15人为执行委员。协会有团体会员30多个，个人会员120多人。协会还建立了专门委员会，分工负责博物馆学术研究、博物馆建筑和陈列、审查出版博物馆学专著和论文、召开学术讲演会等。

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印发《联合年会的希望》,主张“图书馆博物馆亟应增设,以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且可保存文艺,提高学术”,呼吁“愿政府与社会时锡匡助,以期促进图书馆及博物馆事业”。年会通过了博物馆行政、建筑、陈列、保管、考古发掘、整理档案等决议35项,并决定以“博”字代表“博物馆”三个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协会会务陷于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6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复会。1949年自行解散。

协会出版的刊物有《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仅在香港出刊两期后便停刊。书籍有《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博物馆丛书》等。

---

## 第三节 图书馆

---

### 一、概述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式图书馆已开始零星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等。司长夏曾佑和鲁迅也积极推动图书馆事业的改进与发展。因此,在1912—1919年间,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

公共图书馆一直是现代图书馆的主体。1912年8月,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1913年京师图书馆于宣武门外设立分馆,由于馆舍狭窄,不久关闭。1915年教育部决定将京师图书馆暂移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原址,筹备改组,并向内政部调来文津阁《四库全书》,同时通知各省检送方志、金石拓本。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新馆建成并举行开馆仪式。

1916年,中国第一个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日本病故,他的老师梁启超为纪念他的功绩,在上海建立松坡图书馆,后于1923年迁至北京,以北海快雪堂为松坡第一图书馆,西单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图书馆,梁启超自任馆长。

与此同时,教育部教育司也很重视各省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15年10月,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同年11月又颁布《图书馆规程》11条,规定各省、特区都设图书馆,广集图书,供公众阅览。根据这两个规程,民国初年的公共图书馆,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通俗图书馆,偏重民众使用;普通图书馆,注重学术文献的保存和使用。

据教育部行政纪要第二辑统计,到1918年止,全国共有通俗图书馆286所,其他图书馆(包括普通图书馆、大学和学校图书馆)170余所。北京的通俗图书馆,藏书2.1万多种;天津的通俗图书馆,藏书1.5万多种;江苏的松江通俗图书馆,藏书5万多种;广东的通俗图书馆,藏书3000余种。

普通图书馆除京师图书馆外,著名的还有山东的普通图书馆(原名山东图书馆,1915年改名山东公立图书馆),藏书10万多卷;河南的普通图书馆,1915年开放阅览,藏书1万多卷;江苏的普通图书馆(原名江南图书馆,1912年2月改名江南图书局,1913年7月改名江苏省立图书馆,1919年改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经、史、子、集和丛书;还有安徽、福建、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吉林、云南、辽宁、贵州、黑龙江、甘肃、河北、山西、四川和热河的普通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比较著名的有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12年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09年建立的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公书林;1914年建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1917年开放的北京高师图书馆;还有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南洋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学校图书馆等。

这一时期的专门图书馆主要是一些学术团体和机关的图书馆，有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和外交部图书处等。私立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也开始有所发展，与上述各类图书馆一起，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9—1927年，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全国各类型的图书馆数量日益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图书馆也开始创办起来。

公共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变化较大。京师图书馆1926年10月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在前一段时间没有设立图书馆的省、区，在这段时间内陆续开设。1922年11月江西省立图书馆正式成立；1925年绥远、察哈尔省先后设立图书馆。到1926年，全国除西康省以外，各省都有省立图书馆，且具有相当规模。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25年全国502所图书馆中，公共图书馆达259所。

大学图书馆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1924年，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建成，1926年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建成。北京高师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显著发展。据统计，1927年全国大学图书馆共有70所。

研究机构、行政机关、工商金融机构和宗教团体的图书馆都有增设和扩大。如外交部、交通部的机关图书馆，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北平的政治学会图书馆，浙江及江苏等省的教育会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于1924年落成，1926年正式开馆。中华书局也设有图书馆。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1918年1月，李大钊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在此后四年中，他与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合作，把北平大学图书馆办成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亢慕义斋图书馆也是在李大钊帮助下建立的。1922年邓中夏、黄日葵等将马列主义学说研究会收集的中外文共产主义书刊存

于北京大学藏书室,称之为“亢慕义斋”,即英文“共产主义”一词的译音。1923年,天津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成立了马氏通信图书馆。湖南省在毛泽东努力下也成立了一些具有宣传共产主义性质的图书馆,如湖南通俗教育馆内设的通俗图书馆、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湖南青年图书馆等。在广东,毛泽东设立了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阅报室等。1922年,天津、唐山等地也设立了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工人图书馆。1923年,方志敏等发起成立了南昌平民图书馆。

这一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的兴起,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大事。原先零散的以介绍西方为主的图书馆学研究被集中的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所替代,大批专著、刊物相继问世。据统计,1919—1927年,全国出版图书馆学论著达582种。一批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涌现出来,如马宗荣、沈祖荣、胡庆生、李小缘、洪有丰、裘开明等人。他们在理论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使用的分类法和著录法打下了基础。同时,《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周刊》等刊物也相继创办。

1917—192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文华大学图书科。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协会组织应运而生。1925年创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图书馆协会组织。它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28—1937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

这一时期,国家图书馆共有两所,一所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所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1927年,教育部改为大学院,下设图书馆组管理图书馆事业,并颁布《图书馆条例》15条。1928年,大学

院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央图书馆，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由方家胡同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同年改北京图书馆为北平图书馆，接着又改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直到1936年才正式投入使用，但不久即迁至武汉。

这一时期，各地省立图书馆也有较大发展。1927年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规定“各省区应设图书馆”。从此，省立图书馆发展较快。到抗日战争前夕，全国的省立图书馆达34所，各省都有一所或几所图书馆。

在省立图书馆迅速发展的同时，各市也纷纷建立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于1929年设筹备处，1931年新馆建成开馆。上海市图书馆于1931年开始筹备，1932年正式开放。京师图书馆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威海卫通俗图书馆1931年正式开馆。全国各县政府所在地，也多设有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在1928—1937年有了更大发展。教育部在各大学立案的规定条文中，明确须有完备的图书馆才算合格。根据《申报》1936年的调查，当时藏书超过20万册以上的大学图书馆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金陵大学图书馆五所。藏书15万册至19万册的有：中央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目斋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三所。据统计，当时全国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院校共109所，有图书4493616册，平均每校4万多册。

这一时期，研究机构图书馆、行政机关图书馆以及私立图书馆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图书馆，由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多数被封闭或停止活动。当然，一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图书馆仍然存在。1929年上海通信图书馆被查封，1930年被改组为上海市立流通图书



馆。在爱国人士《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支持下,1932年李公朴创办了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1932年3月,苏维埃地区中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创办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

据统计,1935年和1936年两年是1949年以前中国图书馆最多的年份。据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称:1930年全国有图书馆1468所;1931年有1620所;1935年达2935所。据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6年共有5196所。另据中华图书馆协会调查,1928年国民党统治区共有图书馆622所,1929年发展到1282所,1931年达1527所。上列调查数字表明,从1928—1937年,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是迅速的。

1937—1949年,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事业遭到极大破坏。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立图书馆、汕头市立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昆明西南联大图书馆等先后毁于战火。图书损失更为惨重。根据1938年底中央图书馆估计和教育部的报告,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综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教育年鉴、中华民国大学志及各种教育杂志等报道的40多所图书馆损失情况可知:国立北平图书馆,被新民会提走图书4437册;江苏省立图书馆,所有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37宗及尚未整理出的60多大套档案,全被掠夺一空,另外还有6080册木刻丛书及各省方志被焚毁;广东省立图书馆,图书15639册、日报33种,被敌焚毁,原广雅书局全部典籍被敌运走;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有图书20余万册,落入敌手。在战乱中,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图书散失的数目更大。

尽管战火连绵,损失惨重,各地图书馆人员仍努力工作,继续发展图书馆事业。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迁至重庆后,于1940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图书馆。1943年教育部决定筹办国立西北兰州图书馆,1944年正式开放,1945年因无经费又停办。各省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想方设法,保护了大批图书。

大学图书馆1937年底后多数西迁。西迁者有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国立西南大学图书馆等25个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贵州大学、林森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师范学院等,也建立了图书馆。这些大学图书馆虽然都坚持下来,但书刊数量较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私人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也损失较大。在1945—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图书馆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延安后,开始重视图书收集整理工作。中山图书馆是解放区最大的图书馆,1937年5月成立,经历筹备、遭轰炸和整顿恢复以及扩大建设新馆过程,到1940年7月7日正式开放。鲁迅图书馆原为机关图书馆,1942年正式开放。绥德图书馆也是当时较大的图书馆。解放区的机关团体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影响较大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图书室、中共西北局图书馆、《解放日报》资料室等。红军到达陕北后陆续成立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院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书店图书馆是一种有解放区特色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室和工厂农村的图书馆也很多。伴随着延安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日益发展,1941年7月延安图书馆协会成立。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数量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到1949年,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特点。

## 二、主要图书馆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立、省立、市立以及机关团体和私人设立的图书馆较多。这里只将几个主要图书馆简介如下:

### (一) 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早在中华民国以前就开始筹建,以翰林院、国子监南学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本馆藏,并陆续抽调地方一些重要图书资料,但未及开馆,清即灭亡。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派员继续筹建,将旧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及部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分调入京师图书馆,同年8月开馆。1913年在宣武门外前青厂设分馆。同年9月,馆长江翰呈报教育部批准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18条。1914年2月,教育部派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负责京师图书馆,实际工作由鲁迅负责。10月,因考虑到当时馆址(什刹海广化寺)偏狭,不适应客观需要而暂停开放阅览,宣武门外的分馆照常开放。1916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提出将立案的出版图书送京师图书馆收藏,1917年内务部覆文通行京内外。从此,我国始有图书呈缴制度。在此前后,教育部决定将京师图书馆暂移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原址,筹备改组,并向内政部调来文津阁《四库全书》,同时通知各省检送方志、金石、拓本。经鲁迅和京师图书馆人员的积极准备,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正式举行开馆仪式。开办时的藏书共有5424部,151375卷,52326册。其中善本书880部,28412卷,10822册;阅览书4544部,12296卷,41504册,此外还有敦煌写经8662卷和金石、拓片等珍藏。

1926年10月,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7月,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式归属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后,由方家胡同迁到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1月开馆,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

9月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中海馆称第一馆,北海馆称第二馆。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正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1931年6月,文津街新馆落成,将两馆馆藏荟萃一处,7月1日开放阅览。这时的中文普通藏书有30万册,西文藏书9万册,日文藏书近1万册,中文杂志300余种,报纸2000余册,舆图5000幅,以及金石、拓本、工程模型等特藏。1937年7月以后,该馆被新民会抢走图书4437册。由于战乱,馆址不断变迁,初迁长沙,再迁昆明,与西南联大图书馆合作开展业务到1939年。1943年迁至重庆。

## (二)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成立的藏书楼是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前身,1912年藏书楼改为图书部。1918年,聘任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当时馆址占有第一院大楼一层全部,设有阅览室、书库,只有职员21人。1920年,共有中文图书123651册,西文、日文图书19846册。

李大钊从1918—1922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时,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主张“兼容并蓄”,新旧书籍同时收藏。到1923年9月,藏书达184008册。李大钊还帮助邓中夏等人在图书馆藏书室成立了收集共产主义性质图书的亢慕义斋图书馆。日本占领北平后,20余万册图书落入敌手。大学西迁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入西南联大图书馆,图书损失严重。直到1949年才有新的发展。

## (三) 国立中央图书馆

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设立一所大型图书馆。次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又敦请教育部从速办理。直到1933年1月,教育部才派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4月又派为筹备处主任,同时定在南京沙塘园7号新建民房,并开始工作。

筹备处藏书以教育部拨存的北京教育部图书室藏书和南京教育部图书馆复本图书 47000 册及殿试策千余本为基础,同时接受世界各国学术团体与国内机关学会出版品。1935 年底,藏有中文书籍 96864 册,满蒙藏文书籍 500 册,西文书籍 4659 册,日文及东方文字书籍 653 册,金石拓片 2901 幅,地图、图画、乐谱 466 册,杂志、小册子 20389 册。到 1937 年,所藏中西文书籍及期刊达 18 万册。

1936 年 9 月,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开放阅览。同年,创办了图书馆学杂志《学觚月刊》。

日本侵华期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虽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但仍然坚持工作,还编印了“战时国民知识书目”27 期。迁至重庆后,借用川东师范学校礼堂和租用民房开展业务,特设“抗战文库”,开放阅览,并继续国际交换工作。1940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中央图书馆。1948 年,中央图书馆迁往台湾。

#### (四) 中山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是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前所建立的最大的图书馆。从 1937 年 5 月开始,经历了筹备、遭轰炸和整顿恢复以及扩大建设新馆的过程,到 1940 年 7 月 7 日正式开放。以后又几次扩大规模,到 1941 年,馆内设有材料、编刊、阅读等机构,包括图书室、材料室、参考室、阅报室、杂志室等部门。1942 年,又增开馆外阅览室和少年图书馆,成为延安地区影响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馆长为林伯渠。图书馆成立理事会领导馆务,理事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林彪、成仿吾、陈伯达、艾思奇、周扬等人。由常务理事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王林、胡乔木处理日常事务。

馆内藏书较丰富,不但有政治、经济、哲学等社会科学藏书,还有自然科学的藏书。据 1940 年统计,藏书总量达 5000 余种,1 万多册,收藏的报刊约百种。

### 三、图书馆协会组织

1918年12月成立的北京图书馆协会,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术组织。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李大钊被选为协会的中文书记。但由于没被教育部批准成立,经费无着,不久即停止活动。

1920年成立的全国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图书馆教育组,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联络组织。每届年会邀请图书馆人士参加,讨论有关改进图书馆的问题。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决定成立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图书馆学研究组织。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通过了组织各地图书馆协会的决议。1924和1925年的年会上,再次提出成立图书馆协会的要求。1924年3月,由中华教育改进会请戴志骞发起,成立北平图书馆协会。同年4月,浙江、开封、南阳、天津、上海、南京、江苏等省市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1925年,广州、苏州、济南也成立了图书馆协会。

1925年4月25日,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6月2日,在北京举行了正式成立仪式。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图书馆协会的发展,地方协会几乎遍及全国。

《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明确规定: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协会第一任董事部部长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员主要是国内图书馆及热心图书馆事业的人士,同时还特别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著名人士为名誉会员,如罗振玉、徐世昌、傅增湘、严修、王国维、张元济、陈垣、叶恭绰、叶德辉、李盛铎、董康、张相文、柯劭忞、徐乃昌、陶湘等。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

曾任过协会董事。协会设董事部和执行部,负责会务。董事部部长梁启超,书记袁同礼;执行部部长戴志骞,副部长杜定友、何日章。协会下设分类、编目、索引、出版、图书馆教育五个委员会。

各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图书馆学术活动,包括对图书馆事业的改善与推进、图书馆学术研究、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图书馆专业书刊的编辑与出版、国际学术交流等。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图书馆、书店、新出版图书期刊、善本图书、木刻版本等进行调查,其中关于图书馆方面先后发表过五次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很多有价值的统计数字。此外,各协会还呼吁增设图书馆、增加图书馆经费、保障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与待遇等。

在图书馆业务工作上,中华图书馆协会要求各图书馆加强图书的采访与流通,注意新知识的扩充等。据此,各协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图书馆学研究;一是举办学术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所设的五个专门委员会,侧重在分类、编目、索引、检索等方面进行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活动常因经费困难而受到限制。1928年以前,没开过一次年会。1925年,协会与南京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等合办暑期学校,设立图书馆组,安排短期讲习。各地图书馆协会极为重视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或在本区内大学设立系科,或举办讲座。

中华图书馆协会曾出版研究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及通讯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海图书馆协会1925年创办《图书馆》刊物,1929年又创办《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北京图书馆协会也有自己的会刊。中华图书馆协会还编辑出版了目录学丛书及图书馆学丛书。各地协会组织也有出版协会丛书的。

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学术活动,除与各国图书馆协会交换出版刊物外,还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并派代表出

席了 192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1927 年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和 1929 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大会等，还考察了英、法、德、意等国的图书馆。三十至四十年代，由于战争频繁，致使协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作用力日益衰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地区为加强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促进图书馆工作的发展，于 1941 年 7 月 20 日，成立了延安图书馆协会。会址在中山图书馆内。协会成立以后，组织延安地区图书馆工作者开展了许多业务活动。首先，通过全体会员对延安各级各类图书馆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当时调查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图书馆的藏书有 10.8 万余册。其次，了解各图书馆情况，帮助提高工作质量，组织各种工作会议，进行业务学习和研究活动。1941 年 10 月，为迎接第二届边区参议会发起的募集图书运动，发出募集图书万册、扩大边区文化事业的号召。1942 年 2 月 8 日，协会召开了第二届会员大会，会后在调查藏书的基础上，开展了馆际协作活动。同时制定了图书资料单位之间互相交换资料的办法与提高图书馆工作者业务水平的措施，如适当分配新到图书、编出延安图书总录、出版会刊、对图书馆人员进行图书馆学教育等等。协会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第七章 美术 音乐 戏剧 舞蹈 电影

---

## 第一节 美 术

---

### 一、概 述

中国现代美术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但其主干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外国美术研究和美术理论研究。

#### (一) 中国美术史研究

中国现代早期美术史研究多受日本学者的影响,不少著作是从日文翻译(或编译)而成的,直到四十年代以后,中国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才逐渐地丰实起来。

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先后出版的著作有: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26年)、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年)、滕固的《唐宋绘画史》(1933年)、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34年)、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年)、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在这些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是郑昶的

《中国画学全史》，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滕固的《唐宋绘画史》。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关于美术史研究的论文及专著。如童书业、滕固、启功、俞剑华等关于南北宗论问题的探讨，黄宾虹等关于黄山画派的研究，陈师曾、丰了恺、伍蠡甫等关于文人画问题的研究，贾兰坡、马承源、张光直等关于彩陶、青铜艺术的研究，阎文儒、史岩、宿白等关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傅抱石、黄苗子、汪世清等关于石涛、朱耷等明代遗民画家的研究，常任侠等关于中印艺术姻缘的研究等。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是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等。

此外，还有一批收藏书目、美术书目解题、辞典、鉴藏笔记、画家年表、史籍丛刊、跋题及杂记，为深入研究美术史提供了条件。著名的有黄宾虹、邓实编的《美术丛书》，余绍宋著的《书画书录解题》，罗振玉的《雪堂书画跋尾》、《南宋衣钵跋尾》，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汪士元的《麓云楼书画记略》，张大千的《大风堂书画录》，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年表》等。其中《美术丛书》初版于1911年，至1947年4次增订再版，共收集历代名画、雕刻摹印、瓷铜玉石等约285种著作。编者广取善本，参互校对，搜罗丰富；不足处是驳杂而缺乏归纳，有的名著未收入，有的伪书未指明。《书画书录解题》初版于1932年，共12卷，是书画专目并加解题的首创之作。作者对自东汉至现代所见860种书画著作逐一通览，所作解题，言必己出，不为蹈袭之语，博稽精细，条理分明，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俞剑华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一部美术家人名工具书。

## （二）对外国美术的介绍与研究

蔡元培对引进西方美术有重大影响。他大力提倡美术的社会作用，并经常撰文、演说。鲁迅从1929—1936年间，共介绍20多种外国美术书籍，介绍重点侧重外国版画与插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近代

木刻选》(2集)、《比亚兹莱画选》、《〈死魂灵〉百图》、《一个人的受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苏联版画集》等。吕澂是“五四”运动前后介绍西方美术的先驱之一,他倡导美术革命,编写了几部介绍西方美术和美学的著作。丰子恺以质朴而风趣的文字介绍欧洲及日本美术,写了《近代艺术纲要》、《西洋画派十二讲》等书。陈之佛著有《西洋美术概论》(1934年)、《西洋绘画史话》(1940年)、《色彩学》(1928年)、《艺用人体解剖学》及有关外国工艺美术的著作、论文多种。刘海粟著有《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与傅雷一起编辑过《世界名画家》等。倪貽德从二十年代末始,先后写了《水彩画概论》、《近代艺术》、《西洋画概论》、《西洋美术史纲要》、《现代绘画概观》、《西画论丛》等10余种介绍西洋绘画及绘画技法的著作。傅雷著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34年),并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和丹纳的《艺术哲学》。梁得编译了《西洋美术大纲》(1929年)。闻一多、宗白华、徐志摩、施蛰存等也都翻译或写过关于西方美术的著作或论文,且常有独到见解。如闻一多的《拉斐尔前派》、施蛰存译的《今日之艺术》(H·里德著)、岑家梧的《史前艺术史》(1937年)和《图腾艺术史》(1938年),则属于人类社会学与艺术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著作,是美术起源和史前美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 (三) 美术理论研究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是在引入西方文艺思潮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与古代美术理论相比,更富于思辨性和系统性。

在早期美术理论研究中,蔡元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美、美感、美育与美术的关系,美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美术起源、美术分类等问题。鲁迅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信,就美术的性质、社会功能、美术与人生的关系、美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艺术家的修养以及版画、漫画、书籍装帧、连环画创作中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左翼美术运动和木刻、连环画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吕澂编著《美术概

论》(1923年)、《晚近美学思潮》(1924年)、《美学浅说》(1926年)等书,力图以近现代美学观点和方法阐述美术现象。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一些著名画家还提出许多美学观点,如徐悲鸿关于写实绘画的观点,林风眠的中西绘画调和论,刘海粟对艺术个性的鼓吹,高剑父的中西折中论,庞薰琑等人的自我表现论等。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美术理论译著有《美学纲要》(黑田鹏信著,俞寄凡译,1923年)、《艺术概论》(俞寄凡编译,1932年)、《罗斯金艺术论》(刘思训译,1927年)、《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著,苏汶译,1929年)、《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著,冯雪峰译)等。

在众多的著述中,以宗白华、邓以蛰、伍蠡甫的研究最富于理论深度和独特见解。宗白华翻译了一些重要的西方美学论文,写作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一些重要文章,被评为是把握了“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的美学家。邓以蛰著有《艺术家的难关》(1928年)、《画理探微》等,提出了对意境、神、书法与情感关系等问题的独特看法。伍蠡甫著有《谈艺录》(1947年)等,以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画中的线描、意境、诗画关系、风格、形式美等作了广泛的研究。此外,还有林文铮撰著的论文集《何谓艺术》(1931年),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 二、中国现代美术团体

中国现代美术团体较多,这里仅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 (一) 东方画会

东方画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西洋画的组织。1915年创立于上海,由乌始光、汪亚尘、陈抱一、俞寄凡等发起。曾组织会员赴普陀山旅行写生,仅活动一年余,因画会主持者先后出国考察而自行解散。

### (二) 天马会

1919年9月创立于上海,由江新、丁悚、陈晓江等发起;一说由刘海粟、汪亚尘等发起。会员有刘海粟、江新、丁悚、陈晓江、张辰伯、唐吉生、王济远等。研究项目为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画、工艺美术。曾连续八年举办会员及非会员作品展览会。1927年停止活动。

### (三) 晨光美术会

1921年1月创立于上海,由萧公权、宋志欣、汪英宾、陈抱一、朱应鹏、张聿光等发起。设有画室,供会员作画和研究,曾雇用外国女人为人体模特儿。几年间,会员由30余人发展到300人,曾举办展览会四届。1927年初增设戏剧部,改名为晨光艺术会,不久即停止活动。

### (四) 白鹅画会

1924年创立于上海,由陈秋草、潘恩同、方霜鹑等发起,是上海最早创设的职工业余研究团体。1928年改名为白鹅绘画研究所,曾租用长春路一洋楼,附设白鹅绘画补习学校,由陈秋草主持。前后入学者达二三千人。日本侵华,因校舍被炸停办。

### (五) 艺术运动社

1928年创立于杭州,由林风眠发起,社务由林风眠、王子云、李朴园负责,会员多为国立西湖艺术院教师,如林文铮、王静远、克罗多、吴大羽、潘天寿、陶元庆、李树化等。设有研究室,以该院月刊《Apollo》为学术园地。曾于1929年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

### (六) 蜜蜂画社

1929年冬创立于上海,由郑午昌、王伟、张善孖、贺天健、谢公展、陆丹林等发起。社员有钱瘦铁、朱文侯、王震、张大千、顾坤伯等百余人。每年花朝日举办社员作品展览会。1930年出版《蜜蜂花报》及《蜜蜂画集》。同年6月,叶恭绰拟组织国画团体,约黄宾虹、陆丹林商酌,由陆丹林撰《国画家亟应联合》一文,发表于《蜜蜂画报》第11、12期。次年,在蜜蜂画社基础上成立中国画会。

### (七)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简称“美联”。1930年7月创立于上海,以时代美术社为基础,联合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杭州艺专、中华艺大等校及白鹅绘画研究所进步艺术青年组成。选许幸之、沈西苓、于海、胡一川、夏明、张謇、陈烟桥、刘露、江丰9人为执行委员。主任许幸之,副主任沈西苓,总干事于海。它接受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内分若干盟员小组,以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秘密印刷画报及绘制宣传画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围剿”,美联转入地下坚持活动,组织也有所扩大。

#### (八) 中国画会

1931年创立于上海,前身是蜜蜂画社。会所初在华龙路(今雁荡路),由钱瘦铁等主持;不久移至威海卫路,由贺天健等主持;抗日战争前夕,又移至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由汪亚尘等主持。会员300余人,遍布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采合议制,不设会长,由总干事、干事、理事组成。常务理事:孙雪泥、郑午昌、施琳鹏、丁念先、贺天健;常务监事:王师子、田桓、姜丹书。曾举行书画展览,开办国画讲座,编印《图画月刊》,出版现代中国画集等。上海解放前夕会务渐趋停止。

#### (九) 木铃木刻研究会

1933年2月创立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4月,在杭州举行“木铃木刻研究会第一次木刻展览”,并出版手拓《木铃木展》木刻集。5月,该会和白杨绘画研究会在杭州民教馆联合举行第二次展览会,展后出版《木铃木刻集》。10月,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解散。

#### (十) 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

简称“现代版画会”,1934年6月创立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由李桦、赖少其、潘业、吕蒙、刘仑、陈仲纲等发起。最初参加者27人。先后在广州举行过两次“半年展”及“赖少其、潘业、陈仲纲三人作品展”。1936年举行过7次“农村木刻展览会”。1934—1936年出版手印《现代版画》18本。1937年10月在广州举办“抗战木刻展览会”,展

品 200 余幅。

### (十一) 中国女子书画会

1934 年创立于上海。初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杨雪玖、顾青瑶、顾默飞等发起，后得陆小曼、吴青霞、周练霞、庞左玉、鲍亚暉等响应，会员 150 余人。曾编辑刊物，举行画展，还组织画中诗社，分课唱和诗。抗战胜利后恢复活动，由冯文凤主持，冯离沪后，由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主持。1947 年起由李秋君主持。至上海解放前夕，会务停止。是我国解放前唯一的女子书画活动组织。

### (十二)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

1938 年 6 月创立于武汉。到会代表 97 人，通过宣言、会章，推选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为常务理事。会址设于汉口依仁小学。曾举办“木刻训练班”，出版《抗战木刻选集》1 册。后迁往重庆。1939 年 4 月在重庆主办“第三届全国抗敌木刻展览会”，展品五百余件，连同延安木刻作品一并送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战时艺术展览会”。同年 6 月，总会迁至桂林，由黄新波、刘建庵、赖少其等主持会务。曾与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在《救亡日报》合编《漫木旬刊》，共出版 25 期，并出版《漫画木刻月选》2 辑。7 月，李桦在湖南长沙组织“木协湘分会”，主办“木刻流动展览会”，出版《抗战木刻选集》。10 月，总会在桂林为纪念鲁迅逝世 3 周年举行木刻展览会，展品 300 余幅。次年 10 月，又举行全国木刻 10 周年纪念展，展品 524 幅。11 月会刊《木艺》创刊，由黄新波、刘建庵主编，共出 2 期。1941 年 3 月，总会由桂林迁重庆，后被国民党政府宣布撤销。

### (十三) 中国木刻研究会

1942 年 1 月创立于重庆，由卢鸿基、王琦、丁正献等发起。选王琦、丁正献、刘铁华、罗颂清、邵恒秋五人为常务理事，并决议在全国各大地区成立分会。2 月，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木刻作品展览会”。5 月，在中苏文化协会合办中国送苏木刻展，在重庆“中苏文协”举行预

展。该会还先后于1942年及1943年举办“双十全国木刻展”，以及为纪念成立两周年而举行“扩大木刻展览会”等。1944年8月改选，陈烟桥、王琦、刘铁华、梁永泰等当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1月，留渝会员举行会议，改名中华全国木刻协会。

此外，还有湖社、阿博洛学会、红叶画会、艺苑、一八艺社、时代美术社、决澜社、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平津木刻研究会、野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等美术团体。

### 三、中国现代美术报刊

中国最早的美术报刊是广东岭南画派画家高奇峰主编的以美术为主的综合性旬刊《真相画报》。该刊于1912年创刊，在广东编辑，在上海印刷出版，共发行17期。曾发表马星驰、何剑士的漫画，广东、上海等地的中国画和汉画像砖等古代美术作品。还刊出过论述美术的文章，如顾厂的《论上古三代图画之本原》、蕙荪的《中国美术志》、高剑父的《论古瓷原始于陶器》等。

专业性的美术杂志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于1918年创刊的《美术》杂志，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化的思想。其中设有学术、美术思潮、杂俎等栏目，主要登刊中外古今美术史、画家论、美术创作记、美术教育研究等专论和报道国内外重要美术活动的文稿。尤其侧重研究介绍西洋美术的色彩学、透视学、构图学、艺用人体解剖学、写生、素描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刊载有关美术作品的图版，对于开展中国新美术运动和美术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0年4月，中华美育会创办的《美育》杂志是以提倡美育为宗旨的刊物。同年6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创办的《绘学杂志》，也是很有影响的美术刊物，发表过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徐悲鸿的《中



国画改良论》等重要文章,以及有关美术学校和美术界活动的报道。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新美术运动极为活跃。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员建立的天马会和上海晨光画会都曾编辑过报纸副刊,其中以《时事新报》的副刊和《艺术》发表的美术文章最多,影响最大。其次是《民国日报》的《觉悟》和晨光画会创办的《艺术界周刊》。

1927—1937年间是美术刊物最多的一个时期。1929年中国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举行期间,曾出版《美展》会刊,自1929年4月创刊,三天出一期,共出了10期。编者徐志摩、陈小蝶、李祖韩,撰稿人主要有叶恭绰、丰子恺、徐悲鸿、贺天健、林风眠、倪貽德、吴湖帆、王济远等人。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大型《良友》画报,刊登过许多美术作品,影响很大。此外,1934年出版的《美术杂志》,由出版家赵家璧、马国亮主持,对美术出版作出了贡献。

孙福熙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个人创办《艺风》刊物,在沪杭铁路当局支助下,发行了6年之久,成为历时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刊物。而由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只出版3期。

各美术学校大多出版学报。如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出版《艺术院》、《阿波罗》,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出版《艺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出版由倪貽德主编的《艺术旬刊》,北平艺术学院出版《艺术之路》,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出版《艺术旬刊》,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出版《美术》。

各美术团体也多办有刊物。北京有中国画研究会的《艺林月刊》和湖社画会的《湖社月刊》,它们在介绍中国古代艺术传统之外,也介绍当代有成就的画家及其作品。上海有中国画会出版的《画学月刊》、贺天健主编的《国画月刊》和黄宾虹主编、艺观学会出版的《中国美术会季刊》。广州有唐英伟主编、现代版画会出版的《木刻界》。

漫画刊物也异常活跃。早在1918年春,漫画家沈泊尘与其弟沈学仁创办了《上海泼克》,共出版4期,后因沈泊尘逝世而停刊。中国

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于1928年4月创办《上海漫画》周刊,前后出刊110期。1934年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创刊以后,上海漫画刊物明显增多。重要的有胡考主编的《旁观者》,张光宇主编的《独立漫画》、《上海漫画》和《泼克》,王敦庆主编的《漫画界》和《漫画之友》,黄鼎、黄士英主编的《生活漫画》,张谔、黄土英主编的《漫画和生活》,刘永福、黄士英主编的《漫画世界》,曹聚仁、江毓祺主编的《群众漫画》,蔡若虹、庄启乐主编的《漫画漫画》,顾逢、朱金楼主编的《电影漫画》等。这些刊物培养了一代漫画新人,在中国漫画史上有影响的漫画家都在上述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漫画刊物仍然活跃。最先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漫画》,后在武汉创办的《抗战漫画》,都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4年4月,重庆创办《战斗美术》,由卢鸿基、王琦主编。次年,香港出版《耕耘》杂志,由郁风主编。鲁迅艺术文学院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罗工柳、彦涵、华山等人,在晋东南编辑《敌后方木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中华木协)在桂林时期曾主编《救亡木刻》旬刊,另又与漫协合编《漫木旬刊》。赖少其、刘季平等主编《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杂志。1940年中华木协黄新波、刘建庵主编的会刊《木艺》在桂林创刊,只出2期。这一时期,报纸副刊比战前增多,如《新蜀报》《蜀道》副刊开辟了《木刻专页》,《开明日报》副刊编辑了《抗战木刻》与《诗与木刻》,《新华日报》出版了《木刻阵线》副刊,《福建日报》出版了《木刻运动》副刊。1941年,浙江木刻用品合作社在丽水出版了由郑野夫、杨可扬主编的《木刻艺术》双月刊和不定期刊《木合》。与此同时,刘铁华在重庆主编了《艺术家》杂志。

抗战胜利后,许多报纸设有副刊,这些副刊多由美术家主编。如上海《时代日报》设有《艺术》副刊,由艾中信主编;《新木刻》由杨可扬主编;北平《益世报》的《艺术周刊》由徐悲鸿主编;天津《进步日报》的《艺术周刊》由李桦等任主编;香港《大公报》的《美术周刊》由王琦任

主编。在香港出版的《清明》杂志由丁聪主编。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曾出版过《晋察冀画报》和《东北画报》等美术刊物,并刊登了不少优秀作品。

---

## 第二节 音 乐

---

### 一、早期新音乐运动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音乐主要是“学堂乐歌”。中华民国成立后,萧友梅、王光祈、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人,开展了早期的新音乐运动。其具体内容是:建构新音乐理论,进行新音乐创作。

在新音乐理论建设方面,萧友梅和王光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萧友梅新音乐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即“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以表现泱泱大国之风”。他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鲜明地亮出“国民乐派”的旗帜:“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时,方可成为一个‘国民乐派’。”萧友梅的这些思想主张,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奠定了基础。王光祈认为,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现在先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的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基于这一音乐理想,他在音乐理论领域进行不倦探索,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翻译琴谱之研究》及《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戏剧》等大量学术专著,在整理中国音乐文化遗产、介绍西洋音乐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新音乐运动的早期创作中,作品艺术成就高、社会影响大者,当推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诸人。萧友梅归国后,先后创作了大合唱《别校辞》、《春江花月夜》,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大提琴曲《秋思》以及歌曲近百首。他的音乐创作,把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从学堂乐歌时代的选曲填词提高到了真正专业创作的新阶段;尤其是在大型音乐作品(如大合唱)以及器乐曲和乐队作品的创作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探索意义。赵元任创作的《卖布谣》、《织布》、《劳动歌》、《呜呼三月一十八》、《西洋镜歌》、《看醒狮怒吼》、《自卫》、《抵抗》等,在当时的民众中都有较大影响。黎锦晖除作有歌曲、舞曲及话剧配乐之外,主要作品和主要贡献是影响极大、传唱极广的儿童歌舞表演曲24首和儿童歌舞剧12部。如歌舞表演曲《三个小宝贝》、《好朋友来了》、《谁和我玩》及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小小画家》等,在当时的中小学、少年儿童中风靡一时,后来更扩及到大学、青年和成年人中间,从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刘天华一生创作二胡独奏曲10首、琵琶独奏曲3首和民乐合奏曲2首。他的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等是当时时代苦闷的真实回声;《良宵》、《空山鸟语》、《月应》、《闲居吟》等则流露出陶然自乐的欣赏和对大自然的真诚热爱;《光明行》、《烛影摇红》和琵琶曲《歌舞行》、《改进操》等又显示出作者对美好事物和光明未来的执著向往。正因为如此,他被尊为“国乐大师”。

## 二、工农革命歌曲

在1919年到1927年期间的工农运动中所涌现出的革命歌曲,以及在1927—1937年期间各革命根据地所产生的民歌和红军歌曲,在历史上统称为工农革命歌曲。工农革命歌曲是中国现代音乐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工农革命歌咏活动也在各个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歌曲大多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浓烈的革命热情。如1921年长辛店工人纪念“五一”节时所唱的《五一纪念歌》,明确提出“要把强权制度一扫净”,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伟大革命目标;1922年安源矿工大罢工时期所唱的《安源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工农联盟歌》,提出了“世界本是工农所创造”以及消灭阶级压迫的要求;《京汉罢工歌》则表达了人们对“二七”惨案死难者的沉痛哀悼,并提出必须“打倒军阀方有幸福享”的口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工农革命歌曲,大部分是采用民歌、学堂乐歌和外国革命歌曲的现成曲调填词而成,也有一部分是革命工作者创作的。其中,《工农兵联合歌》、《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赞颂劳动》等歌曲,是以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等曲调填词的;《醒国魂》、《工人歌》、《劳工记》、《纪念列宁》、《五卅运动》、《工农兵自叹》等,是以民歌小调《孟姜女》调、《苏武牧羊》调、《无锡景》调、《五更调》、《满江红》调等填词改编的;《国际歌》、《红旗》、《华沙工人歌》、《同志们勇敢前进》、《你们已英勇牺牲》等,是从国外介绍进来的;创作歌曲主要有瞿秋白在1923年创作的《赤潮曲》和贺绿汀在1927年创作的《暴动歌》等。

1927—1937年,工农革命歌曲发展到高潮时期。就其内容来说:有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获得新生活的,如《少共国际师》、《苏区景》、《共产儿童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春耕歌》、《女子革命歌》、《十剪发》、《婚姻自由歌》等;有反映人民对革命、对领袖、对军队热爱的,如《打破旧世界》、《门口挂盏灯》、《工农革命歌》、《刘志丹》、《十送郎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盼红军》、《我随红军闹革命》等;有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生活的,如《秋收暴动歌》、《上前线去》、《吃牛肉歌》、《渡大渡河胜利歌》、《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打碎敌人的乌龟壳》、

《一双草鞋》、《打开米脂城》、《会师歌》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农革命歌曲逐渐被抗日歌曲所代替。

### 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它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形成热潮,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时达到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当时音乐院校的一些师生,以创作爱国歌曲作为响应,其中黄自等创作的合唱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呼声,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音乐工作。聂耳等人在为左翼电影、戏剧创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这个主题,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自卫歌》、《前进歌》、《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形式,唱出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开展抗日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

为进一步传播救亡歌曲,左翼音乐工作者以聂耳、吕骥为主,1935年5月组织了“业余合唱团”,并大力支持当时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这两个歌咏组织在群众中传播了许多优秀的群众歌曲,广泛地团结了上海各阶层的音乐爱好者,并为革命音乐运动的深入发展培养了骨干。

群众性的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队伍、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1936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召唤下,由孙师毅出面成立了成员比较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或称“歌

曲作者协会”),参加者有吕骥、任光、张曙、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钧、塞克、龙沫勋、冼星海等。这批词曲作家创作出的一大批新的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心头恨》、《保卫国土》、《上起刺刀来》、《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大众的歌手》、《全国总动员》等,迅速唱遍全国。救亡歌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地,仅上海一地,在很短时间内就先后成立了上百个歌咏团体。许多歌咏团体以各种方式展开活动,如1936年6月,民众歌咏会在上海举办了“千人音乐大会”;1936年冬,上海又举行了15个音乐团体联合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以及“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会”等规模巨大的音乐活动,对上海市民产生了很大影响。《立报》、《光明》、《大众生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救亡日报》等,均以相当篇幅选登救亡歌曲和报道救亡歌咏运动情况;电台也逐渐把播放救亡歌曲列为经常性的节目。

1937年的“七七”事变把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最高潮。广大作曲家先后推出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洪波曲》、《长城谣》、《军民合作》、《丈夫去当兵》、《在太行山上》、《打杀汉奸》、《保家乡》、《武装保卫山西》、《巷战歌》、《打回东北去》、《到敌人后方去》、《歌八百壮士》等歌曲,传唱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和“抗战歌咏团”,走向战区和内地,传播和组织救亡歌咏,从而形成“无处不有抗战歌曲”的形势。在全面抗战的大力推动下,救亡音乐队伍的团结也得到了加强。1937年8月,上海成立了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1938年1月,武汉成立了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歌咏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开展起来。此外,海外华侨也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组建各种歌咏团

体,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举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和他辅导的“铜锣合唱团”,以及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的“华侨青年歌唱队”等影响较大。

#### 四、左翼音乐运动

左翼音乐运动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932年下半年,为适应抗日救亡斗争的需要,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建立左翼音乐组织。其主要者是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中苏音乐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此外,还有一些音乐家虽未正式加入上述组织,但有的早已从事革命音乐活动,并积极参加左翼戏剧、电影、音乐工作,如贺绿汀等;有的在1935年加入了左翼音乐组织发动建立的救亡音乐团体,并遵循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进行音乐活动,如冼星海、麦新等。

参加左翼音乐运动的人,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相配合,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音乐活动:

第一,为左翼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1933年起,聂耳、任光、贺绿汀、张曙、吕骥、冼星海等,先后为《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创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后,他们和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作曲家,为群众性的救亡歌咏写作了大批歌曲,代表性的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



《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具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

第二，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音乐和开展救亡歌咏活动。左翼音乐家响应“左联”发出的“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口号，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寻找接近和深入群众的机会。聂耳、吕骥、麦新、冼星海、张曙、孙慎、孟波、吉联抗以及1935年5月成立的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农村、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中去，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进行大众化歌曲创作的实践。这是中国的革命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初尝试。

第三，团结音乐界爱国民主力量和扩大进步音乐阵线。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革命音乐，组织起广大的进步音乐队伍，左翼音乐工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任光、安娥、聂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1936年成立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则争取了更多的词曲作家加入到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行列。

## 五、新音乐运动

新音乐运动是1935年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是左翼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解散后，为团结广大

音乐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吕骥等人提出了国际音乐的口号。同时,吕骥又通过《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和周钢鸣的《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等文章,正式提出了“新音乐运动”的口号,并对其性质、任务作了说明。其主要精神是:新音乐要成为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要采用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具有大众化的作风。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全国出现了抗战歌曲创作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的高潮,开创了全国音乐界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团结前进的新局面。其具体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音乐理论方面,对新音乐运动的不同认识和具体实践,在《新音乐》月刊上展开了专题讨论;对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一批具有建设性的论文。重庆国立音乐院部分师生结成“山歌社”,对民间歌曲进行了收集、整理、改编和演唱,还出版了《山歌通讯》和《中国民歌选辑》、《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文集。

第二,在音乐创作方面,主要是反映国统区人民呼声的群众歌曲创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有:揭露、讽刺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歌曲,如《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古怪歌》、《五块钱》等;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歌曲,如《农民苦》、《苦命的苗家》等;表现国统区民主运动、鼓舞群众斗志的歌曲,如《民主是那样》、《跌倒算什么》等;表达国统区人民对解放区和新中国的向往,歌唱民主队伍团结的歌曲,如《山那边好地方》、《别让它遭灾害》、《大家唱》、《太阳一出满天红》等。这些都是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具有战斗性和民族化、大众化的优秀作品。此外,还出现了诵唱长诗《岁寒曲》(由12首朗诵诗和11首合唱曲组成)等具有战斗风格的大型声乐作品。

第三,在群众音乐活动方面,群众歌咏运动随着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的足迹,深入到各中小城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民主歌咏活动蓬勃兴起,形成了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后的又一个群众歌咏热潮。1946年初,在重庆成立了“星海”、“民主”合唱团,并在昆明、北

平等地建立了分团；1946年9月以后，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上海涌现了近300个歌咏团体；同时期在北平、天津、南京、广州、香港等地区也先后成立了各种歌咏团和歌咏联谊会。这些歌咏团体和音乐活动，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鼓动作用。

## 六、主要音乐团体

在中国现代史上，音乐团体较多，这里仅择其主要者简介如下：

### （一）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1917年1月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会长，聘萧友梅、杨仲子、王露等为导师。它是以“五四”运动前在北京大学所成立的“北大音乐团”为基础而建立的一个以学习音乐知识和技艺为主的社团。内分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丝竹乐、师资特别班等组，会员达200多人。该会成立后，演出活动比较频繁。1920年还出版期刊《音乐杂志》，共出15期。后该会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 （二）大同乐会

1920年成立于上海，由郑觐文等人发起。会章中提出：“本会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故定名曰大同演乐会。”成员多为文人、职员。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颇为活跃，曾参照历史资料仿制古代雅乐乐器，在传授各种民族乐器演奏技艺和整理、改编传统乐曲方面作出了贡献。

### （三）国乐改进社

1927年5月成立于北京，由刘天华等人发起，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该社从1928年起出版不定期刊物《音乐杂志》，至1934年共出刊10期。该社以刘天华为主，在对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以及创作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

### （四）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

简称“北平乐联”，1932年10月成立，由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发起。成立后曾参加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组织群众音乐活动，编辑出版2期《音乐周刊》和一本歌集，并曾与北平左翼剧联共同组织演出等。1933年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乐联被迫停止活动。

#### （五）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简称“音乐研究会”，1933年春成立于上海，成员有聂耳、任光、安娥、张曙等。该会旨在创作中国的新兴音乐，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道路。成员们经常集体讨论、创作群众歌曲。聂耳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与张曙早期的一些群众歌曲，都是在该会的推动下产生的。

#### （六）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

简称“左翼剧联音乐小组”，1934年春成立于上海，领导人为田汉，成员有肖之亮、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孙师毅、王为一、陈梦庚等，成员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并为进步电影和戏剧作曲，以此传播进步思想。1935年组织了业余合唱团，推进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同年8月后停止活动。

#### （七）民众歌咏会

1935年2月成立于上海，由刘良模发起、主持，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抗日救亡歌咏组织。参加者多为男女职业青年，开始有90余人。不久，一些左翼音乐家加入该会活动，推动了该会的发展，会员剧增，1936年达千余人。同年6月，该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全体会员及5000余听众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声势浩大，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8月，被迫解散。曾编辑出版《民众歌集》、《青年歌集》与《民众歌咏ABC》。

#### （八）词曲作者联谊会

又名歌曲作者协会,1936年初成立于上海,是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参加的作曲家有吕骥、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张曙、任光、冼星海、麦新、沙梅、丁玲、江定仙、刘雪庵等;词作家有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沐勋、任钧、柳倩、关露等。该会的目的在于促进群众歌曲的创作,为群众提供演唱的材料,以适应当时蓬勃开展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需要。

#### (九) 今虞琴社

1936年3月成立于苏州,由苏州、上海等地的李子昭、沈草农、查阜西、彭祉卿等28位古琴家发起,是为提倡琴学、交流琴艺并以演奏和研究古琴为主要活动的业余音乐社团。它以“虞山派”发源地之常熟虞山命名,并宣称“仰止前贤,用以互勉,并无门户派别之见”。它的成员几乎包容了当时各派著名琴师。最初定期在苏州举行琴会,曾刊行《今虞琴刊》。

#### (十) 歌曲研究会

1936年秋成立于上海,主持者吕骥,成员有孙慎、麦新、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人,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一个研究歌曲创作的组织。著名的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都是在该会的活动中产生的。

#### (十一) 新音乐社

新音乐社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团结国统区音乐工作者、推动新音乐运动而建立的音乐社团。由李凌、林路、赵沅、孙慎、舒模、吉联抗等发起,于1939年10月在重庆成立,至1950年12月在北京结束。该社以“新音乐”为旗帜,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音乐为目标,出版进步音乐书刊,组织进步音乐演出和群众歌咏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活动,培养音乐干部。该会与其他新音乐团体、组织和进步音乐工作者一起,有效地发动和组织了四十年代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

## （十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前身是1934年3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的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最终定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吕骥为会长,成员多为该院音乐系师生。以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研究为主旨。曾出会刊《民间音乐研究》1期。编印民间音乐资料丛刊多种,如《秧歌曲选》、《陕甘宁边区民歌》、《秧歌锣鼓点》、《眉户道情集》、《河北民歌集》等。这些工作对当时解放区的音乐创作,特别是对民歌改编、秧歌剧和新歌剧的创作,有直接影响。

---

## 第三节 戏剧

---

### 一、概述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戏剧发展的基本情况是: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大戏得到发展,一批新兴的地方小戏在全国各地萌芽出现。

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华民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戏剧改良的口号,拉开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帷幕。当时,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积极从事戏曲改良活动的团体和个人。其中著名的有:汪笑侬、刘艺舟、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夏月珊合资创办的上海新舞台(京剧),田际云创办的玉成班,杨韵谱创办的奎德社(河北梆子),李桐轩、孙仁玉创办的易俗社(陕西秦腔),康子林、杨素兰主持的三庆会(四川川剧),成兆才创办的警世戏社(评剧)以及广东为数众多、影响远及海外的“志士班”(粤剧)。这些团体和个人开展戏曲改良活动,为现代戏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时期,在进步思潮影响下,中国戏剧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其突出特点是用戏曲的形式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生活和新思想。如

梅兰芳演出了宣传民主思想的时装新戏《孽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等；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编写出轰动一时的《杨三姐告状》；秦腔易俗社作家范紫东创作了嘲讽迷信教条和封建道学虚伪的《三滴血》；周信芳演出了反映“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革命情绪的《学拳打金刚》和表现反抗暴政主题的《英雄血泪图》；程砚秋从二十年代起陆续演出的《青霜剑》、《荒山泪》、《春闺梦》等，都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尖锐批判和充满激愤之情的作品。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涌现出许多宣扬爱国主义思想的剧作，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高庆奎的《煤山恨》、《史可法》，郝寿臣的《荆轲传》和评剧李金顺的时装新戏《爱国娇》等。

“五四”运动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戏曲界的多数人主要致力于对传统表演艺术的继续提高和不断创新，各个剧种都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优秀演员，并形成了各有千秋的艺术流派。如京剧老生继谭鑫培之后，又出现了余叔岩、言菊朋等表演艺术家。比老生稍后兴起的是旦角，其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等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此外，如川剧的周慕莲（旦）、汉剧的董瑶阶（旦）、秦腔的刘毓中（生）、晋剧的丁果仙（生）、蒲剧的王存才（旦）、湘剧的吴绍芝（小生）、粤剧的薛觉生（生）、滇剧的栗成之（生）、评剧的白玉霜（旦）等，也都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成名成家。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和艺术教育的机构，创办了一些刊物。较有影响的有1919年创办的南通伶工学社，1921年成立的苏州昆剧传习所，1931年出现的北平国剧学会、国剧传习所及其编辑的《戏剧丛刊》、《国剧画报》，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及其编辑的《剧学月刊》，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等，为戏曲艺术的经验总结、史料汇编和演员培训，作出了一定贡献。这时也出现了像齐如山那样的戏曲研究家和评论家。这一时期，中国戏曲也开始传播到国外。1919—1935年，梅兰芳、白驹荣（粤剧）、韩世昌（昆剧）、程砚秋等

或应邀出国演出,或专程出国考察,将京、昆、粤剧艺术传播到日、美、苏和欧洲一些国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主张戏曲与现实斗争相结合、戏曲改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继而又先后在武汉和长沙组织了戏曲演员战时讲习班,分别成立了汉剧、楚剧、湘剧流动宣传队和平剧实验宣传队。田汉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江汉渔歌》被誉为旧京剧的“创格”,是“五四”运动以来戏曲改革的重要收获。柯仲平、马健翎于1938年组建了陕北民众剧团,编写了《查路条》、《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等表现陕甘宁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新戏,取得了成功。此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也都编演出一些表现抗日斗争的剧目。这些创作和演出活动,为推动传统戏曲与新时代相结合,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42年,毛泽东在为延安平剧研究院建院题词时,特别针对发展戏曲艺术,解决传统戏曲与新时代矛盾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推陈出新”的方针,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戏曲改革主张和方法,作了简明、通俗的表述和科学、辩证的概括。在这一方针指引下,1943年初,延安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新秧歌运动,编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等深受陕北农民欢迎的秧歌剧。不久,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相继上演,作品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成为推陈出新的示范性作品。延安的经验和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其他抗日根据地戏曲活动的开展。从1944年起,胶东、鲁中、苏北、陕甘宁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剧团,先后编演了一批表现李自成起义及其失败教训的作品,其中以胶东解放区的《闯王进京》为代表。同时,国统区的戏曲工作者也深受鼓舞,他们利用多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1944年,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在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显示了戏曲界要求进步与革新的历史



趋势。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曲改革继续开展,戏曲工作者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他们一面坚持戏曲创作和演出,一面直接参加战斗和土地改革运动,编演了京剧《九件衣》等作品。

## 二、京 剧

民国时期,新的京剧表演艺术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标新立异,打出旗号,崇尚特色,吸引观众,出现了京剧流派林立、诸芳争艳的繁荣局面。在老生行中有余叔岩的余派、言菊朋的言派、高庆奎的高派、马连良的马派、周信芳的麒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啸伯的奚派、唐韵笙的唐派等。二十年代惯称的“四大须生”为余、马、言、高;后因高庆奎退出舞台,又加上谭富英,有余、马、言、谭之说。旦行中有梅兰芳的梅派、程砚秋程派、荀慧生的荀派、尚小云的尚派、于连泉的筱派、黄桂秋的黄派、李多奎的李派等。其中梅、程、荀、尚被惯称为“四大名旦”。净行中有金少山的金派、郝寿臣的郝派、侯喜瑞的侯派、裘桂仙的裘派等。这些流派有自己擅长的剧目,唱腔、念白、做工都卓有特色,有的在扮相上还有所创造,在其周围集结了一批崇拜者和爱好者。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造,把京剧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京剧的发展,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以培养京剧人才为主的科班学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富连成社。

富连成社 1905 年在北京宣武门外前铁厂 7 号成立,初名喜连成,后改为富连成。它招收学生班次以字为序。第一班排行“喜”字的学生有 70 多名,兼学梆子与皮簧。1906 年招收一批带艺入科学生,学习与演出兼行,不排行,梅兰芳、周信芳、贯大元、高百岁均在此列。他们在北京广和楼每天不停地演出,使喜连成科班打出了牌子。1910

年,第二班的“连”字辈亦接上茬,马连良的老生戏、于连泉的花旦戏都很不错。1914年,广和楼与富连成订长期演唱合同,延续了20余年。此后几年,富字辈、盛字辈陆续入科,4科学生同时登台,排演新戏,搭配齐整,盛极一时。谭富英、茹富兰、马富禄、李盛斌、李盛藻、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等相继为台柱。1932年,第五科世字辈亦有新秀李世芳、毛世来、袁世海等人。1935年尚小云来科班协助演出,排了《酒丐》等新戏,连演不衰。1936年梅兰芳来到科班,收世字辈的李世芳为徒,四大名旦的其他3位前来祝贺,盛况空前。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元字辈、韵字辈为主构成了富连成新的演出阵容。1942年,大火烧去了科班30余年积存的戏装和砌末,损失惨重。此后曾招收庆字辈学生数十人,但状况大不如前。到1948年,百业凋零,延续44年的富连成科班宣告解散。

富连成社是中国现代史上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一所科班。长期任教的教师有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姚增禄、茹莱卿、王长林、尚小云等名家亦兼课授艺。它先后培养了700余名学生,其中有的如马连良、于连泉、裘盛戎、侯喜瑞、叶盛兰、谭富英等都成了某一艺术流派的创始者。40多年中,先后演出大小剧目400余出,尤以“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与武戏最负盛名。连台《三国》戏颇受群众欢迎,《赤壁鏖兵》、《取南郡》、《五彩舆》、《胭脂判》、《南界关》、《太湖山》等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此外,在某些新排剧目中,还进行了适当的改革与创新,如《新天河配》中有空中飞人表演,《三侠五义》中加添大型布景,等等。

### 三、话 剧

中国早期话剧称新剧,后又称文明新戏。它是为了更迅速、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根据西方戏剧样式逐步移植、改造而成的。辛亥革

命前后,新剧发展迅速。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剧逐渐被现代话剧所替代。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20年中,中国现代话剧有了长足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创作和演出两个方面。

在创作方面,郭沫若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早期作品《棠棣之花》(1920年)、《湘累》(1920年)、《女神之再生》(1921年),合称《女神三部曲》,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作《卓文君》(1923年)、《王昭君》(1923年)、《聂荃》(1925年),合称《三个叛逆的女性》,反映了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四十年代,郭沫若重写《棠棣之花》(1941年)、《屈原》(1942年)、《虎符》(1942年)、《高渐离》(1942年)四部历史剧本。这些作品既有深刻的思想,也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戏曲剧本20余部。其代表性的作品有二十年代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三十年代的《梅雨》、《回春之曲》,四十年代的《秋声赋》、《丽人行》等。

演出方面,在国统区,话剧作为革命戏剧的一部分,坚持革命艺术,逐渐向深入、普及的方向发展。1927年成立于上海的南国社,主要演出田汉创作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控诉封建压迫的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矛盾和苦闷。1929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立,举行了两次很有影响的演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联合各地剧联组织,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在全国各地开展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蓬勃开展,从1927年冬到1935年底,革命根据地所创作的话剧数量,据回忆与统计有几百部。在专业剧团方面,海丰有白话剧剧团,湘鄂西有战斗剧社,红三军团有火线剧社,红五军有猛进剧社,红一军有战士剧社,瑞金有八一剧团等。演出的剧目中较重要的有《明天》、

《庐山之雪》、《八一南昌起义》、《最后的晚餐》、《战斗的夏天》、《我——红军》等。

#### 四、评 剧

评剧产生于河北省东部的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一带农村,1910年左右形成于唐山。惯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名“平腔梆子戏”。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正式使用“评剧”名称。

蹦蹦戏或落子戏前身在河北为对口莲花落,亦称十不闲;在东北为二人转,又称地蹦子。对口莲花落的扮丑者与扮旦者分包赶角,有时分扮剧中人,有时又作为第三者加以评述,配合起来演述一个完整的戏剧故事。主要乐器是用绳子连在一起的7块竹板,称节子板,还有一把板胡,另有一个打击乐器,弦乐过门也十分简单。

1910年左右,蹦蹦戏班社进入唐山的茶园演出,原来形式显得单调,成兆才等艺人对它进行了改革:首先将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由演员扮演剧中人;其次,以蹦蹦音乐为基础,吸收冀东民间音乐素材,创造行当使用的唱腔;第三,采用全套河北梆子乐器伴奏,取名为“平腔梆子戏”。成兆才等人被称为评剧的第一代艺人。

早期评剧只有男、女角之分,后逐渐发展为生、旦、丑的“三小戏”。以后又受梆子和京剧的影响,行当增多,有了青衣、花旦、老旦、小生、老生、小丑之分,其表演艺术保持着民间小戏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其唱腔,分为尖板、搭调、慢板与小安板、三锤、倒板、垛板、流水板,并有反调。伴奏以板胡为主,打击乐器和京剧基本相同。

评剧创建时期,正值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都接受了改良新戏的影响,一开始就长于编演时装戏。评剧第一个剧作家成兆才,编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

其中以1919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久演不衰，成为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这一时期的著名演员有月明珠、金开芳、倪俊声、开花炮等。他们把蹦蹦戏带往东北、天津等地，被人称为“唐山落子”。唐山落子在东北流传，出现了以李金顺为首的第一批著名女演员，如喜彩春、喜彩莲、芙蓉花、筱桂花、金灵芝、小麻红等人。在天津最享盛名的演员是刘翠霞。1930年前后，芙蓉花、白玉霜、喜彩莲等先后将评剧带到北平，使评剧成为北平人民喜爱的戏曲剧种。1934—1935年，白玉霜、钰灵芝、喜彩莲、朱宝霞、爱莲君等到上海演出，引起不小反响，白玉霜的演唱艺术曾称颂一时。此后，评剧发展变化不大。

## 五、秦腔

秦腔又名陕西梆子，是西北地区最流行的戏曲剧种，历史悠久。秦腔唱腔分为欢音、悲音两类，对喜悦欢快的情绪与悲愤凄凉的感觉，都有充分的表现。它分行甚为细密，有六生、四旦、二净、一丑之分，号称“十三门”，历来各有出色的演员问世。

1912年，在辛亥革命影响下，西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等人，聘请艺人陈雨农等创办了兼有班社和戏曲教育机构职能的易俗社，志在用秦腔移风易俗。随后，又有三意、正俗等社成立。他们演出了《还我河山》、《颐和园》、《金莲痛史》、《大烟魔》等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针砭时弊的剧目。在艺术上，兼有东、西两路秦腔的长处，又汲取了京剧等其他剧种的营养，唱腔由高亢激越而趋于柔和清丽，身段表情由粗犷豪放而趋于精致细腻，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又融入了新的格调。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不少秦腔剧作者和演出团体。他们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结合抗日战争及发展生产的现实需要，创作、改编和演出了大量现代戏和历史剧。其中主要有赵伯平的

《大上当》、《抓壮丁》、《新教子》、《新考试》、《抓汉奸》，马健翎的《中国魂》、《一家人》、《三岔口》、《血泪仇》、《穷人恨》、《鱼腹山》，黄俊耀的《官逼民反》、《阎王寨》，墨遗萍的《正气图》、《河伯娶妇》、《洪承畴》，田益荣的《有田敏子》、《两个世界》、《皖南事变》、《回头是岸》、《文天祥》、《苏武》、《坚持到解放》，张棣康的《赤胆忠心》、《同胞仇》、《烈火扬州》、《兄弟会》，袁光改编的《白毛女》、《屈原》等。这些剧目，分别由七月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八一剧团、边保剧团、陇东剧团、延安文工团、三八五旅宣传队、七团宣传队、影剧团、延属文工团等单位演出。安波、王依群等记谱整理了秦腔音乐，为丰富和发展秦腔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进行了有益的革新尝试。

## 六、越 剧

越剧是由一种说唱艺术“落地说书”发展起来的新兴剧种。因其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嵊县一带，即古越所在地，故名越剧。最早于1906年出现在嵊县，它的最初形式称“的笃班”（又名“小歌班”），唱腔以“落地唱书调”，即“吟哦调”为主，只用笃鼓、檀板按拍击节。后流行于桐庐、富阳、海宁、杭州一带。剧目多半反映农民生活，主要有《卖婆记》、《卖青炭》、《箍桶记》、《养媳妇回娘家》等。随着小歌班在浙东南各城市流传，剧目逐渐改取坛间唱本或移植乱弹剧目，曲调也由用帮腔演唱的“吟哦调”向乐队伴奏发展。

1916年后，小歌班数次进入上海，到1921年为区别于“绍兴大班”，以“绍兴文戏”名义演出于升平歌舞台。艺人魏梅朵等采用板胡（后改平胡）、斗子伴奏（定弦do、sol，称“正调”），在唱腔上汲取了绍剧、余姚清腔、武林调的音乐成分，丰富板式，创制了倒板、快板、清板、还阳调等。在表演上也借鉴绍剧、京剧的艺术特长。从此男班进入了黄金时期。

1923年,艺人金荣水受京剧“髦儿戏”的影响,在峨县施家乔办起第一个女子科班,短期训练后即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名义进入上海演出,不久退回农村。1928年后,女子文戏科班大量涌现。因女声音域与男声相差四五度,所以吸取京剧西皮 la、mi 定弦,创造出“四工调”,一时与男班展开竞争。1936年后,女班终因扮相俊美,曲调流畅,而取代了男班,盛行于浙江和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一时涌入上海的女班竟达30余个,时称“女子文戏”。著名演员有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屠杏花、姚水娟、筱月桂、马樟花等。剧目以才子佳人戏为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龙凤锁》、《碧玉簪》、《三看御妹》等。

1938年秋,开始用“越剧”名称代替“女子文戏”。1942年,袁雪芬在大来剧场首倡改革,聘请吕仲、韩义、郑传鉴等为编导;以剧本制代替幕表制;建立导演制度;改革服装;采用油彩化妆;改进舞台布景、灯光;充实乐队,创造尺调腔。演员在表演上也吸收昆曲和话剧表演艺术特长,使越剧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945年组成雪声剧团,建立了较正规的剧务部,在演员与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的协作下,使越剧艺术在综合各种艺术手段,丰富表现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范瑞娟在演《梁祝哀史》中,与琴师周宝才创造定弦 do、sol 的“弦下腔”,丰富了越剧曲调。1946年5月,雪声剧团把鲁迅的《祝福》改编为《祥林嫂》上演,引起文艺界广泛注意。

1947年夏,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场和戏校,发展越剧事业,“越剧十姐妹”(即当时在上海的十位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招、筱丹桂、傅全香、范瑞娟、张桂凤、吴筱楼、徐天红)联合义演《山河恋》,并与破坏越剧改革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一时期,除雪声剧团外,还有傅全香、范瑞娟1947年组织的东山越艺社;徐玉兰1947年组织的玉兰剧团;竺水招1947年组织的云华越剧团;陆锦花等组织的少壮越

剧团,被合称为“五大剧团”。他们演出了一批代表剧目,如竺水招、尹桂芳的《石达开》、《葛嫩娘》、《浪荡子》;范瑞娟、傅全香的《天涯梦》、《孔雀东南飞》;徐玉兰的《国破山河在》、《红娘子》;以及雪声剧团的《红粉金戈》、《凄凉辽宫月》、《万里长城》等。新的艺术流派,如旦角方面的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小生中的尹(桂芳)派、徐(玉兰)派、范(瑞娟)派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东四明山地区对越剧也进行了改革,组成社教队,编演新戏,在部队和农村演出。江南新四军北撤时,越剧也随部队到了山东。社教队采取男女合演形式,演出了不少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

---

## 第四节 舞 蹈

---

### 一、概 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外国舞蹈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专业舞蹈家和舞蹈团体的出现,中国开始出现了以反映现实生活为特征的新的舞蹈艺术。

#### (一) 中国新舞蹈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新舞蹈的开创者是吴晓邦。1929—1936年,吴晓邦先后三次赴日本,向舞蹈家高田雅夫夫妇与江口隆哉夫妇学习。留学期间,他还研究了现代舞蹈家 I. 邓肯和 M. 维格曼等人的舞蹈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舞蹈思想。

1932年,吴晓邦在上海创办晓邦舞蹈学校,1935年又创办了晓邦舞蹈研究所,开始了新舞蹈艺术的创作和教学活动。1935年9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个人舞蹈发表会,其代表作有《傀儡》、《浦江之夜》



以及根据 F. F. 肖邦乐曲创作的《送葬》等。这些作品从现实生活出发,努力探索人生真谛,在题材、体裁及表现手法上多有创新,标志着中国新舞蹈的诞生。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晓邦离开上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现实生活而发生了变化。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是其主要作品。这两个舞蹈情感质朴、炽烈,作者以舞蹈形象抒发了同名歌曲反映出来的抗战激情,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1938—1945 年,吴晓邦在广东、上海、桂林、重庆等地开展新舞蹈活动。1943 年,在广东省曲江地区的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设了舞蹈系,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专业舞蹈教育机构。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舞蹈主要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等。1938 年后他还创作了舞剧《罌粟花》、《虎爷》、《宝塔牌坊》等。这些作品用暴露、讽刺、暗示、象征等手法,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作用。

## (二) 革命根据地的舞蹈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舞蹈艺术也很重视。二十年代中期,一批中国革命家赴苏学习,回国后把苏联十月革命后的舞蹈带回根据地。三十年代初在根据地传播苏联舞蹈的代表人物是李伯钊。在她和石联星等人的倡导和传习下,不仅苏联舞蹈《乌克兰舞》、《高加索舞》、《水兵舞》、《国际歌舞》等广泛流传,而且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了一批表现中国工农兵生活的新舞蹈,如《工人舞》、《农民舞》、《青年舞》、《陆海空军舞》等。这些舞蹈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相当流行,以后在部队中创作的“战士舞蹈”,就是这种形式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间歌舞也由过去群众性自娱活动转向为革命服务,运用原来的形式,谱新曲、唱新词、编新舞,歌颂和表现中国共产党、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生活。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组织下,民间歌舞的队伍扩大了,群众性加强了。如 1931 年在瑞金庆祝中央工农

政府成立的提灯晚会上,表演了各式各样的灯舞,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欢乐情绪。以歌舞为主的活报剧(即活报舞蹈)在战争年代普遍流行,起到了迅速宣传时事、政策的作用。革命根据地军民创作了大量的这类舞蹈,主要有《扩红活报》、《红军万岁》、《统一战线活报》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陕北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随后很快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它从形式到内容发扬了中国民间舞蹈中健康、优美、抒情的传统,树立了工农兵形象。当时在延安演出的《组织起来》、《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生产舞》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新秧歌运动对中国民间舞蹈的变革以及当时国统区的进步舞蹈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从事新秧歌运动的文艺工作者,后来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专业舞蹈工作者,如田雨、胡果刚、夏静、陈锦清、陆静、查列、叶扬等,通过他们的努力,在革命根据地发展起了一支专业舞蹈队伍。1945年,吴晓邦、盛婕等到达延安,以后辗转各解放区,和舞蹈工作者一起,开展新舞蹈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内蒙古、华北等解放区先后成立了专业舞蹈队,如内蒙古文艺工作团舞蹈队(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1947年)、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舞蹈班(1948年)以及华北大学文工一团舞蹈组(1948年)等。舞蹈的专业化,促进了舞蹈创作和表演水平的提高,如全国解放前夕演出的《胜利腰鼓》、《进军舞》、《人民胜利万岁》以及《乘风破浪解放海南》等,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 (三) 国民政府统治区的舞蹈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西方的“土风舞”、“形意舞”、“体操舞”等舞蹈形式,在中国大城市的一些学校中开始流传。

三十年代,黎锦暉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等,在学校教育中起到陶冶儿童情操的作用,在社会上也相当流行。此外,一些在中国旅行或侨居的外国舞蹈家,向中国观众介绍了西方的芭蕾艺术,有的还办了私人舞蹈学校,吸收中国学生给予正规训练。如俄国芭蕾教师 H. 苏可夫斯基和夫人在上海设立的芭蕾学校,曾吸收少量中国学生,并让他们参加演出了《天鹅湖》、《睡美人》、《葛蓥莉亚》和《神驼马》等古典芭蕾。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芭蕾演员,如胡蓉蓉、丁宁、曲皓等。另一位俄籍音乐家 A. 阿甫夏洛穆夫以中国故事为题材,创作了舞剧《古刹惊梦》。不过,当时芭蕾艺术只在少数大城市有些影响。

1940年,侨居国外的舞蹈家戴爱莲回国,回国后,她马上投入了创作和表演,并积极学习、研究中国民间舞蹈,于1946年在重庆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少数民族舞蹈的专场演出(由戴爱莲、彭松编导),在观众中很有影响,并由此掀起了一个普及民间舞蹈的运动。戴爱莲的学生中始终坚持在舞蹈事业上工作的有彭松、高地安、王萍、隆征丘、王克芬、杨凡、叶宁等。吴晓邦和戴爱莲多次在桂林、重庆、北碚等地同台演出,开展新舞蹈工作,传播新舞蹈种子。在他们的推动和影响下,新安旅行团、陶行知育才学校演剧队、中国乐舞学院等相继展开新舞蹈的创作和演出。

## 二、主要舞蹈团体

在中国现代史上,舞蹈团体较多,主要有:

### (一) 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1935年成立于江苏淮安。该团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战初期演出了颇为流行的《儿童舞》、《海军舞》、《抗日升平舞》和革命秧歌。1940年,在吴晓邦领导下,演员进行了正规的基本训练,排演了《春的消息》、《爱在人间》等舞蹈和舞剧《虎爷》。他们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创作演出了《儿童解放舞》、《花棍舞》、《少年进行曲》、《参军记》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成为新四军领导下的一支少年儿童文艺队伍。解放战争时期,该团表演推广腰鼓舞等,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1949年5月,随军南下解放上海,以《进军腰鼓》、《胜利花鼓》参加了入城式。不久,又创作演出了大型秧歌舞《建设新上海》等。1952年,该团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后改为上海歌剧院。

### (二) 中华舞蹈研究会

中华舞蹈研究会是1945年在云南昆明建立的舞蹈团体。主要成员有梁伦、胡均、游惠海、陈韞仪等。他们提倡新舞蹈艺术,主张把外国现代舞理论和技巧与中国民间舞蹈相结合,从生活出发,创作演出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它举办了新舞蹈训练班,训练群众艺术骨干。为解决舞蹈的民族形式问题,1945年春,在闻一多的倡导下,深入云南路南圭山地区搜集民间舞蹈,加工整理了《阿细跳月》、《撒尼族跳鼓》、《猴子掰包谷》等舞蹈,并在昆明举行了彝族音乐舞蹈会,介绍和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1946年下半年停止活动。

### (三) 中国歌舞剧艺社

中国歌舞剧艺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1946年在香港成立。梁伦、陈韞仪等负责组建其中的舞蹈组,并担任主要编导和演员。曾在香港及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节目中有舞蹈《渔光曲》、《希特勒还在人间》、《缅甸情歌》、《印尼儿女》;独幕舞剧《五里亭》、《天快亮了》以及大歌舞《中国人民悲欢曲》等。上述演出活动扩大了新舞蹈和歌舞艺术在侨胞中的影响。该社还在香港、曼

谷、新加坡等地举办舞蹈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舞蹈骨干。

#### （四）内蒙古文工团

内蒙古文工团 1946 年成立于张家口市，以当时延安来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为骨干，由汉、满、蒙、回、朝等民族演员组成。团内专门建有舞蹈组。该团在舞蹈创作和培养舞蹈专业人才方面有显著成绩，对内蒙古地区以及全国舞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创作的舞蹈作品有吴晓邦的《蒙古之路》、《希望》，贾作光的《蒙古舞》、《鄂伦春舞》、《献花舞》、《牧马舞》、《雁舞》、《马刀舞》和《达斡尔舞》等。这些舞蹈在解放区十分流行。1951 年，该团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

#### （五）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是中国军队专业舞蹈演出团体，1947 年夏成立于哈尔滨。主要领导人是胡果刚、查列。该队继承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文艺传统，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反映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舞蹈作品，主要有《反攻战舞》、《练兵舞》、《将革命进行到底》、《胜利腰鼓》等。1948 年 3 月，吴晓邦、赵德贤曾来队任教，并和舞蹈队共同创作演出《进军舞》、《参军》等舞蹈节目。1949 年，该队随军南下，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并抽调部分骨干在武汉创办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舞蹈系，为部队培养了大批舞蹈骨干。

#### （六）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舞蹈班

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舞蹈班 1948 年 10 月成立于沈阳，班主任陈锦清，主要教员有吴晓邦、盛婕等。曾聘请朝鲜舞蹈家姜玉彩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培养舞蹈演员。舞蹈班设有中国传统戏曲舞蹈、中国民间舞蹈、芭蕾舞、外国民间舞和现代舞等课程。该班创作了许多短小的舞蹈节目，如《农作舞》、《锻工舞》、《单鼓舞》等。1951 年底并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舞蹈队。该班培养了近 50 名舞蹈演员，许

多人后来成了中国舞蹈事业的骨干力量。

---

## 第五节 电 影

---

### 一、概 述

1905年秋,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试拍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获得成功,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电影正式诞生。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与发展,一方面,一些电影公司拍摄了不少低级、庸俗的影片,古装片,以及武侠神怪片。但另一方面,进步的、民主的、革命的电影工作者,以“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为阵地,拍摄了许多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影片,揭开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光辉一页。其中,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代表作有: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狂流》(程步高导演),阳翰笙的第一部作品《铁板红泪录》(洪深导演)。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生活和觉悟成长的代表作有:洪深改编的《香草美人》(陈铿然导演),沈西苓编导的第一部电影《女性的呐喊》。反映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生活、揭示都市中尖锐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代表作有:夏衍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沈西苓导演),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表现抗日反帝斗争的代表作有:蔡楚生编导的《共赴国难》,田汉自编自导的《民族生存》,阳翰笙的《中国海的怒潮》(岳枫导演)等。另外,还有以妇女为题材的影片《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姊妹花》(郑正秋编导),《时代的儿女》(夏衍、郑伯奇、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以及把新文学名著搬上银幕的《春蚕》(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等。

但是这些电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扼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形成了抗战电影运动。优秀的新闻纪录片有《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四万万人民》等。优秀抗战故事片有:《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好大夫》(史东山编导)、《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袁丛美导演)等。这些影片对于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事业进行了所谓的“接收”和垄断,并不择手段地排挤民营电影公司,迫害进步电影运动。但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顽强斗争,不断促进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艺术上比较成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导)、《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三毛流浪记》(阳翰笙改编,赵明、严恭导演)、《乌鸦与麻雀》(陈白尘编剧,郑君里导演)、《假凤虚凰》(桑弧编剧,佐临导演)、《夜店》(柯灵编剧,佐临导演)、《艳阳天》(曹禺编导)等。这些影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 二、主要影片公司及其成就

### (一) 亚细亚影戏公司

亚细亚影戏公司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公司。1909年由美国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经营,先后在上海拍摄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儿》,在香港拍摄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烧鸡》。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的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等工作,两年内完成《难夫难妻》、《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老

少易妻》等 10 多部短故事片,还拍了新闻片《上海战争》和根据文明戏改编的《茶花女》,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15 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胶片来源断绝而结束摄制工作。

## (二) 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张季直、朱庆澜、程龄荪、卢寿联等集资建立的,办事处设在上海仁记路百代公司内,并在南通筑有玻璃摄影棚。同年 5 月,张季直还在南通创办了伶工学校,不久又建立了更俗剧场,并聘请欧阳予倩等人来校任教。该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是戏曲片《四杰村》。拍摄的影片主要有《饭桶》、《周扶九大出丧》、《南京的警政》、《矮子坟》、《南京风景》等。1923 年 3 月,拍摄的新闻短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记录了上海工商学各界 5 万人为反对日本拒绝废除二十一条和拒绝归还中国旅顺、大连而举行的对日外交游行示威的片断。后因资金、人才缺乏,该公司夭折。

## (三) 上海影戏公司

上海影戏公司是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0 年秋,由但杜宇创办。次年拍摄影片《海誓》,这是中国最早摄制的几部长故事片之一。后又连续拍摄了故事片《古井重波记》(1923 年)、《弟弟》(1924 年)、《杨花恨》(1925 年)、《重返故乡》(1925 年)、《还金记》(1926 年)、《盘丝洞》(1927 年)、《小剑客》(1928 年)、《糖美人》(1929 年)、《媚眼侠》(1930 年)、《豆腐西施》(1930 年)等。1931 年该公司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32 年末退出,1933 年又与艺华影业有限公司合作拍片,1934 年独立改组为上海有声影片公司,至抗战爆发而停止。该公司 17 年中共拍摄 30 余部故事片,大多数影片由但杜宇担任编导,前期作品多半由殷明珠主演。该公司摄制的影片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表现了但杜宇浓厚的唯美主义艺术观。

## (四) 明星影片公司

明星影片公司是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2 年 3 月,由张



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革等发起，创办于上海。初期摄制滑稽短片，1923年冬拍摄《孤儿救祖记》后，开始摄制长故事片。1927年摄制《火烧红莲寺》，开了中国影坛神怪武侠片之先河。1931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2年，邀请夏衍、阿英、郑伯奇任编剧顾问，促成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电影事业提供了契机。之后，在短期内拍摄了《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盐湖》、《丰年》、《姊妹花》等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影片，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1934年，该公司又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工作者，要求实行第二次合作，并于1936年7月进行了革新和改组，明确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建立了明星一厂、二厂。改组后，公司面貌有所改观，相继拍摄了《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该公司在15年内共拍摄影片200余部，培养了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录音、剪辑、洗印、发行在内的一整套人才，为发展中国的民族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

### （五）民新影片公司

民新影片公司是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3年在香港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21年成立的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该公司由黎海山任经理，黎民伟任副经理，以拍摄新闻片为主。1924年，将为梅兰芳拍摄《西施》中的“羽舞”片断、《霸王别姬》中的“剑舞”片断，以及其他京剧舞蹈片断，剪辑成一部戏曲短片。同年冬，在广州建立摄影棚，为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拍摄了一批反映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同时，还拍摄了根据《聊斋志异》中的《胭脂》改编的同名时装影片，全片共8本。后因香港大罢工，制片工作暂停。1926年迁往上海，建立厂地，并开办民新影戏专门学校，聘请欧阳予倩、侯曜、孙瑜等参加编导工作。拍摄的影片有欧阳予倩创作的同情劳动人民、暴

露社会黑暗的《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也有侯曜编导的逃避现实、流露某些颓废情绪的《和平之神》、《海角诗人》等。1927年后，还拍摄了一些古装片、武侠片和宣扬封建迷信的影片。至1929年，先后拍摄了20多部影片。同年，与华北电影公司合作拍片，不久并入联华影业公司。

#### （六）神州影片公司

神州影片公司是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4年，由学电影摄影的留法学生汪熙昌、徐琥等人创办，地址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以“潜移默化”为制片方针，不仅注意影片的内容，而且重视艺术表现的形式，被称为“神州派”。代表作品为《不堪回首》和《难为了妹妹》。主要创作人员有裘芑香、陈醉云、丁子明、李萍倩等。周克、孙师毅、万籁鸣、孟君谋等也在该公司从事过电影工作。该公司共拍摄了8部影片，在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受好评。1927年4月因营业失败而结束。

#### （七）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是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5年6月由大中华影片公司和百合影片公司合并而成。大中华于1924年1月由冯镇欧投资成立，曾拍过《人心》和《战功》两部影片。百合是朱瘦菊在商人吴性栽的投资下创办的，曾拍摄《采茶花》、《苦学生》、《孝女复仇记》和《前情》4部影片。两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百合公司后，创作了《透明的上海》、《马介甫》、《呆中福》等影片。1928年起以拍摄神怪武侠片为主。1929年底停止制片，1930年8月并入联华影业公司。

#### （八）天一影片公司

中国早期的私营电影企业，1925年邵醉翁及其兄弟创办于上海。由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负责制片兼编剧。完成最初两部影片《立地成佛》和《女侠李飞飞》后，派三弟邵仁枚、六弟邵逸夫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开拓南洋市场。1926年起拍摄了由胡蝶主演

的《梁祝痛史》、《珍珠塔前后集》、《义妖白蛇传》、《孟姜女》以及其他古装片。1928年拍摄了《混世魔王》、《乾隆游江南》等神怪武侠片。1931年,利用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和技术,拍摄了中国最早发声影片《歌场春色》。三十年代在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下,先后拍摄了《飞絮》、《飘零》、《挣扎》、《海葬》、《母亲》等较有社会意义的影片。1937年在完成《花花草草》等影片后,即结束了上海的制片活动,把全部资金迁往香港,成立南洋影片公司。该公司在12年中拍摄了无声故事片60余部,有声故事片35部,长短新闻片、纪录片15部。

### (九) 联华影业公司

中国私营电影企业,全称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29年由罗明佑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裁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电影机构合并而成,罗明佑任总经理。除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外,在上海设分管理处,在北京设分厂,并建立演员养成所。由于该公司善于网罗人才,尤其注意吸收具有新文化思想的艺术人员参与和创作,使其创作面貌有别于其他公司。在1930--1932年间,共拍摄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恒娘》、《一剪梅》、《南国之春》、《野玫瑰》、《人道》、《共赴国难》、《火山情血》、《奋斗》等长故事片28部。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和该公司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从1933年开始,影片较初创时期有明显变化。在1933—1934年间,摄制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影片,如《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渔光曲》、《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大路》、《神女》、《新女性》等。这些影片被当时舆论肯定为“新派”电影的代表。其中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不仅在国内创上座最高纪录,而且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状。1936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由华安电影公司接管,但仍沿用联华名义发行,并拍摄了《狼山喋血记》、《孤城烈女》、《联华交响曲》、《将军之女》、《艺海风光》等有声影片和有声戏曲

片《斩经堂》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

#### (十) 艺华影业有限公司

中国私营电影企业,查瑞龙创办,严春堂任总经理。在田汉、阳翰笙等帮助下,完成抗日影片《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等。1933年夏增资扩大,建立摄影棚,9月改组成立艺华影业有限公司。同年11月,发生蓝衣社捣毁艺华公司事件。其后,继续得到田汉、阳翰笙以及史东山、应云卫、卜万苍等编导支持,并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一个基地。在1934—1935年间,先后完成《黄金时代》、《飞花村》、《生之哀歌》、《逃亡》、《人之初》、《时势英雄》、《凯歌》等影片。1936年后,改变制片方针,拍摄出《化身姑娘》、《喜临门》、《三星伴月》等19部商业片。在1938—1941年间,艺华在上海租界内继续拍片,先后完成54部影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

#### (十一) 新华影业公司

中国的私营电影企业。1934年由张善琨创办于上海。1935年完成的两部影片《红羊豪侠传》(杨小仲导演)和《新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导),奠定了该公司的基础。随后,由于进步电影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又摄制出一批颇受世人注意的影片:如史东山编导的《长恨歌》、《狂欢之夜》,吴永刚编导的《壮志凌云》,徐维邦编导的《夜半歌声》,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青年进行曲》等。这些影片与现实结合密切,艺术上各有特色,成为中国抗战前夕爱国进步电影的组成部分。1938年摄制了18部影片,除《雷雨》和《貂蝉》外,其余为商业片。1939年,该公司邀请欧阳予倩创作电影剧本《木兰从军》,以华成影业公司名义拍摄发行,在观众中产生很大影响。1942年2月,宣告停业。

#### (十二) 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的私营电影企业。前身是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德建等人经营的一家电影器材制造公司。1934年夏,司徒慧敏与其堂兄司徒逸

民等人合作,在左翼文化工作者参与下,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组为制片公司,夏衍、田汉等领导公司的创作工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该公司共拍摄了四部优秀影片,即《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1934年)、《风云儿女》(田汉编写故事、夏衍改编、许幸之导演,1935年)、《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1935年)、《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1935年)。这四部影片宣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5年9月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而停办。

### (十三) 西北影业公司

中国的私营电影企业,1935年5月由阎锡山出资在太原创办,以拍摄新闻片、教育短片为主。完成第一部故事片《千秋万岁》后,上海一部分进步电影戏剧工作者宋一舟、田方、蓝马、王斌、王苹等先后加入该公司,拍摄了影片《无限生涯》。1936年11月,拍摄、剪辑完成新闻纪录片《绥蒙前线》。1938年,公司的制片厂迁往成都。1939年底,该公司完成上映了迁成都后的第一部作品、优秀的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次年又拍摄了《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在后者即将拍摄完成时,公司被阎锡山下令停办。

### (十四) 中央电影摄影场

中央电影摄影场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5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电影股,后扩建为摄影场,是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在“七七”事变之前,没有拍出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八一三”后迁往芜湖,1938年初转迁重庆,相继拍摄了《克复台儿庄》、《东战场》和《抗战纪实》等反映抗战的新闻纪录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该场为中心,对电影事业进行接收。该场通过接收扩展至三个厂,一厂、二厂设于上海,三厂设于北平。由于缺乏电影人才,该场不得不吸收一些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而使其在抗战后的数年中,仍拍出了几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故事片。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主要有《遥远的爱》、《松花江上》等。描写战后时期,尤其是国民党接收过程中下层

人民悲苦遭遇的影片主要有《天堂春梦》、《追》、《还乡日记》、《乘龙快婿》、《幸福狂想曲》等。1949年,该场停止拍摄工作,迁往台湾。

#### (十五) 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统治区的电影企业。1943年5月,日本指使汪精卫傀儡政府,把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使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从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共拍摄80部故事片。从内容看,这些影片多以家庭伦理、爱情纠葛为主题,如《燕迎春》、《两地相思》、《鸾凤和鸣》、《大富之家》、《何日君再来》、《恋之火》、《摩登女性》等。此外,还有新闻片《中华电影新闻》以及与日本合作拍摄的《万紫千红》和《春江遗恨》两部影片。

#### (十六) 昆仑影业公司

中国的私营电影企业。原由夏云瑚、任宗德合资经营,与大业公司合拍过《迎春曲》一部影片。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华影艺社与该公司合并,仍名昆仑影业公司。由夏云瑚任总经理兼厂长,孟君谋任副厂长。该公司由此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的基地。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归该公司发行,下集《天亮以后》由该公司继续摄制。1947年10月,完成上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再次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创造了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之后,又先后拍摄了《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等比较优秀的影片。1950年与其他私营制片机构改组为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 (十七) 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是1938年秋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的电影制片机构。建团时仅有李肃、袁牧之、吴印咸等6人。主要器材由袁

牧之自香港购置,另外还有伊文思馈赠的一架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建团后即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生动地记录了各地青年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及八路军战斗生活的镜头。此后,又摄制了记录白求恩生活与战斗片断的《白求恩大夫》和记录南泥湾生产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纪录片及一些新闻片。后来,该团队不断扩充,至1942年已增至40余人。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摄下了此次盛会的历史镜头。该团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起点。

#### (十八) 东北电影制片厂

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的钱筱章、田方、许珂等人组建,于1946年10月1日在兴山正式成立。由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新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它既摄制了大量的新闻纪录片,也拍摄了美术片《皇帝梦》、《瓮中捉鳖》,科教片《预防鼠疫》,并制作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特别是试制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林其编导)。这是人民电影事业向多片种生产发展的开端。同时,还组织编写了长故事片剧本,并陆续投入拍摄,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电影的第一批长故事片诞生做好了准备。

# 第八章 科学技术

---

## 第一节 概述

---

1912—1949年,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大致经历了奠基、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三个时期。

1912—1927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时期。

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拉开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帷幕。该社1914年由中国留美学生成立于美国,1918年从美国迁至上海,后迁至南京。在它的推动下,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开始了草创与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1913年,北京政府工商部创办地质研究班,次年改为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任所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1922年1月27日,章鸿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到会者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和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继地质学之后兴起的是生物学。在生物学领域,钟观光不避艰险,跋涉万里,惟珍奇草木是求,开创了植物采集和研究的风气;钱崇澍执教大学,著书立说,开植物生理学研究之先河;王家揖先后调查南京和厦门的原生动物,取得了动物学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同时,数学、物理和化学研究也开始



起步。胡明复、陈建功、苏步青等在数学领域发表了首批科研成果；李耀邦、吴有训、叶企孙奠定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任鸿隽于1915年发表化学论文《化学元素之命名说》，填补了中国人化学研究论文的空白。现代气象事业的发展始于1912年。这年6月，南京临时政府派员前往北京，筹建观象台。12月29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参议院决议，中央观象台设天文、历数、气象、磁力四科。1913年，气象科开始工作。次年编印《气象月刊》，1915年改为《气象丛刊》。在工程技术方面，詹天佑于1918年9月负责建成汉粤川铁路中的武(昌)长(沙)段，共360公里，刘仙洲从1918—1924年编写出《机械学》等6本中技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的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贡献。

1927—1937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初步发展时期。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李煜瀛(石曾)、张人杰等为筹备委员。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通过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随后，北平研究院和其他科研机构纷纷创办。到1935年1月，全国共有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34个，出版应用技术书籍273部，自然科学书籍170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李四光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黄汲清出版《中国南部之二叠纪地层》等著作。地质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皆负盛名。秦昌仁、胡先骕、张景钺、冯言安等人广采标本，建立植物园，出版著作，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同时，动物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门类不断增多。物理学领域更为活跃，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丁燮林、严济慈、王守敬等人，在美、英、法、德等国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表明中国现代物理学已基本形成并且得到了初步发展。化学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高宗熙创造的高级脂肪族化合物、萨本栋制成的各种脂、庄长恭关于 Sterols 化合物的研究、袁翰青关于立体

化学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比较突出的成果。侯德榜致力于纯碱制法的研究,并有新的贡献。1930年以后,在数学领域里,苏步青、华罗庚、熊庆来等一批新人辈出,数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1928年元旦,中央研究院成立观象台气象组,2日即改为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南京钦天山北极阁建成气象台,标志了中国现代气象学科的独立和研究工作的开始。

1937—1949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西迁,辗转至西南地区的昆明、重庆等地。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然科学家们仍然坚持科研活动。在数学领域里,姜立夫、陈省身、陈建功、华罗庚、苏步青、江泽涵、许宝騄等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在物理学领域里,吴大猷、张宗燧、郭永怀等人的科学研究放出异彩,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化学领域里,“黄鸣龙还原法”和“侯氏制碱法”令世界瞩目。1941年9月21日,天文研究所观测到日全食,这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国天文学领域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此外,茅以升、凌鸿勋等人,在工程技术领域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科学技术事业,为推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其宣言提出以下几项任务:一是开展自然科学大众运动;二是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三是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四是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当时自然科学界应有的任务。1941年,朱德发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明确指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发展科学技术。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科学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

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工作者。”

---

## 第二节 主要科研机构 and 学术团体

---

在中国现代史上,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较多,这里仅将其主要者简介如下:

### 一、中央研究院

1927年5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李煜瀛(石曾)、张人杰等人为筹备委员。同年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会议通过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以蔡元培为院长,以杨铨为秘书。1928年,该院在南京成贤街设总办事处,在清凉山一带占地千亩,另在上海新西区及小木桥占地约190多亩。从1930年2月起,该院共成立物理、化学、工程、气象、天文、地质、社会科学和历史语言八个研究所,后又增加了动植物和心理研究所。另外还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和汉籍图书馆筹备处。全院研究人员(包括专任研究员、兼任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外国通讯员、助理员以及专任、兼任编辑员)共193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往昆明、重庆和成都。1945年,又陆续迁回南京和上海。后迁往台湾。

### 二、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是全国性学术团体。1914年6月,由在美国各大学

留学的中国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发起成立。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学术之发达”为宗旨。1915年1月创办《科学》杂志，至1950年12月共出版32卷。1915年10月，该社制定会员新章程，当时共有会员170名，有农林、生物、化学、机械、电气、土木、采矿、冶金、物理、数学等人才。1918年，该社总部由美国迁到国内。按1919年第四次年会报告，共有会员604人，其中农林44人，生物17人，化学36人，化工37人，土木65人，机械69人，电工60人，矿冶79人，医药32人，物理数学42人，经济48人，其他75人。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界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曾是该社的成员。它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三、中国天文学会

中国天文学会是群众性学术团体。1915年开始筹建，1922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任会长高鲁、副会长秦汾。学会的任务是：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天文学书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普及天文科学知识。学会先后出版的期刊有：《观象丛报》、《观象汇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宇宙》、《大众天文》和《会员通讯》等。学会还编译天文图书，修订天文词汇，奖励天文学著述，以及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1935年，该会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起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了1936年和1941年两次日食观测。

### 四、中国化学会

中国化学会是中国化学家自愿组成的学术团体。1932年8月，由王箴、王琏、戈福祥、吴承洛、李方训、邵家麟、倪则损、张江树、张洪沅、陈裕光、曾昭抡、邬保良、黄新彦、叶峤、戴安邦等45人在南京发

起成立。它以“联络国内外之化学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展”为宗旨。理事会是学会的领导机构。自学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共改选了16届理事会。陈裕光、曾昭抡、吴承洛、张洪沅、范旭东等人担任过会长、理事长;吴承洛、高济宇等人担任过总干事、书记。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150余个。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出版《化学学报》、《化学通报》、《物理化学学报》、《无机化学学报》、《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学术期刊。学会在开展化学教育、化学名词审定等学术活动的同时,还结合国防和工业建设的需要开展了许多开拓性的化学研究工作。

## 五、中国物理学会

中国物理学会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全国性的学术团体。1932年8月,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P.朗之万的促进下,由梅贻琦等人在北平筹建成立。按照学会会章,学会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推选4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后来会章屡有修改,会长、副会长的名称亦有变更。任会长(理事长)的历届学者为李书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等。学会的学术活动是通过年会和专门组织来展开的。学会成立时就设立了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教学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又增设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除最后一个委员会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是学报和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赓续不断。1933年,《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当时规定学报用英、法、德文印行,但附有中文摘要。学报出版至第3卷第1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在1939—1945年间又出版了5期。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在当时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其首次审查结果于1934年刊印公布,此项工作延续至今。同时,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提出了建议,并为当时中国

科学界所采纳。

## 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是中国机械工程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5年,由刘仙洲、庄前鼎、杨毅、顾毓琇、王士倬、王季绪、李辑祥等7人在北平发起筹建,1936年在杭州正式成立。学会最初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一个分支,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前身又是1912年由詹天佑发起成立的中华工程学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会停止活动。1941年学会改选负责人,发展会员983人,成立地方学会7处。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型综合报告会,编译图书,参加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并出版《机械工程学报》。

---

##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

---

### 一、数 学

数学领域人才济济,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都是著名的数学家。陈建功专攻函数。1921年,他在日本发表处女作《关于无穷乘积的一些原理》。随后不到10年时间,又连续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数十篇。1930年,他用日文写成第一部专著《三角级数论》。此书从理论上解决了满足什么条件的函数可用绝对收敛三角函数表示问题。这一重要成果的获得,比世界著名数学家哈代和李特伍德还早数年。此外,他在直交函数级数论上也有突出贡献,如论证得门孝夫、波尔根和卡斯乌茨得到的直交函数级数的两个重要定理是等价的。1928年,他又改进了拉特乌赫关于勒贝格函数的估计问题。苏步

青主要研究微分几何学。1927—1949年,他共发表论文103篇。1942年,撰成专著《射影曲线概论》一书。1947年,又出版了15年来历经修改的《微分几何学》教材。他的这些成果为解放后微分几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罗庚是我国数论的继承人和创新者,解析数论的前驱。在抗战期间,他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该书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苏联维诺格拉朵夫院士的“三角和法”,改进了维诺格拉朵夫的中值定理,并把“华林问题”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加以推广,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陈省身的主要成就是把几何与拓扑联系起来,他对 Gauss-Bornet 定理的证明以及示性类的研究,被国际上誉为这方面研究的顶峰。同时,他在与几何有关的领域(如代数拓扑、代数几何、偏微分方程等)中,进行了划时代的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许宝騄的早期成就表现在统计学方面。1938年,他创立了在两个正态母体方差未知的情况下,检验它们的数学期望是否相等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在解决问题时最为实用,被后人誉为“许氏方法”。他早期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关于线性模型方差的二次估计。继之,他又在多元分析中作出了不少重大贡献,求出了多元分析中 Wishart 等许多重要分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还发展了矩阵论中的某些方法。此外,他在概率论、马氏链、序贯分析、试验设计、代数等众多领域也都有所建树。

## 二、物 理

物理学领域,人才辈出,成果甚丰。李耀邦在1914年以 R. A 密立根的方法,利用固体球粒测定  $e$  值,取得先进性成果。胡刚复在1918年对 X 射线放射机制的研究,对推测原子结构有重要意义。叶企孙在1921年与人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得出当时最精确的数值,

沿用了 16 年之久。吴有训在 1925 年对康普顿效应的系统研究,是对 A. H. 康普顿的发现的有力支持。王守竞在 1927 年把量子力学的概念成功地运用于研究氢分子和转动量子化的问题。赵忠尧在二十年代末对硬  $\gamma$  射线的反常吸收的研究,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湮没辐射的现象,为正电子的发现做了有益的工作。王淦昌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和任何粒子都有反粒子相对应的观点。钱三强和何泽慧在四十年代创制了多丝火花计数器,发现  $M^-$  子原子,并直接证明  $M^-$  子的弱作用,对研究原子核结构有启示。此外,严济慈关于压电晶体和光谱学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特别是湍流理论的研究,钱临照关于水晶压电现象的研究,任之泰关于微波的研究,饶毓泰关于原子和分子光谱的研究,吴大猷关于分子光谱的研究,胡宁、朱洪元和周光召等关于基本粒子的研究,彭桓武关于介子理论和用辐射阻尼理论对宇宙线的研究,黄昆对固体物理学,特别是点阵动力学的研究,萨本栋关于电路分析的研究,王竹溪和张宗燧关于统计物理学的研究,葛庭燧关于金属物理,尤其是对内耗实验和理论的研究,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

### 三、化 学

在化学领域里,人才广布,科研成果显著。

无机化学。1921 年,侯德榜应聘,与实业家范旭东合作,建设了当时为亚洲第一大碱厂的天津塘沽永利制碱厂,接着于 1922 年又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社,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化学工业的新纪元。1932 年,他用英文撰成《制碱》一书,首次把苏尔维法制碱的秘密公布于世,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制碱工业的权威性著作。1942 年,他又研究成功了“侯氏制碱法”,把苏尔维碱与哈伯合成氨创造性地组合在一起,为我国联碱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有机化学。在天然有机方面,特别是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对麻黄素的药理作用,钩吻和汉防己生碱等的分离及结构分析作了研究。在合成方面,三十年代,庄长恭等报道了雌性激素类似物去甲脱氢雌甾醇的全合成;其他工作者也曾报道孕甾二醇及其葡萄糖醛酸苷的分离定量研究,并初次报道了双胞胎孕妇尿中有大量糖醛酸苷。同一时期,庄长恭在完成麦角固醇支链的化学结构研究以后,即着手进行雌甾类化合物模型的全合成研究。1941年,他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应用 Diels-Alder 反应, Dieckmann 反应环化多环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甾族碳架的菲族类似物,在该领域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氨基酸合成方面,林国镛、黄耀曾等利用 Hoffmann 反应原理,改善了合成反应条件,制备了 19 种氨基酸;程有庆等用玉蜀黍粉、豆饼及不同的金属催化剂合成了 d-型麸氨酸,以铜与三氯化铁为催化剂时,得率提高。

同位素化学。1931年,中国学者发现重氢,其性质与轻氢有明显差异。而 1935 年重水的投产,为同位素化学的研究提供了广泛实验的条件。因此,我国学者于 1935 年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1936 年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而且在四十年代的实验工作中,进行过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这些研究工作,为中国同位素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物理化学。三十至四十年代,以中央和北平两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为中心,组织和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工作。其研究不仅在传统领域,如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和胶体化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在一些新领域,如分子光谱、X 射线晶体系、量子化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发表了 300 余篇论文。

热力化学。关于相平衡研究,Tali 在研究液态铁中氢为硫化合之

平衡时,总结出  $K = \frac{[\text{H}_2\text{S}]}{[\text{H}_2]} = -4500/T + 0.0095$  的公式。黄子卿于1938年精确地测定了水的三相点( $0.0098/\pm 0.00005^\circ\text{C}$ )。在当时该结果是最精确的,曾被国际上采用为温度标准数据。关于汽态及物态方程式研究,李相杰、张青莲、苏国桢、黄子卿等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关于热力化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从光谱数据推算分离能、焓值,由电动势数据计算自由能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外,在1931—1939年间,曾昭抡、孙承谔、陈尧初、李世璠、李运华、朱振钧等人还对有机化合物的沸点、熔点、气压等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分子光谱。在中国现代史上,饶毓泰是开展分子光谱研究工作的第一人,并培养了吴大猷、郑华炽等人才。吴大猷撰写了中国第一分子光谱专著《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构造》。他还和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同事对乙炔的位能函数、乙烯及卤代物的基频归属、苯的拉曼光谱和同位素效应,以及其他一些分子和离子的结构与分子常数等,都做了许多研究。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严济慈、翁文波和钱三强,研究了碱金属二原子分子  $\text{Na}_2$ 、 $\text{K}_2$ 、 $\text{Rb}_2$ 、 $\text{CS}_2$  的电子吸收光谱和位能曲线。严济慈和钟盛标还精确地测量了  $\text{O}_3$  的紫外谱带的吸收系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吴学周、柳大纲和朱振钧,测定了若干直线型多原子分子  $\text{HCN}$ 、 $\text{ClCN}$ 、 $\text{BRCN}$ 、 $\text{ICN}$ 、 $\text{C}_2\text{H}_2$ 、 $\text{C}_2\text{N}_2$  和  $\text{C}_3\text{H}_2$  等的电子光谱,并从分子的振动基频算出力常数,还从异氰酸酯和硫代异氰酸酯的紫外吸收光谱中求出分解能。

原子发射光谱。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开展原子发射光谱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戴安邦以浸泡过金属盐类溶液的棉纱代替铂,用分光镜观察金属在火焰中的光谱,为检验金属元素提供了一种简便而准确的方法。张定钊用电弧光谱分析法做了钼、铋、锡及钨矿石的定性分析,指出某些矿石含稀有元素;用化学法及光谱法做了中国萤

石的定性分析;还用简单的光谱半定量法估计了萤石样品中 La、Ce、Dr、Na 及 Sm 的相对含量。此外,他还介绍了一种定性分析用的简单的光谱图表。

放射化学。1934 年,玛丽·居里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郑大章回国,从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的居里实验室带来了放射化学。当时,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聘请郑大章参加筹建该院镭学研究所,从此中国开始了放射化学的研究工作。次年,郑大章及其助手发表了一系列镤的定量提取及其载体元素化学的文章;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镤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钍系对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为了在国内寻找铀矿石以供研究,郑大章等以捷克的育新斯泰铀矿附近温泉水中含有异常高浓度的氡为借鉴,在我国各地广集著名温泉水,并测定其中氡的浓度。1938 年以后,郑大章和杨承宗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得很强的  $UX_{1+2}$  ( $^{234}\text{Th} + ^{234}\text{Pa}$ ) $\beta$  放射源,发现了  $\beta$  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成为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及其厚度的原理。另外,1937—1939 年间,卢嘉锡对核化学进行了最早研究。他与英国 S. Sugden 教授在热原子化学体系中使用了添加剂,发现了添加剂的清除效应,从而提出了一种著名的浓集卤素放射性核素的方法,为定量研究同位素交换动力学创造了条件。1938 年后,吴征铠曾对铀酰盐的红外及拉曼光谱学进行了研究。在巴黎的居里实验室,杨承宗对离子交换法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化学性质极为相近的放射性核素之间或与其载体元素的分离。不久,此法因在稀硫酸溶液中可浓集低浓度的铀而得到广泛的发展。

#### 四、生物

在中国现代生物学发展的早期,生物学家首先对中国的动植物

资源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钟观光。他在1918--1921年间对中国的植物种类和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采集标本达10万份。1919年,胡先骕在浙江也采集了大量标本。从此开创了我国学者自己采集标本并用现代方法进行分类学研究的历史。1922年以后,胡先骕、钱崇澍先后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工作,组织进行了华东和沿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研究工作。1928年,胡先骕主持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派员到华北和西南各省调查研究,建立标本室,定期出版汇报和图谱。这两个机构是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分类学在中国兴起,成了生物学在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领域,形成了一支有相当水平的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队伍。胡先骕是中国现代富有成就的植物分类学家之一,他一生发现了一个新科、六个新属、一百几十个新种。钱崇澍主要研究华东植物,涉及分类、区系和植被等方面。陈炳镛主要研究华南植物,主攻樟科、胡桃科和山毛榉科植物,发现了几十个植物新种。此外,吴蕴珍对华北植物,刘慎愕对西部和北部植物,裴鑑对马鞭草科和药用植物,方文培对西部植物和石南科,孙雄才对唇形科,林镛对龙胆科和菊科,耿以礼对禾本科,郑万钧对裸子植物,张肇騫对菊科、堇菜科、胡椒科,秦仁昌对蕨类植物,陈邦杰对苔藓植物,李良庆、饶钦止对淡水藻类,曾呈奎对海水藻类,戴芳澜、邓叔群对真菌类,等等,都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在四川万县磨刀溪首次发现一种罕见的裸子植物,经胡先骕、郑万钧等研究,确定它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所发现的两种化石为同一属植物,并给以新的种名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中文名为水杉。研究论文于1948年发表,引起各国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普遍重视。

在动物分类学方面,昆虫与农业、医学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很早受到了人们的注意。邹树文和秉志于1914年和1915年,分别在国外

发表了昆虫学的研究论文。胡经甫从二十年代起就从事昆虫学研究，所著《中国昆虫名录》(1941年出版)，全书6卷，4286页，包括在中国发现的昆虫25个目、329个科、4968属、20069种，是中国昆虫学的巨著之一。陈世骧、邹钟琳、关福桢、蔡邦华、杨惟义、柳友英、何琦、朱弘复等，对昆虫分类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朱元鼎、伍献文、陈兼善、张春霖对鱼类，方炳文、张孟闻、刘承钊对两栖类，寿振黄、任国荣、郑作新、傅桐生、常麟定对鸟类和兽类，王家揖、戴立生、张作人、倪达书对原生动物，陈纳逊对腔肠动物，董聿茂对沿海甲壳动物，张玺对沿海软体动物，沈嘉瑞对华北蟹类，陆鼎恒对海蜘蛛，都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开拓了道路。

在古生物学方面，结合地质学调查开展了中国生物化石的研究。周赞衡对山东白垩纪植物化石、孙云铸对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李四光对蜓科动物化石、赵亚曾对腕足动物化石、杨钟健对中国北部及云南脊椎动物化石，以及斯行健对陕西、四川、贵州的植物化石，都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著发表。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用火遗迹，这项发现举世瞩目，对研究人类起源有重大意义。

在生物学的实验研究方面，许多学者结合大学教学做了不少基础工作，获得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成果。在动物解剖、组织、胚胎等领域，从二十年代开始，秉志就对江豚、虎、白鲸等多种动物进行了一系列解剖研究。马文昭在组织学方面，卢于道、欧道翥在神经解剖学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此外，陈纳逊、陈伯康、武兆发、孟廷季、雍克昌、崔芝兰等，或在解剖学方面，或在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方面，开展工作，并皆有所建树。贝时璋、朱洗、童第周等在实验动物学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贝时璋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朱洗以许多动物为材料，探讨了精子在发育中的作用和单性生殖问题。

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以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央研究院有关单

位为核心开展了相当数量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1929年,吴宪在第13届国际生理学会上对蛋白质变性问题,首次从分子结构变化上作了解释,提出了蛋白质变性是由于原来紧紧缠绕的肽链变为了松散结构的结论。学者们还对素食和荤食动物作了比较研究,发现素食动物生长发育较差,植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较低等。林司胜等人揭示了脂肪阻遏胃液分泌的机理及胃肌的运动,并对脑交感神经中枢作了研究。张锡钧等人发现存在于周围神经上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也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并提出了“迷走神经——重体后叶反射”学说。同时,蔡翘在肝糖元新陈代谢方面,汪敬熙、张宗汉等人在中枢神经生理方面,赵以炳在冬眠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此外,汪堃仁在用组织化学方法研究酶的定位、王志均在胃肠激素、吴襄在调查中国人的生理常数等方面,也都做了不少起始性的研究工作。

在植物学方面,第一个从事植物形态学研究的是张景钺。1926年,他发表了关于蕨菜组织研究的论文。1927年秋,李继侗和他的学生殷宏章在南开大学用气泡计数法发现光合作用的瞬间效应,这个成果是发现光合机理有两个光反应的开端。罗宗洛自1927年起,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对植物矿质营养和微量元素进行了研究。1931年,汤佩松发表了关于在不同空气供给情况下小麦发芽的研究论文。

在遗传学方面,陈桢、李汝棋等人在传播现代遗传学理论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陈桢对金鱼变异和品种形成规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谈家桢提出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理论,并进行了果蝇的进化遗传学研究。

## 五、地 质

中国学者有组织地进行地质调查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这时被

派往国外学习地质的学者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陆续回国。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一些地质研究机构(如中央地质研究所)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地质专业(如北京大学地质系)。这些地质学的先驱和他们的学生所进行的工作,结束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地质调查的垄断地位,出现了由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在构造地质学方面,早在1916年,章鸿钊、翁文灏就对北京西山进行研究,于1920年出版了《北京西山地质志》一书,对北京西山的褶皱、断裂、火成岩侵入以及不整合等地质现象进行了描述。1927年,翁文灏发表了《中生代以来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和火成活动》,这是中国学者研究构造运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它系统地总结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中国东部造山运动划分为秦岭期、燕山期、西岭期、陇山期四个时期,首次提出了中生代大规模的地壳运动,并命名为“燕山运动”。1924年,丁文江又发表《中国的造山运动》一文,明确提出古生代以来中国有三次重要的造山运动:加里东、海西、燕山。李四光关于地壳运动的观点更独树一帜。1926年,他发表的《地球表面现象变迁的主因》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引起全球性大地构造变化的见解。1929年,李四光又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问题的意义》一文,将东亚的构造型式划分为按照等间距分布的五个东西构造带。1939年,李四光的重要著作《中国地质学》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大地构造问题,此书是解放前我国地质学家所撰写的第一本最全面、最系统论述中国地质的著作。1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因袭贝特朗(M. Bertrand)的造山循环说,把中国的造山运动划分为先寒武纪、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诸轮回几个阶段;他编制的中国主要构造单位图则对中国的构造单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从而确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

地质力学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学说,其主要代表是李四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吸收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地质学派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泰勒、休斯、魏格纳的活动论思想,并巧妙地把它们结合起来,用历史分析和力学分析“建造”和“改造”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从而为大地构造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多旋回说”是继地质力学之后,中国地质学家较早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大地构造学说。1945年,黄汲清对地槽褶皱带构造岩浆活动单旋回观点〔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质学家史蒂勒(H. Sülle)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中,既吸取了贝特朗的造山循环说,也提出了自己的地槽褶皱带的多旋回运动观点。这一学说不仅概括了中国地质发展的特点,而且综合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地质实际,对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有指导作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 六、机械工程

早在近代时期,中国的机械工业就诞生了。中国最早使用动力的机械厂是外商开办的,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机械厂是清政府经营的军火工业。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北洋军阀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军事工厂,如1915年建立的河南巩县兵工厂、湖南兵工厂,1919年扩建的沈阳兵工厂等。1913年前后,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清河设飞机修造厂,这是中国最早的飞机厂。这一时期,军事工业在机械工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1915—1924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机械工业的黄金时代。如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其中车床专业修造厂10家,动力机械和农产品加工机械修造厂



由 16 家增加到 48 家,纺织缫丝机械修造厂由 13 家增加到 50 家,针织机械修造厂由 3 家增加到 39 家。上海华通电业机器有限公司、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日用机器产品制造厂也是在这一时期起步的。如 1915 年在烟台创办的中宝时钟厂,是中国的第一个钟厂;1919 年在上海创办的协昌、润昌缝纫机行,为中国最早的缝纫机厂。但这些靠民族资本发展起来的机械厂,基本上都是小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 1926 年北伐战争以前,除大隆机器厂等个别企业有所发展外,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工业大都陷入困境。

但是,从中华民国成立到 1926 年,中国在机械工业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1912 年,上海家兴工厂制造出手摇袜机及小型针筒槽铣床。1913 年,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烧球式 40 马力柴油机;兵器方面制造出了新型迫击炮、步兵炮、山炮等。1915 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车床。1918 年,江南制造局生产出为万吨远洋运输舰配套的 3430 和 3668 马力蒸汽机;上海王岳记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 3 号万能铣。1922 年,上海增茂五金厂开始生产小口径低压阀门、管接头。1924 年,上海新祥机器厂首先仿制成 16 马力、24 马力等五种规格低速重型柴油机。1926 年,上海丰泰机器厂和福昌祥机器厂分别制造出 1 号、2 号万能铣;上海华德机器厂生产出铸铁阀门,最大口径 6 英寸。

从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 1937 年抗战爆发,中国机械工业起色不大。但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兴起的抵制外货浪潮的推动下,机械工业也有过局部的、短暂的发展。国民政府于 1931 年在上海筹建中央机器厂(后因抗战爆发而停顿);1936 年在湘潭开始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因抗战爆发迁往昆明),下设电线、灯泡、电话机、电机 4 个分厂。兵工系统重点扩建了南京、汉阳等兵工厂。航空委员会于 1934 年在杭州建设成中央飞机制造厂,1936 年在南昌建立制造轰炸

机的飞机厂。这一时期,在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的情况下,生产的主要产品有:自动螺丝机、灯泡用钨丝机,排水量 4275 吨长江客货轮、排水量 2383 吨护航舰,50 马力以下柴油机、200 马力以下煤气机,200 千瓦以下交流发电机及电动机、6600 伏以下变压器,18 英尺普通车床、14 英尺龙门刨床及摇臂钻床、万能铣床、冲床等中小型机床和锻压设备,小型离心泵、风机、空气压缩机及轻纺工业的小型纺纱厂、织布厂、缫丝厂、制革厂的成套设备等。

抗战时期的机械工业以从沿海内迁的企业为主体。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工厂,至 1941 年底内迁 230 家,复工者 198 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重庆的周恒顺机器厂、顺昌铁工厂、新民机器厂、民生机器厂、中国机器厂,五通桥的永利化学公司机器厂,广西的纺织机械厂,湖南的新中工程公司等。内迁的国营机械厂主要有兵工署所属设于昆明、重庆、泸州、桐梓、万县的 10 多个兵工厂,航空委员会的第一、二、三制造厂和大定发动机厂,还有交通部门的铁路工厂、汽车修配厂、通讯器材厂等。这一时期,也新建了一批机械厂,大多数设在昆明、重庆。如资源委员会于 1938 年在昆明设立的中央机器厂、交通部于 1938 年在重庆设立的中央汽车配件厂以及农业部设立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重庆厂等。

在这一时期,机械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其主要表现,在动力机械方面有:恒顺机器厂生产的 120 和 180 马力船用蒸汽机,新中工程公司的 65 马力、1800 转/分的四缸柴油机,中央机器厂的 250 马力、600 转/分的煤气发电机组,上海机器厂的小型水轮机等。在交通机械方面有: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桐油汽车,新中工程公司的煤汽车,交通部汽车配件厂的汽车齿轮等。在轻纺机械方面有:中央机器厂、中央工业试验所机械厂的车床、铣床、磨床和铣刀。在试验仪器方面有:中央工业试验所机械厂的油类、纤维、纺织、金属等试验仪器。在军火方面有:兵工署各厂的 150 毫米迫击炮、中正式 79 步枪等制式

兵器等。此外,还有航空器材方面的产品。全国共生产机床 2615 台、交流电动机 22000 千瓦、变电器 16000 千伏安、内燃机 3900 马力、蒸汽机 4500 马力。

# 第九章 新闻 出版

---

## 第一节 新 闻

---

### 一、概 述

在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时期。1915年,随着新文化运动报刊的创办,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大清报律》无效,在民国报律没有颁布之前,先定《暂行报律》3章,令报界共同遵守。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6条第4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纷纷涌现。在南京有临时政府对外宣传刊物《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共和西报》等;北京有《亚东新报》、《中央新闻》、《国华日报》等;上海有《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武汉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江报》等。此外,广西、广东、四川、云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区均有报刊出现。据统计,1913年,全国共有报刊500余种。

袁世凯窃取民国政权后,于1914年4月制定《报纸条例》,对革命派报刊横加摧锄,致使有的报刊被查封,有的报刊被迫停办。据统计,到新文化运动前夕,全国仅存报刊130余种。同时,他扶植御用报刊,并怂恿黄色小报。其御用报刊有北京的《京津时报》、《天民报》、《黄钟日报》,天津的《庸言》,上海的《时新报》,武汉的《国民新报》,湖南的《湖南公报》,广东的《华国报》等。黄色小报有《晶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金刚钻》、《福尔摩斯》等。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低潮时期。

自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起(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宣传新思潮的报刊风行一时。仅在1919年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新出版的报刊就达5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主持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等。这些新型报刊,在办报宗旨、组织稿件、报刊形式等方面都有了突破。这一时期,报刊副刊有了重大改革。当时的“四大副刊”即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及《京报》副刊,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办报风格活泼。这些报刊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919—1927年,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新闻工作,出版了一批无产阶级的报刊。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新青年》改组为理论刊物;同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1922年9月,又创办《向导》周刊。《新青年》、《共产党》和《向导》皆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时期,一些小型的工人报刊尤为活跃,如《工人周报》、《劳动周报》、《真报》、汉口《真报》、《热血日报》等。国民党的报刊也有了较快发展,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建设》等报继续发展。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为专门读者服务的报刊,如《革命军人》、《中国农民》、《中国工人》、《中国青年》

等。不仅各种报刊的总体数量保持着增长的趋势,而且新闻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23年,平民大学在邵飘萍支持下增设了新闻系,上海大学也开设了新闻课程。1925年,民国大学设立新闻系。一些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如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

1923年1月,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由美国人在上海创办。1926年10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开始播音。一些通讯社也随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初具规模。1927年,蒋介石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包括通讯社网、广播网和报刊网在内的新闻事业网。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通讯网的中心。该社于1927年6月在南京创办。它通过全国的11个分社和30个通讯员,控制新闻发布权。《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报刊网的中心。该报于1928年2月在上海创办。它以《晨报》、《中国日报》、《东南日报》为附翼,组成了国民党党政军报网。中央广播电台于1928年8月1日开始播音,它是国民党广播网的中心。国民党从以上三个方面,控制全国的新闻舆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冲破蒋介石的文化“围剿”,迅速地向前发展。革命根据地报刊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突出特点。1931年11月7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创办了红色中华通讯社,12月11日,在瑞金创办了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1932年,在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此外,中央根据地、各级党、政、军及研究团体也出版了不少报刊。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条件下,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版有《右江日报》,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出版有《红旗日报》、《工农日报》,湘鄂赣区出版有《红旗》、《苏维埃》、《新浏阳》等。此外,在国统区,还有《布尔塞维克》、《红旗》、《红旗日报》在秘密发行。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1931年10月23日,中国新闻研究会在

上海成立；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发展。

1937—1945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抗日、爱国、进步报刊的纷纷创办，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突出表现。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中心从南京、上海向武汉、重庆转移，为此，在武汉、重庆和全国各地又创办了一大批党报和军报。在武汉，陶希圣、周佛海、何肇基、陶百川等先后创办了《民意》、《血路》、《抗战导向》、《抗战汇报》等刊物；在西安有《文化批判》、《抗战与文化》、《思潮》、《西北角》等；在广州有《时代动向》；在江西有《政治汇报》；在浙江有《胜利》等。据1944年统计，国民党共有省市级党报41家，县市级党报397家。这些报刊既有抗日救亡的宣传，也有反共反人民的宣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不仅在数量上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国统区，1937年，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出版；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发行，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这两份报刊，是国民政府统治区宣传团结抗日的旗帜。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于1936年恢复出版《红色中华》，1937年1月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39年将《新中华报》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7年1月，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这是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中央机关刊物。1940年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1941年5月，《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这是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在广大敌后根据地，各种小型报刊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晋察冀边区有《抗敌报》、《救国报》等百余种；在晋冀鲁豫边区有《中国人民》、《战斗日报》等百余种；在山西

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有《战斗导报》、《大众抗日报》等 50 余种；在晋绥边区有《战地通讯》、《西北战线》等 50 余种；在山东解放区有《大众日报》、《鲁南大众报》等 70—80 种；在华中地区有《新华报》、《抗敌报》等 300 余种。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发展，1938 年 3 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938 年 10 月，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正式成立。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垄断。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于 1945 年 9 月公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接管了日、伪的新闻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新闻事业的垄断。全面内战爆发后，这种垄断进一步加强，《新华日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等大批报纸被迫停刊。

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新闻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解放区新办了大批报刊，如东北的《东北日报》、华中版的《新华日报》、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晋绥的《晋绥日报》等，都有较大影响。新华社在扩大改组总社的同时，还不断在新解放地区设立分社，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 年，新华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北平，华北《人民日报》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 二、主要新闻团体

1912—1949 年，全国各地创办的新闻团体大约有十余个，主要者如下：

### （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 年 10 月 14 日在北京成立，初名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次年 2 月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副会长徐宝璜。著名记者邵飘萍和



徐宝璜被聘为指导教师,学员以北大师生为主,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等都曾经入会学习。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向学员讲授新闻采访和新闻学理论等课程。办有《新闻周刊》作为学习园地。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刊物。1920年12月,因主要负责人离校,研究会停止活动。该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序幕。

## (二)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

简称“记联”,1932年3月20日,由国统区的一些进步新闻记者在上海组织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斗争纲领》、《开办国际通讯社传播革命消息》、《广泛建立工农通讯员》、《开展工厂、学校、兵营的墙报活动》等决议,提出“争取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反抗国民党对新闻的统治及其新闻工具的法西斯式宣传、实行新闻大众化等主张。不久,在上海法租界开办了国际新闻社,编发抗日稿件。1934年1月7日,创办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阐扬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集纳主义”。还出版了小型报纸《华报》。1935年秋,创办公开对外发稿的中华新闻社。1936年5月,为适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宣告停止活动。

## (三)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这是全国性的组织。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创建,次年3月在武汉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及学会《简章》。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术,进行自我教育,促进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求取新闻事业及其从业人员之合理保障,以致力中华民族之解放与建设。”学会名誉理事有邵力子、王芸生、于右任、叶楚傖、邹韬奋、郭沫若、张季鸾、潘梓年等,常务理事有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1938年4月,创办《新闻记者》月刊,以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教育,各地分会也出版了不少新闻刊物。由于中国在抗战初期军事上节

节失利,总会先后迁至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在桂林设有“南方办事处”,在华北敌后设有“北方办事处”。分支会遍布全国,会员达2000余人。为培养新闻人才,总会和各地分会还举办了新闻学校及训练班,开办新闻学讲座等。1941年春,国民党查封了总会和国统区的各个分会,而香港、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各分会继续坚持活动,为抗日宣传服务。新中国成立后,该学会演化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 三、主要通讯社

1912—1949年,中国主要有三大通讯社,即中央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和国际新闻社:

#### (一) 中央通讯社

全称中央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通讯社或中央社(CNA),1927年6月创立于南京,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宣传部主办。1932年进行大规模改组,名义上有自行发稿权,实际上仍受国民党中央控制。在上海、汉口、北平、天津、西安、广州、香港、南昌、成都、重庆、贵阳设有11个分社,在其他省会和重要城市派驻30名通讯员,形成全国性的通讯网,向国内250家报纸发稿。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订立合约,购买新闻稿,收发少量国际新闻。1935年9月,设英文编辑组,主要向亚洲各国发稿。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迁至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2月,迁到广州。

#### (二) 新华通讯社

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通讯社。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通讯社与报社为同一个组织机构。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有周以粟、王观澜、李伯钊、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任质斌、徐名正、韩进和瞿秋白等人。

他们既编报纸,又编文字广播稿件。1937年1月,为适应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日报社分开,各自成立单独机构。1940年12月,新华社开办口语广播,名称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4年8月,成立英文广播部。到1945年为止,新华社已经在华北、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分社。这段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廖承志、李初黎、沙可夫、向仲华和博古等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有了新的发展,廖承志任社长,余光生为总编辑,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的有艾思奇、范长江、陈克寒、钱俊瑞、石西民、梅益和徐迈进等。1947年以后,新华社担负着三项重任:文字广播、语言广播和党报的评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留有重要一页。

### (三) 国际新闻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双方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新闻界抗战人士,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发布战争新闻。委员会由胡愈之主持。“八一三”事变后,迁往香港,取名国际新闻社。1938年9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组成国际新闻社,负责人为共产党员范长江,正式编发抗战稿件,向国内外发稿。10月迁往长沙,后迁往桂林。1939年,桂林、香港两社合并,以桂林为总社,在重庆设办事处,成了在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设有通讯网的全国通讯社。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重庆两社被国民党关闭。香港分社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际新闻社在香港重建,重新向海外华侨、外国记者和国统区发稿,负责人有范长江、孟秋江、恽逸群等。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新闻社宣告结束。

## 四、主要电台

1912—1949年,中国共有几十家电台,主要是中央广播电台和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 （一）中央广播电台

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1928年8月1日在南京开始播音，呼号为XKM。最初装有500W电力中波发射机，每天播音4小时。内容有时事、国民政府决议案、施政报告、演讲、通令、宣传报告、纪念典礼、气象预报、音乐等。新闻稿件由中央通讯社供给。初隶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属专设的广播事业管理处。1932年扩充发射电力为75KW，改呼号为XGDA。1937年11月，“中央广播电台”内迁，1938年3月在重庆播音。1946年5月，迁回南京。1948年冬，开始将部分设备迁往台湾。1949年4月，改在台湾播音。

### （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家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开始播音，呼号XNCR。每天上下午各播音一次，每次1小时左右，广播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社论、《解放周刊》重要文章、国内外重要新闻及名人讲演、革命故事等。1943年春停播。1945年8月中旬恢复播音，首播内容是朱德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进军命令。1947年3月，迁到陕北播音，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之后屡迁，1949年3月，迁至北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9月，改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现场广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实况。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全国性广播电台。

## 五、主要报刊

1912—1949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所办报刊，几乎无法尽数。现择主要报刊介绍如下：

### （一）《新青年》

《新青年》的前身为《青年》杂志。《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创刊,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人和主办者是陈独秀,由群益书社帮助发行。1917年,编辑部迁往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当时经常为杂志写稿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鲁迅等。1919年第6卷起成立编委,由编委轮流主编。从《新青年》的宣传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发展阶段:从1915—1918年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为主,是为第一阶段;从1918年开始,逐渐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为第二阶段。在“五四”运动中,《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指明了方向。从1921年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与《共产党》一起发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1926年7月停刊。

## (二)《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发起人陈其美,由叶楚伦任总编辑,邵力子任经理和副刊编辑。办报宗旨是:“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唤起国民奋斗精神。”1924年,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报转为国民党机关报。1925年“五卅”运动后,逐渐被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所把持。1927年,转变为国民党中央的直属党报。1932年1月30日停刊。5月,改名《民报》而复刊。1937年停刊。1945年10月,又以《民国日报》之名复刊,直到1949年停刊。该报有当时全国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副刊,1919年6月19日始创,邵力子任主编。“五四”时期“觉悟”成为宣传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 (三)《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创办人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撰稿人有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罗家伦、张申府等。每周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每版四栏。主要栏目有:国外大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评论之评论、选论、来信、名著等。是一个小型的政治杂志,文章短小精悍,战斗力强。从第26期

起,由李大钊和胡适主编。一个月以后,胡适单独主编,开始大量登载杜威讲演录和罗素的学术观点,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一方。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查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出37期,影响很广。

#### (四)《湘江评论》

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主编毛泽东。周刊。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第1期为8开一张,第2期至第4期为4开4张。主要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宣传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第5期尚未发刊,即被湖南军阀查封。

#### (五)《向导》

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主编蔡和森。周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之一。最初每期8页,第142期起为12页,144期起为16页。主要栏目有时事短评专栏、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寸铁、读者之声等。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促进国共合作。后期,也作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宣传。该刊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编印发行,在中国内地许多大中城市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销售点。1927年7月被迫停刊,共出201期。

#### (六)《热血日报》

1925年6月4日创刊于上海,主编瞿秋白,编委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是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个日报。报纸4开4版,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紧要消息、舆论之制裁等栏目。副刊“呼声”,主要刊登小评论、杂文、通讯和文艺等。该报创刊后,立即投入“五卅”运动中,积极支持全国各地的反帝斗争。该报仅出版20多天即被当局查封,到1925年6月27日为止,共出24期,发行量达3万份。

### (七)《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第1卷由王志莘主持编辑,以宣传职业教育为宗旨。第2卷起由邹韬奋主编,宗旨要做读者的“好朋友”,全方位为读者服务。1929年12月第5卷起,选材以时事为主,注意讨论社会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成为著名的抗日救亡刊物,销售量从初期的2800多份猛增至3万多份。1932年7月,在原有基础上成立独立经营的生活书店,扩大销售规模。从1932年初开始,发表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时的销售量已达15万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1933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8卷50期。

### (八)《中央日报》

1927年3月22日创刊于武汉,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社长顾孟余,总编辑陈启修,副刊主编孙伏园,英文版编辑有林语堂、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后由汪精卫把持,不久停刊。1928年1月1日,在上海创办同名报刊,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11日迁往南京,社长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傖兼任。先后任总编辑的有彭学沛、查光佛、严慎予、鲁荡平、刘芦隐、赖琏等人,由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陈布雷、叶楚傖等组成董事会,胡汉民任董事长。先后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出版贵阳、成都、福建、安徽、广西、沈阳、长春《中央日报》等,形成了全国性的党报网。宣传上强调军令政令统一,为国民党的清共政策和消除反对派系的政策辩护。1937年迁至武汉,1938年9月迁至重庆,1945年9月迁回南京。1949年4月后迁台湾。

### (九)《红色中华》

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初为铅印4开报纸,第1—49期为周刊,第50—147期为3日刊,第148期以后为双日刊,周日休刊。主编先后有周以栗、王观澜、沙可夫、瞿秋白、李一氓、任质斌

等,主要撰稿人有周恩来、任弼时、陈潭秋、张闻天、秦邦宪、项英、李富春、谢觉哉、蔡畅、陆定一、邓颖超等。内容有社论、小时评、要闻、专电、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红色区域建设、工农通讯、工农民主法庭、赤色战士通讯、党的生活、突击队、红色小辞典等栏目,从第72期起又增设文艺副刊《赤焰》。作为革命根据地第一个中央级机关报,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积极宣传。出到第240期,因红军长征而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改为油印出版,开始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1937年1月20日改名为《新中华报》。

#### (十) 《立报》

1935年9月20日创刊于上海。社长成舍我,总经理严谔声,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张友鸾、萨空了。恽逸群主编国际新闻版,兼写社论,徐迈进主编社会新闻版;编辑还有谢六逸、张恨水等。该报提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要求文字通俗,售价低廉。每份4开,每张一分钱,创造了销售量达20万份的最高纪录。有三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和《小茶馆》。1937年11月25日,因日本侵占上海而停刊。1938年4月1日至1941年在香港出版,萨空了任总编辑。后期政治倾向日趋保守,一些进步报人纷纷离去。1941年12月8日,因被日军战火焚毁而停刊。1945年10月,由陆京士在上海复刊,杜月笙任董事长。1949年4月30日停刊。

#### (十一) 《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经理徐迈进,编辑有许涤新、章汉夫、杨放之、朱世纶、何云等。在《发刊词》中宣布,“于今团结初成之时,本报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同时本报将无情地抨击一切有害抗日与企图分裂国内团结之敌探汉奸及托派匪徒之阴谋”。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出版了在武汉的最后一期。



第二天,重庆版便问世。周恩来直接领导《新华日报》,担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开始在宣传报道中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1945年9月,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但遭到国民党的拒绝。重庆分馆继续工作,在国统区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宣传,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抗战期间,曾有华北版出版;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有华中版出版;后有南京版、西南版出版,均为中共各分局的机关报。

### (十二)《华商报》

1941年4月8日创刊于香港。邓文田任总经理兼督印大人,范长江任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张友渔任总主笔。以宣传团结抗战、和平民主为主。同年12月12日,因日军进攻香港而停刊。1946年1月4日复刊,改为日报,董事长邓文钊,总编辑刘思慕,总经理萨空了。宗旨是:“全面的和平,真诚的团结,彻底的民主。”主要栏目有言论、专栏、国内外要闻、经济版、港闻、热风副刊、读者版、漫画地图、周末增刊等。该报复刊以后,充分发挥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号召人民反对法西斯政策。1946年4月29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以秘密渠道继续发行。1949年10月15日,宣告停刊。

### (十三)《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后为陆定一。社论“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具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性质,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并撰写发刊词。1942年4月1日,实行改版,改变过去那种以大量篇幅刊登国内外通讯社消息的做法,而以报道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为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放日报》在提高质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阐述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对报刊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建立无

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思路。1947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在陕西省子长县史家畔村继续出版了几期。3月27日停刊。6年期间共出2130期。

---

## 第二节 出 版

---

### 一、概 述

中华民国成立后,规定人民有言论、著述、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创办人是陆费逵。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

在这之前,1897年由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该馆建馆后出版了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整理印行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主要古籍,并编印教科书,在国内外,特别是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居中华书局之后,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相继创办了各种出版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1916年由吕子泉等创办的大东书局;1917年由沈知方等创办的世界书局以及1925年由任联德创办的良友图书公司。它们出版的图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中小学教材、知识性读物,又有学术专著、工具书,还有画册。内容涉及政治、文艺、经济、医学、历史等多个学科。其中,综合性新闻画报——《良友》画报、《工人课本》、《农民课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辞通》、《十三经索引》、《社会进化史》、《中国文学史》、《共产党宣言》等出版后均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版机构在出版印刷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知识书籍的同时,还整理出版中国优秀古籍,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存起了积

极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新型的人民出版机构应运而生。1920年2月,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发行他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文化书社,“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人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9月,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独立为新青年社,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9月1日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取名为人民出版社,由李达总负责,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康明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及通俗宣传的小册子数种,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大阵地。1923年11月,上海书店开业,经理为毛泽民,出版发行中共中央的宣传刊物,如《共产党宣言》、《世界劳工运动史》、《平民千字课》等。1926年上海书店被查封后,又在武汉成立长江书店,在汉口创办长江印刷所,继续印刷出版革命书刊。1925年10月1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生活》周刊,后来发展为生活书店。1926年7月1日,章锡琛主编《新女性》,在此基础上扩大改组为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主持编辑工作,出版物以青少年读物为主,作风严谨,倾向进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著作权法》,限制出版自由,禁止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将中国共产党初期创办的几家出版发行机构先后查封。在国统区,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仍很活跃,1935年,钱俊卿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称读书出版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革命书刊。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海,秘密建立了地下出版发行机构——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通过私营书店、露天书摊和其他途径向外发行。在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设有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中央政府设办

了中央印刷厂；中央军委办有军委印刷所；少共中央局、中央军委、教育部等也都有各自的出版发行机构，但由于苏区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和受战事困扰，只能出版一些报纸、干部学习文件、通俗政治读物及文化课本等小册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在重庆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加强了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进步出版机构在国统区的60余处分支店，大部分被国民党当局封禁，不少工作人员被捕入狱。1942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通过各种管理规则，垄断教科书出版业务，由正中书局组织其他出版机构成立教科书“联合发行处”。在日军占领地区，一些未能及时撤离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开明、生活、世界、大东、良友等均被查封，由日伪政府直接控制出版发行。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版业却得到了充分发展。1937年4月，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设的发行科开始以新华书局（10月改称新华书店）的名义发行书报杂志，1939年单独建制，书店内部健全了机构，并与各地的发行网点取得联系，帮助各解放区建立当地的新华书店。这样，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得以发行到各根据地，甚至运送到国统区和敌占区。

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更严厉地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发行机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出版机构相继撤离。1945年8月，重庆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年三家总店在香港正式合并。1945年11月，东北日报社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东北书店，经营各项出版业务，在解放战争期间，建立201个东北分支店，发行网点遍及东北地区城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南等地均设有新华书店，并成立总店或总管理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

领导筹划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集中。1949年10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作出决议,统一了全国新华书店。

## 二、主要出版机构

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版机构众多,这里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 (一) 商务印书馆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由夏瑞芳等创办于上海。初期只经营印刷业务,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于是设立编译所,聘张元济为所长(此后任所长的有高梦旦、王云五等人,但张一直是商务印书馆领导人之一),开始编印教科书,出版西方学术和文学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小仲马的《茶花女》等,整理印行主要古籍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企业,出版各类图书也最丰富:有工具书,如《辞源》,1915年出版;有丛书,如“大学丛书”、“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有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它是一家综合性的,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出版企业。在编辑部门,聘用并造就了许多学者、作家和出版家;印刷方面,引进与采用近代先进设备和技术,对近代印刷业有着奠基作用;在发行方面,国内的分支馆,前后有86所,港、澳及新加坡设有分馆。1932年“一二八”之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全部建筑和图书、器材,被炸毁,损失极大。抗战发生,迁重庆。胜利后回沪,由张元济、陈叔通主持,直到解放。

### (二) 中华书局

1912年元旦由陆费逵在上海创办。创建初期以编辑出版学校教科书为主,内容新颖,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营业规模日益扩大。聘请了梁启超、马君武、范源濂等人入局工作。先后创办出版了《大中华》、

《小说界》、《实业界》、《中华教育界》、《学生界》、《妇女界》等8种杂志。从1919年陆费逵担任书局总经理兼编辑所长起,又创刊《改造杂志》、《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和《少年中国》月刊。三十年代出版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古代文献,并编辑出版了语文工具书《辞海》。四十年代出版了《中国政治史》(周谷城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李四光著)等著名学术专著。中华书局的分局、支局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 (三) 亚东图书馆

1913年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汪孟邹。“五四”运动后,出版新文化书籍,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并首创用新式标点、分段整理出版《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由汪原放分段标点,而且排校认真,以此出名。

### (四) 泰东图书局

1915年成立于上海,赵公南主办。“五四”以后,出版创造社的期刊和文艺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赵公南因此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拘禁三次。1927年停业。

### (五) 大东书局

1916年成立于上海,吕子泉等创办。京、穗、杭、汉口、长沙等均设分局。自办印刷所,承印教科书、钞票等。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以及社会科学、文艺、医学等书籍。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初均在大东出版。抗战发生后总管理处迁重庆,并在湘、浙、赣、渝、港等地设印刷分厂。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杜月笙曾任董事长。

### (六) 世界书局

1917年由沈知方在上海创办。1921年扩大为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盘进广智书局、俄商西比利亚洲书馆、东亚书局等,规模扩

大,编辑所、发行所、印刷厂都有相当实力,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分局30多处。创办初期,出版一些迎合广大平民口味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1924年起,开始出版中学、小学、师范院校的教科书,成为出版发行教科书的五大家之一。出版书籍中,有政治读物《三民主义读本》、《不平等条约问答》等;有介绍各科知识的通俗读物《ABC丛书》、《生活丛书》、《世界少年文库》、《青年自学丛书》等;有陶行知主编的平民教科书《工人课本》、《农民课本》等;有连环画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封神传》、《岳飞传》、《火烧红莲寺》等。为世界书局撰稿的主要作者有陈望道、茅盾、夏丏尊、傅东华、谢六逸、徐调孚、丰子恺、杨贤江、裴小楚等。1934年,因经营不善,为李石曾所接管,由陆高谊任总经理,继续出版发行大量图书,主要有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贺之才译的《罗曼·罗兰戏剧丛书》,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1950年该书局宣告结束。在30多年经营中,共出书5000多种。

### (七) 新青年社

1920年9月成立于上海。出版《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起)。有系统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等。1923年该社为上海书店接管。

### (八) 民智书局

1921年成立于上海。国民党根据孙中山授意而创办。在初期,出书倾向进步。除出版孙中山著作外,也出版过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胡汉民的《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等书。“四一二”政变后,出书倾向发生变化。1936年停业。

### (九) 光华书局

1925年由沈松泉、张静庐在上海创办。书局与创造社关系十分密切,初建时就编辑出版了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和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书。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后,光华书局重

新编排了《创造百期汇刊》。三十年代初,书局停办。

### (十) 良友图书公司

1925年由伍联德在上海创办。创办人先后向海外侨胞和港粤商人集资,把原有的印刷厂扩展为印刷公司,自设编辑部、印刷所和门市部。历任主编有伍联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等。1926年2月15日,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良友》画报由良友图书公司创刊。画报为月刊,多半向海外侨胞邮寄,曾以大量写实图片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的主要活动。除《良友》之外,还出版多种画册。1932年,另辟文艺书出版部,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以及《一角丛书》等文学系列和单行本。刊登文艺作品,作者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还刊登一些名人回忆录,如冯玉祥的《我的入伍前后》、戈公振的《报业回忆》和徐悲鸿的《悲鸿自述》。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迁往桂林、重庆,继续经营业务。1946年停业。

### (十一) 长江书店

1926年分别成立于上海、汉口。上海长江书店由毛泽民负责,汉口的由瞿秋白主持。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叛变,两店均转入地下。

### (十二) 开明书店

1926年成立于上海。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创办人章锡琛,编译所夏丏尊、叶绍钧、王伯祥、吕叔湘、宋云彬、傅彬然、顾均正、贾祖璋、丰子恺、徐调孚等许多学者、教育家,都是名副其实的“开明(进步)人”。作为一家综合性出版单位,它不求大而全,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以中小學生、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提供正确、有益的辅导,包括教师参考用书。它出版的书刊,以校印认真为主要作风,称为“开明风”。它所编撰出版的教科书、辅导性读物、青年读物、《中学生》杂志,对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有良好的教育作用。出版



的工具书,如《辞通》、《十三经索引》、《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对教学、研究提供便利;文艺书籍方面,如巴金的《家》、《春》、《秋》,在当时中学生中间普遍流行。抗战发生后,总管理处和编译所先后迁往重庆,胜利后迁回上海。

### (十三)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1926年成立于上海。由中国科学社社友发起成立。出版《科学》杂志与《科学画报》、《中国科学社丛书》、《中国科学社通俗科学丛书》等自然科学图书。南京、广州设有分公司。

### (十四) 新月书店

1927年成立于上海。徐志摩等创办。以出版新诗集为主。1928年创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等编)。出版的书有《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著)、《死水》(闻一多著)、《白话文学史》(胡适著)等。1932年徐志摩搭飞机北上失事后,于1933年停业。

### (十五) 自由书店

1927年成立于上海。由无政府主义者创办。出版“自由丛书”,其中有《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苏俄革命惨史》等书;“社会科学丛刊”有《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等书,还出版“自由小丛书”。三十年代初停业。

### (十六) 大江书铺

1928年陈望道创办于上海。出版的期刊有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鲁迅主编的《文学研究》季刊(只出版一期就被查禁)。出版的书籍,主要是苏联的文学理论和小说,以及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夏衍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法捷耶夫的《毁灭》(均鲁迅译)。这些书都遭查禁,甚至读者也被拘讯。还出版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等专著。1933年因经济困难,盘给开明书店。

### (十七) 昆仑书店、笔耕堂书店

1928年由李达、邓初民等创办。李任总编辑。主要出版马、恩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前者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后者如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邓初民的《政治学大纲》、施复亮的《世界社会史》等。出书屡遭查禁,1932年遭租界当局搜捕,书店难以维持。李达另以笔耕堂书店名义出书,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唯物论教程》——此书原名《辩证唯物论理论入门》,传到延安,毛泽东读后作了眉批:“这部书出得及时。”《反杜林论》译者吴黎平被捕,笔耕堂重印时改名吴理屏译。1937年停办。

#### (十八) 独立出版社

1928年成立于南京。上海也设分社。国民党官方出版机构。出版时事政治读物,如“时事综合丛书”、“建国丛书”等。抗战发生后迁重庆。出版“民族复兴丛书”、“抗战建国小丛书”、“抗战文学丛刊”、“公民知识丛书”等。抗战胜利后迁回宁、沪。

#### (十九) 华兴书局

1929年成立于上海。中共地下出版社。该局出的书被查禁的,有案可查的有49种。

#### (二十) 拔提书店

1930年成立于南京。国民党军方出版机构。出版期刊有《创作》月刊、《青春》月刊;丛书有“军人小丛书”、“边疆丛书”、“国民军事丛书”等。抗战发生,先迁长沙,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复回宁。

#### (二十一) 黎明书店

1930年孙定冰创办于上海。出版复旦大学编的《文摘》季刊。出版的书籍有“暨南大学法学院丛书”、“黎明商业丛书”、“黎明文学小丛书”等。抗战期间在武汉、长沙、广州均曾设过分社。

#### (二十二) 湖风书局

1931年由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创办于上海。出版丁玲的《北斗》文艺月刊,出至第8期被国民党查禁。又出版《正路》杂志,编者张耀

华,后被杀害。湖风还出版“文学创作丛书”,以及其他文艺创作,均为左翼作家作品。1934年盘给春光书店,实际上是换一块招牌。宣侠父于1937年被反动派杀害于西安。

### (二十三) 生活书店

1932年7月成立于上海。邹韬奋为理事长,徐伯昕为总经理,编辑有胡愈之、张仲实、张友渔、胡绳等。出版主要期刊有《新生》、《世界知道》、《译文》、《大众生活》、《全民抗战》、《文艺战线》、《理论与实践》等;丛书有《青年自学丛书》、《世界文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有一些社会科学论著,如胡绳的《新哲学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此外还有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通俗政治读物和文艺读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总店迁往武汉、重庆,并在重庆、成都、桂林、西安、昆明等地开设50多个分店,在香港、新加坡还有海外分店。1945年,总店迁到上海;1947年,迁往香港;1948年,与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

### (二十四) 正中书局

1933年成立于南京,上海设分局。系国民党C.C系所办。抗战后迁重庆,胜利后总管理处和编辑部均设于上海。该局除出版教科书外,还出版各类书籍。有叶楚傖、陈立夫主编的“国防教育丛书”,周佛海主编的“中国青年丛书”,还有“外交丛书”、“军事丛书”,以及用蒋介石名义出版的《西安半月记》、《中国之命运》等。

### (二十五) 上海杂志公司

1934年5月成立于上海,张静庐创办。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发售杂志的书店。店内开架陈列各种杂志,任读者翻阅。读者订阅一种杂志,读后不想续订,可以改订另一种,称为自由订户。随后也编辑出版杂志,如《译文》(黄源主编)、《作家》(孟十还主编)等。抗战期间先后迁汉口、长沙和桂林。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 （二十六）文化书店

1935年7月成立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编委会主办。出版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种文字的课本;并经销生活、新知、读书等家的图书。四十年代新疆政局发生变化,1949年底停业。

## （二十七）新知书店

1935年秋成立于上海,以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徐雪寒编辑的《中国农村》为前身。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为总经理,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到抗战爆发为止,出版了《新世纪》、《语文》等4种期刊,社会科学著作有吴清友翻译的《帝国主义论》、薛暮桥的《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吴大琨的《大众政治经济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总店先后迁至武汉、桂林、重庆。重庆、金华、丽水、常德、襄阳、柳州等地设有分部。陆续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等。出版的社会科学论著有《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胡绳著)、《经济学》(薛暮桥著)、《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著)等。此外还有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出版。1945年,总店迁回上海;1947年迁往香港;1948年,与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并成为三联书店。

## （二十八）读书出版社

1936年初成立于上海,以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为基础,初名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理为黄洛峰,编辑有艾思奇、柳湜、郑易里等。抗战前夕,出版了《读书》、《战线》、《大家爱》、《认识月刊》等6种期刊,图书40多种,其中著名的有《大众哲学》(艾思奇著)。抗战爆发后,总社先后迁往武汉、重庆,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设有分店,香港设有办事处。期间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社会科学论著有《哲学选辑》、《新哲学大纲》、《论民主革命》等;期刊有《学

习生活》、《文学月报》、《新音乐》等。1945年，总店迁回上海；1947年，迁往香港；1948年，与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

### （二十九）风雨书屋

即1938年成立的中华图书公司。除出版《文献》月刊外，还出版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毛泽东著作）和《西行漫画》（即黄镇所作《长征漫画》）等。

### （三十）华北新华书店

1940年底成立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初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领导。1942年成立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出版《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期刊《华北文化》。1948年与晋察冀新华书店合并，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1949年3月迁北平（今北京）。

### （三十一）东北书店

1945年11月7日成立于沈阳，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总经理为李文任，副总经理为李保昌、卢鸣谷。因国民党军队进犯东北，书店先后迁至佳木斯、哈尔滨等地，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牡丹江等地设有分店，共有201个分支店，网点遍布东北各地。曾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期刊有《知识》、《翻身乐》、《东北文学》、《东北教育》、《东北画报》等。1949年7月，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

## 三、出版书目举要

中国现代出版的图书，数量巨大，难以一一列目，这里仅将主要书目列出，供参考。

### （一）马、恩、列、斯著作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陈望道译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年

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著，

- 郑次川译 上海群益书社 1920 年
- 国家论(即《国家与革命》) 列宁著 王静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 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 马克思著 李季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 列宁论组织工作 列宁著 (编译) 无产阶级书店 1927 年
- 列宁主义概论(即《列宁主义问题》) 斯大林著 瞿秋白译 长江书店(上海、汉口)1927 年
-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著 李膺扬译 上海新生命书局 1929 年
- 费尔巴哈论 恩格斯著 彭嘉生译 上海南强书局 1929 年
- 哲学之贫困 马克思著 杜竹君译 上海水沫书店 1929 年
- 革命与考茨基(即《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列宁著 贺瑞麟译 上海华兴书局 1929 年
- 帝国主义论 列宁著 刘楚平译 上海启智书局 1929 年
- 民族革命原理(即《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马克思等著 唐杰编译 上海华兴书局 1930 年
- 从猿到人(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著 成嵩译 上海泰兴图书局 1930 年
- 反杜林论 恩格斯著 吴黎平译 上海江南书店 1930 年
- 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著 杜畏之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2 年
-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列宁著 傅子东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2 年
-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方乃宣编译 武汉中国出版社 1938 年
- 资本论(一、二、三卷) 马克思著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 年
-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著 郭沫若译 上海言行社 1938 年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周扬编校 曹葆华 天蓝译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1940 年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解放社编译 延安解放社 1942 年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著 曹葆华译 华北新华书店 1948 年

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著 郭大力译 上海实践出版社 1949 年

## (二) 哲 学

孔经哲学发微 廖平 中华书局 1913 年

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编 中华书局 1916 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胡适 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哲学问题 [英]罗素著 黄凌霜译 新青年社 1920 年

唯物史观解说 [荷]郭泰著 李达译 中华书局 1921 年

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 范寿康译著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胡适 世界图书馆 1924 年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戴季陶 民智书局 1924 年

唯物史观研究 中华学艺社编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新哲学论丛 张东荪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 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苏]德波林著 林伯修译 光华书局 1929 年

哲学及其根本问题 范寿康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西洋哲学的发展 瞿世英 神州国光社 1930 年

无产阶级底哲学 张如心 光华书局 1930 年

辩证法与唯物论 张如心 光华书局 1932 年

社会哲学概论 赵一萍 生活书店 1933 年

哲学概论 范铨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现代哲学思潮 陈止谟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 行为主义 陈德荣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 中国哲学十讲 李石岑 世界书局 1935 年
- 历史哲学 [德]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朱谦之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 大众哲学 艾思奇 读书出版社 1936 年
- 辩证唯物论入门 胡绳 新知书店 1938 年
- 科学的哲学 葛名中 生活书店 1939 年
- 论道 金岳霖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 思想方法论初探 胡绳 生活书店 1941 年
- 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唐君毅 正中书店 1943 年
- 新唯识论 熊十力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 康德学述 郑昕 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 现代哲学名著评述 谢幼伟 正中书店 1947 年
- 中国哲学思想 赵纪彬 中华书局 1948 年
- 新哲学简明教程 李仲融 开明书店 1949 年
- 伦理学 ·
-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 商务印书馆 1910 年
- 德育鉴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 伦理学浅说 余家菊 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 伦理学概论 江问渔 北京法轮印字局 1925 年
- 人生哲学 冯友兰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 伦理问题 ABC 叶法元 世界书局 1929 年
- 道德哲学 张东荪 中华书局 1931 年
- 现代伦理学 孙东荪 新日书店 1932 年
- 道德学 黄方刚 世界书局 1934 年
- 道德学 [美]杜威著 余家菊译 中华书局 1935 年



新哲学的人生观 胡绳 生活书店 1937 年  
 道德自我之建立 唐君毅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中国伦理政治大纲 方乐天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 心理学 ·

迷信与心理 陈士齐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 年  
 人类的行为 郭任远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儿童心理之研究 陈鹤琴 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心理学 ABC 郭任远 ABC 丛书社 1928 年  
 群众心理及自我的分析 夏斧心译 开明书局 1929 年  
 青年期心理学 沈履 商务印书馆 1932 年  
 变态心理学 朱光潜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心理学大纲 [美]盖茨著 任况甫译 世界书局 1933 年  
 工业心理学概观 陈定山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文艺心理学 朱光潜 开明书店 1936 年  
 心理问题 萧孝嵘 中华书局 1939 年  
 社会心理学 孙本文 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三) 经济学

合作主义(上、下) 孙锡麟 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漆树芬 光华书局 1925 年  
 苏俄新经济政策 顾树森 中华书局 1927 年  
 产业革命史 [日]上田贞次郎著 刘宝书译 太平洋书店 1928 年  
 资本主义批判 [日]上川均著 高希圣译 励群书店 1928 年  
 消费论 李树时 东南书店 1928 年  
 分配论 ABC 殷寿光 世界书局 1928 年  
 中国劳工问题 陈达 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经济学大纲 [日]河上肇著 陈豹隐译 乐群书店 1929 年  
 平均地权的理论与实践 李健人 泰东图书馆 1929 年

- 土地问题 黄通 中华书局 1930 年
- 资本主义发展史 陈麒著 马寅初校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 农村经济 唐启宇 宋希庠 世界书局 1931 年
- 经济学大纲 [美]伊利著 郭大力译 世界书局 1933 年
- 经济学绪论 [英]凯恩斯著 王亚南译 郭大力校 民智书局  
1933 年
- 经济学史 王亚南 民智书局 1933 年
- 新经济学大纲 沈志远 北平经济学社 1934 年
- 世界经济危机 沈志远编 中华书局 1935 年
- 中国工业自给计划 胡博渊编 中华书局 1935 年
- 中国农村复兴问题 董成勋编著 世界书局 1935 年
- 经济政策 王渔村 中华书局 1936 年
- 日本财阀史论 郑学稼 生活书店 1936 年
-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薛暮桥 新知识书店 1937 年
- 电业会计 杨涛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 论民生主义的本质 钱俊瑞 世界社 1940 年
- 农村经济与合作 陈兹焯 教育图书出版社 1946 年
- 世界经济史纲 彭迪生 生活书店 1948 年
- 凯恩斯之经济学说 金国宝 中和印刷厂 1949 年
- 广义政治经济学 许涤新 三联书店 1949 年
- 通货新论 马寅初 商务印书馆 1949 年

#### (四) 法律

- 比较宪法 王士杰 钱端升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
- 九朝律考(上、下) 程树德 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 历代刑法考(全 4 册) 沈家本 北京木刻本 1929 年
- 中国法律发达史 杨鸿烈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梁启超 中华书局 1931 年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梁启超 中华书局 1931 年

朱熹法律思想 丘汉平 光华书局 1931 年

中国法律思想史(2卷) 杨鸿烈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中国制宪史(2册) 吴大熊 黄公觉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中国法律之批判 蔡枢衡 正中书局 1942 年

唐律通论 徐道邻 中华书局 1927 年

### (五) 语 文 学

中国文字学 徐道政 杭州武林印书馆 1917 年

白话字话 方毅 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国文法草创 陈承泽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新著国语文法 黎锦熙 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中国文法通论 刘复 群益书店 1924 年

四声实验录 刘复 群益书店 1924 年

文字教授改良论 方溯生 大东书局 1926 年

高等国语法 杨树达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言语学通论 王古鲁 世界书店 1930 年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注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甲骨文研究之扩大 董作宾 中央研究院 1930 年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 上海大江书铺 1932 年

汉语音韵学 王力 中华书局 1936 年

中国文法语文通体 杨伯峻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中国文字学史 胡朴安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中国训诂学史 胡朴安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中国文法论 何容 商务印书馆 1941 年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商务印书馆 1942 年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

汉语语法论 高名凯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

中国文字学 唐兰 开明书店 1949 年

汉字问题 艾伟 中华书局 1949 年

### (六) 历史

史学要论 李大钊 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二十史朔闰表 陈垣 励耘书屋丛刻本 1925 年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支伟成 章太炎校 泰东图书局 1925 年

古史辨(7 册) 顾颉刚 朴社 开明书店 1926—1941 年

清史稿 赵尔巽 清史馆 1927 年

中国文化史 顾康伯 泰东图书局 1927 年

清史列传(80 卷) 中华书局编 中华书局 1928 年

汉代风俗制度史 瞿兑之 北平广业书社 1928 年

中国妇女生活史 陈东原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 上海联合书店 1930 年

清开国史料考(6 卷) 谢国桢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1 年

元典章校补(10 卷) 陈垣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1932 年

西洋文化简史 常乃熹 中华书局 1934 年

西洋文化史大纲 顾康伯 中华书局 1934 年

明元清系通纪(16 卷) 孟森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34 年

三国史略 王钟麒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中国近世文化史 陈安仁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二十五史补编(6 册) 开明书店编 开明书店 1936 年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吕振羽 南京文化印刷社 1936 年

四部备要 中华书局编 中华书局 1936 年

古史新证 王国维 北平朱薰阁 1937 年

太平天国史纲 罗尔纲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中国婚姻史 陈顾远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 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 陈安仁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湘军兵志 罗尔纲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中国通史 周谷城 开明书店 1939 年  
国史大纲 钱穆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蔡尚思 中华书局 1940 年  
中国通史(2册) 吕思勉 开明书店 1940 年  
中国史学通论 朱希祖 独立出版社 1943 年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十批判书 郭沫若 群益出版社 1945 年  
宋辽金史(第1册) 金毓黻 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秦汉史 李源澄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历史人物 郭沫若 海燕书店 1947 年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新华晋绥分店 1947 年  
清史讲义 孟森 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7 年  
秦汉史(2册) 吕思勉 开明书店 1947 年  
中国古代社会史 侯外庐 新知识书局 1948 年  
两晋南北朝史 吕思勉 开明书店 1948 年  
世界通史(3册) 周谷城 商务印书馆 1949 年  
简明中国通史(2册) 吕振羽 三联书店 1949 年

### (七) 文 学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胡适 申报馆 1924 年  
文学概论 潘梓年 北新书局 1925 年  
神话研究 黄石 开明书店  
文学概论 田汉 中华书局 1927 年  
文学概论 郁达夫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  
文学大纲 郑振铎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  
文艺论 ABC 夏丏尊 世界书局 1927 年

- 中国神话研究 ABC 茅盾 世界书局 1929 年  
唐代文学概论 朱炳煦 群众图书公司 1929 年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陈子展 中华书局 1929 年  
冰心女士全集 冰心 合成书店 1930 年  
清代文学 张宗祥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中国文艺论战 李何林 北新书局 1930 年  
现代中国文学作家 阿英 亚东图书馆 1932 年  
创作的经验(论文集) 鲁迅等著 天马书店 1933 年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世界书局 1933 年  
沫若代表作选 张均编 全球书店 1937 年  
鲁迅全集(20册)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 复社 1938 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 开明书店 1944 年  
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4册) 周瘦鹃译 大东书局 1947 年

#### (八) 自然科学、应用技术

- 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 上海医学总局 1920 年  
医学史纲 李涛 中华医学会 1930 年  
清式营造则例 梁思成 中国营造学社 1934 年  
历法通志 朱文鑫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化学史通考 丁绪贤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中国度量衡史 吴承洛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章鸿钊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中国地理学史 王庸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中国水利史 郑肇基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中国化学史 李乔革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 范行准 中华医学史会钧石出版社 1943 年  
历代治河方略述要 张含英 商务印书馆 1945 年  
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 李四光 中华书局 1947 年

## 参 考 文 献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
-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1 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1 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 1 卷（1912—1916 年）上、下，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 2 卷（1916—

- 1920年),中华书局1987年版。
- 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张紫晨著:《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严昌洪著:《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许全兴、陈战难、宋一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李振霞、傅云龙主编:《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罗洛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郑家栋著:《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濮子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上海)1948年版。
-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杨稚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 林茂生、王维礼、王榕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 1991 年版。
- 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上、中、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 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著:《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李朝先、段克强著:《中国图书馆史》,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王酉梅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 孙英民、李友谋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于润祥著:《音乐美学史学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音乐协会四川分会编:《中国音乐家小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吴晓邦著:《舞蹈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 许道明等著:《中国电影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版。
-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年版。
- 张庚等编著:《中国戏剧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杨世祥著:《中国戏剧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逊著:《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年版。
- 毕剑横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概述》,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